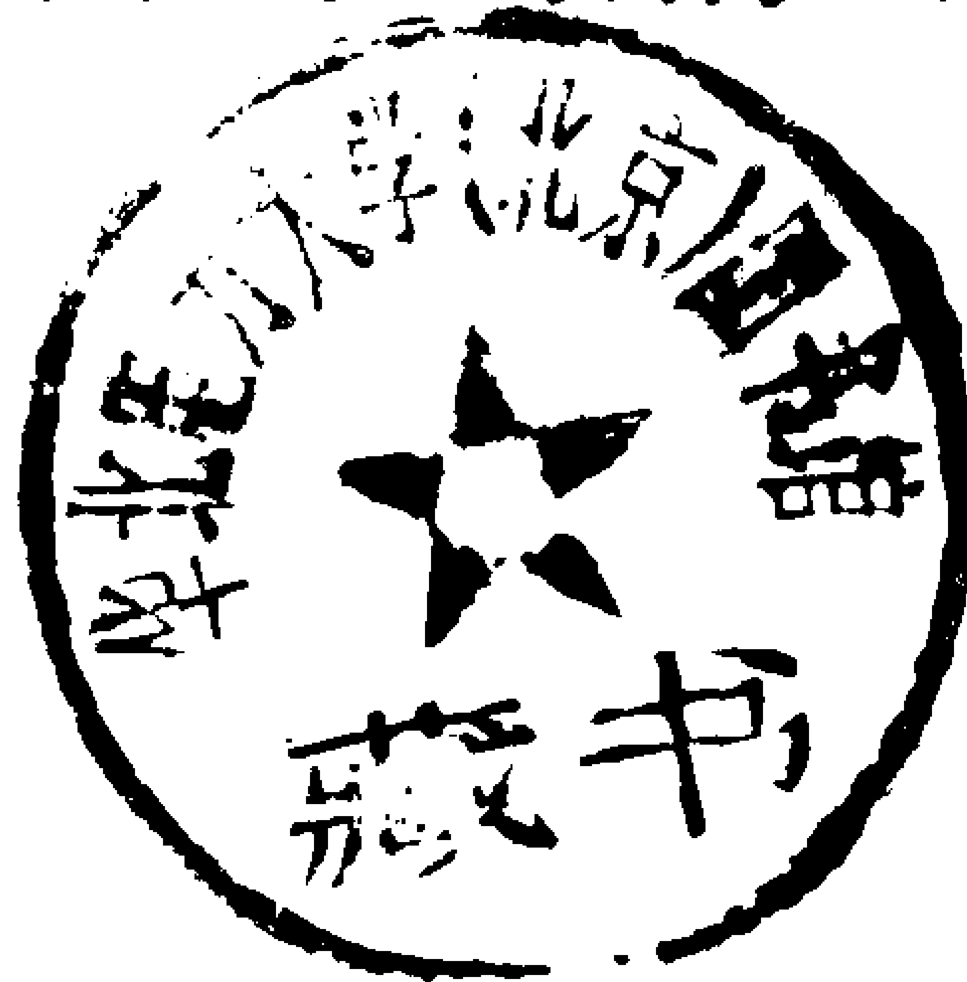
СЕРИЯ КНИГ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白银时代丛书

红木

〔俄国〕鲍·皮利尼亚克 著

石枕川 刘引梅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木/（俄）皮利尼亚克著；石枕川，刘引梅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白银时代丛书）
ISBN 7－5063－1341－3
Ⅰ．红…　Ⅱ．①皮…②石…③刘…　Ⅲ．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Ⅳ．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677 号

红　木

作者：〔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译者：石枕川　刘引梅
丛书主编：严永兴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50 千
印张：12.5　　**插页：**4
印数：001—11000
版次：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41－3/I·1329
定价：19.80 元

辉煌的白银时代

（总　序）

严　永　兴

一

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

大家知道，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等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因此，面向二十一世纪，海内外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悉心研究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

社会到历史，从军事到科技，从宗教到哲学，从艺术到文化，等等，无不涉猎。

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全都跨鹤西去，只剩下片片花瓣，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

首先，许多研究者几乎不谋而合地形成一个共通点，认为所谓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应该有三种文化，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俄国文化。源自同一母体的三种文化，虽具继承性和延续性，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文化内涵、思想、表现形式、成就和影响。因此，它们是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却非一种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它们的不同名称，亦不表示它们各自的含金量、重要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产生了以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

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为首的俄国新音乐；也使俄国芭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除法兰西、意大利之外的世界芭蕾第三学派——俄罗斯舞派；并使以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等著名画家为中坚的俄国巡回展览画派迅速崛起，左右俄国画坛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似乎都毋容置疑，且为世界各国文化界人士所熟悉，所接受。但是，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诸多原因，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或者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恰如蚌中珍珠，沙漠隐泉，掩藏着一个粲然的世界，清冽，明丽，灵动，精致，却长期鲜为人知。殊不知，短短三十年的白银时代，得天地之韵律，时代之造化，不但今天让人神醉情驰，刮目相看，就在当时，它所达到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成就和影响所及（尤其是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理论、音乐、芭蕾、表演艺术、摄影、电影、绘画、雕塑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涉及建筑、工业品艺术设计、宗教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

绘画方面，世界抽象艺术的鼻祖就是俄国的康定斯基，他的一系列以音乐命名的抽象画风靡世界，他发表于1910—1926年间的四部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论具体艺术》和《点、线、面》，成了抽象艺术的奠基之作。再加上1915年以一幅《黑方块》轰动京城的马格维奇和美术设计艺术的奠基人塔特林，无论是属至上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成就都是惊人的。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1915年是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分裂”，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转折点。理由是造型艺术找到了“自身至高无上的语言”，开始否定古希腊的拟态（模仿大自然）原则，“有理性地在符号系统中进行创作”。（列什，《俄罗斯文化

的青铜时代》,《文学报》1997 年 4 月 16 日)

这个论断不无道理，但岂止绘画。音乐方面，如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起来，以早期的原始表现主义、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和晚期的无调性序列主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终于融汇贯通而攀上音乐艺术的峰巅。斯克里亚宾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探索表现主义的和声结构,他的《普罗米修斯》交响诗等作品，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肖斯塔科维奇虽是后来者，但他从 1925 年登上乐坛，即表现出异常独特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音乐语言和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使作品富有哲理。虽屡遭批判，但无法动摇他作为二十世纪交响乐大师的地位。

俄国芭蕾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占主导地位，接着以戈尔斯基、福金、斯特拉文斯基等艺术家为组合，从芭蕾音乐、芭蕾舞改编和表演风格上进行革新。并依托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年轻的舞蹈家们在欧美各国成功的巡回演出，产生极大影响。斯特拉文斯基风格独特的芭蕾音乐和印象派画家科罗温色彩绚丽、场面宏伟的舞台设计，此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著名画家兼建筑师利西茨基把俄国的至上主义、非具象艺术、构成主义与西欧的新造型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西方的建筑与美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并推动了美国前卫艺术的发展。

但是，应该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最灿烂辉煌的，当推文学。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十九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俄国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

每每高山仰止，或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

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

二

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世纪末（1900 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和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

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安德列·别雷（1880—1934）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3—1914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

《彼得堡》在俄罗斯文学中，是一部同时表现了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表现了世界的作品。作家所展现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在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界定的，又是朦胧模糊和无限的。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但它犹如一幅涵纳万象的巨型绘画，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蕴含异常的艺术魅力，并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至今的民

间传说和文学掌故，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哲学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数以万计。”别雷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改革上，除象征和意识流，他还追求小说的诗化、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的节奏和“音响”效果，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旋律的再现等音乐作曲技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因此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享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叙述技巧上的繁复，以及作者大量使用的古文字、民间词语、外来词和仿声词，往往让译者面对“天书”望而却步。因此西方虽早有“别雷学”研究，但《彼得堡》的译介却大大滞后，德、法、英文的译本几乎都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

1990年，我曾约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善行研究员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彼得堡》的部分章节。钱先生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担此重任后，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始大功告成，可见态度之认真和译事之艰难。但译文准确传神，使我国读者得以第一次领略这部名著的魅力，可惜只是选译。此后，钱先生又与他夫人合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1922年版的《彼得堡》(删节本)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开始该书的另一版本（全本）的翻译，也即我们这套“白银时代丛书”中的《彼得堡》中译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经前后六七年的潜心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已经将译文磨炼得近乎精雕细镂的程度，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

"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

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

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二十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

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

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

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

三

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

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

布宁十九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

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二十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

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就是这次“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的作家之一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布宁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如果说，高尔基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布宁的散文注重语言的洗练、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那么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是在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由于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总是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因此他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有力的影响和启发。

鲁迅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只消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先生七十六年前的评价，比起安德列耶夫的一些同胞评论家们，要客观得多，真诚得多。

诚然，不能说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部部都属上乘，但是它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辨，都与当时的

社会现实相交融，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儿散发着严峻、强悍、豪壮、奇崛的风范，如果他要写出几行流丽优雅的文字，反而会使人们惊讶，感到不协调。他甚至吝啬到不肯在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个性特征上多费笔墨，也不注重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惜篇幅，调动一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手段，渲染夸张、强化突出他意识中的“事实的形象”，亦即他的主观感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如《红笑》，如《七个绞刑犯》，如诸多其他作品，与其说他在写作，供人阅读，不如说他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写作技巧论，用浓墨重彩、强烈对比、刺激性的色调、荒诞的形象来描摹自然物象、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不是太离谱了吗？只有把技巧与思想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理想的渴求化为笔底风云。

这，就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

四

正在这时候，1917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

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

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1918年以后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与考验。

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暇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以后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苦难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

生命脉流的搏动。

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十八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的地位。一生创作有长诗十七部，其中有十一部是在1922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是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遭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做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由于家庭熏陶，纳博科夫十五岁便出版了第

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

五

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生辉，继续着白银时代文学的辉煌。

记得在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副对联：

秋从夏雨声中入，
春在寒梅蕊上寻。

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

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以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雅可夫斯基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间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

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

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她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

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

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如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1966 年西蒙诺夫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其实，称“严谨的现实主义”并不贴切，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坛上确曾出现过荒诞派，虽说只是昙花一现。荒诞派没有纲领，没有团体，但是却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堪称荒诞派小说的杰作，并且比西欧和拉美的超前了几十年。只不过人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无缘读到这些“荒诞离奇”的作品，原因是它们根本无法得以问世，或是一经问世即遭厄运。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作为“回归文学”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

六

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两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

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

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

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年，奥威尔的《1984年》出版，亦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

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离奇动人的艳情惊险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

七

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1894—1938），也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裸年》和《红木》。他不属于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描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这是作家最为熟悉的生活。小说中，那种常常被称作外省奇特或古怪本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儿子鲍里斯·安德罗尼卡什维奇-皮利尼亚克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我的父亲》一文中认为，小城生活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城市里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在这些荒诞不经（或是病态）的行为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革命撕掉了天性体面美好的外衣，它那被压抑的、细心包藏的、如今公开表露的不良影响也就暴露无遗。

奇怪的是，作品刚问世，便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文章，说“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红木’的中篇和许多其他作品虽然我都没有读过”，不过，“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这无异是一种军事叛乱”。高尔基虽然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目睹对当时任全俄作协主席的皮利尼亚克的围剿，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表示不同意用“似乎要把他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全部抹杀”的态度来对待皮利尼亚克。他两次撰文指出，据他对皮利尼亚克等作家的了解，“他们并不想妨碍正在创建的美好而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对忠诚地从事这项必要而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怀有生就的敌

意”。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这场围绕《红木》的批判运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作家的人品由此亦可见一斑。

其实，皮利尼亚克的全部灾难，均由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生。作品中虽没有提及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书生气十足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皮利尼亚克最终没有逃脱厄运，1937年10月28日，在三周岁的儿子生日那天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枪决。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是他晚年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但风格已趋平和，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隐含着苦涩和深沉的思索；对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细致描写和颂扬，蕴含着作家博大精深的艺术底蕴，展露了俄国文化不可轻易窥探的秘仪。

与上述写现实和写荒诞的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批在大自然和幻想世界中遨游的作家，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格林。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诗化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依相傍，点化了生活和世界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亦善以抒情笔调描绘大自然的美景，作品充满诗意，抒发对祖国、人民、生活的无限关切和爱恋之情。

“白银时代丛书”介绍的最后一位作家格林（1880—1932），是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杰出的浪漫派作家，以其富于浪漫色彩与专写爱情、冒险、奇遇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幻想作品闻名于世。他原名格林涅夫斯基，波兰流放犯的儿子，身世坎坷，从小漂泊俄罗斯各地，当过渔民、水手、矿工、士兵，多次被沙皇政府投入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一生中

目睹了人世间的沉重与丑恶。他的小说便取材于他的历险见闻和苦难经历，那辽阔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岛、那低语的清风和芬芳的花香所特有的异域情调，那富于奇思异想、意境怪诞的神秘冒险，那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和理想中的“格林国”，那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奇遇，那表现深刻人道主义的幻想世界，编织成一部部动人心弦的抒情浪漫小说，描绘出一幅幅朦胧幽眇的画卷，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美好信念，使格林的小说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显得精深华美，寄托遥深，清新而鲜亮。

八

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逐渐低迷、衰落，到二十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蜚声文坛、卓有成就的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他们的匆匆离去，无疑加速了这辉煌时代的终止步伐。

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书桌上铺就的白纸，却是空白一片。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可以写

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家和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松，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

待到废黜百家、禁书和镇压，俄罗斯文学的冬天便来临了。

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

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
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白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白银时代文学留给我们太多的辉煌、惊叹和思索。但愿“白银时代丛书”沧海一粟的六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学大师们那依然跳动着的脉搏，能带给读者一缕墨香、一份愉悦、一丝意绪。

一九九七年夏于中国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译者简介

石枕川，1931年生，解放军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除教研工作外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译介。翻译过十九世纪作家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谢德林，二十世纪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阿勃拉莫夫、别洛夫、别利亚耶夫、皮利尼亚克、勃留索夫、伊斯坎德尔、卡达耶夫、凯特琳斯卡娅、阿纳托利·金、马卡宁、纳吉宾、纳博科夫、雅申等人的作品，散见于《花城》、《花城译丛》、《百花洲》、《苏联文艺》、《外国文艺》等杂志，或由江苏译林、上海译文、江苏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漓江、东方、人文出版社出版。一些译作曾被收录入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吕同六、柳鸣九、钱善行、严永兴等专家学者所编的各种丛书。

译者简介

刘引梅，1952年生，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75—1977年在北京版本图书馆编译室工作，参加翻译《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注释、《恩格斯传》等。1977年至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先后参加了文学进修班学习和在资料室工作。1990年在莫斯科文化学院进修。现为外国文学编辑室副编审。

从事编辑工作以来，编辑的图书有：《人生舞台》、《诗人之恋——俄国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安娜·卡列尼娜》、《苦难历程》、《青年近卫军》等。

翻译出版的作品有：《科学皇后》、《祸起宫墙》（上册）、《在人间》、《幽灵》、《卡利奥斯特罗伯爵》、《黑衣修士》等。

译者简介

石枕川，1931年生,解放军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除教研工作外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译介。翻译过十九世纪作家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谢德林,二十世纪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阿勃拉莫夫、别洛夫、别利亚耶夫、皮利尼亚克、勃留索夫、伊斯坎德尔、卡达耶夫、凯特琳斯卡娅、阿纳托利·金、马卡宁、纳吉宾、纳博科夫、雅申等人的作品，散见于《花城》、《花城译丛》、《百花洲》、《苏联文艺》、《外国文艺》等杂志,或由江苏译林、上海译文、江苏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漓江、东方、人文出版社出版。一些译作被收录入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吕同六、柳鸣九、钱善行、严永兴等专家学者所编的各种丛书。

刘引梅，1952年生，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75—1977年在北京版本图书馆编译室工作，参加翻译《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注释、《恩格斯传》等。1977年至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先后参加了文学进修班学习和在资料室工作。1990年在莫斯科文化学院进修。现为外国文学编辑室副编审。从事编辑工作以来，编辑的图书有：《人生舞台》、《诗人之恋——俄国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安娜·卡列尼娜》、《苦难历程》、《青年近卫军》等。翻译出版的作品有：《科学皇后》、《祸起宫墙》(上册)、《在人间》、《幽灵》、《卡利奥斯特罗伯爵》、《黑衣修士》等。



鲍·皮利尼亚克

目录

红　　木

石枕川　译

第 一 章

穷哥儿，预言者，乞讨人，流浪歌手，拉撒路[1]，云游派教徒，先知，朝圣香客，愚人，癫僧——神圣罗斯[2]生活中这些名异实同的芸芸众生，以上帝名义乞讨和募化的人，装点着自有罗斯以来，自伊万王朝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一切俄国的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作家无不埋首笔耕，追忆这些逝者。这些疯子或痞子，煞有介事的虔诚信徒，都被称为教堂的骄傲之花，上帝的使徒，来世的祈求者。俄国的正统历史和经典文学也这样赞颂他们。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住在莫斯科、就读于神学院但未修完课程、名叫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的癫僧死在耶稣登山节医院。因

①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一乞丐名，后以此名泛称乞丐。
② 罗斯为俄罗斯古称。

这癫僧有相当名气，于是采访记者、诗人和史学家大做文章，纷纷撰文记述他的葬仪。有位诗人在俄国资格最老的《消息报》上咏叹：

疯人院在举行什么大典？
但见人如潮涌车如龙，
全那么急急匆匆，
忧心忡忡。
人丛里不断传来阵阵叹息，
声音是那样凄切：
先知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登天了，
一盏明灯熄灭了。

史学家斯卡夫龙斯基在《莫斯科特写》中说，死者入土前，为他整整做了五天五夜、二百多次的安灵弥撒，许多人干脆就在教堂旁边宿夜。据葬礼目击者、《二十六个莫斯科伪先知、假癫僧和愚人》研讨文章的作者巴尔科夫记述，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的葬礼原订礼拜天举行，《警方公报》也已正式公布，但因一早出殡时在蜂拥而至的仰慕者之间产生争执而不得不推迟。究竟在哪里安葬？数方各执一词，几至动武，恶言恶语自不必细述。一些人要把灵柩运去斯摩棱斯克逝者的故乡。另一些人执意把他安葬在波克罗夫斯基男修院，说是墓穴都挖好了，就在教堂跟前。第三类人恳求把他的遗骸存进阿列克谢耶斯基女修院。第四类人拦住棺材，硬是把它往切尔什兹村拖。史学家写道："该时适逢阴雨，道路泥泞，灵柩由医院运送教堂、由教堂运送墓地途中，无论出嫁妇女或待字姑娘，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一律匍伏地上，向灵柩致哀。"史学家还提到："伊万·

雅可夫列维奇弥留之际大便失禁，污物流了一地，不得已命打更人撒上沙子以遮狼藉。仰慕者把沙子当作灵丹妙药，争着捡回家中。孩子肚痛，母亲在稀糊里渗半匙这样的沙子，让孩子服用，果然病痛霍然若失。安灵弥撒后，堵死者耳朵、鼻孔的棉花也被分割成许许多多小块，赠予参加弥撒的信徒。又因此人死于水肿，从棺木里不断滴下浊水，为此送殡者专门从家中带来小瓶接盛。死者所着衬衣亦撕成碎片，分赠善男信女。棺木厝放教堂期间，残疾人、疯癫者、伪君子、男女香客从四方云集，挤不进教堂的只得伫立街头。有的当众布道，有的诵经显灵，有的卜算祸福，有的公开募化，但听得喊声迭起，人语鼎沸。”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生前喜欢把他的洗脸水当作甘露赐给仰慕者，并能预卜未来，或用口述，或用手写。他的手谕已归入历史研究文献。有个教徒向他讨教：某人可否择妻？他答复道：“你失去的，便会……得到。”

莫斯科有个叫“中国城”的市区，便是癫僧们荟萃之地。其中有写诗的，有学鸡打鸣或学孔雀和红腹灰雀叽叽叫的，有以上帝名义骂娘的，有的只把三句话奉为至圣，并将它代谕神意：“人生像童话，棺木才是家，躺着保平安！”有的人癖好狗叫，据说上帝的意志正是由狗叫来预示的。在穷哥们、乞食者、卜卦人、拉撒路、流浪歌手——神圣罗斯的贫民中还夹杂着农夫、小市民、贵族、商贩、孩子、老人、壮汉和生儿育女的婆娘。他们醉意朦胧，专注于干酪和大葱头，他们在亚细亚的俄罗斯帝国的平静中过日子。而葱头状的教堂尖顶便是这俄罗斯生活的象征。

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俄罗斯的其他城市里还有另一类

怪人。这些人的出现始于俄罗斯帝国而非俄罗斯王国[1]。由这类怪人创造了一门艺术——俄罗斯家具。它自彼得大帝时兴起，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粲然凸现。关于这种农奴时代的艺术，历史上并无文字记载，艺术家的名字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无闻。这是一种个体的艺术，是在城市的地下室里，地主庄园的毗屋里，在烈酒和恶劣条件下产生的艺术。它肇始于十七世纪的法国艺术大师雅可布和布尔。年方十几的农奴被送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再从那里送到巴黎、维也纳学艺。学罢回到圣彼得堡的阴暗地下室，再从那里回到地主庄园的毗屋，于是动手创作。一个能工巧匠往往以数十年时间来雕凿一张安乐椅或一张梳妆镜台，一个八宝箱或一顶书橱。他们喝酒，雕凿，死去。未完工的艺术品由他们的外甥接手。这些巧匠一般没有后代，概由侄甥继承技艺。一批又一批的巧匠相继死去，但艺术品留在地主庄园和花园洋楼里供人鉴赏。鉴赏者坐在安乐椅里死去，在八宝箱里珍藏他们的密信，小娘们对镜审视青春年华，老婆子对镜审视龙钟暮态。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时代崇尚洛可可式、巴罗克式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喜欢在红木（包括黄檀木、紫檀木、蓝花楹木、榉木、花纹桦木和胡桃木）家具上饰以青铜及涡纹。俄国皇帝保罗是共济会会员，却不要花饰而要军人的粗犷线条。保罗的内寝布置得庄严肃穆，家具一律用抛光红木，墨绿漆面，加上黑狮和狮身鹰首怪物雕饰。亚历山大一世转向埃拉多斯[2]，古典主义。红木雕刻艺术一直传到尼古拉一世，他又恢复了保罗的风尚，同他长兄亚历山大一世的豪华不可同日而语。

---

① 彼得一世于1721年称帝，为俄国第一个皇帝，自此俄国称帝国。而此前俄国君主仅称沙皇，此处故译王国。

② 希腊古称。

1861 年农奴制崩溃，农奴工艺改由家具工厂取代："莱温松"、"托内特"、维也纳式的轻巧家具成为时髦。但工艺师的侄甥们伴随着伏特加酒活了下来。这些徒子徒孙什么新东西也不创作，而专事复古。是他们保留下了爷叔们的技艺和传统。他们也都是单身汉，不爱多说话。他们为自己干的这一行而骄傲，一如哲学家为自己的论点而踌躇满志；他们爱自己的工作，一如诗人爱自己的诗篇。他们仍住在地下室里。这些巧匠们绝不去家具厂，绝不肯放下面子去修尼古拉一世以后的轻佻货。他们是古董家，复古派。他们从莫斯科人的住家的阁楼上或未遭火劫的地主庄园的杂物棚里找到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保罗时期的或亚历山大时期的一张桌子，一件三扇镜妆台，一张安乐椅，于是买回去，成年累月地在地下室里摆弄它们；抽烟，沉思，眯起一只眼瞅那古玩艺，想方设法使它复活；爱那古玩艺儿爱不释手；没准还会在书桌的夹层抽屉里找到个小小的八宝箱，箱里还保存着一束发黄了的信札。他们是复古派，眼睛盯着过去，盯着那古玩艺儿的年代。他们必定是古怪的人，把古董古怪地转卖给同样古怪的古董收藏家，买卖成交时还和收藏家一起喝成交酒：把整装白兰地倒进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四棱瓶，再从四棱瓶斟到镶金砌玉的御盏里。

第　二　章

1928年。

小县城——俄罗斯的布吕赫，俄国的镰仓[1]。三百年前，留里克王朝[2] 的最后一位王太子曾在此被害。被害那天王太子和图奇科夫贵族后裔在一起嬉戏。图奇科夫一脉在本城绵延迄今，乃如该时所建的修道院和该时一些名气较小的贵族至今仍能见到那样……它是罗斯古迹的保留地，一个小县城，地处伏尔加河上流深水航段，有森林、沼泽围绕，有稀稀落落的村庄在一旁点缀，有修道院，地主庄园。它连接着一连串的其他小城市——特维尔，乌格利奇，雅罗斯拉夫尔，大罗斯托夫。它是个寺院群立的县邑，原是俄国的一块皇室领地。它有长遍除虫菊的街巷，有惨案和百年纪念的碑坊。县城离莫斯科二百俄里，离

① 吕布赫是比利时的古老城市，镰仓是日本的古老城市。
② 系罗斯公的王朝。九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的基辅公、莫斯科公和俄国沙皇都被认为是留里克的后裔。

铁路五十俄里。

这里散落着庄园的断垣残壁和旧时的红木家具。这里的博物馆馆长头戴高筒礼帽，身着披风大衣，腰间挂着博物馆和各寺院的钥匙。他在酒肆当着人面喝茶，在储藏室里独自一人喝酒。他家中堆满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遗物：圣经，圣像，大司祭的和主教的法冠，助祭的法衣，锦缎套袖，僧侣长袍，金银宝石衣饰，盖圣餐盘的方巾，裹尸布和祭坛上的裙布。他书房里陈列着卡拉津的红木家什，书桌上放着卡拉津的外形如同贵族盔帽的烟缸。

维亚切斯拉夫·巴甫洛维奇，也就是说卡拉津老爷，革命爆发前二十五年因生性耿直而离开了他曾为之服役的近卫重骑兵团。他的一个同事盗窃了公款，上级派他调查，他向上级报告了实情。但上级有意掩护盗用公款者，这叫他受不了，他写了第二份报告——请求解职的报告。从此他蛰居庄园，一星期只出一次门，为的是到县城来买日用必需品。每次出门，他乘坐笨重的大马车，随带两名仆役。他伸出戴白手套的手来，指示店掌柜为他称半磅鱼子酱，半磅多点儿干咸鲟鱼肉和鳇鱼肉。一个仆役付款，另一个仆役接过买下的商品。有一次，店掌柜为表敬意，想跟卡拉津老爷握手，但后者手也不抬，只说了句："算啦！"卡拉津老爷头戴贵族制帽，身着尼古拉式大氅。革命迫使他从庄园迁来县城，但那制帽和大氅还是留给了他。现在卡拉津老爷仍然戴着那顶制帽排队购物，不过，跟班的不再是仆役而是他的妻子。

卡拉津靠变卖古董过日子，为此常去找博物馆馆长。在馆长那里他见到革命后从他庄园里没收来的旧物。不过他并不动心。有一回，他瞧见馆长书桌上放了那只外形像贵族制帽的烟灰缸。

“把这拿开，”他简短地命令。

“为什么?”馆长问。

“俄国贵族的制帽不应当成为烟灰缸，”卡拉津老爷回答。

两位古董家起了争执。卡拉津老爷忿然离去，自此再没跨进博物馆馆长家的门槛。城里的一个马具匠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他早年在老爷府里当小厮时的往事，说有一次因手脚怠慢，老爷用左手赏了他一记耳光，打落了他七颗牙齿。

县城冷清而郁闷，一昼夜只能听到两次航班经过时冲破沉闷的汽笛声和教堂的古老钟鸣。但那钟声只响到1928年，因为1928年许多钟都被摘下，送去冶炼厂了。一般用辘轳、滚木和大索把钟吊到钟楼外面，让钟自行坠落。随着辘轳和滚木的滑动，那钟发出沉郁的呻吟。呻吟声久久地滞留在沉郁的县城上空。每口钟呼啸坠地时都把地砸成一公尺半左右的深坑。

摘钟的那些日子里，县城也像古钟那样在呻吟。

县城里最派用场的是工会证。商店门前排队的分作两行，一队人有会员证，另一队人没有。有工会会员证的租用伏尔加河上的游艇每小时十戈比，非会员得掏四十戈比。电影票价对非工会会员每张二十五、四十及六十戈比，对会员每张五、十和十五戈比。能与工会会员证相提并论的只有食物配给证。而配给证，当然，还有与之相关联的面包，只发给有选举权的人，每人每日四百克定量。没有选举权的人及其子女不予配给。影院设在工会大院的一个生有火炉的板房里。电影开场通常并不按铃通知。全城的作息时间由电厂发出统一信号：第一次信号——该结束早茶，第二次信号——整衣出门上班。发电厂工作到子夜一时，但逢列宁生辰、十月革命节或其他意料外的节日——如执委会主席或工业联合企业主席等领导者寿庆，发电厂破例通宵服务，普通居民连带沾光，乘此庆贺自家的生日。有一次，

有个姓萨茨或卡茨的某内贸全权代表，在头脑极其清醒的状况下不意碰撞了执委会主席夫人，该夫人轻蔑地啐了他一句："竟敢对我库瓦尔济娜如此冒失！"萨茨一时不知这个姓氏的厉害，但在惊讶之余，仍连连道歉，后来还是落了个滚出县城的下场。县城领导自成一体，他们出于天生的不信任感，在提防着其他居民。但他们的生活乏味，用无谓纠纷代替社会活动。当然领导层内部也有工作调动，例如县城的某一领导调任另一岗位的领导，但这纯属内部调整，根据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及事贵人和的原则。协调经济也同样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县城，经管经济的是联合企业（联合企业产生于本篇主人公伊万·奥若戈夫成为神经病人之后）。其管委会主席是库瓦尔济娜夫人的丈夫库瓦尔金。工农检查委员会全权代表是普列斯努欣，主席则由涅多苏戈夫担任。在他们的管理下，革命前的财物逐次耗散。他们也重视遗产，无奈大手大脚，不善经营。榨油厂亏本；锯木厂亏本；制革厂不亏，但不赚钱，更无所谓折旧资金。在那大雪铺地的冬天，动用了四十五匹马和全城的一半居民，把一只大铁锅从五十俄里开外的地方拖到制革厂，可拖到制革厂便报废，纳入盈利和亏损部分报销了，因为不适用。那时候，为铡草而买了一台树皮粉碎机，后来也废置不用——麦秸究竟不是树皮！为改善工人居住条件，能像建筑工那样住集体住宿，买下了一幢二层楼木结构房子。拆房，搬运，到了工厂把它锯成一段段有用的木料。锯成的木料共计五立方，十三根，因为其余的业已腐朽，派不上用处。用这十三根木料，外加九千卢布，建成了工人宿舍。新屋落成之日，也是工厂倒闭之时。它之所以倒闭，并非因为像其他厂家那样亏了本，而是无利可图。新屋权且空闭。联合企业靠变卖革命后未复工企业的设备来弥补亏损。变卖的方式挺奇巧：管委会主席库瓦尔金向管委会委员

库瓦尔金出售一批木料，以固定价格对折计算，计约二万五千卢布；管委会委员库瓦尔金转手卖给居民，其中一小部分卖给库瓦尔金个人，按固定价格，得五万余卢布。1927年将临之际，管委会庆祝其所获之成就，决定赠库瓦尔金一只皮包。买皮包的钱列入待报销项目，由出纳员暂付，然后征集居民签名，让大家分担费用。收集来的钱归还给了出纳。领导层受居民阶层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闭塞的，兴趣是狭隘的，对新鲜事物无动于衷。县城出售两类酒：伏特加白酒和教堂用的红甜酒。其他的品种没有。伏特加的需求量很大。红甜酒比较小，但也相当可观，因为领圣体时非用它不可。县城里卖的纸烟大炮牌每包十一戈比，拳击牌十四戈比。其他牌号的缺货。买烟像买伏特加，要排队：有工会会员证的排一行，无证者另排一行。一昼夜间有两趟航班打这里过。轮埠的小店里能买到萨福牌纸烟，波尔图葡萄酒和花楸露酒。它在城里没法见到，因为城里没有个体商。买萨福牌烟要超过个人预算，买得起的显然钱的来路不正。县邑是个小城，居家过日子要另找额外收入作补贴，靠菜园子，靠互相照顾和互相服务。

县城里有顶斯库特林桥，斯库特林桥畔有幢称作斯库特林府的房子，里面住着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本人。他虽八十高龄，农民有事还来找他当跑腿。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有两个年龄与他相差悬殊的胞妹：一个叫卡皮托莉娜，另一个叫里玛。他还有个胞弟，名叫伊万。他们不住在一起，但住同一县城。伊万后来改姓奥若戈夫，成了懒蛋，有关他的事将在下面提到。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最近四十年来一直受疝气的折磨，走

路时须用左手伸进裤裆，托住下垂部分。他的双手非但浮肿，而且发青。他喜欢抓起盐瓶，给面包撒上厚厚一层盐，以至嚼面包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吃罢，他把散落在桌上的盐粒小心翼翼地捡起，归到盐瓶里。最近三十年雅科夫·卡尔波维奇的作息有点儿离谱。他半夜起床，满带劲地诵读《圣经》，直读到晨曦映窗，然后倒头睡到正午，正午去阅览室读报。报纸在县城没有零售。订吧——没钱。要读报，就得上阅览室。雅可夫·卡尔波维奇身子发福，已经谢顶，长一双见风便掉泪的泪眼。他开口说话先喘上一阵子气。斯库特林府原属地主韦列伊斯基，后者因农奴制的废除和丢了调解法官职务而破产。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原在军队服役，那年服役期满，回来在韦列伊斯基手下当了名录事，懂得了衙门诀窍，乘韦列伊斯基不走运买下他的房子，并取代了他的职务。这幢房子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至今仍然完好，只是由于一百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免像宅主人的年久月深的红木家具那样显得稍稍暗淡，玻璃窗框增加了霉绿。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对农奴制记忆犹新。老头儿记得农奴制庄园里的老爷、塞瓦斯托波尔大募兵、最近五十年来所有俄国的部长和苏联人民委员的名字和父称、所有帝俄时代的大使和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强的所有外交部长和总理、帝皇和大主教的姓氏。老头儿忘了自己偌大年纪，夸口道：

“我比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皇和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得还长，我还要超过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

老头儿的笑容特别使人不舒服：既像谄媚，又像笑里藏刀，笑的时候总是翻着他那双泪眼。老头儿脾气倔，他几个儿子的脾气也像他。1905 年前有一天，他命长子亚历山大送一封急信，

但人到轮局时没赶上航班，为此他搧了儿子一记耳光，并命令他“滚蛋”。这记耳光是赐给儿子的最后一次父爱。那时亚历山大十四岁，领了这份父爱掉头便走，一去六年，回来时已是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六年中父亲几番写信命他回家，否则将剥夺他的天伦之乐，并且一辈子诅咒他。儿子在信尾父亲的签名下面批了“去你的吧！”，把原信退回了。六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亚历山大走进了客厅。父亲笑着举起手，揍他。儿子一笑，双手捉住父亲的腕关节，又粲然一笑。笑里蕴藏着欢愉和力量。他钳住父亲双臂，略使腕劲，让对方跌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从而说道：

“您好，爹！何必费心呢，爹！还是坐下的好，爹！”

父亲气吁吁地发出一阵干笑，忙招呼老伴：

“玛丽亚，亲爱的，嘿嘿，伏特加，给我们来点儿伏特加，亲爱的，要冰窖里的，再来个冷盘！儿子大啦，长大啦！狗儿子叫咱俩受气来啦！”

他的几个儿子都已成才：神甫，芭蕾舞演员，医生，工程师。最小的两个像长兄，也像父亲，也像长兄那样，是从家中赌气出走的。最小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他就是工程师阿基姆·雅可夫列维奇。他出走后再没回过家门，即使回他出生地，也只借住在他姑姑卡皮托莉娜和里玛家中。1928年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几个大外甥早已娶妻成家，此时他最小的女儿才只二十岁。这是他唯一的女儿，生于革命烽火年代，没能受到任何教育。

在这幢房子里住有老头儿本人，他的老伴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和小女儿卡捷琳娜。冬天只一半房子生火。房子如同主人的生活那样没有变化，早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甚至彼得大帝前就这模样儿。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红木家具在屋里数它流逝的日

子。老少三口的生活靠摆弄菜园。家中使用的工业品只有火柴、煤油和盐。工业品由父亲亲自掌管。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卡捷琳娜和老头儿从春到秋都忙于地里的白菜、甜菜、紫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和麦芽制糖。夏天黎明时总能见到老头儿身穿睡衣，打着赤脚，一手拄棍，一手插在裤裆里，踏着早露放牛。冬天老头儿只在兴致好的时候掌灯，平时让母女俩坐黑。中午老头儿上阅览室读报，记诵一个个人名和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闻；卡捷琳娜坐到钢琴前练习科斯塔尔斯基谱的赞美诗。她参加教堂的唱诗班。老头儿傍晚回家晚餐，上床睡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只有妇女的絮絮低语。有时卡捷琳娜去教堂参加合唱练习。父亲夜半醒来，点灯用饭，朗朗地背诵《圣经》。清早六时他又躺下睡了。老头儿忘了哪是白天，哪是黑夜；既不怕活，也不怕死。在他面前，母女俩从不吱声。母亲熬麦糊，做汤，烙饼，通炉子，制酸奶，做肉冻（为外甥准备的）。生活同俄罗斯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生活一样，食品也和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食品一样。玛丽亚·克里莫芙娜，这个枯槁的老太婆，是个神奇的女人，是俄罗斯农村随同圣母像一起保留下来的妇女典型。她听命于丈夫的残酷意志。五十年前，婚后第一天她刚穿上绛红丝绒背心，丈夫问："穿给谁看？"她还没能从他话里明白过来，丈夫接着又问："穿给谁看？脱下！你没这身打扮我也认得，对旁人嘛，那就甭去卖俏啦！"丈夫用蘸着口沫的大拇指戳她的脑瓜，告诉她该怎样梳头。丈夫的残酷意志逼使她把绛红丝绒背心永远藏进箱底，并乖乖地走进厨房。是丈夫摧毁了她的独立意识，还是以沉默作为抗争？她永远那么顺从，自尊，缄默，忧伤，却又那么心地善良。她的生活范围从未越过栅墙，出了栅墙她只有一条去教堂的路，就像人生只有一条去墓地的道路。她和女儿一起练唱赞美诗。她六十九岁。彼得大

帝前的罗斯在这幢房子里凝固住了。老头儿已忘了他有多大年纪，每夜背诵《圣经》，每隔几个月，在寂静无声的夜晚，秉烛走到妻子床头，悄悄说：

“玛丽亚，亲爱的，嘿嘿！玛丽亚，人生一世，嘿嘿！”

他拿着烛台，泪眼在笑，手在哆嗦：

“玛丽亚，嘿嘿，是我呀！人生在世，玛丽亚，嘿嘿！”

玛丽亚在胸上画十字。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您怎不害臊！……”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吹灭了灯。

女儿卡捷琳娜的一双蜡黄眸子由于夜梦不绝而显得呆滞，她的手和脚像树段，鼓鼓的胸房像乳牛。

……小城，俄罗斯的吕布赫，俄国的镰仓。

第 三 章

莫斯科的纷繁事务车载斗量，有开始的，有完成的。公共汽车和街道两侧的屋宇在同时飞驰，驰向远方，驰向高处。国家出版局、电影院、各种代表大会形形色色的招牌和标语都在嚷嚷。纵横南北东西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喧嚣在证明着首都的忙碌。

列车驶出莫斯科时已是夜晚，黑沉沉的夜晚。发热病般的莫斯科喧嚣仿佛叫哑了嗓子，而且哑得那么迅速。旷野里黑魆魆，一片寂静。寂静不久钻进了车厢。软卧的一个双人间里，坐着别兹杰托夫兄弟俩——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和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两人是红木古董家。他们的衣着打扮不伦不类：按上身的时新常礼服判断，像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时期的商人，但在时新礼服外面却又套了件带褶的旧式大衣。他们的脸盘干干净净，富有雅罗斯拉夫尔的斯拉夫人特征。他们各有一双聪

明但空虚的眼睛。列车在漆黑的旷野里挟着时间往前奔驰。车厢里发散着熟皮子味和大麻味。忽而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从提箱里拿出一瓶白兰地，一只银酒杯。他斟满，一口干了，再斟满，默默地推给他弟弟。弟弟一口干了，把空杯推给了他，由他把空杯和酒瓶放回提箱。

“小花玻璃项链买不买?”斯捷潘问。

“当然买，”帕维尔答。

有半个钟点两人没出一声。列车挟着时间往前奔驰，只在靠站时才让时间缓一口气。帕维尔拿出酒杯酒瓶，饮罢，给弟弟斟了一杯，饮罢，收进提箱。

“要不要请姑娘？要不要找乐子?”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问。

“当然要，”帕维尔答。

午夜时列车驶近伏尔加河，离开以制靴工艺闻名全国的那个村子已经不远，皮子的气味越来越浓烈。帕维尔啜完最后一杯白兰地。

“能不能把亚历山大也带上?”斯捷潘问。

“不能，”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答。

车站上堆满俄罗斯式高腰皮靴。俄罗斯乡间土路之泥泞及行路之难不是以哲学，而是以这些靴子来论证的。从这堆积如山的手工艺品上发出一股焦油味。夜，也像那发散着浓烈气味的焦油一样乌黑。皮匠们在站台上奔忙。站台外遍地泥浆。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没多言语，出四十戈比雇了部去轮埠的马拉小车。那些马车夫在暗地里像皮匠般动不动破口对骂，而皮匠是骂街出名的。因为湿度大，伏尔加河上水汽缭绕。对岸亮着制靴匠人乘夜操作的点点灯光。一伙从事倒卖的犹太人在轮船的餐室里寻欢作乐，由穿猴皮大衣的年轻女人执壶。他们折

腾到笛鸣三遍方始离去。船上的灯熄了。宽广的伏尔加河面上起了风。湿雾沁入了船舱。餐室女招待，一个健壮女人，一面在餐桌上为别兹杰托夫兄弟俩拾掇铺垫，一面谈她的情夫，说他从她那里偷走了一百二十卢布。轮船带着靴皮味离开了码头。甲板上的旅客唱起绿林响马的山歌驱寒。灰蒙蒙的黎明勾画出一幅不是十四世纪而是史前时期的画面：十四世纪的欧洲已有木筏、渡船和村落，但这儿只有荒岸滩，野松林，白桦树，水边的圆石，泥土和水。近午时分轮船方到十七、十八世纪俄国的布吕赫——小县城。城垣，教堂，1920年大火烧成的一块块废墟迤逦而下，直达河边。那年的大火烧掉了半个市区，因为城里的消防队，忙于搜捕资产阶级分子没去救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他们搜捕了三天三夜。搜捕停止，火也灭了，在没有水龙和居民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灭了。古董商下船时小城上空盘旋着一群群傻乎乎的寒鸦，钟楼上将坠未坠的钟在呻吟，小城裹在雨前的阴霾中。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默默地雇了辆老式四轮马车去斯库特林桥找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马车在鹅卵石路面上辚辚滚动，马车夫给他俩讲述城里摘钟的新闻。他说，城里人等着大钟落地的巨响，就像没听过枪响的人眯眼等枪响那样，提溜着颗心眼，都快神经失常了。别兹杰托夫兄弟俩在院子里见到了老头儿。老头儿正在劈炉柴，玛丽亚·克里莫芙娜正在畜棚里清牛粪。老头儿一下子没认出客人。认出后很高兴，嘿嘿笑着说：

"哦，买卖人来了！……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套无产阶级理论。"

玛丽亚·克里莫芙娜把手藏在围兜下面，弯腰施礼，唱歌似的说：

“欢迎，亲爱的客人，盼望好久的客人!”

卡捷琳娜连忙撩起粘满污泥的裙子，溜进屋去更衣。恰在这时响起嘭的一声，大钟坠地了。面朝院子的窗玻璃被震得哐啷作响，乌鸦扑棱棱地在屋子上空乱飞。玛丽亚忙朝胸口画十字。这声音比大炮还响，真能把人吓疯。

大家进了屋。玛丽亚把搁馅饼的炉叉推进炉膛。她脚旁的茶炊已经咕咕冒气。卡捷琳娜下楼会见客人，向客人行了屈膝礼。她身上的衣服已焕然一新。老头儿脱下毡靴，打光脚，嘴里喋喋不休，围着客人来回转。古董商净了手，入席肩挨肩坐下，不出声，尽睁着空荡荡的眼睛。玛丽亚·克里莫芙娜端上十七世纪的传统菜肴和面包，招呼客人进餐。客人掏出白兰地来助兴。席上只雅可夫·卡尔波维奇说话。他一面嘿嘿干笑，一面呼哧呼哧喘气，告诉客人他在哪见过红木家具，该上哪收购古董。

“您自己的卖不卖?”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问。

老头儿局促地笑，说话像哭：

“不，不卖，我的是另码事，我自己要用，我的往后再说，嘿——嘿！对，先给你俩说说我的理论……兴许我活得比你们长!”

午饭后客人休息。客人掩上吱呀响的门，躺在羽绒垫上，用那只古老的银盏继续喝白兰地。近黄昏时人已喝得半醉。而卡捷琳娜这大半天一直在练唱赞美诗，雅可夫·卡尔波维奇一直在客人的房门外徘徊。他等客人出来或在房内说话，以便凑上去聊天。乌鸦偷走了白天。因为偷走了白天，所以夕阳如血。运水大车把黄昏分送到各家各户。到了饮晚茶的时候，客人默默入席，肩挨肩坐下，瞪着直楞楞的、发白的、死人一样的眼睛。他们把白兰地跟茶搀和一起，然后敞开礼服前襟，从碟子里一

口一口啜。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坐客人身后，凑着客人的耳根子，为的是好说话。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的落地烛台放在餐桌一侧。餐桌是红木圆桌。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有哮喘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要说的是，咳咳……无产阶级理论要不多久就要被人忘记，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要不多久便不存在。这是我的想法……革命毫一无一用一处，咳咳，是历史错误。再过两三代，无产者就将消失，首先在美国、英国、德国消失。马克思完成他的理论体系，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眼下体力劳动已由机器劳动替代。这是我的想法。要不多久，照看机器的都是工程师。无产者没有了，无产者都成工程师了。这是，咳咳，我的想法。工程师不是无产者，这一因一为：人的文化高了，思想从物欲中解脱，不再看重身外之物。你瞧那英国人，不论贫富，穿一样的睡衣，住一样的三层楼房。可我们这儿悬殊还大着哩……就拿买卖人跟干粗活的相比，买卖人的日子过得像神父，穿得好，住得好。住的像宫殿。不过，我打赤脚，并不低人一等。你说，咳咳，今后照样儿有剥削？怎么会照样儿有？要剥削，只能剥削干粗活的，因为他们不懂文化。但到那时候，绝不会让他们摆弄机器。他们能把机器折腾坏的。而一台机器价值几百万。买机器不是为节省三五个劳动力。机器要熟悉它的人来照看。那时候的人以一抵百，那时候要珍惜的是以一抵百的人才。无产阶级注定要消亡！……"

客人睁大直愣愣的眼睛，一面啜茶，一面听。雅可夫·卡尔波维奇说得气喘吁吁还没尽意。此时来了他的弟弟，改姓奥若戈夫的伊万·卡尔波维奇，懒蛋。他一身干净的破衣烂衫，一张干净光洁的脸蛋，光脚丫子上套了双雨鞋。他向在座的一鞠躬，默默坐到一边。谁也没答礼。雅可夫·卡尔波维奇一见他

那傻脸，满身都不自在。

玛丽亚·克里莫芙娜没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兄弟，您何必来呢？”

“我来瞧瞧反革命是什么样儿，大嫂。”

“哪有什么反革命呀，兄弟？”

“就说您，大嫂，也是个现行反革命，”奥若戈夫疯疯癫癫地低着声说，“不过您曾为我哭过，就是说您心中还有着共产主义的胚芽。我哥雅可夫一次没哭，悔不该我那时没把他杀了。”

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只得摇头叹气。她问：

“您儿子怎样了？”

懒蛋骄傲地回答：

“我儿子吗？快要大学毕业了。他没忘了我，假期常来我的国家烤火，听我念革命诗歌。”

“眼下弟妹可好？”

“我俩不见面。她领导妇女部的工作。您可知道管理两名生产工人要多少领导？”

“不。”

“七个。一个孩子七个保姆管，结果没人管。你们的客人嘛，他们是历史反革命。”

两位客人白着眼睛顾自喝茶。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脸气成像甜菜根似的紫糖色。他迎兄弟走去，嘴里发出彬彬有礼的干笑，同时撩起袖子，像挨了冻般摩他的手掌。

“好兄弟，”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嘶哑着嗓门客客气气地说：“快给我滚他妈的蛋，我由衷地恳求你！……”

“请原谅，雅可夫哥哥，我不是来拜访你，我是来瞧历史反革命，跟他们聊天来的，”伊万回答。

“我恳求你快快滚蛋！”

"可我不愿滚蛋。"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别兹杰托夫用左面那只白里透亮的眼睛瞥一下弟弟斯捷潘，说：

"我们不和白痴打交道。你不走，我叫我弟弟打发你。"

斯捷潘也像他哥哥那样翻起一只眼，并挺了挺腰。玛丽亚·克里莫芙娜手支着头，叹了口气。懒蛋默默坐着。斯捷潘懒洋洋地站了起来，迎懒蛋走去。懒蛋起身往门口退。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再次叹了口气。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嘻嘻笑。斯捷潘走到屋中央，站住，懒蛋走到屋门口，站住。他吓得脸都变了。斯捷潘又跨前一步，懒蛋忙不迭躲到门外，央求道：

"既然如此，给我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买酒吧。"

斯捷潘瞧了瞧帕维尔，后者说：

"给他半瓶的钱。"

懒蛋走了。玛丽亚到栅门外面送他，塞给他一块馅饼。栅墙外是漆黑的、凝固的夜。奥若戈夫穿过黑沉沉的小巷向伏尔加河方向走去。他经过修道院，空地，顺着一条只有他知道的小路边走边自言自语。夜，非常黑。前面就是工业联合企业所属的砖厂。他钻过篱笆洞，穿行于挖土制砖的坑洼之间。一座土窑正在升火焙砖。伊万爬进窑门前的洼坑。那里不但暖和，而且闷热。从窑门缝隙里透进火红的光亮。奥若戈夫的那群穿着破烂的共产党员[①] 躺在光秃秃的泥地上。他们和工业联合企业达成一项默契：他们为砖厂义务烧窑，砖厂免费为他们提供这块宿地。这些人推伊万·奥若戈夫当主席，共同过军事共产主义年代的生活。坑中央放着一块作为桌子用的木板，木板旁的

① 俄共（布）第十次党代表大会（1921 年）作出决议，把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钻营之徒和自私自利的人，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洗出党。此处即指此类清洗出党分子。

麦秸上也躺了人。奥若戈夫浑身哆嗦，像生了冷热病。他坐近麦秸上的三个人，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之后把钱和馅饼放到桌上。

“他们没哭？”其中的一个问。

“没有，没有哭，”奥若戈夫回答。

众人不言语。奥若戈夫开口道：

“奥格涅夫同志，这回该你去了。”

又有两人下到泥坑。这两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人把各自带来的钱和面包放到木板上，找了个空档躺下。瑟缩在昏暗处取暖的那个奥格涅夫爬到木板跟前。他四十岁上下，却像老头儿。他数了数钱，便爬出地坑。剩下的人有的坐，有的躺，全不作声。方才下坑来的两人之一通知大伙儿明儿一早去驳船卸木柴。没隔多久，奥格涅夫买回了几瓶伏特加。懒蛋们挪近木板，取出各自的口杯，像口杯那样围坐成一圈。奥格涅夫负责斟酒。酒过一巡，奥若戈夫说道：

“现在我发表讲话。从前，有一对名叫赖特的兄弟决心飞向天空，但从天上跌落下来，牺牲了。虽然牺牲，人们却没中止他俩的事业，他们抓住天空不放。所以人们现在在天空飞翔，像鸟、像鹰那样在大地上空飞翔！同志们！列宁也像赖特兄弟一样牺牲了……我曾是城里的第一任执委会主席，可1920年那年全换了样，眼下全城只剩下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只留给我们这么个土坑。我曾是第一任执委会主席，只要还活着，永远做个共产党员。我们的事业不朽！我们的理想无限美丽！可惜除了我们，谁也不记得了。我们就像赖特兄弟！……”

奥格涅夫斟上第二遍酒。奥格涅夫打断奥若戈夫的话头：

“现在由我来说，主席。多么伟大的事业！仗打得有多狠！我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林子里走了一天一夜，又走了一天一夜，

黎明时突然听到了机枪声……”

波扎罗夫打断奥格涅夫的话头，问：

“你是怎么砍的？握马刀时大拇指是曲的还是直的？”

“直的，对准刀刃那一面，”奥格涅夫答道。

“对准刀刃那一面，没错，但你做个把式让咱瞧瞧，喏，就拿这切皮刀！”

奥格涅夫拿起制靴匠用于切皮革而今他们用于切面包的刀来，表演操刀姿势。

“不对！”波扎罗夫嚷道。“我砍的时候可不像你，我握马刀就像握剃须刀。来，让我握给你瞧！哪有像你这么砍的！”

“同志们！”奥若戈夫发话。他那懒蛋的怪脸上显示着痛苦。“我们今天应该谈理想，伟大的理想，而不是谈砍杀！”

第四人打断奥若戈夫的话头，大声说道：

“奥格涅夫同志！当时我在二师，你在三师。你记得你们怎么在申卡村附近耽误了渡河吗？！……”

“我们耽误？！不，是你们，不是我们！……”

“同志们！”奥若戈夫以他神经兮兮的语调低声说。“我们应该谈理想！……”

半夜时土坑里的人都睡了，终于在砖窑门前的坑洼里找到一席之地的这些衣衫褴褛的人都睡下了。他们胡乱地挤成一团，一个人的头枕在另一人的膝头上，用破衣服权当被盖。最后睡的是他们的主席伊万·奥若戈夫。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一枝笔，挨着窑门的通火口躺了许久许久。他削尖了铅笔在写诗。“我们掀起了全世界的”——写罢，划掉。“我们点燃了”——写罢，又划掉。“你们，伸着你们那双在取暖的小偷的手”——写罢，又划掉。怎么也不是味儿。头垂到了勾勾划划的纸上，他睡着了。在这里睡的是响应军事共产主义号召及1920年遣散令的共

产党员们。一群怀抱过时理想的人，神经兮兮和嗜酒如命的人。这群栖宿土坑、从事卸货劈柴劳动的人组成了一个严格的团体。这群严格律己的共产主义者什么也没有，既没有金钱，也没有实物，更没有老婆，因为老婆跟他们，跟他们的理想、精神反常和酗酒分道扬镳了。洼坑里非常沉闷，非常暖和，非常寒碜。

小城上空是凝固的，黑漆漆的，是像当地历史一样的子夜。

在这子夜，古董商别兹杰托夫兄弟俩中的弟弟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在阁楼楼梯上拦住了卡捷琳娜，用他醉后的手抚摸着姑娘健壮如牛的裸肩，悄声说道：

“你去告诉你那些……姐妹们……再来一次聚会。你就说，让她们找个地方……”

卡捷琳娜顺从地站着不动，顺从地回答：

“好，我去说。”

这时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在楼下的客厅里给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讲文明史。圆桌上放着一件外形像三桅战船的黄铜酒具。它光可鉴人，里面装满了白兰地。制作这件十八世纪的酒具是为饮酒者得以乘船遨游于幻想。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用手插进裤裆，托住股沟，迈着鸽子般的蹒跚步子围住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转。

“是呀，咳咳，”他说，“照你看来，是什么在推动这世界呢？文明？科学？轮船？你说，是什么？”

“是什么？”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反问。

“照你看来是什么？劳动？知识？饥饿？爱情？不！促进世界文明的是记忆！不妨设想：一早醒来，忽然失去记忆，只剩下本能和理智，我从床上滚落到地下。这因为，按照记忆，我有关于空间的概念，没有了记忆，也就没有了空间概念。我不知道该怎样行走，用脚？手脚并用？我记不起昨天。我不怕死

亡，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工程师忘记了他的高等数学。所有的电车和火车停在原地不动。神父找不到去教堂的路，甚至忘了耶稣基督。总之，咳咳……只剩下本能，虽则本能和记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妨假定，我饿了，我却不知道该吃什么，吃凳子？还是吃留在凳子上的隔宿面包？我见到女人，长幼不分，把女儿当成了老婆。”

桌上盛酒的三桅船鼓起了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思想风帆。这铜制的三桅船，这一房红木家具和俄国的伏尔泰，都卡在十八世纪里出不来了。而十八世纪的窗外是小城的苏维埃时代的子夜。

一小时后斯库特林府沉入了梦乡。但在空气沉寂的卧室里，响起了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拖鞋声。他正向玛丽亚·克里莫芙娜的眠床走去。此时玛丽亚·克里莫芙娜，这位很老的老太婆已经入睡。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手里的烛火在颤动，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嘴巴在嘿嘿笑，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碰碰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干瘦的肩膀，泪眼里闪烁着欲火。他低声说：

“玛丽亚，亲爱的玛丽亚，人生在世，人生在世，亲爱的玛丽亚……”

十八世纪沉入了伏尔泰的昏暗的深渊。

清晨，县城上空响起即将坠成碎片的钟的哭泣，临死时的呻吟。别兹杰托夫兄弟俩醒得早，但玛丽亚·克里莫芙娜起得更早。随早茶端上了热乎乎的蘑菇大葱馅饼。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在睡觉，没来。卡捷琳娜来了但睡眼惺忪。来了的默默地喝茶。灰暗的白昼渐渐露脸。早茶后别兹杰托夫兄弟俩出门办事。出门前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在纸上画了张地形图，包括县城的石子街道，石垒围墙，篱笆下的杂草，火场废墟上的接骨木丛，各教堂，各钟楼。当将坠未坠的钟发出呻吟和哭泣的

时候，县城发出无声的呐喊；当古钟挟着呼啸从钟楼飞坠直下的时候，县城沉默着。

别兹杰托夫兄弟俩走门串户，进门往往招呼也不打，只用他们的盲人眼睛打量周围的一切。

1. 在老罗斯托夫街上有幢年久失修、已开始倾斜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姓梅什金娜的寡妇。她已是静待天年的七十岁老人。房子的墙角奇怪地冲着街面，因为它还是在有街道之前就盖起了的；而且这幢木房建造时不是用的锯板而是斧削木板，俄国匠人那时还未使用木锯，单凭一把斧子。也就是说，房子建成于彼得大帝之前。按该时的标准而言，这是幢贵族府邸。室内至今还保留着瓷砖壁炉和瓷砖火坑，瓷砖上则绘有羊羔、贵族等赭色油彩像。

别兹杰托夫兄弟俩没敲门便走进栅墙门。梅什金娜老婆子正坐在墙脚培基上，脸对猪食槽，瞅着猪吃槽里经开水烫过的荨麻叶子。别兹杰托夫向老婆子鞠了一躬，一声不吭地坐到她身旁。老婆子忙不迭还礼，既感惘然，却又高兴、畏惧。她脚穿一双破毡靴，下半身套一条印花布裙，肩披一块花花绿绿的波斯围巾。

“您想好了？卖，还是不卖？”帕维尔·别兹杰托夫问。

老婆子把手藏进围巾，垂眼看猪。帕维尔和斯捷潘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者眨了眨左眼：肯定卖！老婆子抽出一只干瘦的、连指甲都发紫的手来抹了抹嘴角。手在抖。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卖，”老婆子说罢，歉然瞅了眼兄弟俩。“要知道，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有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都在这房子里住过。从哪一辈的人开始住进这房子的都没法记了。他们留下过遗言……后来，我的房客死了，——愿他在

天国幸福，——这就叫我左右为难。他活着的时候，每月付给我三卢布的房租，还管灯油钱。这笔钱够我花销的……我爹妈也是在这瓷坑上死的……该咋办呢？……愿我那房客在天国幸福，他是个好性儿的，每月付我三卢布房租，是我在一旁侍奉着死的……我想呀想，几个夜晚没合眼。你们把我的平静日子搅乱了。”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壁炉上的加上坑上的瓷砖共计一百二十块，照我开出的价钱，每块二十五戈比，一共三十卢布，够您这辈子用的了。我们派个炉匠来，由他拆下瓷砖，补上泥砖，然后粉白。这些都由我们开支。”

“价钱，我不争，”老婆子说，“给的是好价钱，这样的价钱在我们这儿没人肯出……再说，除开你们，谁上门找我呢？……若不是爹妈……留下我孤单一人……”

老婆子在心中默默盘算，盘算了好一阵子。或者，她压根儿不在盘算？她的眼珠躲进眼皮下，不见了。猪吃完食，用嘴拱老婆子的毡靴。别兹杰托夫兄弟俩的眼睛严肃地盯着老婆子。老婆子又抬起哆嗦的手抹了抹嘴角，尔后歉然一笑，瞧了瞧快倒的栅墙和墙里的菜园，垂下眼，启口道：

“就这么定吧，愿上帝保佑你们！”说罢伸手给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怯怯地，但完全按照生意谈妥时的老规矩。一笔瓷砖买卖就这样偷偷地成交了。

2. 教堂广场上一幢房子的半地下室里，住着地主图奇科夫一家老小。这幢房子原也是他们的私产，而他们以前在乡下的庄园现已改成乳牛养殖场。住在这地下室里的共两大六小。两个大人指老婆子图奇科娃和她的长儿媳妇。长子原来是个军官，1925 年患肺结核，眼见无望，开枪自杀了。她的老伴曾任上校，

1915那年在喀尔巴阡山地被击毙。四个孩子属奥莉加·帕甫洛芙娜，也就是说属她的长儿媳妇。另两个孩子是奥莉加的小叔子的，小叔子因反革命罪被枪决。奥莉加·帕甫洛芙娜为养活一家人，每晚去剧院演奏钢琴，三十岁的人已成了小老太婆。

别兹杰托夫兄弟来访时屋门正开着，正如穷苦人家的屋门成天大开那样。奥莉加·帕甫洛芙娜向客人颔首致意，邀他们入室，并抢先奔进所谓餐室，把床铺盖严，不让人瞧见被子下面没有床单。奥莉加·帕甫洛芙娜还匆忙对着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的红木梳妆台上的三折镜整了整容。兄弟俩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儿。为察看红木成色，斯捷潘翻倒椅子，推开沙发，掀起床垫，拉开五斗橱的抽屉。帕维尔顾自挑选画像、玻璃珠子和瓷器一类古玩。小老太婆奥莉加·帕甫洛芙娜举止之间仍有着少女的轻盈和羞怯。古董商默默地翻腾墙角里的一应破烂，弄得乒乓直响。六个孩子全依偎在他们母亲的裙边，瞪起好奇的眼睛打量这幅不平常的景象，大的叫，小的哭，使得母亲心烦意乱。

“家具不全，不成套。”

“您说什么来着？”奥莉加·帕甫洛芙娜追问，并无可奈何地冲着孩子说道：

“孩子们，你们走开！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请……”

“家具不全，不成套，”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说，“只三张凳子，一把靠椅。质地不错，没说的，但得大修，搁在这么潮湿的地方，您也清楚。要把缺的找出来补齐。”

古董商一开口，孩子们反不作声了。

“是的，”奥莉加才说话便红了脸，“本来是一整套，但现在未必凑得全。一部分家具从家出走时留在庄园里了，一部分已被农民拿走，存下的也被孩子糟蹋坏了。再说，地下室这么潮

湿。个别家具放进了板房……”

“限二十四小时内出门，是吗？”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问。

“是的，我们连夜走的，没等命令下来，我们预见到……”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也加入谈话，他问奥莉加·帕甫洛芙娜：

“英法两国文字您都认得吧？”

“哦，是的，”奥莉加·帕甫洛芙娜答。“我能说……”

“这些画是布歇[1] 和霍斯利[2] 的吗？”

“这些画吗？哦，是的！”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瞥一眼斯捷潘，说：

“每一件可以出价二十五卢布。”

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打断哥哥的话，正颜道：

“如果能凑成半套，我就出这价钱。您说有些家具散落在庄稼汉手里，我可以上门看货。”

“哦，是的！”奥莉加·帕甫洛芙娜忙答。“如果能凑成半套……我们那村子离这才不过十三俄里，来回一趟等于散一次步……能收拾到半套。今天我便下乡，明儿准给回音。但若有的已经散架……”

“没关系，压低点儿价钱罢了。不用给回音，把家具直接运来一次成交得了。希望明天到货，包装发运。沙发十五卢布，扶手椅七个半卢布，凳子以每张五卢布计算。包装费用由我们支付。”

“哦，是的，我今天便去。村子离这才十三俄里，来回一趟等于散一次步……我现在就动身。”

---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代表人物。

② 霍斯利（1817—1903）：英国画家。

年龄最大的孩子问：

“妈，到那时能给我买鞋了吧？”

窗外是阴霾的天。城外是俄罗斯稀稀落落的村庄。

3. 贵族老爷维亚切斯拉夫·帕夫洛维奇·卡拉津躺在餐室的沙发里，身上盖一件磨损得没有了毛的灰鼠皮上衣。他的餐室一如他伉俪俩的卧室兼书房，是个珍品陈列馆，而这珍品陈列馆却设在一个赶邮车的马车夫家中。别兹杰托夫兄弟走进门，向他一鞠躬。卡拉津老爷向他俩端详了一阵子，倏然吼道：

“去，去，你们这些坏蛋，给我滚出去！”

兄弟俩纹丝不动。

卡拉津老爷的脸涨成猪肝色，他再一次吼道：

“离我远点儿，恶棍！”

他妻子听见吼声，从里面走了出来。别兹杰托夫兄弟向这位卡拉津太太鞠罢躬，退到门外。

“娜京，我不见无耻之徒，”卡拉津老爷对太太说。

“好，维亚切斯拉夫，您回书房去，由我来跟他们谈。唉，维亚切斯拉夫，其实您也知道他们上门来的目的！”卡拉津太太回答。

“他们打扰了我的休息！行，我回书房，你跟这些奴才不必客气。”

卡拉津老爷带着他的上衣离开了。别兹杰托夫兄弟这才重新跨进门。他俩再次向卡拉津太太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请把您的俄罗斯织花壁毯拿给我们看看，并报个价钱，”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先请坐下，先生们，”卡拉津太太说。

就在这时书房门忽地打开，露出卡拉津老爷的脑袋。他故意不看别兹杰托夫兄弟，只冲着窗户吼叫：

“娜京，不准他们就座！他们哪懂得艺术的美妙？不让他们挑三拣四，只卖给我们想卖的那些瓷器、瓷像和铜像……”

“不卖，我们可以走，”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啊，请等一等，先生们，先让维亚切斯拉夫·帕夫洛维奇消消气，他有病，”卡拉津太太无可奈何地在桌旁坐下。“我们必须卖掉些东西。哦，先生们！……维亚切斯拉夫·帕夫洛维奇，您把门带上，别听我们的谈话，最好去散会儿步……”

4.5.6.7……

临近黄昏，当声声寒鸦撕裂心扉、古钟不再呻吟的时候，别兹杰托夫兄弟才回到斯库特林家用午餐。饭后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打点出门。他口袋里装着别兹杰托夫的钱和清单，头戴宽边细毡帽，身穿羊皮短大衣，但脚上是双破鞋。老头子要去找泥匠和搬运工，去买绳子和蒲席，还要指挥包装那些买来的古董，运送轮坞，从水路发往莫斯科。他正事正办，临出门时说：

“包装托运这类事本可以交那伙神经病办。他们穷虽穷，人倒挺诚实。但不行呀，伊万老弟不会答允。他是革命的头，绝不肯为反革命卖力，嘿嘿！……”

别兹杰托夫兄弟被安顿在客厅里休息。不觉昼去夜来，又是掌灯时分。整个黄昏不断有人蹑手蹑脚走来敲玛丽亚·克里莫芙娜的窗子。卡捷琳娜走出去会见他们。这些人结结巴巴地恳求：“说是客人在您家住，收购大小古董，能不能见上一见？”他们想出售的或是旧的卢布和戈比，或是破旧了的油灯、旧茶炊、旧书、旧烛台。这些人并不懂得什么叫古董，这都是些穷得见底的人。卡捷琳娜哪能让手拿油灯之类的人去见客人！她叫他们把东西留下，等明天客人休息过后看了再说。黄昏，黑沉沉的。临晚起了风，下起了蒙蒙秋雨。奥莉加·帕甫洛芙娜，

这位脸若老妪但动若少女的徐娘正行走在林间泥路上（如同阿基姆·斯库特林这天陷进路途上的泥浆那样），半老徐娘正朝她昔日的庄子走去，为的是向农民收买他们所用不着的扶手椅。

晚八时，卡捷琳娜告诉她母亲，说她要去练唱，在这之后还要去看望女友。她梳妆打扮了一番，出门去了。半小时后斯捷潘和帕维尔兄弟俩也消失在雨中。卡捷琳娜守候在桥头。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挽起卡捷琳娜的膀子。他们三人摸黑沿着沟壑的一条小道，往城郊斯库特林两个年老姑姑的住家走去。卡捷琳娜和别兹杰托夫兄弟偷偷地走进院子，偷偷地钻进花园。园子深处有个冷冷清清的澡房。

卡捷琳娜敲了敲澡房间。门打开一半。里面亮着灯，有三个姑娘在等候客人。姑娘们早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桌子拉到了蒸汽浴床的台阶底下。她们打扮得像过节似的，全都向客人热烈问好。

别兹杰托夫兄弟掏出了从莫斯科带来的白兰地和波尔图葡萄酒。

姑娘们则在桌上摆出纸包裹着的熟香肠，油浸鲱鱼，糖果，蕃茄和苹果；其中年岁最长的克拉芙季娅从炉后拿出来一瓶伏特加。他们说话时都压低着嗓门。别兹杰托夫兄弟并排坐在台阶上，面对衣物架。衣物架上放着一盏铁皮油灯。

一个钟头后姑娘们全醉了，虽然说起话来仍是悄悄的。酒醉的人，包括酒醉的女人，尤其当醉得非常厉害的时候，脸部都会出现一种醉后的麻木神色。克拉芙季娅如同男人般双手支头，龇着牙，僵木的嘴唇露出轻蔑的表情。每当头部滑下掌托，她便揪自己的一头修过的短发，揪的时候丝毫不感到疼痛。她一支连一支地抽烟，一刻不停地灌白兰地，脸红红的，红得美极了，那是一种失态的美。她漫不经心地说：

“说我醉了？是的，醉了，醉就醉。明天我又要去学校教书。我懂哪门课？教啥？明天下午六点钟还得出席学生家长会议。那是我召开的。这是我的笔记本，上面都写了的……我喝，唉，我豁出去了！你们是谁？算哪门子亲戚？你们收买红木家具吗？收买古董？想用酒买下我们？你们以为我不懂什么叫生活？不，我懂。我已经怀孕了……可我还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管他哩！”

克拉芙季娅的牙龇着，眸子凝固着。帕维尔纠缠着齐娜不放。这是个矮脚姑娘，女的中数她年轻。她蓬松着淡黄色的头发，动不动便格格笑，人坐在离桌子较远的木墩子上，叉开两条悬空的腿，用双手支撑住身体。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我说你，齐娜，准定不敢脱下短衫，不敢解你那胸褡扣子，你准定不敢！”

齐娜捂住嘴，免得笑出声来，可仍是笑了。

“我解给你看！”

克拉芙季娜轻蔑地说：

“她真能那么做。齐娜，让他们瞧瞧你的乳房！要瞧，让他们瞧得了。要瞧我的吗？你们以为我醉了？不，那是上次你们来这儿的时候，今天只是在尽尽兴，明白吗？来图一次痛快！……管他哩！……齐娜，就让他们瞧你的乳房好了！你不是也让你的科里亚瞧的吗？……要不要瞧我的？”

克拉芙季娅扯自己的短衫胸扣。姑娘们忙向她奔去。卡捷琳娜向她规劝：

“别扯，克拉芙季娅，会被家里人知道的。”

齐娜踉踉跄跄走来抱住克拉芙季娅的双手。克拉芙季娅吻了吻齐娜。

“不扯？”她问。“那好，我不扯……你解怀让他瞧就是……

瞧就瞧，我们不害怕偏见！……你们是买红木的吧？”

“行，解我的，”齐娜顺从地动手解自己的衣扣。

第四位姑娘走出了澡房，她感到恶心。当然，别兹杰托夫认为自己是买主，一切都可以花钱买。

澡房外秋雨潇潇，树枝桠被风吹得飒飒作响。此时奥莉加·帕甫洛芙娜终于到了她旧日的村庄，为纳扎罗夫老爷子卖给了她凳子和扶手椅而欣喜，而感谢，接着便在纳扎罗夫家地板上垫些麦秸睡着了。这时卡拉津老爷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时光棍汉们正在窑门跟前的泥坑中像精神失常者那样大谈 1919 年：那时候一切都是共同的。共同的面包，共同的劳动，心无牵挂，只对未来充满理想，没有钱，也用不到花钱。又过了一个钟点，澡房空了，酒醉男女各自回家去了，醉意朦胧的姑娘们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家中的卧榻。只有一本笔记簿遗落在澡房的地板上，本子中写着“七日，晚六时家长会议”，“工会区委会会议上建议购买工业债券，数目相当一个月的工资”，“建议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温习一下关于共产主义的起码知识”。

一早，钟又发出呻吟。一早，在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指挥下，货物正往轮坞发送。这都是叶卡捷琳娜、保罗、亚历山大时期的红木家具。别兹杰托夫兄弟一觉睡到红日当头，而在他们醒来之前，厨房里守着一大群人，等候着古钱、古灯、古烛台的命运。

小城——俄罗斯的布吕赫。

第 四 章

……比别兹杰托夫兄弟晚两天，工程师阿基姆·斯库特林也到了县城。他是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最小的儿子。回城后没有去见他父亲，而是逗留在他姑姑卡皮托莉娜和里玛家中。阿基姆工程师此番回城并无公事，只因他有一星期的空闲时间。

……卡皮托莉娜·卡尔波芙娜走近窗口。窗外是一片外省景象，一边是坍塌的红砖围墙，围墙断处坐落着一幢带望楼的赭色住房。另一边是教堂，教堂后是广场，县邑所属村庄，接着又是教堂。秋雨淅沥。猪在嗅路上的水洼。一辆运水车出现在转角处。克拉芙季娅脚穿上了油的靴子，身着长及靴筒的黑色大衣，头蒙蓝色兜巾，出了栅门，低头横穿过马路，正沿着坍塌的围墙朝街角后的广场走去。卡皮托莉娜·卡尔波芙娜眼尖，她久久地凝望着克拉芙季娅的背影。在隔壁的餐室里，里玛·卡尔波芙娜正在喂她的外孙女——长女瓦尔瓦拉的女儿。

房间非常简陋，非常洁净，数十年来一贯保持着老处女的特色。窄窄的床，小小的工作台，缝纫机，人体模型，窗幔。卡皮托莉娜走进餐室。

“亲爱的里玛，由我来喂外孙女吧。我见克拉芙季娅出门去了，瓦尔瓦拉也上班去了吗？”

两个老太婆，卡皮托莉娜和里玛，是县城世袭的荣誉居民，专门制作衬衣的女裁缝。她们的生活简单得如同左手的掌纹那样一目了然。姐妹俩只相差一岁，卡皮托莉娜是姐姐，她的一生乃是全城的道德楷模，全城居民心目中的典范。不单全城知道，连她本人也知道，她所有的周末都用来彻夜祈祷，所有周末以外的日子都用来缝制坎肩、衬衣，千百件衬衣，除家中亲戚以外没有人吻过她。只她自己知道内心的想法和哀痛，她的一生乃是一杯苦酒。她曾有过豆蔻年华和青春时代，也有过徐娘半老的时候，可从来未被人爱过，从不知男女私情。结果是，她成了全城皆知的恪守规范的例子，一个贞女，一个老太婆，因清白自守、信奉上帝、遵从传统而使醇酒成了苦酒。里玛·卡尔波芙娜同是裁缝，过的却是另一种生活。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她度过了整整三年，蒙受屈辱的三年日子。那时她年逾三十，青春即将消逝，正感绝望之际，爱上了一个县城里的财务会计，客串演员，一个已有妻小但行为放荡的美男子，酒鬼。里玛为了爱情未能抑制自己。说来丢人；爱情既不圆满，又使她丢掉了名声。县城四周都是可以藏羞遮丑的森林她不去，却在夜晚的林荫道上委身于人，而且，因羞于把撕破了的、沾满污泥和血（其实，这是神圣的血）的衬裤带回家，急切间把它塞进了灌木丛。第二天被孩子们无意发现了，于是满城风雨。受辱后的三年——两秋一冬她都未能见到她的情夫，无论是在室内或林中，马路上或废墟旁，或是在空荡荡的驳船船舱里。大

哥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拒绝收留她，姐姐卡皮托莉娜反对她，街道居民不认她，并且指着背脊骂她，会计的合法妻子明目张胆地打她，并唆使农村小伙揍她。根据县城的道德规范，人们都站在合法妻子一边。里玛生下的女儿瓦尔瓦拉既是耻辱，也是耻辱的见证。里玛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克拉芙季娅。而克拉芙季娅是耻辱的第二个见证。那位客串演员，也就是说那个会计，后来离开了县邑，留下里玛和两个女孩。母女三人在耻辱和贫穷中凄苦度日。那时里玛已经三十多岁。又过去了三十年。长女瓦尔瓦拉已经成家，生活幸福，有两个女儿，也就是说里玛有了两个外孙女。瓦尔瓦拉的丈夫有工作，瓦尔瓦拉本人也有工作。里玛·卡尔波芙娜照管着一大堆家务，成了家族的始祖。里玛·卡尔波芙娜是位和蔼的老太婆，有她值得称羡的晚年。年迈使她矮小，幸福使她发福，矮小而发福的老太婆常常像她那样和蔼，并且有她那样的充满生命之乐的眼睛。连卡皮托莉娜·卡尔波芙娜所考虑的也尽是里玛、瓦尔瓦拉、克拉芙季娅、外孙女的生活，她那节操，她那全城皆知的贞淑美名此刻已对她毫无用处。卡皮托莉娜·卡尔波芙娜没有自己的生活。

卡皮托莉娜·卡尔波芙娜说：

"里玛妹子，由我来喂外孙女吧。我见克拉芙季娅上班去了。瓦尔瓦拉也走了吗？"

窗外是外省的景象：秋雨潇潇而下。倏地过道门咿呀一声，听到噔噔的靴子声，有人在蹭靴底的泥污。接着，那人走了进来，用他仿佛去掉了眼镜的近视眼茫然环顾。他就是工程师阿基姆·雅可夫列维奇·斯库特林。他的长相跟他五十年前的父亲一模一样。他来了。不知他为什么而来。

"亲爱的姑姑，你俩好！"阿基姆说。他首先吻里玛姑姑。

外省的景象：窗外秋雨潇潇，室内是生得旺旺的俄式茶炊。

……阿基姆只是回城小憩。两位姑姑为他升起茶炊，烙了馅饼，而且一如俄国外省的家中主人招待客人那样满心欢喜。阿基姆并没有去看望他的父亲和他的上级。城市上空响着钟的临死的呻吟，而石子马路上却响着人的欢乐的笑语。阿基姆在这里盘桓了一昼夜，走了。县城不需要他，也没有接待他。他和两位姑姑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一同遨游于逝去的岁月，沉湎于如梦的往事，谈论姑姑一贫如洗的生活和琐琐碎碎的家事，她们的想望和希冀。家里的陈设一如二十年前，二十五年以前，包括那尊小时他看着害怕而今已全然习惯的人体模型。黄昏前克拉芙季娅从学校回来了，于是他俩，一对年龄相差十岁的表兄妹，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谈心。

"日子过得好吗？"阿基姆问。

他俩先是谈了些日常琐事，之后克拉芙季娅打开她的主要话题。她说得简单明白。她很美，很安详。夜色渐浓。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克拉芙季娅说。"我已经怀孕，但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该怎办？"

"怎么不知道谁是他父亲？"

"我已经二十四岁，"克拉芙季娅说。"春天的时候我忽想尝尝禁果的滋味，于是我尝了。"

"你总该有个你所钟爱的人吧？"

"没有。与我接触的人有好几个。我出于好奇，和好几个人睡过觉。我已经二十四岁啦。"

阿基姆不知再问什么好。

"我关心的不是爱别人，而是我自己，我的体验。我挑选不同类型的男人，体验不同的感受。我并没想要怀孕，我只想到性的愉快，没有想到将有孩子。不过，我怀孕了，而且不准备打胎。"

“你不知道谁是你丈夫吗？”

“我拿不准是谁。但这无关紧要。我一是一母一亲。我能对付，国家也会给我帮助。至于道德……我不懂什么叫道德。我不想理会道德或不道德，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道德观。我只对自己负责，我维护我自己。为什么跟人睡觉就是不道德？我干我想要干的，不欠别人的情。丈夫？我不需要一个丈夫来尽我的妇道，丈夫只是在我需要而又不成为累赘的时候才是好的。夜里我不一定需要他的陪伴，婴儿出世时不需他来帮忙。人们会帮助我。我信任人们。人们喜欢那些有傲气而又不至于加累于他们的女人。国家肯定会帮助我的。我和我所喜欢的人来往，只因为我喜欢。我将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现在我不想再去找男人，我不需要。昨儿我醉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这便是对你说的心里话。我讨厌自己，不想喝醉却喝醉了。也许，孩子需要有个父亲，但你便是舍弃父亲出走的，我出生时也是没有父亲的。关于我父亲，除知道他有个恶名以外，我什么也不清楚，虽则小的时候我曾为没有父亲而生妈的气，感到过委屈。不，我已下定决心保胎，我只想着肚子里的小不点儿，那是我最大的快乐，甚至比……我年轻，我身体健康。”

阿基姆怎么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他依稀看到散乱在地板上的布条儿之间，在清贫的小市民生活的网络间蜿蜒着一条条小路。克拉芙季娅很安详，非常健康，非常美。窗外细雨蒙蒙。共产党员阿基姆想了解新的生活的趋向，原来生活仍沿平常的轨迹前进。但他感到克拉芙季娅的道德观是新的，不平常的。克拉芙季娅的观点是否对呢？

阿基姆说：

“那就生下你的孩子吧。”

克拉芙季娅把头枕在他肩上，蜷起双腿，让自己坐得惬意

些，她忽而显得那么娇弱。

“我重视生理因素，”她说，“我喜欢吃喝，喜欢洗澡，喜欢体操，喜欢萨利克——我们的守门犬——舔我的手和脚，它那爪子把我膝盖抓得出血我反感到愉快……而生活是广阔的，无处不在的，我无法分清它的是非，也说不清革命的好坏，但我信任它们，信任生活、太阳、革命，我并不惊慌，我理解与我有关的一切。至于其他，我才不管哩。”

一只公猫从地毯跳上沙发，再又跳到克拉芙季娅的膝头上。显然，这是公猫的习惯。窗外天全黑了。隔壁亮起了灯，响起了缝纫机的轧轧声。世界进入了黑夜。

晚上阿基姆去看望伊万叔叔，也就是那个由斯库特林改姓为奥若戈夫的懒蛋。奥若戈夫从土坑里钻出来迎接侄儿。砖窑周围的土地都挖成了一个个坑洼，而砖厂一排排的板房又低矮，又简陋，像废墟或像神出鬼没之地。伊万叔叔醉醺醺的。跟这样的人根本没法交谈。但伊万因侄儿专程来看望他而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幸福。他的两只脚在摇晃，身子像落水狗似的在颤抖。

他掀开门帘，把侄儿让进板房。

“你来啦！你来啦！”他低声说，同是以颤抖的双手把侄儿搂进颤抖的怀里。

他把斗车翻个身，让侄儿坐下。

“把你赶出来了？”他高兴地问。

“从哪儿？”阿基姆反问。

“从党内，”伊万·卡尔波维奇说。

“没呀！”

“没有？没把你赶出来？”伊万追问，语气中不乏悲凉，但

话的结尾仍然乐观："现在没有，将来肯定会。所有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都将开除出党！"

伊万·卡尔波维奇接着发表一通呓语，说他的公社，说他过去曾是执委会的第一任主席，说过去是个什么样儿的年代，说他们在严峻的岁月里作出的牺牲，尔后他怎样被赶出革命队伍，现在他到处向人们游说，促使人们哭泣，叫人们记住过去，热爱过去。他再次说起他的公社，公社的平等原则和兄弟情谊；他再而三地说共产主义把爱、把关注人、把友好和情谊列为首位。共产主义拒绝物质享受。爱人、尊重人、尊重百姓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个面容清癯的老头在风中不断哆嗦，用不断哆嗦的、清癯的双手时不时拉紧上衣领口。砖厂大院破败零落。工程师阿基姆·斯库特林可说是伊万·奥若戈夫的最最亲的亲人。穷哥儿，要饭的，卖唱的，拉撒路，香客，衣衫褴褛者，朝圣者，先知，癫僧——正是这些为了上帝的人点缀了神圣罗斯的生活。他们是生活的花絮，基督的子民，来世的祈求者。在工程师阿基姆面前站着的便是讨饭的贱民，疯疯癫癫的拉撒路，为正义事业而生的苏维埃罗斯的癫僧，来世和共产主义的祈求者。伊万叔叔肯定得了精神分裂症，所以有一种怪癖：到城里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那里去，要求他们哭泣，要求人们听他炽烈的、疯疯癫癫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说。市场上的人也真有听了他的演说而哭的。他跑政府机关，因而城里出现了荒诞不经的怪论，说是某些领袖人物用大葱头抹眼睛，也像那些懒蛋一般流泪、哭泣，为的是在城中取得好名声。伊万害怕教堂，所以他对神父赌神发誓说他不怕。伊万的口号是城中最左的口号。城里的居民都尊敬伊万，乃如罗斯千百年来一贯尊敬疯修士，那些口宣真理并为真理而死的癫僧一样。伊万嗜酒，由酒而疯。他聚集了一批像他那样被革命抛弃、却由革命造就的难兄难弟。他

们在土坑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他们那儿是所谓的真正共产主义，他们在那儿找到了平等友爱和兄弟情谊。他们各有所好：有人想与火星上的无产阶级通信；有人建议捕尽伏尔加河的大鱼，用卖鱼钱建造河上大桥；有人幻想在县城里也铺上电车道。

"哭吧！"伊万说。

阿基姆正在想自己的事，没能马上明白伊万的意思。

"你说什么来着？"他问。

"哭吧，阿基姆，哭吧，为失去了的共产主义哭吧！"伊万大声命令。

"好，好，我哭，伊万叔叔，"阿基姆回答。

阿基姆强壮、高大、魁梧。他站了起来，吻了吻叔父。

秋雨淅沥。昏暗中的砖厂更显衰败冷落。

阿基姆从懒蛋那里取道市区回他的住地。他穿过集市广场时，见一幢房子里亮着孤灯，便走近窗口。这是城里的怪人——博物馆馆长的家。他曾和这位馆长一起在内城从事过地下发掘工作。他正打算敲门，忽然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在堆满圣职人员的法衣、肩带、长袍的房间里有两人正在对酌。博物馆馆长从装两公斤半的大酒瓶里倒满一杯伏特加，举杯凑近裸体人的嘴唇。但裸体人纹丝不动。那人光头，戴顶荆冠。阿基姆明白了：馆长在和木雕耶稣喝酒。这是十七世纪的木雕，有常人那么大小，幼时曾在贞女修道院见过。馆长每呷一口，先把酒盏凑近木制基督的嘴边。馆长敞开着他那普希金时代的礼服，脸上长满乱蓬蓬的络腮胡子。阿基姆觉得，戴荆冠的基督裸身像此刻真的复活了。

阿基姆的母亲玛丽亚·克里莫芙娜不管夜深看望儿子来

了。两位姑姑让出房间给母子叙首。母亲是穿了家常便服来的，外面只裹一条披巾。她戴上用线代替镜脚的眼镜，为的是能好好看看儿子。她像赴圣餐会般喜气洋溢。她拥抱了儿子，用她干涸的胸脯贴紧儿子，用她瘦削的手指抚摸着儿子的头发，把头依着他的脖子。她没有哭，她仔细端详着儿子。她不信眼睛，她用手指去抚摸。接着她画了个十字为儿子祝福。

“儿子，你不愿回来看我们，是吗？”

儿子没答。

“那么我为什么要守这一辈子呢？”

儿子知道，如果父亲得悉他的母亲前来，非揍她不可。他知道，母亲在黑地里一连几小时地静待他父亲入睡，同时思念着他。他知道母亲什么也不瞒他，但所述并无新的内容。虽则旧事无趣，母亲终归是母亲，是他独一无二的、最最美好、最最神奇的养育者，苦行僧，塑造生命的功臣。他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什么也没有说。

翌日一早，工程师阿基姆走了。轮班是昨天夜晚就过了的，因此他要走五十俄里旱路，以便赶上去莫斯科的夜行火车。他雇到一辆由一对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天气无常，忽而雨丝飘散，忽而青天白日。他走的是莫斯科驿道，泥泞没及车轴和马的腿肚。沿途都是些年深月久的老林，阴森森，湿淋淋，悄然无声。走到半途，阿基姆刚担心别误了火车，车夫却说要停马喂料。合作社的小铺不卖伏特加，不过，伏特加酒还是从对面的私营酒店的掌柜——村苏维埃书记手里弄到了。马车夫酒下了肚，这才开口。他没精打采地叙述他怎样干了三十年的屠宰营生，后来革命不需要他，把他抛弃了。酒至十成，他两眼闪光，惊叹起政权的高明来：“哈，真叫你摸不着头脑，上帝饶恕！

我干了三十年屠宰，可政府的委员一到，没出三星期，就叫我开路。接着，不到三星期，又把我兄弟赶走了。我兄弟是磨面的，好歹也是个三十年工龄的行家呀!”听罢，你闹不清他是在惊叹还是在讥诮。喂过料，继续赶路，马车夫重又一声不吭。

工程师阿基姆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的派别已被消灭，他的家乡和他的县城对他说来已无需要。他本打算把这一星期专门用来思考，思考革命和党的命运，而他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命运，他没去思考。他瞧瞧林子，心头浮想及难于涉足的密林和沼泽。瞧瞧天空，心头浮想及苍穹、游云和广袤无际的空间。马早就累了，背在冒汗，腹部一起一落。路烂得没法走，但它是大道，非走不可，结果踩成一片稀泥。天色近晚，鸦雀无声。阿基姆从绵亘千里的老林和错落其间的村舍想到他的姑姑卡皮托莉娜和里玛，于是阿基姆一而再地为革命辩护。卡皮托莉娜姑姑有过所谓高尚的生活，她从未有悖于县城居民和县城的道德，从未有失检之处，但她的生活是空虚的，不为任何人所需要的。里玛姑姑如果生活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话，将永远在她的身份证上留下污点，上面会注明：未嫁，生有两女，犹若圣母马利亚之有基督一般。里玛的孩子是里玛的污点，她的痛苦之源，但痛苦之源成了幸福之源，成了她的优点。她的生活充实、丰富。总而言之，她，里玛姑姑，非常幸福。卡皮托莉娜沾她妹妹幸福的光而自己没有幸福。所以什么也不应惧怕，应该去做，所做的一切即使是痛苦的，大半都能结出幸福之果。如果什么也不做，那么什么结果也不可能有。再说克拉芙季娅，不是比她母亲更幸福吗?她压根儿不知道谁是她孩子的父亲，而她母亲知道所爱的人是个坏蛋。然后阿基姆又想起自己的父亲。不知道有这父亲反倒好！阿基姆在想父亲、克拉芙季娅、两位姑姑的时候倏地醒悟到，其实不是想他们，而是想革命，他的

生活始于革命，以革命为生，亦将为革命告终。

树林和道路愈来愈幽暗。后来马车终于出了林子，走上田野。太阳早已落山，只剩下一抹受创的晚霞。田野一如五百年前的田野。后来马车带着十七世纪就有的泥浆经过一处村庄，走向一条深壑。那儿有座桥。过了桥，面临一片难以逾越的水洼。马车驶入水洼。马儿使了半天劲，站住，不动了。任凭鞭子抽打，就是不动。处处是不可跨越的泥浆。四轮篷车陷在泥洼里，前左轮陷得犹深，泥浆直没到轴心。车夫坐不住了，他提脚往就近的辕马屁股上猛踢，不料辕马一挣，跌倒在地，把辕木压在身下。另一匹也连套带绳跌入污泥。车夫用鞭子抽了又抽，终于明白辕马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下车去扶。一脚下去，便陷到膝盖，另一脚下去，他整个儿身体都没法动弹。他使劲儿抽脚。刚拔出脚，一个踉跄，身子失去平衡，一屁股坐进了水洼，而两只靴子则留在泥里。老头儿哭了，流着痛苦的、歇斯底里的、无力的眼泪哭了，他，专门宰牛的屠夫，既感到忿懑，又感到绝望。

托洛茨基分子阿基姆没有赶上去莫斯科的夜车，没有赶上时代的列车。

第五章

红木艺术是无名的艺术，实物的艺术。一批批工艺匠成了酒徒，悄然死去，但实物却留给了人世。人们在它旁边恋爱，死亡。在红木艺术品中藏匿着他们的恋情、事业、欢愉。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朝代崇尚洛可可、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保罗皇帝是共济会会员，偏爱庄严肃穆的风格，红木要色泽深沉，经过研磨抛光，用墨绿漆面，间以黑狮和狮身鹰首怪物雕饰。亚历山大一世推崇埃拉多斯，一味仿古。一代代的人相继谢世，然而实物保存了下来，从这些旧时的实物中溢出了一种背时的“精神流质”——已往时代的流质。1928年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外省城市，出现了一批古董铺子和古董商。买卖古董的有当铺，国营商业机构，掌握国家资金者和博物馆人员。1928年很多人都在收集“精神流质”。那时革命的风雷已经过去，一些人买下这些古董，拿回家中鉴赏，对之唉叹，唉叹故物犹存

而人事全非，当时以共济会会员保罗皇帝时期的直线条严肃风格、不附铜雕或卷花的艺术品最为抢手。

别兹杰托夫兄弟住在莫斯科弗拉季米尔-多尔戈鲁科夫斯克区的日沃杰尔克，即所谓老城区。他们是古董修复家、古董商，因此，他们当然是“怪僻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单身汉，不爱多说话，为自己的行当而骄傲，乃如哲学家为自己的哲学论点踌躇满志那样。这两个怪人，住在地下室里，修理保罗、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尼古拉时期的红木珍品。一些同样古怪的收藏家不时上门看望。他们看看古董，谈谈往昔，鉴赏一阵子工艺，感受点儿遗风。若是看中其中的一件，就买它回去，并掏出白兰地酒庆祝成交。他们把整装白兰地注进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四棱瓶，再从四棱瓶倒进镶着宝石的御盏。

……而在斯库特林桥侧，什么新鲜事也没有发生。

县城——俄罗斯的布吕赫，俄国的镰仓。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夜半醒来，点灯进餐，接着琅琅背诵《圣经》，四十年来习惯未变。早晨，通常有他的朋友来访，有时庄稼汉也来求见，因为他肯替农民跑腿。那时庄稼汉正为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所说的两难选择所苦恼，不懂得为什么农民分为两个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的农民三点起床，晚上十一点钟睡觉，大事忙，小事忙，忙不歇手。如果他们要买条小牛犊，买之前先端详它十遍。见路上有根树棍儿，必捡起来带回家。他们的家务安排得有条有理，牲口喂得饱饱的，他们自己也吃得饱饱的，他们的农活也棒棒的。公粮和其他赋税他们按章向国家交纳，他们怕政府，自认是革命对象，不折不扣的革命敌人。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农民住的是透风墙，养的是瘦骨嶙峋的牛羊，除破屋和一牛一羊外一无所有。春天的时候，去城

里领回国家借贷给他们的种子。领回的种子一半下了肚，——因为他们缺粮，——一半用于播种。播种人懒懒散散，播得稀稀拉拉，因而秋季长不出庄稼。他们解释说，歉收是因为牛羊太瘦，粪肥短缺。于是国家免征他们的公粮，免还借贷的种粮。他们自认作革命的朋友。据革命的“敌人”说，革命的“朋友”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是酒徒（当然，很难确定是由于贫困而酗酒还是因为酗酒而贫困），百分之五是因为不走运（也许要想拯救他们也救不了），而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因为游手好闲，专说空话，是夸夸其谈的懒虫、笨蛋。在农村，对“敌人”施加种种压力，促使他们转化为“朋友”，但他们住进透风墙农舍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交纳公粮的可能。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常为他们撰写充满感情却无用处的申诉。有一个名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疯子，祖国的“敌人”就常来找他。革命前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是县自治局的信差。他闲来没事，阅读了许多科技书籍。1920年他下了乡，分配到十俄亩土地，他以四十岁壮年之力精心耕种这十俄亩的土地。1923年他在全俄农业展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证书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口头嘉奖，赞扬他饲养的乳牛，交售的牛奶，他所领导的饲养场。1924年春为他提供四十俄亩土地，以便他建立农业样板。但他谦虚，只领受二十俄亩。到1926年时他已有十七条牛，两名雇工。正因如此，他成了富农，倒了楣。1927年他只剩下五亩地，三条牛，因为其他的都用来偿付农业税、公债和贷款了。1928年秋他丢下一切，决定回城重操旧业。其时庄稼汉在横贯伏尔加河的木筏上，在各个村落，在饭铺和市场都在谈买卖，谈数字，说卖给合作社一普特黑麦为一卢布八戈比，从合作社买按牌价为一卢布八十戈比，而如果拿到市场上出售，可以卖到六卢布。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回到县城后，精神失常——他再也无法摆脱富农

的处境。他躲不了，因为在这一带到处是森林沼泽，而村落却屈指可数。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丧失了时间感和对生活的恐惧感，除撰写谁也不需要的申诉之外还写宣言和哲理文章，叫人感到可恨又可恼。

县城——俄罗斯的布吕赫，俄国的镰仓。十六世纪时德米特里王子① 在此被刺。那时鲍里斯·戈东诺夫把克里姆林教堂的大钟从斯帕斯塔楼卸下，因为奥古列茨神父曾敲响这口大钟以晓示这场谋杀。鲍里斯·戈东诺夫摘去钟耳钟舌，与其他不听命的居民一道抬去广场用鞭子抽打，随后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眼下钟在县城上空发出濒死的呻吟。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活得好端端的，一切如常。

1744 年，旅华商队总办格拉西姆·基里洛维奇·洛勃拉多夫斯基在恰克图批准一个名叫安德烈·库尔辛的人加入他的商队。此人金银匠出身，系亚兰斯克人，他接受总办指示去北京了解中国细瓷——那时叫珐琅瓷——的生产工艺和原料配方。库尔辛到北京后，通过俄国的“准尉衔见习官”们，以一千两白银，即二千俄国卢布的代价收买了御瓷厂的一个技师。后者在离京城三十五里处的破庙里向库尔辛透露了工艺、配料等一应秘密。格拉西姆·基里洛维奇·洛勃拉多夫斯基带上库尔辛和所获资料回到圣彼得堡向皇帝禀报。随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向切尔卡索夫男爵代宣圣意：把从中国来的一行人送去皇村。对库尔辛当然恩泽倍加。但据一项秘密通令所说，他窃来之物毫

① 史载德米特里为鲍里斯·戈东诺夫所杀，丧生乌格列奇，时1591年5月15日。

无用处，中国人采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把安德烈·库尔辛骗了。库尔辛怕皮肉受苦，溜回了他的家乡亚兰斯克。与此同时，在1744年2月1日，科尔夫男爵与赫里斯托福尔·唐拉德·贡格尔在克里斯蒂安尼亚[1]签订了一项密约。贡格尔是细瓷工艺师，据他自己说，是在萨克森的迈森瓷器厂学到的手艺。签过约，他秘密地乘上俄国巡航舰，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随后着手建厂（即后来的帝国瓷器厂）。他一面作投产试验，一面同他的俄国助手维诺格托夫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动用棍棒。不用说，靠这样的人是生产不出瓷器来的。1748年，把这个招摇撞骗、其实一窍不通的贡格尔赶出了俄罗斯，代之以本国的矿务专员、彼得大帝的学生、嗜酒如命的自学成才者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维诺格拉多夫。维诺格拉多夫研制出了一套细瓷工艺和原料配制方法。因此说，俄国的细瓷业并非借鉴外国，而纯系他的发明创造。然则俄国细瓷工艺的鼻祖仍算被中国人所骗的亚兰斯克人安德烈·库尔辛和诳骗沙俄的德国佬赫里斯托福尔·贡格尔。俄国细瓷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帝国细瓷厂以及老加德纳、波波夫、巴捷宁、米克拉舍夫斯基、尤苏博夫、科尔尼洛夫、萨夫罗诺夫、萨巴宁各立门户，并各自拥有一班能工巧匠。细瓷工艺如同农奴制那样盛极一时，且自德米特里·维诺格拉多夫以来，环绕细瓷生产还出现了一批瓷器鉴赏家，怪人，吝啬鬼。古老的尤苏博夫家族办厂设坊，世袭贵族弗谢沃洛日斯基热衷此道，更有博哥罗茨克的商贾尼基塔·赫拉普诺人（亦属怪人）从中插手。赫拉普诺夫还因触怒亚历山大一世陛下，领了一顿皮鞭，原因出在他的一尊瓷像上：从外形看，是个背负禾捆的偻腰曲背的修士，但空腹中藏了个

---

[1] 克里斯蒂安尼亚即挪威首都奥斯陆，前者系1624—1924年所用名称。

理想化的年轻农妇。巧匠相互偷学“绝艺”：尤苏博夫偷学帝国细瓷厂的，基谢廖夫偷学波波夫的，萨夫罗诺夫则乘夜深人静之际从阁楼上通过楼板缝隙往下偷看。正是这些巧匠和怪人创造了许多瑰宝。俄国细瓷作为一种最最美妙的艺术点缀着我们的地球。

1929年1月15日写于雅姆斯
科波列—伏尔加河畔的住所。

短篇小说两篇

石枕川　译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第 一 章

黎明时分，城市上空响起了工厂的汽笛。浮游在小巷里的阴冷灰暗的夜雾在晨曦中渐渐消散。这就是说，今天的早晨一定是沉闷的，灰色的，雾蒙蒙的。此刻在报馆的印刷车间里，轮转印刷机很快就要把当天的报纸印出来了，再过不大工夫，报童便将挟着大叠大叠的报纸走出发行科的院子，奔散到各条大街，在空荡荡的十字路口高声叫喊：

"中国发生革命！欢迎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到来！红军统帅来市就医！"报童一面喊叫，一面清嗓子，因为他们要叫卖一整天。

与此同时，一列特快开进了专门停靠南方来车的车站。这是辆专列，还拖着供办公用的熠熠发亮的瓦蓝色尾挂。办公车

厢无声无息，车门口踏级上站着哨兵，锃亮的玻璃窗后垂着厚厚的窗幔。列车来自黑夜，来自蓬勃的盛夏耗尽了精力换来白雪覆盖的严冬老态的原野。列车徐徐驶到站台的荫棚底下，停在备用道上。月台上空空的。也许出于偶然，车门正好对着站在月台上加强警戒的、穿绿条镶边制服的民警。三个缀有菱形袖章的军官走近办公车厢。车上车下的人相互敬礼，三人等候在车门踏级旁边，守门哨兵朝里悄悄说了些什么，于是那三个军官跨上踏级，消失在窗幔后面。车厢中亮起了灯光。两个通讯兵在车厢旁边忙忙碌碌，从月台荫棚下把电话线接进车厢。又有一个人朝车厢走来了。他穿件半旧夹大衣，却又不合时令地头戴护耳皮帽。他不朝哨兵敬礼，对方也不向他还礼。他说：

“请您告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说波波夫来看他。”

红军战士慢腾腾地瞥了波波夫一眼，又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尤其仔细地察看了他那蒙满灰尘的皮鞋，然后慢腾腾地回答：

“司令员同志还没有起床。”

波波夫向红军战士友好地笑笑，改口称战士为“你”，和气地说：

“没事，老弟，你去说吧，告诉他，就说波波夫来了。”

战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于是波波夫钻进车厢。办公车厢里因为垂着窗幔，又亮着灯，所以仍像是夜晚。桌上台灯旁摊开着一本书，放着一盘吃剩的碎麦米粥，再旁边放着开了盖儿的柯尔特手枪皮套。皮套带像条蜿蜒的蛇。桌子另一端有两只启开瓶塞的酒瓶。三个带菱形袖章的军官坐在桌旁一排靠厢壁的皮圈椅里，姿态谦恭温雅，手捧公文包，端端正正，默

---

① 加弗里洛夫的名和父称。

不作声。波波夫走到桌后，脱去大衣，摘下帽子，把它们放在身旁，拿起那本打开的书来瞧了瞧。列车员走了过来。他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自顾拾掇桌子：把酒瓶藏到车厢角落里，将石榴皮扫进托盘，然后铺上桌布，拿来一只带茶杯托的杯子，一碟干面包，一盏吃鸡蛋用的高脚杯，两只囫囵煮蛋，一撮盐，几小瓶药。在这之后，他掀开帘角，瞅一眼窗外，窗外已是早晨，便把窗帘拉开——拉帘幔的小绳可怜巴巴地吱的一响。他关灭了电灯，灰蒙蒙阴冷的秋天的早晨倏地钻进办公车厢。在这浑浊的晨色中，办公车厢里所有人的脸都是蜡黄的。稀溜溜、潮乎乎的光线像是浓液。侍从副官和列车员并排站在门口，响起了电话铃声，办公日开始了。

没多会儿司令员便从他的起居车厢走进办公车厢。他，不高的个儿，阔肩膀，一头往后梳的浅黄长发。缀有四个菱形袖章的军上衣是用草绿色粗呢料子缝制的，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括。带刺马靴虽经仔细擦过，但从磨损的靴跟看来，显然穿了不少时候。这位司令员的名字标志着整个内战时期红军的英勇无畏，标志着他身后成千上万、几十万的人。他的名字也标志着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死亡、困苦、伤残，标志着寒冷、饥馑、酷暑下的行军，标志着火炮的轰鸣、子弹的呼啸和深夜的刺骨寒风，标志着夜间的篝火、行旅生活、胜利、奔命，再次标志着死亡。他指挥千万人组成的军队，指挥人、胜利和死亡——由火药、硝烟、白骨和横飞的血肉所构成的死亡，赢得后方千百面红旗招展和无数人民群众欢呼的胜利，由无线电广播传遍全球的胜利，这胜利后面是俄罗斯沙场上埋葬尸体的深坑，横七竖八胡乱堆积千万个肉体的深坑。围绕着他的名字演化出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说他指挥英明，英勇善战，大胆无畏，坚忍不拔。他有驱使人们杀戮同类，驱使他们去死的权力和意志。

这位个儿不高但肩膀宽阔的司令员走进办公车厢，和蔼的脸上略带教会学校学生那种倦容。他走路很快。照那步履，既像骑兵，同时又像与军人迥然不同的文职人员。三个参谋霍地站起身来，立正。司令员走到他们跟前，并不答礼，只做了个允许稍息的手势，就这么站着听取他们一一汇报。汇报人往前跨一步，打个立正，然后说："嘱办的……"最后用"为革命效劳"的话作为结尾。司令员轮流和每个汇报的人握手，大概，汇报的内容他压根儿就没听。在这之后，他对着那只孤零零的杯子坐下。列车员立即出现在他一旁，用一只漂亮的茶壶给他斟了茶。司令员边拿起熟鸡蛋，边问：

"情况怎样？"他说话开门见山。

三人之中的一个说了说新来的消息，接着问道：

"您身体好吗，加弗里洛夫同志？"

司令员的脸骤然一变，不满地回答：

"我在高加索接受过治疗，现在已经康复了。"停顿了一小会儿，又说："现在身体健康。"停了停，又说："告诉你们，不要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不要派什么仪仗队，总之……"歇了口气又说："你们没事了，同志们。"

三个参谋起身告辞，司令员就这么坐着跟他们握手，参谋们悄悄出了办公车厢。司令员进办公车厢的时候，波波夫没向他问好，而是拿起桌上的书低头翻阅，司令员只朝波波夫瞥一眼，也不答理，仿佛没看见似的。这会儿参谋走了，司令员仍旧不说一句寒暄的话，就像昨晚就已见过面似的，径直问：

"阿廖什卡，你想喝点儿茶还是来点儿酒？"

但波波夫没来得及回答，因为副官向前迈出一步开始向司令员汇报："司令员同志……"他说汽车已从平板货车上卸下；办公室收到各方发来的函件，其中的一封是一号宅院发来的、秘

书亲送的密件，他说，住所安排在总部，来了一大束贺电和贺文。司令回答他：决定在专列的车厢里歇宿。在这之后把副官打发走了。列车员不等波波夫表示意见就在桌上放了一只茶杯，一只酒杯。波波夫从车厢角落里移身坐近司令。

“尼古拉沙，你身体好吗?”波波夫的问话像对手足兄弟那样亲切。

“身体吗？已经好了，完全恢复健康了，不过，没准儿你要在我的棺材旁守灵。”加弗里洛夫既像是认真说的，又像开玩笑。但不管怎样，即使是玩笑，也是苦笑。

他俩，波波夫和加弗里洛夫，是对旧交，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曾在同一个厂里干活。打从很久以前，还是年轻小伙的时候，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工厂当织造工起开始了他们的人生，后来他们同坐过博戈罗茨克监狱，再后来同时成了职业革命家，经历流放和逃亡，共同从事秘密工作，同是塔甘监狱里待发配的囚犯，接着又是流放、逃亡，直至流寓国外，浪迹巴黎、维也纳、芝加哥。乌云翻浪的一九一四年，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希腊的萨洛尼卡，罗马尼亚，基辅，莫斯科，彼得堡。最后来是雷鸣电闪的一九一七年，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隆隆炮声。嗣后一个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当赤卫军的参谋长；另一个成了雷科夫戏称的无产阶级首席贵族，留在图拉。一个忙于战争，指挥大炮和人，指挥死亡；另一个埋头于省委、省执委直至最高经委的工作，忙于开大会，作报告。对于他俩来说，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和思想，都是为了追求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世上最伟大的正义和真理。但是，一个在另一个眼里永远是尼古拉沙，另一个在这一个眼里永远是阿列克谢，阿廖什卡，他们永远是织造工同志，不受级别和军人条例的限制。

“尼古拉沙，你说说，身体究竟怎样?”波波夫问。

“说实话，我确曾犯过胃溃疡，也许现在还有。犯起病来便呕血，灼痛，疼极了。总而言之，那病犯起来很可恶。”司令员凑近阿列克谢低声说。“他们把我送去高加索治疗。后来不痛了，我试着去工作。半年后又出现呕吐和疼痛，再次去了高加索。眼下症状已经消失。为了试试是否真的好了，我甚至还喝了一瓶酒……”司令员说到这儿，自己打断自己的话：“阿廖什卡，你想喝酒吗？喏，在椅子底下，给你带来了一小箱，你自个儿打开吧!”

波波夫用手掌支着头，坐着不动，回答道：

“不，清早我不喝。你往下说吧。”

“这不是，你瞧，我现在好好的。”司令员沉默了一小会儿。“阿廖什卡，为什么召我回来，这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去了封信，要我从高加索直接回来。连妻子那儿也没来得及去告别。”司令员沉默了一小会儿。“见鬼，怎么也猜不透为了什么。军队里一切正常，眼下又不开代表大会，什么大事也没有。”

司令员谈到了军队，谈到了战争。他大概没有发现，在他谈论军队和战争的时候，他不再是织造工，而是统帅，红军的将领。这位司令也没有发现，当他谈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和奥列霍沃-祖耶沃年代时，他又成了织造工，爱上了河对岸一位女教师的织造工。为了去见她，他把靴子擦得锃亮锃亮，为了不让尘土弄脏靴子，宁肯赤脚去学校，直到学校旁的小树林里才穿上它。为去见她，还买了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和蝴蝶领结，一顶神气活现的礼帽。可跟女教师除了谈书本之外没能深入进行下去，没有产生罗曼史，女教师拒绝了他。织造工-司令员是个

好人，爱开玩笑，也善于找到笑料，因而和朋友在一起说话非常风趣，只是偶或想起莫名其妙地被召回莫斯科这蹊跷事来才感到忐忑不安。他茫然若失地在车厢里踱着步，以棒小伙子织造工的口吻评论犯病的司令员："当显贵，当统帅，有什么好的！连荞麦粥也咽不下……是啊，中央任意摆布人。你爱听不爱听，话就得这么说。"他说到这儿，不作声了。

"尼古拉沙，你直截了当说吧，你怀疑什么？"波波夫问。"干吗说那些守灵之类的话？"

司令员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才说："在罗斯托夫，我曾遇见波塔普（他用革命代号提到一九一八年"光荣的一群"当中一位显要革命家）。他建议我……他想说服我进行手术，割掉溃疡，或者缝补缝补。这种说服工作真叫人犯疑！"司令员沉默一会儿。"我感觉身体很好，我打心眼里反对手术，一百个不愿意。不再医治也能恢复健康，一点儿也不觉得痛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几乎是老头儿了，成了所谓显贵，可总惦记自己的肚子，可耻！"司令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那本打开的书。"我在读托尔斯泰这老头儿写的书，《童年和少年》。老头子写得不赖。他对生活有感受，对流血……流血，我见得多了，可是……可是怕手术，像孩子那么怕。我不愿意，这能送掉我的命！……关于人血，托尔斯泰这老头儿有深刻的理解。"

副官走进来，打个立正，报告说，总部来通知，说由一号宅院开来接司令的汽车已经开到，请您去那里；说又来了一些电报；说某人已派人来提取从南方来的包裹。副官说罢，把一叠报纸放到桌上。司令员让他走了。司令吩咐准备好大衣。司令员翻开报纸。那里，在当日重要新闻的版面上，刊登了一条消息："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到达莫斯科。"第三版上又写道：

“今天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临时离开军队来此接受胃溃疡手术。”这则报导里还说“加弗里洛夫同志的健康情况令人忧虑”，但“医生们一致保证此项手术必获成功”。

革命的老战士，士兵，集团军司令，把千万人送去死亡的红军统帅，开动杀戮、死亡和以流血取胜的战争机器的加弗里洛夫此刻仰身椅背上，举手拭拭前额，凝视着波波夫说：

“阿廖什卡，你听见了吗？这事不简单！啊，怎么办呢？”随后高声命令：“勤务兵，取我的大衣来！”

第　二　章

市内，在两条大街的交叉口，在汽车、行人、马车如流的地方，坐落着一幢花园洋房。这幢带大圆柱的房子不挂任何招牌。大门两旁，狮身鹰首雕像下面，站着两个戴头盔的岗哨。行人、汽车喇叭声、群众、人的时间从府邸旁边流去，灰暗的白昼、报童、挟公文包的人、穿齐膝短裙和长统丝袜（别人错以为她们裸着大腿）的妇女从府邸旁流去，但在大门上的狮身鹰首雕像后面，时间是安谧的，静止的。城市的另一端坐落着另一幢宅院，属同样的古典式建筑，有花园，有圆柱，有耳房，有描绘神怪的浅浮雕。这幢宅院有两个大门，大门上，画有扭曲着脸的牧人保护神，门旁有岗亭，岗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腰束围裙、脚登毡靴的守门人。他们的围裙上还别着铜号牌。大门旁停着一辆轿车，黑色车身上涂了红十字，并写有“急救车”三个字。

这一天，一家大报在《庆贺金本位纸币[1]发行三周年》的社论中指出："只有使经济生活建立在严格的经济核算和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方有可能使货币稳值。如果国家给予企业的补贴及国民经济的进展与它的预算不相称，便将不可避免地破坏严密的财政制度。"大字标题有：《中国的反帝斗争》，国际栏有英、法、德、捷、拉脱维亚和美国的来电。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登在底栏：《革命暴力问题》。另外两版上刊登公告，有大字标题是：《生活的真实——梅毒》，《斯·布罗伊德的新书〈在疯人院里〉》。

中午时候，一辆洛伊斯牌高级轿车开进一号宅院，也就是使时间凝滞不动的那幢楼房的前面。哨兵上去打开车门，接司令员下车。

府邸深处，办公室里窗帷半掩。窗外是往远处延伸的大街。而窗内，办公室的壁炉燃得正旺。铺有红呢毯的书桌上的三架电话机，壁炉里木柴清脆的劈啪声更衬托出办公室的宁寂。三架电话机是三条大动脉，通过它，在静静的办公室里便可以指挥城市，了解城市，掌握城市的命脉。书桌上放着沉甸甸的青铜文具盘，笔架上插了一打之多的红蓝铅笔。书桌后面，办公室的墙孔里安置了一台收音机、两副耳机和一排通往各处的电铃按钮——既有通接待室的，也有发"警报"的。书桌前设有一张圈椅。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书桌后的木椅上坐着一位腰背不弯的人。窗帷半掩，书桌上亮着绿罩台灯。这位腰背不弯的人的脸庞落在台灯阴影里，看不真切。

司令员沿着地毯走来，坐进圈椅里。

第一人，腰背不弯的人：

---

① 苏联金本位纸币于1922年发行，1947年停止使用。

“加弗里洛夫，我们俩用不着谈革命的残酷性了。历史的车轮，很遗憾，我是这样认为的，是靠了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革命的车轮尤其如此。我和你也用不着谈论死亡和鲜血。你当记得，我和你曾率领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红军战士进攻叶卡捷琳诺夫。你手里提一支步枪，我也拿着枪，炮弹击中了你的坐骑，于是你徒步向前。战士们往后溃退，为了制止他们，你把其中的一个枪杀了。司令员，如果当时我害怕，你也会枪毙我的，而且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

第二人，司令员：

“嘿，你这陈设不赖，真像部长办公室。这儿能抽烟吗？没见有烟蒂呀！”

“别抽烟，别抽，你的健康不允许。我自己不抽。”

第二人严肃地、爽快地说：

“不需要开场白。为什么召我回来?免去外交辞令，直说吧！”

“召你来，是因为你应该接受手术。你是革命所不可少的人。我已约好一批教授。他们说，一月后你即能下床行走。这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教授们正等着你，他们会给你作体格检查并理解一切的。我已下达了命令。甚至请来了一位德国大夫。”

第二人：

“你吸不吸烟由你，可我想抽一支。我的医生曾对我说过，不用手术，会自动痊愈的。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任何手术都不需要，我不要。”

第一人往后伸手摸到墙上的电钮，按下铃，秘书便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第一人问：“有人在外面等候接见吗？”秘书点头称是。第一人不作答复，让他走了。

第一人：

“司令员同志，有次我俩曾讨论要不要派遣四千人的问题，

这些人去了肯定送死，你记得吗？你仍然下达了派遣令。你做得对。过三星期你就能下地行走。请原谅，我已下了命令。”

电话铃响了。不是市内公共电话，而是内线的。这样的内部线路一共也不过三四十条。第一人拿起听筒，听完后追问一遍，然后说：“给法国人发一份照会？那当然，要正式的，照我昨天说的那样。这你明白，你记得咱们是怎么捕淡水鲑的，法国人就像鲑鱼，滑溜溜的。怎么？是的，是的。给加点温！再见。”

第一人：

“请原谅，不用多谈了，加弗里洛夫同志。”

司令吸完烟，把烟蒂塞进红的蓝的铅笔中间，便站起身来。

司令员：

“别了。”

第一人：

“再见。”

司令员踩着红地毯向门口走去，洛伊斯轿车将他带进了大街的喧闹声里。办公室中只留下那位腰背不弯的人。没有人再到办公室里来。他腰背挺直，手执一支粗大的红铅笔，坐着批阅文件。他按铃，秘书进来，他说：“吩咐把烟蒂清除掉，这儿，笔架里！”说罢他重又拿起红铅笔，一声不响批阅文件。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他依然批阅文件，埋头工作。其间来过一次电话，他听了回答：“给土耳其斯坦运二百万卢布的胶靴和纺织品去填补商品不足的窟窿吗？对，当然！对，干吧！再见。”侍者轻手轻脚地用托盘送来一杯茶和一块餐巾盖住的冷肉，放到靠窗的小桌上，走了。腰背不弯的人又一次召来秘书，问：“秘密综合报告准备好了吗？”秘书作了肯定的回答。“把它取来。”吩咐罢，他又默默地、久久地埋头于文件，埋头于外交

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治经济处、外贸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等各类文件之中。这时，三个最高决策者中的其他两人也都跨进了他的办公室。

下午四时，几辆汽车开进了市郊的二号宅院。二号院的房子裹在昏暗里，仿佛湿雾缭绕的房子靠这昏暗能焐暖似的。院门口，在系围裙穿毡靴的看门人旁边配置了两个民警，正门旁也配置了两个民警。胸挂两枚红旗勋章、腰柔如柳的红军军官带着两个战士走进楼房。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前厅迎接他们："是，是，嗯。"房间很大，很空旷。正中放置一张铺白漆布的长桌。桌子两侧，如同列车的办公车厢里那样，是一溜漆布面高背椅子。靠墙有一张漆布面沙发小床，上面铺了白被单；沙发床旁有一张木凳。墙角里有个盥洗用的瓷盆。它上方的玻璃搁板被许多贴标签的瓶罐占满了：有升汞，有钾皂。旁边挂着几条未经漂白的黄乎乎的毛巾。最早开来的几辆汽车送来的是内科和外科医生们，都是教授。

人们陆续进门，互相寒暄。迎候他们的还是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秃顶、脸上一团和气的人——很像是这儿的主人。

洛佐夫斯基教授走上前去。他三十五岁上下，脸刮得精光，身穿燕尾服，戴副直梁夹鼻眼镜，长一双斗鸡眼。

"是，是，是，嗯。"

光脸蛋大夫递给大胡子一个拆开漆封的信封。大胡子掏出信纸，扶正眼镜，将信读了一遍，再一次扶正眼镜，疑惑地把信交给了另一人。

光脸蛋大夫眉飞色舞地说：

"瞧，是份密件，可以说这是下的一道命令。早晨送来给我的，你们明白吗？"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全都压低声音，你一句我一

句地说：

“何必还要会诊呢？”

“我是接到加急电报赶来的。电报打给了医大校长。”

“诸位可知道，加弗里洛夫司令就是那位……”

“是，是，是，嗯，革命，军司令，公式，瞧——嗯……”

“会诊。”

这里的电灯光投下清晰的人影。医生们有的抓住对方白大褂胸袋上的纽扣，有的手牵住另一人的手，随后，正当他们要走进房间了……

此时门口响起举枪的咣啷声，靴跟的碰击声。红军战士打着立正姿势。那个胸佩红旗勋章、腰若柔柳的高个儿青年军官也和战士一样立正站在门前。司令员迅速地走进了接待室。他用手把头发往后撩了撩，又整了整军上装的领子，说：

“你们好，同志们！要我脱去衣服吗？”

此时：教授们在长桌两旁的漆布椅上缓缓落座，把胳膊肘放到桌面上，扳动着指头，扶正他们戴的眼睛，邀请患者坐下。戴直梁夹鼻眼镜、长一双斗鸡眼的那位，也就是拿出信来给大家瞧的人，对大胡子说道：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是 primus inter pares[①]，由您主持这次会诊吧。”

“要我脱下衣服吗？”司令员又问，同时把手伸到领口。

会诊主持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佯做没听见司令员的问话，自顾在主席位置就坐，慢条斯理地说：

“我建议，我们先问问患者：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病的？有哪些症状使他发现自己有病？然后再作检查。”

---

① 拉丁文：最年长者。

这次教授会议后写出了一份会诊记录，上面是潦草得难以辨认的医生笔迹：

会诊记录。参加会诊者某某教授，某某教授，某某教授（共七人）。

患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加弗里洛夫公民主诉上腹部疼痛，呕吐，灼痛。两年前开始患病，但本人不知。曾进行门诊治疗并在疗养院疗养，均无效。上述七人应患者请求举行此会诊。

Status praesens①：总的情况尚好。肺——N。心脏稍有扩大。脉快。轻度 neurastenia②。除胃部外，其他器官未发现病理性改变。经诊断，患者似有 ulcus venticuli③，必须手术。

会上推选阿纳托利·科兹米奇·洛佐夫斯基教授主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科索夫教授同意担任助手。

会诊地点：某市。日期。七位教授的签名。

只是在手术后，才从私人谈话中获悉，实际上没有一位教授真的认为有动手术的必要，病情说明无须手术，不过会诊时谁也没有挑明。会上，只有那个沉默寡言的德国人提出过无须手术的设想，但在同事们的反对下没有坚持这个意见。从私人谈话中还透露，会诊结束，大家坐进汽车返回学者之家时，科科索夫教授，即脸上浓密的毛发几乎挡住了眼睛的那位，对洛佐夫斯基教授说道："若是这病生在我的兄弟身上，我是不会给他做手术的。"洛佐夫斯基答复他："这当然，但……手术并无危险嘛……"随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汽车开走了。

腰背不弯的人仍坐在一号宅院他的办公室里。帷幔把所有的窗子遮得严严实实。壁炉内重又升了火。整幢房子沉浸在寂

①②③ 均为拉丁文，依次为：病人现状，神经衰弱，胃溃疡。

静之中。那寂静，似乎有一百年之久了。他坐在木椅子上。他面前摊开着德文的和英文的书，他正蘸着墨水写字，写的俄文字母一个个都是直愣愣的，嵌在德国的 Lainen Post[①] 里，摊在他面前的书，都是有关国家、权力及政权的论著。从天花板照下的灯光现在照清了他的脸，原来是张普通的脸，也许略带点儿严峻。不过，无论如何，是张注意力集中的、毫无倦意的脸。他对着书和笔记本坐了好久。嗣后召来女速记员，开始口授。他说出的话句句涉及苏联，美国，英国，苏联和世界的关系，英镑以及俄罗斯小麦的普特数，美国的重工业以及中国的劳力。他说话铿锵有力，每句话都像公式。

城市上空，月儿缓缓而行。

这时候司令员在一个只住共产党员的大旅社里，在波波夫的房间里做客。屋里一共三个人。加弗里洛夫坐在桌旁，娜塔什卡在他的膝上不肯安静地坐着。加弗里洛夫一根接一根地划亮火柴，娜塔什卡一如所有的孩子那样惊奇地瞧着这世界上的神奇事物，尖起嘴巴想把火花吹灭。但她没有足够的气力，火花后来自己灭了。瞧见娜塔什卡蓝色眸子面对神秘事物流露着如此之多的惊讶、赞叹和惧怕，他不得不再次划亮火柴，因为他不得不倾倒于娜塔什卡所体现的那种神秘。后来加弗里洛夫安排娜塔什卡去睡觉，自己坐在她的小床边，说："闭上眼睡吧，我给你唱个歌儿。"他唱起了儿歌。其实他不会唱，也不知道任何儿歌，而是随口胡诌：

"来了一只公山羊，他说道：

'快快睡觉，睡觉，睡觉，'"

加弗里洛夫狡黠地瞥了一眼娜塔什卡和波波夫，莞尔一笑，

① 德文：《莱纳邮报》。

照他闪念之间想到的与“睡觉”押韵的词儿，继续唱道：

“来了一只公山羊，他说道：

‘快快睡觉，睡觉，睡觉……

可别撒尿，别尿，别尿……’”

娜塔什卡睁开眼笑了笑，而加弗里洛夫依然唱他编的最后两句儿歌（他唱得并不好），直到娜塔什卡睡熟。

后来加弗里洛夫和波波夫一起喝茶。

波波夫问：“尼古拉沙，要给你煮点儿碎麦粥吗？”

两人对坐而谈，声音很低，不慌不忙，哪儿也不忙着去，接连喝了好多茶。加弗里洛夫敞开上衣衣领，把茶倒进碟子里，一口一口地啜。他们说东道西，谈了许多琐事。波波夫正喝第二杯时忽然放下杯子，沉吟了会儿，说：

“尼古拉沙！我的济娜出走了，把孩子丢给我，找他以前的情人去了。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说是个工程师。我不愿用脏话来骂她，不过，无论如何，我还得说，这臭婆娘不说一声便溜，真可耻！我自己也觉得可耻——从前线的炮弹坑里把她抱了回来，关心她，爱她，我像傻瓜似的照顾她，她却是个臭小姐。跟她一块儿生活了五年，可我看错了……”波波夫详详细细地说起分歧的种种原因。其实这些原因不值一提，正因如此才特别让人难过，人们常常为这么点儿小事而看不清主要方面。接着他俩谈到了孩子。加弗里洛夫讲起他自己的家庭生活，讲他的三个男孩，讲他的妻子。妻子已快苍老，然而她仍是加弗里洛夫唯一的、终身的伴侣。

司令员走的时候说：

“给我本书读读吧！但要朴实些的，讲好人，讲美好爱情的，像《童年和少年》那样的。”

波波夫的书在墙角里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但就是找不出一

本写普通人的爱情、普通的人际关系、普通的生活，写太阳和人、写人的日常欢乐的普通的书。

“瞧这些革命的书籍!”加弗里洛夫戏谑地说。“得了，我还是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吧。那里面，关于舞会上的旧手套那一节描写得妙极了。”说到这儿，脸忽地阴沉下来，停了停，低声说：“阿廖什卡！为了不浪费时间说那些空话，所以我没提，今儿我去见了上级，也去了医院，会见了教授们。教授们发表了一通高深理论。我不愿挨刀，当然不愿。可明天得躺到手术台上。开刀时希望你来医院看望我。别忘了老朋友。不要写信告诉我的孩子和孩子妈。别了!”加弗里洛夫也不握手告辞，就走了出去。

旅馆外停着一部轿车。加弗里洛夫坐下后吩咐：“回去，回车厢去。”于是轿车钻进了小巷。备用线上月光在铁轨上滑动。跑过一只狗，它哼了声，隐没在铁轨远处的黑暗中。登车踏级旁的哨兵当司令员走过他身边时肃立无语。旋而副官出现在过道里，列车员也探出头来，车厢里亮起了灯。悄无声息的、只有外省才有的蔚蓝色的宁静笼罩了车厢。司令员走进起居车厢，脱下靴子，换上便鞋，解开上装领口，按按铃：“来杯茶。”然后他跨进办公车厢，就着台灯坐下。茶端来了，但司令员连碰也没碰杯子。司令员读《童年和少年》读入神了。他边读，边想。后来司令员回起居车厢取来了一本厚厚的本子，按铃叫通信员：“请把墨水瓶拿来。”他开始写信。他思考着每个句子，写得很慢。写完一封，重读了一遍，又思考一番，嗣后塞进信封，将信封封好。接着写第二封，也思索一阵后塞进信封。现在写第三封信。写得很短，很匆忙，写完后没再复看一遍便装入了信封。车厢内悄无声息。登车踏级旁的哨兵肃然不动。过道里的副官和列车员也不吱声。时间也仿佛凝固了。三只白色的信

封上各写上收信人姓名地址，然后放在面前。好久后，司令员拿起一个大封袋，将三封信统统装了进去，封好，在大封袋上写道："待我死后开拆。"

第 三 章

加弗里洛夫之死

加弗里洛夫死的那天下了第一场雪。城市白了，安静了，它像是披上了一件缟素。只有窗外的山雀在嬉弄枝头的雪花。这些山雀是随着初雪从市郊飞来的。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科索夫通常七点醒来，做手术的那天也是如此。

他将头伸出被子，咳了声，然后习惯地抬起毛茸茸的手，在床头柜上摸到自己的眼镜，把它架到鼻梁上，让镜片嵌进浓密的毛发里。窗外的白桦树上的一只山雀把枝头的雪粉弄得纷纷扬扬。教授穿上晨衣，把脚套进拖鞋，上盥洗室了。

当教授醒来的时候，家里还是静悄悄的，但他干咳着从盥洗室出来时，他的妻子卡杰琳娜·帕夫洛芙娜已在餐室里给他的茶杯里放糖。茶匙叮叮当当，茶炊呼呼冒气。教授穿着晨衣拖鞋走过来用茶。

"早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妻子说。

"早安，卡杰琳娜·帕夫洛芙娜，"丈夫说。

教授吻了吻妻子的手，在她对面坐下，扶正毛发丛中的镜

片。他默默地呷了口茶，正想在这早茶时分说点例行的话儿，然而往日的习惯被电话铃声打断了，电话打得太不合时宜！教授瞪眼瞅瞅书房门——铃声就是打那儿来的，然后疑惑地瞧瞧已经衰老、皮肤松弛、穿着日本式和服的妻子，站起身来，疑惑地走到电话机旁。他冲着话筒以极其苍老的不满的口吻说：

“喂，我听着哩。谁打电话？有什么事？”

对方回答说，是从总部打来的。总部得知八点半开始手术，所以挂电话问问，需不需要帮助，是否要派车接他。教授骤然生了气，对着话筒呼哧呼哧地说：

“……请听我说，老……老弟。我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什么个人效劳，老弟！我习惯每天乘电车去医院上班，凭良心履行我的职责，老弟！今天也一样，并没有不乘电车的理由。”

他砰的一声挂断电话，哼哧着回到餐桌边，回到妻子身边，又去喝茶。他咬胡子，生气，哼哼了一阵子，但没多久也就安定下来。镜片后的眼珠儿重又发亮，这时显得那么睿智、专注。他慢条斯理地说：

“德拉金卢日村有个名叫伊万的庄稼汉，他如果病了，病得三星期不能下床，于是他就做祷告，和家人商量一番，然后去县立医院找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夫诊治。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伊万已有十五年之久。十五年来，伊万送给彼得·伊万诺维奇的鸡少说也有二十来只，还认得大夫家所有的孩子，甚至还拧过其中一人的耳朵。伊万见到彼得·伊万诺维奇，伸长脖子一鞠躬。彼得·伊万诺维奇检查过他的身体，听过他的心脏，认为有必要就进行手术。他动刀时不慌不忙，手术很出色，一点也不会比我差。如果手术不成功，伊万死了，死后为他立个十字架，如此而已……再比如说平民百姓阿纳托里·尤里耶维奇·斯温齐茨基，他来找我，仔仔细细讲述他的病情。我给他

作检查，仔仔细细地检查，认真彻底地研究，然后对他说：‘老弟，就让你的溃疡留着吧，留点儿神就行，还能再活五十年。要是死神找到你，那也没什么，上帝要你回去嘛，老弟！’如果他说：‘给我做手术吧！’我就做。但如果他不愿意，我是绝不会做的。”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今天在我们医院里，要给一个布尔什维克，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做手术，我当助手。”

“他……他就是……”卡杰琳娜·帕夫洛芙娜接口道，“就是……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常常……太可怕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为什么不是您主刀呢？”

“其实一点儿也不可怕，”教授回答。“至于说这回由洛佐夫斯基主刀，因为时下看重年轻人，他们需要晋升，出头。虽然医界名流们对他进行了反复检查，叩诊、透视、灌肠，虽然进行了会诊讨论，但最后依然是谁也不了解这位患者。而最主要的是，他们不了解人，不是跟人打交道，而是跟个公式打交道——是一位将军，报纸每天都提他的名字，为了造成恐惧心理。如果手术出了差错，你的大名便会弄得全欧洲皆知，有你好受的。”

阿纳托利·柯兹米奇·洛佐夫斯基教授家与科科索夫家迥然不同。如果说科科索夫家属于1890—1900年的俄罗斯式布局，洛佐夫斯基家则带有1907—1916年的现代气派。这里有厚厚的窗幔，宽大的沙发床，橡木书桌，青铜裸体女像烛台，墙上绷着壁毯，壁毯上挂着从“艺术世界”展览会上弄来的二流画。

洛佐夫斯基睡在沙发床上，不是一人，还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他的浆领胸衣落在地毯上。洛佐夫斯基醒来，轻轻吻

了吻女郎的裸肩，便爽然起身，拉动窗幔索。沉重的帷幔滑到一边，于是飘舞着雪花的白昼映入了房间。洛佐夫斯基乃如一切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人那样欢愉地瞧着街道、白雪、天空。

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就挂在靠沙发床上壁毯边。教授拿起话筒："是，是，我在恭听呢。"电话是总部打来的，问要不要派车接他。

"好，好，请派车吧！关于手术，请不必担心，我相信将非常顺利。请派车来，手术前我正巧要办件事。好，好，最好八时到。"

动手术的这天早晨，波波夫来到加弗里洛夫的病房。当时天还没明，亮着灯，但没能和老朋友好好交谈，因为助理护士要领加弗里洛夫去盥洗室作术前最后一次灌肠。加弗里洛夫边走边说：

"阿廖什卡，你读读托尔斯泰《少年》中关于合乎礼貌和不合乎礼貌那段描写吧！这老头儿对流血感受很深！"这是波波夫从加弗里洛夫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手术前，从加弗里洛夫的病房到手术室的过道里人们来来往往。他们压低着声音说话，轻手轻脚地奔忙。手术前一天的晚上曾用一条古塔胶虹吸管塞进加弗里洛夫的食道里洗胃和吸胃液。这种胶管拔出后患者感到恶心，心理上受压抑，仿佛这胶管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侮辱人的人格。今天早晨进行了术前最后一次灌肠。加弗里洛夫走进手术室时穿的是病号服——粗布裤和不系纽扣系带子的衬衣，赤脚穿一双编有号码的布鞋（今天早晨最后一次给他换了内衣，消过毒的内衣）。他走进手术室时瘦削的脸显得苍白而疲惫。

手术室的外间里酒精灯吐着火苗，上面架着长方形的镍匣。穿白大褂的人都不说话。手术室是个很大的房间，地板、墙壁、

天花板一律是柔和的白色。手术室里非常明亮，因为整整一面墙是玻璃的，而且这面大窗对着河边。房间正中是张白色的长桌，那便是手术台。科科索夫和洛佐夫斯基就在这儿迎接了加弗里洛夫。科科索夫和洛佐夫斯基都穿着白大褂，现在他们戴上像炊事员一样的白帽，科科索夫还用专门的套子罩住胡须，只露出一双毛发丛里的眼睛。另外还有十来个人沿墙站立。

加弗里洛夫随助理护士不慌不忙地进了手术间，朝两位教授默默点点头，瞅了瞅窗外的隔河景色，便反剪双手朝手术台走去。另一个护士把盛有手术器械的煮沸过的消毒匣提在钩子上拿来了。

洛佐夫斯基低声问科科索夫：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咱们开始好吗？”

“是，是，嗯，”科科索夫回答。

于是两位教授去洗手。洗了又洗，之后再用升汞溶液浇手，用碘酒涂抹。氯仿麻醉师检查了面罩和盛氯仿的玻璃瓶。

“加弗里洛夫同志，现在咱们开始，”洛佐夫斯基说。“劳驾把您的鞋脱了，躺到手术台上去。”

加弗里洛夫瞥一眼女护士，像是害羞般拉拉衬衣。护士看了加弗里洛夫一眼，就像看一件物品，再报以一笑，就像对孩子微笑一般。加弗里洛夫坐到手术台上，脱下一只鞋，然后脱下另一只，整了整枕头，迅速卧倒，闭上眼睛。助理护士利索而习惯地把他的脚用皮带扣紧，把人拴在桌子上。麻醉师过来用毛巾遮住他的眼睛，在鼻子和嘴上涂了凡士林，套上面罩，再操起他的手听了听脉，在面罩上洒了些氯仿。手术室里立刻弥漫了一股甜丝丝、黏乎乎的氯仿气味。

麻醉师记录下手术开始的时间。两位教授暂时退到窗下静静等待。护士用夹钳把解剖刀、纱布、镊子、针线等一一放在

消毒布上。麻醉师又在面罩上洒了些氯仿。手术间里悄无声息。忽然间患者摇头呻吟起来：

“憋得慌。把面罩取下来！”加弗里洛夫说时牙齿咬得格格响。

“请忍耐一下，”麻醉师回答。

几分钟后患者唱开了：

“伏尔加河上冰消雪融。亲爱的人啊，亲爱的人，我还是个小姑娘就堕入了情网。”司令员唱过又悄声说：“快快睡觉，睡觉，睡觉。”歇了片刻，像在严厉吩咐：“别再给我莓果羹，够了，这不合乎礼貌。”沉默了会儿，他威严地、像在战斗时那么大声嚷嚷：“不准后退一步！谁退枪毙谁！……阿廖什卡，老弟，全起动啦，连地面也看不清了。我都记得。那时我明白什么叫革命，明白它的力量。我不怕死。”随后又唱起了“乌拉尔有个木匠，我亲爱的，亲爱的……”

“您自我感觉好吗？想不想睡觉？”麻醉师轻声问加弗里洛夫。

加弗里洛夫以平常的声音轻轻地、诡谲地回答：

“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憋得慌。”

“请再忍耐一下，”麻醉师说，又给加了些氯仿。

科科索夫忧心忡忡地瞅了瞅表，俯身又把患者的病历读了一遍。

有的机体对某种麻醉品会产生特异反应。加弗里洛夫经过二十七分钟的催眠仍未能入睡。

科科索夫叫过来一个年轻助手，把脸凑近他，请他扶正鼻梁上的眼镜。麻醉师低声问洛佐夫斯基：

“是否放弃氯仿，改用醚？”

“再试试氯仿吧。否则手术就得下次再做。这不大好。”

科科索夫严峻地朝四下扫了一眼，接着慢慢地垂下眼睛。麻醉师给患者又加了氯仿。医生们都不作声。

到四十八分钟时加弗里洛夫终于睡着了。两位教授用酒精最后擦了遍手。助理护士掀开盖在加弗里洛夫腹部的布单，光线照亮了他那瘦削的两肋和凹陷的腹区。

科科索夫用酒精、汽油和碘酒迅速擦洗了手术区——整个上腹部。护士将被单盖住加弗里洛夫的双脚和头部。护士给洛佐夫斯基手上倒了半瓶碘酒。

洛佐夫斯基拿起解剖刀，在患者的皮肤上划了一条口子。鲜血立即溅满了破口四周，皮肤向两边裂开，皮下露出了夹杂着血管的、有如羊肉表层那样的黄色油脂。洛佐夫斯基又在人肉上切了一刀，切开了一层层紫糖色肌肉和亮闪闪的、白颜色的筋膜。此时科科索夫一反平时笨手笨脚的习惯，灵巧地用夹钳钳住了出血的血管。

又一刀，洛佐夫斯基切开腹膜囊。洛佐夫斯基放下刀，用消毒布擦去溢血。切口内露出肠子和黄里带青的胃。他将胃反转过来，在手里攥了攥。

在光亮的胃壁上，在该是溃疡的地方，有一块形似蜣螂幼虫的、蜡塑一般白色的瘢痕，这就是说溃疡已经愈合，手术是多余的。

但是，这时候，就是这时候，在加弗里洛夫的胃攥在洛佐夫斯基手掌里的时候……

“脉搏没有了！脉搏没有了！”麻醉师嚷出了声。

“呼吸停止了！”科科索夫机械地应和。

这时候可以看到，科科索夫毛发丛生的脸盘上，眼珠从镜片后面狠狠地瞪着，瞪得极其可怕，仿佛瞪到了眼角外，而洛佐夫斯基眼窝里的两只眼珠更深地陷入了眼底，向鼻梁处集中，

并成了一个，目光尖锐得十分可怖。

患者没有了脉搏，心脏不再跳动，呼吸已经停止，脚也在逐渐变凉。

这便是心脏休克，机体因不适应氯仿而引起的中毒。这百分之百地说明，人不可能复苏，他注定得死，人工呼吸、输氧、使用樟脑或注生理盐水也只能将死亡推迟一小时，十小时，最多三十小时，但他再也不能恢复知觉。实际上，他已经死了。

已十分明显，加弗里洛夫注定死在刀下，死在手术台上。

科科索夫转脸让助理护士扶正眼镜，高声命令：

“打开窗户！快拿樟脑！准备好生理盐水！”

沉默地站在一旁的助手们更加沉默了。科科索夫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俯身瞧着小桌上的手术器械不作一声。洛佐夫斯基也俯下身去，凑近他，悄悄地、恶狠狠地开口道：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嗯？”科科索夫响亮地答应。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这一次洛佐夫斯基的声音更轻了，狠劲儿也没有了。

“嗯？”科科索夫响亮地答应，继而说：“继续您的手术！”

两位教授同时直起身子，同时瞥了对方一眼。一个人的两颗眸子溜到了一块儿，另一个人的眼珠几乎钻出了丛林般的毛发。洛佐夫斯基有那么一会儿工夫闪开科科索夫，仿佛挨了一拳想找地方退避。他的斗眼儿忽地分开，露出迷惘的神色，忽地又聚在一起，更加锐利了。他低声说：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他把手伸向刀口。他不是缝，而是把内脏粗粗缭在一起，然后把刀口边的表皮用线联上。接着吩咐：

“松开他的双手，进行人工呼吸！”

手术室的大窗统统被打开，初雪的寒气沁入了手术室。樟脑已注入患者身体。科科索夫与麻醉师一起把加弗里洛夫的胳膊后弯、上举，再后弯、上举，进行人工呼吸。洛佐夫斯基正忙于补缀切口。洛佐夫斯基忽地叫喊：

“生理盐水！”

女助手将两枚卷烟粗的药针的针头扎进患者的胸膛，准备输液一千西西，以保持患者的血压。这时病人的脸已失去人色，嘴唇变成为青紫色的了。

加弗里洛夫被解下手术台，搬上四轮推车送回病房，他的心还在跳，肺还能呼吸，但没有了知觉。他大概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注入樟脑和生理盐水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的那最后一刻，那时——三十七个小时以后——停止注射樟脑，医生离开了，他死了。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术后直到临终，除了这两位教授和一位护士小姐，谁也没有被允许靠近他。然而，在正式宣布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逝世前一小时，邻室的一个病号偶然听到从他房里传来奇怪的声音，这声音像是谁在撞击墙壁，或像牢里的囚犯敲墙通风报信。病房里躺着一个活着的死人，那是给他使用了樟脑，因为医学界有一个道德传统——不允许人死在手术刀下。

八点三十九分开始手术，十一点十一分将加弗里洛夫推离手术间。其间按走廊里侍者的说法，一号宅院曾两次打电话召见洛佐夫斯基大夫。大夫走近放电话的办公桌，走近大窗子，先是倚窗眺望窗外的初雪，然后咬咬他自己的指头，才转回头拿起话筒，专心倾听那拥有三四十条专线的电话网中的声音，他俯身对着话筒说，手术很顺利，但患者的身体十分衰弱，他们两位医生认为情况严重，他请求对方原谅，现时抽不开身，无法亲自去向领导汇报。

加弗里洛夫死了，也就是说，洛佐夫斯基教授手里拿着张白纸从病房走了出来，他垂头沉痛宣告，患病的红军统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加弗里洛夫公民不幸于子夜一时十七分逝世。

过了三刻钟，也就是二时左右，一队红军战士开进了医院的院子，立即在各通道和楼道口设置了岗哨。夜空飘着浮云，倦于奔忙的圆月依旧急匆匆地追赶飞云。这时洛佐夫斯基大夫坐进洛伊斯牌轿车向一号宅院急驰而去。车子悄然开进带有狮身鹰首徽的院门，通过岗哨，停到正门的台阶下。哨兵打开车门；洛佐夫斯基跨进办公室——书桌红呢毯上放着三架电话机，墙上安着一排电铃按钮的那个房间。

洛佐夫斯基在办公室里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一共只有三分钟。洛佐夫斯基走出办公室，走出大门，走出院子，匆匆地，手里拿着礼帽，臂上搭着大衣，像霍夫曼[①] 笔下的人物那样。轿车早不见了。洛佐夫斯基如酒醉了似的一摇一晃向前走去。月光下，旷夜凝寂的街道也随着洛佐夫斯基的身子在摇晃。

洛佐夫斯基像霍夫曼笔下的人物似的离开了一号宅院的办公室，一号宅院的办公室里只剩下腰背不弯的人了。他用两只拳头支着桌面，站在桌前垂着头，有好大一会儿工夫凝滞不动。他暂时离开了他的文件和公式。随后他又开始在室内踱步，他踱步的路线是严格的矩形，就像他让女速记员记录的公式似的规范。他步子迈得很快。他按一按身后的电钮。他取下电话筒。他对值班员说：“我要轻快车，敞篷的！”他与最高三领导之一通电话，那时对方大概正在睡觉。他的声音低沉无力：“安德烈，

① 这里指德国小说家恩斯特·台奥多拉·阿马德马斯·霍夫曼（1776—1822）。

亲爱的！又一个人去世了，尼古拉·加弗里洛夫死了，一位战友不再在这世上了。亲爱的，请你打电话通知波塔普。”

腰背不弯的人命令司机：“去医院！”

黑魆魆的过道里站着哨兵。整幢房子无声无息，哪里有死亡，哪里就应当这样悄无声息。

腰背不弯的人穿过黑魆魆的过道，走进加弗里洛夫司令员的病房。他走进病房——那里躺着司令员的尸体，那里充满憋闷的樟脑气味。

所有的人都退了出去，只留下腰背不弯的人和一个人的尸体，加弗里洛夫的遗体。他在遗体的脚旁坐下。加弗里洛夫的双手放在被盖上，直僵僵地垂在身子两侧。他在尸体旁低头默坐了好久。病房里没有声音。最后他拿起加弗里洛夫的手，握了握说：“别了，同志！别了，老弟！”说罢垂头走出病房，对谁也不瞧一眼，只吩咐：

“最好把那里的气窗打开，太闷气了！”他疾步走出了黑魆魆的过道。

最后一章

晚上，加弗里洛夫司令员的葬礼结束后，当军乐队的铜管乐沉默下来，丧葬队的低垂的旗帜一一收起，成千上万的送葬人各自走散，地下的尸体与土地一齐凝冻了的时候，波波夫在他的旅馆里睡着了。他醒来时不知道是几点钟，只发现自己伏在桌上。房间里很暗，娜塔什卡在轻声哭泣。波波夫俯身抱起

女儿，在房间里一来一回走动。

倦于奔忙的圆月的皎洁光亮射进窗子。波波夫走近窗前，瞧了瞧外面的白雪和静寂的夜。娜塔什卡挣开波波夫的手，站在窗台上。

波波夫的衣袋里装着加弗里洛夫给他的信，即入院前夜写的那张信笺。上面写道："阿廖什卡，老弟！我知道这次非死不可。请原谅，因为你也不年轻了。在我摇着你女儿哄她睡觉的那会儿就在思考这事。我的妻子也已衰老。你认识她有二十年之久。我已经给她去信，请你也写封信去。你就和她一起生活吧，怎么说呢，就娶她吧。由你们把孩子抚养大。原谅我，阿廖什卡！"

娜塔什卡站在窗台上。波波夫看见她鼓起小腮帮，嘴儿像喇叭似的正对着月亮吹气。

"你在干什么，娜塔什卡？"父亲问。

"我想把月亮吹灭，"娜塔什卡回答。

如同商妇一样圆圆胖胖的月亮还在追逐浮云，但它累了。

这是城市这台大机器醒来的时刻，工厂的汽笛鸣了。汽笛响了很久，慢声慢气地，一个接一个——无数的汽笛声在城市上空汇成一片阴沉的嚎叫。不难明白，那是被今夜的月光冻僵了的城市的灵魂在号啕。

小　　城

一

有这么一个俄罗斯的小城。是的，一个小城，俄罗斯的小城。伊凡雷帝称沙皇以后这儿原是边塞，彼得大帝升位后改设为县邑，但快到1917年的时候又撤消了它的县级建制。后来，革命降临小城，苏维埃政权不顾小城的偏远，设置了区执委会。本世纪初曾有过一番兴旺景象：一些退休的将军在城里买下带樱桃园的房子并住下来安度晚年。但它随着革命的到来而衰落了。小城离车站有七十一公里。市场和教堂都在山上，不过，教堂的门窗都是钉死了的。簇拥着市场的，是原属高贵门第的带石门和花园的两层砖楼。越过这些深宅大院，无论往东往南，往西往北，便是些小木屋小平房了。小木屋后面是谷仓，谷仓后面是果园子、路口的井、牧场、田野、天空。

区执委会设在原来的管理局里，而茶馆的雅座改成了负责干部的宿舍。原来市场上的客店、马厩和二层楼砖房都成了兽

医站的诊疗所。楼上住着主任医生伊凡·阿夫杰耶维奇·格罗扎，药房也设在二楼。主治医生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雷奇科夫则住院子里的侧厢。对街二层楼上，窗对窗，住着检疫医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尔斯基。他占了整个二层楼的楼面，还摆了一套将军用的红木家具。在小城，给人看病的医生有五人，给牲口看病的医生有两人，教师共有三十来人。当然，在各个村苏维埃，另有他们自己的医疗站、兽医站和教师队伍。

兽医格罗扎和检疫医生涅韦尔斯基都是革命后出现在小城的。他俩见面时既没握手，也没鞠躬，他们根本不愿互相介绍。这有原因。还在1905年前，有过一个时期格罗扎和涅韦尔斯基在卡里亚津地方自治局共过事。自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名医皮罗戈夫召开防疫医生会议以来，在地方自治局防疫咨询委员会内形成了一个传统：凡加入地方自治局的新来医生，得经防疫咨询委员会推荐，并作为临时医生试用一年，以便医学界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这不属地方自治局的明文规定，而是自治局历来的传统。当时任卡里亚津地方自治局主席的首席贵族是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公爵，当地的地方，女皇陛下的枪骑兵。拉斯托罗夫公爵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未经防疫咨询委员会推荐，径自聘请了两名医生不经试用长期任职。防疫咨询委员会的理事们对此感到气忿，他们聚集到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尔斯基家，为维护皮罗戈夫原则如何作出反应进行磋商。天才演说家、善于引证县邑名人名言的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作了即席发言。这些民主派人士提出了种种民主措施：决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未经防疫咨询委员会而径由公爵雇用的两名医生到会，和这两名医生作一番友好的谈话，劝导他俩主动拒绝公爵的盛情而服从医界传统。与会者还决定，若新来

医生不听善意劝告，就不与他俩握手，孤立他俩。到了规定时间，防疫咨询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在涅韦尔斯基家中，新来的医生也到会了。涅韦尔斯基发表了精彩演说，他劝导年轻医生不要破坏美好的皮罗戈夫原则，并提醒他俩，防疫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将以不与之握手的方式来捍卫这一原则。新来的年轻医生仔细地聆听了涅韦尔斯基的讲话，会后把讲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拉斯托罗夫公爵。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公爵认为涅韦尔斯基的讲话无疑是谋反，立即召来防疫咨询委员会理事开会，并告诉他们，会上他要把年轻同事介绍给他们，若有人不与新来者握手，将被地方自治局解职。于是，医生们都和新来同事握了手……除开两人——伊凡·阿夫杰耶维奇·格罗扎和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尔斯基。涅韦尔斯基事先便获悉公爵的行动方案，因此在防疫咨询委员会开会前一天便提出离职申请，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卡里亚津，到另县工作，从而避开了这次握手。而格罗扎将手藏在背后，按旧时礼节向公爵一鞠躬，然后庄严地说："请原谅，公爵，敝人不愿和这两位先生认识。"没过二十四小时他当真被卡里亚津地方自治局解除了职务。涅韦尔斯基的行径较之那些苟安之辈被迫握手是更为糟糕的背叛。大约两星期后，他回卡里亚津搬家，向同事们作了半合法的告别，同仁为他举行了半合法的饯别宴会，席间发表了半合法的讲话和预言。但没有人为格罗扎饯行，送格罗扎上路的只有一个医士和一个诊疗所的看门人。格罗扎从一个县邑到另一个县邑，踏遍了俄罗斯的乡间小道，风尘仆仆，为牲口治疗口蹄疫、炭疽病、马鼻疽和马腺疫。到了俄罗斯帝国临近末日的世界大战开战那年，在反动的封建统治的淫威之下，在弗托罗夫[1] 资

[1] 弗托罗夫（1866～1918），俄国金融寡头。

本主义和冯·梅克[1] 工业兴盛之时，俄罗斯的乡间小路把格罗扎领到了莫扎伊县城。莫扎伊县城里的医界人士分片聚居，过着果戈理时代的生活。格罗扎来县城不久，便在防疫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作了有关该县兽疫防治现状和今后防治措施的报告。

“诸位同仁，”格罗扎庄重地说，“我的一生及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告诉我，必须把社会公益工作当作神圣的事业看待。如有人不吝指出我工作中的缺点，敝人将为此而感谢，因为改正缺点有利于社会事业。我的报告首先想指出莫扎伊县医务工作中的缺憾，乃至可耻现象。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位区段医生竟用地方自治局经费为自己订阅《俄国言论报》，他欺瞒地方自治局说，这笔钱是买包药纸的。这位医生，还有几位医生也是如此，出诊并没花销一个戈比，但呈报说他花了每俄里十二戈比的雇车费……”

格罗扎的报告极其冗长。医界人士互相串门喝酒，跟彼此的妻子和小姨子调笑时，对他的报告只字不提，只是暗暗记在心里。可是到了 1917 年夏天，社会革命党人得势，防疫咨询委员会的那些医生一夜之间成了临时政府的委员，这时候，火山终于爆发了，格罗扎因他那篇报告被撵出了莫扎伊县城。从而他流落到了上面描述过的小城，身无长物，独个儿光棍一条，而且是个模样恶狠狠的老家伙。在小城，他八时开始门诊，到下午一时结束，然后亲自做饭，用量杯给自己稀释五十克的纯酒精，吃过，喝过，便躺下睡觉，直睡到三点钟。三点钟出发作巡回医疗，日落归来，查房，再给自己稀释五十克。这一回他就在药房里把酒灌下肚，因为没有下酒菜，呛得他咳嗽反胃。晚十时给自己做一个煎蛋，尔后躺到软榻上，盖上罗曼诺夫王朝

① 冯·梅克（1821～1876）俄国大资本家，拥有多条铁路线。

时期的羊皮被卧，读已读过成百遍的麦因·里德[1]的小说，直至入梦。秋天的时候，常常刮风下雨。风吹过破旧的铁皮屋顶，那声音犹如魔鬼肆虐，下起雨来，又仿佛马迈将军[2]的鞑靼步兵从屋顶走过。在小城成为边塞之前，马迈的鞑靼军的确到过这里。黑夜的小城伸手不见五指，这样的时候最好点起灯，生起炉子，把屋子照得亮亮的，烤得暖暖的，哪儿也不去，只和朋友们呆在一起。对窗二楼上的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尔斯基便是如此。他来小城比格罗扎晚。自从与格罗扎在卡里亚津不告而别，迄今已有多年。1917 年时他是省里的检疫医生，从三月到十月，先后在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下经管国家建设，并作为省委委员当过两个星期的市长，后来主管全省的防疫工作。十月革命之后，官运不再亨通，1918 年因地窖内贮了二十七普特上等面粉被粮食收购队两次抄家，出了丑，丢了职，来到小城。从火车站运来七车家什，占了最好的、曾是旧俄将军住的二层楼面，压价买下了将军的红木家具。随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按职业她是个医助，身量宏伟，仪态庄严，总戴一副夹鼻眼镜。她是遍览世界名著而不求甚解的文学爱好者，她说话引经据典比不引经据典顺当得多。涅韦尔斯基在区执委会遇到伊凡·阿夫杰耶维奇·格罗扎并认出了是他过去的同事，不由眼睛一亮，似乎非常欣慰。区执委会主席特鲁巴切夫同志介绍道：

“伊凡·阿夫杰耶维奇，这是新来的检疫医生涅韦尔斯基同志，请认识一下。”

但格罗扎像以前在拉斯托罗夫公爵面前一样，把手藏到背

---

① 麦因·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长于冒险小说。

② 马迈（？～1380），鞑靼军队统帅，金帐汗国的实际统治者，曾率大军侵占大片俄罗斯土地。

后，一鞠躬，摇头答道：

“请原谅，帕维尔·叶戈洛维奇，敝人不愿与这位先生认识。”

特鲁巴切夫很尴尬。涅韦尔斯基两眼眯缝起来，立刻变得冷若冰霜。总的说来，涅韦尔斯基的外形、气派像旧俄大学生或民意党人：披风，礼帽，长发；并如同他的妻子那样戴夹鼻眼镜，身材瘦削，活泼好动。

特鲁巴切夫同志当没外人在场时跟涅韦尔斯基打招呼：

“涅韦尔斯基同志，请别生他的气……他是个很好的兽医，但脾气古怪。听说他常自个儿喝闷酒，整夜整夜地看小说……”

特鲁巴切夫同志当没外人在场时问格罗扎：

“格罗扎同志，好好的无故发火，这是怎么回事？没准你知道他的内情？如果知道，不妨跟我说说。”

格罗扎涨红了脸忿忿回答：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想提起涅韦尔斯基！”

夜晚，当连绵几星期不停的秋雨像鞑靼军队走在小城的屋顶上一般疯狂肆虐的时候，涅韦尔斯基家里又明亮，又暖和。医生和教师们都上他和他妻子那儿做客，他们散坐在圈椅里、沙发上，纵论当今形势，偶尔甚至争论一番。涅韦尔斯基订有《红色处女地》和《新世界》杂志和各种报纸。这些报章杂志放在一张单独的小桌上。新到报章杂志一般当众诵读。诵读者是女主人，对当代作家报以讥讽的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房顶上，街道上，鞑靼夜行军的铁蹄响个不停。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热心公益，亲手创建了方志博物馆，把收集到的将军的破烂——狼、熊、狐、黄鼠狼、鹰和黑琴鸟的标本一一陈列出来，又按她的意思，经孩子们的手拾来了乌鸦、麻雀、黄雀、山雀

和杜鹃鸟蛋。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还在博物馆里挂上各类禾谷。第一个春天她率先把排球引进小城，兴致勃勃地和教师们一块儿打球。到了夏天，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组织知识分子乘船集体郊游、野餐，在大自然美景中钓鱼，煮鱼汤。而小城按照大自然的节奏春去夏来，夏去秋来，寒暑不断更易。涅韦尔斯基白天忙于会议，但每晚六时必在家中用餐。他严格按照皮罗戈夫的箴言：神圣的黄昏不可侵犯，必须好好休息。若有例外，也只是天黑后到城外散会儿步。若逢夏日，他遨游于小山浅壑之间，春秋季节，则造访荒芜的磨坊。他虽年近老境，但在那里却是等候这位或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向她阐述永恒问题。他的妻子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对此不过嗤之以鼻。涅韦尔斯基在小城人缘很好，受人尊敬，他作报告，他主持会议。按皮罗戈夫传统，私人行医属禁止之列，且非他检疫医生的专业。尽管如此，涅韦尔斯基被认为医术高明之士。他绝不私人行医，仅仅参与咨询，只收些鸡鸭之类的谢礼。关于自己，涅韦尔斯基常常谈起从卡里亚津他年轻时期直到来小城进入不惑之年常说的仿若新闻的笑话。那是在某个星期日，他在家门口窗下听到的。有个人问另一个人："大夫是住这里的吗？""是的！""这大夫的医术不赖吧？""医术倒很高明，不过，他是专科大夫，不治活人专治死人，治死不治活！……"而格罗扎独个儿生活，冷冷清清，老是没好气。他从不外出做客，上他那儿做客的也只有他的助手——年轻的兽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里姆科夫，去他那也只是喝点儿对水的纯酒精。这时格罗扎把定量由五十克增加到一百克，用八个鸡蛋做煎蛋。格罗扎无论如何不属于能说会道者之类。小城的夏夜是十分短暂的。小城里牛羊马群的健康保险概由小城的兽医担当。格罗扎两点半就起床外出巡视受保畜群。他身穿帆布风衣，头戴草帽，把鼓鼓囊囊的

大皮包捆在装燕麦的喂料袋上，套上轻便马车，从原先客店的院子里辚辚地迎着曙光出发了。半纯种牡马体壮蹄疾，老头威风凛凛。这一去，要到上午八时开诊时间才回来。夏天常下瓢泼大雨。至于特鲁巴切夫同志，他是个中不溜儿的党员。他的一些战友早调到边区县或莫斯科工作去了。他是山脚边土生土长的渔民的儿子，封建时代小市民和穷哥儿的后嗣。他那渔民子弟的童年是在当地一所自1877年改制的小学里度过的。十六岁那年红军的革命浪潮把他带到南方。他打起仗来出色、骁勇，心眼里只有革命事业。但到1921年，退伍后既未能上学深造，也没被任命新职，而是回到他的小城，跟一个助祭的女儿——女教师结了婚，在山脚下的菜园子里住了下来，并生了一群娃娃，当了永不换任的区执委主席。一个好人，好同志。大门外的事和大小新闻只在党的会议上他方知道。涅韦尔斯基理所当然邀他夫妻俩到家做客。特鲁巴切夫和妻子只去了一次。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对他们谈论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谈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的儿童教育法，背诵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俄罗斯讽刺大师谢德林书中的名句，还暗示她娘家原属名门，出过曾作环球航行的航海家，十二月党人扎瓦利申。特鲁巴切夫的妻子对涅韦尔斯基家产生了好感。特鲁巴切夫当时不动声色，待第二次接到邀请时，虎起脸儿对妻子说："我不去。那些知识分子，去他妈的！……我劝你……也别去……嘿，扎瓦利申，她那些胡言乱语都把你扎胡涂了！……还系领带！……"可是格罗扎从没有邀请过特鲁巴切夫，仅有两次要求他上门诊棚瞧瞧顶棚漏雨的现场，孝敬他几句不中听的话儿。

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了。从边区派出的一个委员会乘汽车来到了小城。委员会包括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边区经济统计学家，女秘书兼速记员。局长是刚从莫斯科调来不

久的一个稍见衰老的人。他和司机留在区委负责干部的宿舍，也就是帕维尔·秋林茶馆雅座间里歇宿。经济统计学家原来和涅韦尔斯基是老相识，因此他和女秘书兼速记员被接了过去。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无数附属委员会的会议就在摆满禽兽标本、挂满当地植物标本的方志博物馆召开。小城顿时热闹起来，而涅韦尔斯基无处不在。他查阅并摘录了不少有关当地土壤的资料，提出了能否在此建立工厂的问题：如果建不成冶金厂，至少可以建个水泥厂或者化肥厂。他计算了风速，因为会上提出了风力电气化的问题。会上提出了一项临时动议：用围堵壑谷的办法引水灌地，建立饮用水库。而这一方案是经过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构思，由她坚决要求纳入五年计划的。为此人们将一切土地，包括山岭、沼泽、墓地、荒地、熟地、壑谷进行了一次次丈量和统计。委员会还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小城保健和畜牧事业的会议，让区里所有的医生都来参加。主要报告人又是他，涅韦尔斯基。他以种种数据及他演说家的天才作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报告。他对小城保健事业的美好未来寄予美好希望。当涉及兽疫防治时，他侃侃而谈口蹄疫、马鼻疽、炭疽病、马腺疫引起的危害及除害灭病之道。他以数据和演说家的精湛艺术指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日，也就是兽疫消灭之时，到那时不但没有鼻疽病、炭疽病、狂犬病、口蹄疫，甚至牛的阴道炎和肺结核病也都在本区内的大小畜群中绝迹。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坐在特鲁巴切夫身旁注意地、但不无倦意地静听。报名参加讨论的人开始发言。说实在的，发言内容模棱两可。这也许是的确无人反对，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讨论，也许是大家都钦佩报告人的口才，同意他的意见。大家的发言大致如此。至于兽医事业，听发言人的意思，似乎五年计划完成时小城的各种畜疫真的会排除净尽。贴墙站着兔子、狐狸、狼和熊的标

本，墙上挂着杜鹃、黑琴鸟、鹏鹗的标本。接着涅韦尔斯基向主席团递交了决议草案。但，就是在这当儿。格罗扎突然要求发言。他样子很凶，脸上的须毛像茂密的丛林。

“先生们，”他庄重地说。忽而感到不好意思，恼恨自己说漏了嘴，忙改口道：“也就是说，同志们！关于涅韦尔斯基公民提出的医学方面的种种方案我不愿多加评论。至于谈到兽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完全不能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我在地方自治局工作……”他又一次感到不好意思，更加恼恨自己说漏了嘴，忙改口道：“就是说以前在地方自治局，而如今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作，前后总共二十七年……”他再次感到不好意思，恼自己恼极了。“同志们，现在说我的由衷之言。我不知道我们打算诳谁。我举个例子。德国对家畜疾病的防治工作比我们先进得多，德国人比我们有知识，德意志的邻国是波兰、瑞士、奥地利，最落后的算波兰，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在德国仍存在兽疫，而我们的草原与伏尔加河贴近，再过去便是哈萨克斯坦，中亚，与兽疫发源地蒙古毗邻。因此我必须坦诚相告，我深信不疑，消灭畜病不可能用短短的五年，而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方能办到。”

随同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来的经济统计学家马上发言。他以彬彬有礼的、科学院院士式的风度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因为格罗扎居然怀疑发言人用意不纯。彬彬有礼的经济统计学家撇开防治家畜疾病的特殊性不谈，着重揭露格罗扎本人，说他崇拜德国，不相信革命的力量，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破坏五年计划。他以彬然有礼的、院士式的蔑视来回敬格罗扎方才的失言：“先生们”，“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的发言无疑像烧红了的烙铁。

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水兵——想为格罗扎辩解：

“同志，他说的我国的和德国的地理形势和家畜病疫防治情况确是事实。他发言的政治意义由我来评价好了……我们是不是重新研究一下主席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经济统计学家再次发言，坚决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涅韦尔斯基发言了，语调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他首先声明，决议是他草拟的，他不准备收回这项决议草案。他是会上唯一直呼主席其名的人，他以略带嘲讽却又友好的口吻说道：

“伊凡·涅菲多维奇，请您原谅我们，虽然我们被怀疑为不诚实的人，但请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好吗？”

格罗扎从座位上跳将起来，脸色铁青，眼睛里一团怒火，未经会议主席允许便擅自发言。他语不连贯地大喊大叫：

“请允许我申明！……我要求进行讨论！我虽然不愿意跟涅韦尔斯基公民打交道，但我必须声明，我作为地方自治局工作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兽医，二十七年来从未干过一件不诚实的事。我所说的有关兽疫的话是正确的，但我绝不参加表决。允许我声明：我这就离开会场，我不打算向任何人道歉，因为有人明显地歪曲了事实……”

格罗扎砰的一摔门走了。展览厅里掀起了小城夏天的响亮声浪。在人们愠怒和激烈的话音造成的暑气当中，老狼、兔子、狐狸、喜鹊标本也都复苏了，连一束束的麦禾标本也都摇晃起麦穗来。在一片混乱中，涅韦尔斯基建议就他提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他得胜了，消灭畜病的决议通过了，其中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病疫将在小城绝迹。

最后，在负责干部的宿舍里，亦即秋林的茶馆雅座间里以一顿同志式的晚餐结束了会议。医生和兽医中居然不乏歌手，他们唱了《纤夫曲》，《布琼尼骑兵进行曲》，《积木歌》，甚至唱了

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大学生歌曲《我们要欢乐》。大会主席，亦即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不料是个爱热闹的同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钢琴伴奏下表演了俄罗斯舞，一如他曾几何时在“无畏”号战舰上表演过的那样，而这次却是在舞会组织者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伴奏之下，与会者直到黎明方散。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从前的水兵——已经接连几夜没认真睡觉了，但还是和特鲁巴切夫一起去晨雾遮蔽下的小河洗澡，他问特鲁巴切夫：

“你那个格罗扎是个什么样的人？”接着，他若有所思般补充道：“鬼才知道知识分子安的什么心眼儿！……说也是，小城这么偏僻，草原这么大，即使有条疯狗，跑上几千里路都碰不上一个人，更甭说带疫耗子和黄鼠狼了……再从另方面说，大多数都赞成，他们不是孩子，不是闹着玩，全都明白他们商讨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开不得玩笑，大多数人的学问不比这犟老头差！……他姓什么来着？格罗扎[1]？姓这么个姓？”

“是呀，是姓格罗扎，”特鲁巴切夫答道。“论工作，是个拔尖儿的，人嘛……疯疯癫癫的，常独个儿喝闷酒，整夜读外国小说，爱吵架。乍看没啥，但该防着点儿，没准是个异己分子，要知道他是从莫扎伊地方自治局逃出来才上这儿的！……”

“那么，涅韦尔斯基呢？”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问。“这家伙能说会道，妈的，像社会革命党人……他在这里的表现怎样？”

“干事挺勤恳，”特鲁巴切夫回答。接着，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道呢？正如你说的——知识分子嘛！……的确都一样系领带，你能分得清谁怎么样吗？……跟他谈话，他不理解你，你不理解他，压根儿谈不上什么阶级联系、共同兴趣。有一回涅

① 格罗扎在俄语中系大雷雨之意。

韦尔斯基邀我们夫妻到他家做客，他老婆倒出一肚子学问，把我虎得够呛！不错，干事挺勤恳。说实话，我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给他们下命令，叫他们办事，都得绕着弯儿说话，非这么办不可……我想，大多数人的意见错不了。你说得对，他们不是孩子，你直截了当对他们说了，不是闹着玩儿，是干一件伟大的事业。你一开始就说了：想听听他们这些专家们的意见。我也是这么强调的。只好信任他们……他妈的，全都系领带，都一样！……”

“信任……问题就在这里！”局长若有所思地接口道。“我一回到边区，边区就要往莫斯科发电报。你明白吗？莫斯科便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各边区、各州汇报的材料基础上制订伟大的五年计划的。计划中在‘畜牧业’这一部分里，在‘家畜疾病的防治’这一章里，在‘与兽疫作斗争’这一节里就将写上：苏维埃政权将采取各种措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消灭兽疫！……这可写的是你，简明扼要，毫不含糊。你该掂掂这分量！”

“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特鲁巴切夫悒悒地说，“培养党员专家……我给他们下命令，他们就努力干……可是，我说不好，我怎么也不愿意信任他们。可又不得不信任他们。我又不是医生！……可下命令，我说不好，也不大愿意。知识分子一听说是命令就一蹦三丈高……只好信任他们，不然就只能跟格罗扎这老疯子一个人商量了……”

两个党员在磨坊附近的河里洗完澡，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水兵，坐上司机戏称为“中国梅塞德斯”的破旧汽车，回他的边区去了。草原仍如垦殖前那么辽阔。

格罗扎没有出席负责干部家里的舞会。他睁着眼睛躺在他二楼的住所里，盖一条老羊皮被卧，倾听那黑夜。他没有到药

房去喝稀释酒精。他的双手像死尸那样平展展地伸在身体两侧，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的助手，他唯一的客人克里姆科夫参加同志式的聚餐后回他院子里的厢房时天已微明。格罗扎正等着他的脚步声，此时冲着窗口叫道："请上我这儿来一趟！"说罢打开房门，重又躺回老羊皮被卧里，将双手平展展地伸在身体两侧，眼瞧天花板。克里姆科夫走进了暗沉沉的、墙角里闪动着黎明的肮脏黑影、发散着未经透风的夜间闷味儿的房间。他心里不是个滋味。格罗扎递过一支烟。克里姆科夫赶忙接了，却又不忙着吸。格罗扎不作声。克里姆科夫吸了口烟，迟疑了会儿，这才开口：

"您今儿又何必呢，伊凡·阿夫杰耶维奇？……"

"什么叫'何必'？……"格罗扎大声问。

"何必在会上发表意见呢？……既然发表意见，又干吗不捍卫自己的立场，不作斗争，嚷一阵子就走了？您是受人尊敬的医生，有丰富的经验，可……"

格罗扎打断他的话，问：

"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

"就是由涅韦尔斯基提交的那份。几乎一致赞成。"

"您也参加表决了？"

克里姆科夫瞅了瞅窗外，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眼盯着烟卷头上的火星说：

"您不早就了解涅韦尔斯基的吗？应该从这开刀，应该揭露敌人。既然公开站出来反对，就该以一切方式作斗争，一斗倒底，而不应该大吵大闹一番走掉……不过，这不是主要的……"

"什么才是主要的？"格罗扎厉声问。他一下子坐起身，哼哼说："涅韦尔斯基这人我认识了四分之一世纪，是个彻头彻尾

的叛徒，我从不跟他握手，不跟他说话，更不要说跟他辩论。但我不愿当奸细，打小报告，告密，我不打算揭他的老底。”老头儿的眼睛变成悒悒的了。“您投赞成票了？但请您现在，在这儿，只有我俩的时候，坦率地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难道我们能在五年内消灭兽疫？！”

“当然对！……倘不是全体，那也是绝大多数都明白……”

“那么，主要点是什么呢？！主要点是什么？”格罗扎高兴地说：“我是为了我们的事业站出来发言的！为了有助于兽医事业，有助于我们的国家！……但你们投他的票！……”

克里姆科夫将目光从烟卷移到了郁悒同时又高兴的老头儿脸上，心里好不是滋味，他说：

“伊凡·阿夫杰耶维奇，按理不应由我来开导您，既然那些人是故意地说违心的话，那能怎么办？难道能让那些人支持您的真诚吗？请您想一想，难道可以像您那样直言不讳吗？……但这不是主要点。关于涅韦尔斯基，我不愿加以评说，他唱得像夜莺那么美，说得像蜜糖那么甜，是为了曲意奉迎，为要当第一提琴手，唱主角。我想跟您说的是像我这号人……我们知之不多，我们不是党员，我们愿意国家兴旺，愿意相信革命的力量，从另一面说，谁也不知道五年后到底怎样。也许五年计划真能创造出奇迹，也许到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谁知道？相信奇迹，此其一，知之不多，此其二，说不定布尔什维克真下决心，在我们的边界上筑一道长城，把病马火化或放进水泥棺埋葬。到时谁对谁错？是您还是涅韦尔斯基？……再瞧瞧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吧，他们多么希望一切都好啊！且不提特鲁巴切夫——他虽不是直接说出口，也是绕弯儿下的命令：干吧，伙计们！您就瞧那会议主席：真了不起！老布尔什维克，当过水兵。您没注意他脸上的伤疤吗？他在晚餐桌上说，

是被哥萨克白匪砍的。他的政治信仰，他整个身心都显示着一种渴望，渴望一切都变得美好无缺，想必认为通过决议是桩大事，是了不起的胜利，想必他感到非常幸福，五年之后我们这儿真的不会再有兽疫了。他把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你怎好意思拂他的意呢?！不，我们不愿使他难受。使我们敬畏的还有——政权……政权希望兽疫绝迹。某些人害怕共产党人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敌对分子，故意或者由于害怕从不说真话，害怕心理起着作用！……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无所知，只懂得应该说讨好政权的话，不伤和气，并保住自己的皮囊……人的皮囊是个可怕的东西！”

克里姆科夫沉默了一会儿，局促不安地把没吸完便灭了的烟卷丢到一堆烟蒂里，心里又是一股苦涩味，说：

“您原不该在会上发言，伊凡·阿夫杰耶维奇！……人的皮囊是个可怕的东西！……请您告诉我：特鲁巴切夫同志跟您说过掏心话没有？可您工作不单为了保全皮囊，也为了良心，为了职责！……大概您也不会给特鲁巴切夫掏心里话的。没必要，没必要发言，那些在会上发言反对您的人，包括那些发言赞成决议的人，虽然角度不同，但或多或少知道他们是在说谎，在美化。可您把它公开说了出来，一语道破了。我们——这是指我而言——之所以站到涅韦尔斯基一边，正因为您说出了真话。同志们指您是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异己分子，可以说这都是对您的人身攻击。但问题就在于，一个人往另一个人身上泼脏水，初时觉得过意不去，但后来，甚至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打心眼里要为自己找借口，而且必定能为自己的肮脏勾当找到借口，必定说被他攻击的好人才动机不纯。您不该发言，伊凡·阿夫杰耶维奇！……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保不了您自己。说实话，若不是您冲着窗子叫我，若不是好意地请我抽烟，我会真

的把您当成敌人。您那发言只是给您自己招致了很多敌人……”

“请便!!我不央求，我不需要!”格罗扎不是嚷嚷，而是在大吼，声音震得窗玻璃格格响。“我不跟厚颜无耻的和出卖朋友的人打交道!我从未向任何人出卖过良心，也未曾当过叛徒!不，我不去乞求!”

街另一侧，窗对窗住着的涅韦尔斯基打开了一扇小窗。克里姆科夫求饶般合起双手，求饶般悄声说：

“伊凡·阿夫杰耶维奇，涅韦尔斯基在那里偷听呢!求您把声音放低点儿，别那么大嗓门。方才是我作为朋友说的知心话，我求您啦!别人在听着哩……”

老头儿重又躺下，盖上老羊皮被卧，双手平放在被盖两侧，眼瞧着天花板，专心致志，目光遥远。老头儿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后来老头儿说话了，轻轻地：

“我不明白，不明白……要知道，我发言是为了我们的兽医事业，我为兽医事业贡献了一生，困苦的一生!……谢谢您告诉了我真情，这样的事我从未听说过。别生我的气吧……我老了!我不明白!……”

克里姆科夫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说：

“唉，您哪，伊凡·阿夫杰耶维奇!……”

街那一边，窗对窗的二楼里，黎明时亮起了灯光。涅韦尔斯基和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准备铺床睡觉。街这一边，窗对窗的兽医站诊疗所里，天明时忽然响起格罗扎的喊叫。他俩——涅韦尔斯基和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赶忙打开窗，然而喊声静止了。

“格罗扎这白痴又发疯了!无怪乎他姓格罗扎，”涅韦尔斯基说。

“他当真公开说不信兽疫能消灭吗？当真声明不再跟你说话，然后离开会场的吗？真是个白痴！真这么说了吗？”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问这话已是第二十次了。接着她又悄声问：“不过，拉夫尔，你心里踏实吗？你不认为说话说过头了？边区会不会重新审查决议？”

拉夫尔扮起一付受难者的脸，像受难者那样说：

“当然不踏实，不过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他们！……”

“讨厌谁？格罗扎？”

“不，当然是指布尔什维克。全是瞎说，愚蠢透顶！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些东西，看见他们就恶心！……至于格罗扎，明天我通过工会系统提出书面抗议……”

“哦，那当然……”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说。

晨曦初上时，在负责干部宿舍门前响起了“中国梅塞德斯”汽车马达声，随后又响起格罗扎的轻便马车的辚辚声。那是格罗扎巡视他的受保单位——牛羊马群去了。他身穿帆布风衣，头戴草帽，踞坐在轻便马车上。身后装了燕麦的喂料袋上捆着他那鼓鼓囊囊的皮包。漂亮的半纯种牡马扬着欢快的蹄儿。特鲁巴切夫同志恰恰在旧教堂前的下坡路口遇上了他，招呼道：

“听我说，伊凡·阿夫杰耶维奇，你干吗捣乱？今儿你打开天窗跟我说亮话，说说那兽疫防治的事儿。你们，知识分子，都是些鬼灵精，系着领带！……今儿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涅韦尔斯基瞎说八道？……”

格罗扎平心静气地回答：

“好吧，你想想看，我们有百分之七十的牛患阴道炎。而在荷兰，以养牛著称的国家里牛的阴道炎也还存在，并且患肺结核的牛羊也占很大比例数。我们再来看看丹麦的统计，如果你不信德国的……”

“别忙掏你的学问，你先简单说说：兽疫能不能消灭？说说你对涅韦尔斯基的看法，”特鲁巴切夫道。“来，抽支烟伊凡·阿夫杰耶维奇！……”

“消灭不了，”格罗扎干脆利落地回答，又干脆利落地补充道：“而提涅韦尔斯基有损我的尊严。再见。”

格罗扎理一理手中的缰绳。

“等一等！你去哪？也许你了解涅韦尔斯基的底细？既然你肯定说兽疫消灭不了，没准儿是你故意不想消灭？我干吗应该信你的？……”

“再见，”格罗扎说，“别胡扯了，我这要去给牛马看病。”

草原上笼罩着迷离的雾霭。特鲁巴切夫的迷离的目光伴送着格罗扎打从山脚下逐渐远去。山上是俄罗斯的居民点，伊凡雷帝以前曾是边寨，后来发展成了小城。古代木造要塞旧址上是市场和闭锁的教堂，东西南北都是小城居民的住家和旷野。每逢秋夜，潇潇冷雨就像马迈将军的军队又打这儿经过了。小城上空或是风儿打着唿哨，或是雪暴漫天飞舞。大自然遵从着事物的固有规律，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然后是飘雪的冬天，年复一年。革命洪流漫过小城时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设了区执委会，五年计划初期，要把教堂钟楼上的钟摘下来，小城居民说：他们办不到，人民要起来反对的。但钟还是搬走了。事件迭起，人们也就把钟忘记了。在席卷全国的社会风暴中，小城周围的农村闹腾起来，农民像潮水般涌进集体农庄。小城居民说：成不了。但个体农民逐渐消失了，在新农村里，人们也就把他们忘记了。有一次，小城的居民一连几夜不睡觉，孩子们整天爬在栅墙和椴树上，小伙子们干脆背了背兜去车站迎接——大家都在等待拖拉机从车站开来，这可是空前的奇景。拖拉机一下子便来了二十三台，哒哒地开进了摘去了钟的教堂，开进了教堂

的车库。小城的人把拖拉机直送到教堂，又随拖拉机钻进了车库。接连三天，来参观拖拉机的娘们儿络绎不绝，人们还涌到地头看拖拉机怎样翻耕土地。在拖拉机热潮中，人们没有发现，从车站到小城七十一公里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土路变成了石子公路，公路上公共汽车来回奔忙。小城居民正惊叹于集体农庄的建立、公共汽车的开通和拖拉机的出现时，山脚下破旧磨坊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发电厂。小城居民理所当然地要求区执委会把电线接到每个家庭。不知不觉间许多居民趁早逃离小城另寻天地去了，而压根儿不知垦殖前小城是个什么模样儿的外地人通过另外的渠道到小城定居了。晃眼四年多，波琳娜·伊西托洛芙娜在方志博物馆里准备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到来。现在是十二月年终，人们忘了，但知道小城所在的这块土地上还存在兽疫。格罗扎家的窗子对着街那一边涅韦尔斯基家的窗子。新年前夕——在莫斯科，工业活动家诉讼案刚刚平息，康德拉季耶夫与恰亚诺夫诉讼案又在报纸上热闹起来——两辆崭新的汽车沿着新铺的公路开进了小城。从其中的一辆车里走出一个身穿羊皮袄、头戴护耳帽、脚登毡靴的人。他便是以前的水兵，不错，比五年前稍稍苍老了些，但在他冻红的脸上那条以往被马刀砍下的伤疤更显苍白。方志博物馆门外的雪堆早在节前铲平。馆内亮着无数盏电灯——新的委员会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老水兵在慢慢地翻阅发黄了的速记记录。在他一侧，还有一个脸儿刮得光光的、袖口缝了红色菱形章的年轻人，把胳膊肘儿叉在桌上，也在俯身看速记记录。

“唉，你呀——说什么系领带的家伙们！……他们又不是些孩子……”

桌对面站着特鲁巴切夫。他一夜还没坐下歇口气呢。夜半人散后派人去唤醒格罗扎，要他来方志博物馆。他是最后一个

被召来的。他在人陪伴下来到了。水兵从绿色台灯灯罩下抬起头，接着走上前和格罗扎握手，说：

“伊凡·阿夫杰耶维奇，认不出我啦?！你好！日子过得怎样？我们正在翻看速记记录。记得吗？就是我们拟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那份速记。那时你曾说兽疫消灭不了，现在果真没有消灭。你能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吗?”

“您好！认得出是您。正如我以前说的那样，兽疫过去有，现在依旧有。”

“那你就给我们出出主意，你能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今儿我们逮捕了涅韦尔斯基……”

“逮捕了他?”格罗扎问，接着笑了起来。头上的白发也跟着笑。

“逮捕了，”水兵回答。“正因如此，所以要你说说你怎样为自己辩护。如果早在四年前你便把涅韦尔斯基的事揭露出来，也许就不必逮捕他了，也许为了我们的事业当时就将他逮捕。你可知道，你包庇坏蛋，也应该逮捕你。要知道，特鲁巴切夫跟你坦率地谈过了的。关于这，你好好想想吧，老头儿，你因你那套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而成了危害分子！可以对你信任吗?”

“可以。”

“那就拿出值得信赖的证据，不要扰乱我们的视线。直截了当地给我们摆明自己的观点，说明你对当地兽疫防治的看法。怎么的，你还想保护涅韦尔斯基?”

博物馆里非常明亮，非常暖和。博物馆外是小城，旧俄的垦殖区定居点。在垦殖之前，马迈的军队常在这一带走动。这里筑有边寨。当教堂的钟被摘下时，小城居民说：办不到。格罗扎会反对的，更不用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尔斯基了。但钟仍被摘走了，人们把它忘了。

果实的成熟

刘引梅译

第　一　章

……下午三点多钟，轮转印刷机把最后几千份将要随长途列车运走的报纸抛了出来，这时一个人正在发行科机械地用手工操作将它们一一贴上地址：

——第504期《消息报》。也门萨那。阿拉伯。——汉志。阿拉伯。——第1219期《消息报》。南哥伦比亚。南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蒙得维的亚。乌拉圭。——比勒陀利亚。南非。——悉尼，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阿富汗。——乌鲁木齐。中国西部。——马德里。西班牙。——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雅典。希腊。——《消息报》——《消息报》——《消息报》——第1881期——第1881期——美国——美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芬兰——

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他在贴最后一个地址：

第235期《消息报》。梵蒂冈希布雷里亚。梵蒂冈城。意大利。——这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地址。窗外狭小的院子里，齐斯牌汽车把一卷卷新闻纸卸下来，把一捆捆报纸装上车。新闻纸从车站上运回来，一捆捆报纸运往车站——出版报纸所需的七车皮纸张和一千五百公斤印刷油墨。

狭小的院子上空，天空显得拥挤不堪。

第一批铅版是在夜间一点三十七分浇铸出来的。轮转印刷机一点五十五分开机印刷。第一批货车两点十五分开始发送报纸。第一批收到报纸的是当地邮局和近郊列车。早晨六点，邮递工人把报纸分送到各企业和各售报亭。晚上，最后一批汽车开往长途列车站。各次列车夜间分别开往七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摩尔曼斯克到埃里温，从文尼察到海参崴，开往各城市，各工厂，各村镇，各荒僻的角角落落。列车开往边界。行李车厢里堆放着一捆捆报纸。在大西洋，在赤道附近，在通往阿根廷的途中和卡普施塔德，在印度洋，在通往悉尼途中的赤道附近，在太平洋，在北冰洋——在夜间，在黎明前——波浪撞击着船舷，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船舱里堆放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经过某些天的运行，从摩尔曼斯克到科拉冻土带，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梅津，——在冻土带——将有鹿出没。嘎斯牌汽车在中亚的沙土地上轰隆作响，门廊侧墙将像螺旋桨那样发出轰鸣。一个星期之后，脖子上系着小铃铛的毛驴将翻越一道道山口，冒着阿拉伯大沙漠的炎热，把小邮件从汉志送到萨那。

他用手背揩了揩脑门上的汗。他用抹布擦了擦手指上的浆糊。他把抹布扔到镀锌的桌子角上。脚下边的轮转印刷机已经不响了。日光渐渐为电灯所代替。铅字工人把铅版加空，用金

属把排字机调整好。排字车间散发出铅和油墨的气味。货梯装载着沉甸甸的一卷卷纸张，被压得唉声叹气。一股冷气从地下室升起，灌进货梯里，吹得碎纸沙沙作响，货梯的轰隆声仿佛变成了空气的轰隆声，而且从地下室涌来的气流有一股煤油气味，还有松树气味。在地下室里，那人脱光了衣服，洗了个淋浴，换上西服，打上领带。那工人穿过狭小的院子向一座对着德米特罗夫卡大街拐角和受难女修道院的老房子走去，普希金曾经在这所房子里住过，这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曾作为素材被格里鲍耶陀夫用在他的诗体喜剧《智慧的痛苦》里。这座房子里设有食堂、红房子、工会基层委员会、医务室。在空荡荡的红房间窗户外面，在亮着《消息报》的新闻图片、挤满了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中世纪的胡同后面，矗立着一道中世纪修道院的墙壁，仿佛一条小胡同似的。一百年以前，这道墙壁保护了受难女修道院。现在那里辟为反宗教博物馆。在1916—1917年冬天，临近十月革命前夕，连从前线回来的那些变得呆头呆脑的人都有一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似的革命预感，文学家们和律师的妻子们习惯在彻夜狂欢之后到受难修道院去做晨祷，醉醺醺地聆听教堂赞美歌的呓语，在饮酒引起的歇斯底里般的过度紧张中同上帝把永恒和暂时彼此说说明白。

那工人在食堂待了一会儿，来到普希金广场，等了一会无轨电车。车来了，他坐上去，到索科尔新村去了。

《消息报》社正门的电梯在运行。它犹如温度表升温一样，从一层升到六层，升到各编辑部办公室，升到报纸的中枢。身穿缀有镶条的蓝色上衣的电梯司机是温度表的汞。德高望重的老者——看门人——总是站在大门口交谈，他们根据胶皮套鞋的优劣，谙熟所有俄罗斯的、联邦的和许多国外的新闻记者、作家、社会艺术理论的团体。电梯按照苏联文化和苏联事务的楼

层往返运行。《消息报》社的主任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维诺库罗夫博士曾主持医学界讨论会，否定印刷工人和报人的“由铅引起的心理变化”，否定由莫斯科某些心理分析学家提出的理论。维诺库罗夫博士对《消息报》的联合工厂一千五百名工人、职员、编撰人员进行观察，没有发现这种“由铅引起的心理变化”。印刷工人是他进行观察的主要范围。六层是编辑部，那里都是苏联作家、编辑、文学家、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典型。五层和四层是财务处、宣传发行处，这里宽绰，有点儿古板，很安静，像会计事务所一样。甚至在进行生产的楼层，维诺库罗夫博士都不认为轮转印刷车间和浇铸铅版车间及钢电铸版车间对印刷工业具有代表性：金属工业工人站在轮转印刷机旁工作就如同他们站在机器制造厂任何一个冷冰冰的车间里铣床和冲床旁工作一样，像在冶金厂任何一个高温车间里工作一样。排字车间，从较小的程度上说是装订车间，是进行观察“由铅引起的心理变化”的椎骨和主要范围，但是维诺库罗夫博士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发现“由铅引起的心理变化”。他坚信，《消息报》联合工厂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对事件进行装帧和生产有组织的政治思想的、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的全部形式提供服务的工厂企业，——仅仅是企业而已。电梯通过企业的所有各楼层，就其实质而言，是通过国家的积淀的所有各层。电梯司机把上百万卢布的工资、稿酬、发票运到五层。四层把预订费和广告费登记入账。四层和五层的财务处把犹如最最复杂的花边似的数字、核算、结算及官僚制度分别登记在册。下面几层使产品增加到上百万份。六层对产品——国家的事件、政治愿望和政治意向——进行装潢。电梯司机在各楼层上上下下。事件的温度往往体现在电梯的运行中。事件往往带有国家和现实生活的色彩。事件迅速传播到国家和现实

生活中去。事件被报纸、六层、编辑部、核心、编撰人员加以装潢。

下午三点多钟，昨天一期的报纸的事务结束了。而在这个时间里，明天的报纸便进入了出版流程。编辑部的编撰人员、各部室主任都集中在一起参加所谓的碰头会。塔斯社发来了今天苏联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电报。加里在口述自己的社论。机要通讯员们送来了政府的命令。文学家们的特写和短篇小说在排队等待。会议往往从讨论昨天的报纸开始，也就是读者今天所读到的报纸。会议讨论了社论，并且还讨论了明天将要读到的报纸的宗旨。社论是紧急写就的。讨论过社论之后，苏联建设编辑部主任就明天的行数同外编部发生了争执。在走廊另一侧的一个房间里，女速记员们在判读与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电话商谈。通过了明天报纸的版式。各编辑部都得到了自己的行数和题目。报纸的底栏从存稿中挑选出了要刊登的材料。编撰人员各自分散回到办公室，把题目和写好的文字编排就绪。有的坐下来写东西，有的口述，有的在写字台上翻来翻去。电报机和电话机继续把发生在日本、美国、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科尔古耶夫岛的事件，把在摩尔曼斯克召开的地质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情况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来．事件都是日常生活。明天的思想、政治意愿、对发生在德国、法国、还有四川、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的事件的观点、对科尔古耶夫岛日常生活富有诗意的描述、对奥摩尔州教育工作者粗枝大叶的工作态度的讽刺，都一一确定了下来。

编辑部秘书和编辑的接待工作开始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对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的翻译稿。一个不留姓名的人通知说，他在伊加尔卡生活了两年，每天写日记，写了一些特写，打算把它们提供给编辑部，希望事先得到记者证，因为他明天

就要出发到蒙古布里亚特共和国。一个机要通讯员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带来一封公文。伊斯克拉，一位外勤新闻记者，穿着打上油的皮靴突然闯了进来，满脸喜气洋洋，他开始讲述库兹涅茨克之行的心情，他是今天早上刚刚从那里回来的。编辑部秘书使他大为扫兴，他通知说，伊斯克拉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塔斯社的日本记者纳吉同志到秘书这里来告别，小坐了一会儿，起身去找编辑。秘书这时想了起来，他对驻美国的塔斯社记者久兰特的电报还没有回复，于是写了回电。送来了一封来自巴黎让克·萨杜利的长达二百行的电报，秘书把这封电报从二百行压缩到七十五行。乘汽车到伊万诺沃州，到帕列赫去消夏和休养的作家谢尔盖·阿尔别科夫顺便到这里来告别。

莫斯科沉入夜幕之中。电梯把苏联和世界发生的事件运到编辑部。从六点到九点半，电梯减缓了运行速度。轮转印刷机沉默不响了。财务处人去室空。轮转印刷机一点十五分开始工作。电梯在这种时候寂然无声，因为纸型已经打好了。

在距离莫斯科一千公里的地方，在东方或者西方，在北方或者东南方，距离莫斯科都是同样距离的地方，有两个人骑着马，间距马尾巴半米远。他们已经走了很久，浑身冻透了，累得筋疲力尽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也许是《消息报》记者，也许是当地集体农庄主席。他在车站上收到邮包、信件和报纸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回到村里，把马卸下来，在门限上把皮靴上的泥刮掉，拉开灯。集体农庄主席打开了报纸。他的眼睛已经很疲劳了。他的眼睛霎时间变得又惊又喜，疲顿的神色一扫而光。

“写我们的！有一篇写我们的文章?!”他惊喜交加地说。

“纽约市第 38 大街 301 号——美国——”

第 二 章

改名换姓，用笔名来代替原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演员和作家改名换姓首先是出于爱美的原因。齐克洛波夫改为韦尔希宁。雷宾改为沃尔斯基。凯勒尔因此变为阿尔别科夫，不过，凯勒尔改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凯勒尔是一个德国姓氏，而凯勒尔在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在笔名的选择中已经表现出了唯美主义，对于莱蒙托夫时代来说，“征服”高加索和对高加索的神往，比对世界大战以后在俄国出现的那些年更方便。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在苏联——出现了改造人的劳动时期，因此又是改造人的时期。至于人的劳动，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应当与艺术携手并进，变为艺术。文学家们的劳动正是艺术。这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种情形——文学家的劳动就是艺术——使作家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快地复杂化了。社会

主义的劳动，它就是艺术，——必定是集体意识的劳动。文学家们是个体进行工作，培养自己的独特个性，在这个性里，普希金不像莱蒙托夫，因为所要求的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不像马雅可夫斯基，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不像康斯坦丁·费定和谢尔盖·阿尔别科夫；阿尔别科夫、杰米扬·别德内、格拉德科夫、伊万诺夫、基尔雄、列昂诺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托尔斯泰、费定、肖洛霍夫——他们都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和社会起源的革命的俄罗斯作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彼此并不相像。

阿尔别科夫给自己定了夏季休假。他去了帕列赫、伊万诺沃工业州、古老的俄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封地。他是开汽车去的，以便有机会沿途看看全州风貌。在伊万诺沃，他应该到车站去接妻子和儿子以及保姆。为了免受坑洼不平的路途颠簸之苦，他们乘火车来。

汽车是晚上七点钟从莫斯科出发的。

同行的有阿尔别科夫，他的工人朋友和汽车事业家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还有一位是修复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西尼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修士”。

卡拉什尼科夫这次出行纯属偶然。

整个春天，阿尔别科夫都在搜集有关俄国十七世纪的材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交给阿尔别科夫一本关于十七世纪图拉和卡希拉冶金厂的书。书中讲述了三个外国人即安德烈·韦尼乌斯、彼得·马尔谢利斯和菲利蒙·阿克马的故事。他们第一次在俄罗斯，在当时的罗斯，建起了冶金工厂。出现这些工厂的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把它们称之为封建的手工工场是不确切的，因为它们是在俄罗斯最先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最后的法律形成和农奴制巩固的那一年，即1649年出现的、

根据同沙皇阿列克谢达成的协议用各乡和农奴装备起来的这些工厂拒绝了农奴制劳动，使用了雇佣劳动。这些工厂都是租赁的，它们按照合同给沙皇铸炮，把火绳枪钻上孔，锻造马刀，但是除了合同以外，这些工厂——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把大炮发往荷兰市场，发往自由城市汉堡，就是说，罗斯在十七世纪就向欧洲出口铁器，并且这铁器与欧洲的铁器，首先是与瑞典的铁器进行竞争。当这些工厂是租赁的、隶属于外交衙门时，它们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既不受军政长官管辖，也不受县令管辖，一切依照自己的法律行事。但是它们生存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于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混合体出现了：冒险家-企业主和工人，他们的花名册迄今完整无损，每一个工人的姓名旁边都有说明："他自称彼得鲁什卡，出生在工厂，他父亲是从哪个城市到这里来的，他没有提到。"冒险家-企业主和逃亡工人，即那些农奴，躲避十七世纪在全罗斯的那个"农奴制"法令，躲避戈杜诺夫斯克的尤里节①，逃到了顿河、亚伊克河②，逃到了古里耶夫③，逃到了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④那里。韦尼乌斯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外交衙门的在编翻译，马尔谢利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建了一座中心商场⑤，即阿尔汉格尔斯克贸易城堡。韦尼乌斯、马尔谢利斯和阿克马都在宫廷里受到过接见，但是保存下来的档案指出，他们工厂的工人不仅读过暗中投下的拉辛的信，而且还参加了拉辛的运动。在那里，在那些工厂里，

---

① 旧俄历 11 月 26 日。俄国在 15—16 世纪时，每逢尤里节农奴可以从一个农奴主转到另一个农奴主。

② 乌拉尔河 1775 年前的名称。

③ 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拉尔河畔的城市。

④ 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约 1630—1671），1670—1671 年农民战争的领袖。

⑤ 指俄国 13—17 世纪专供外国商人贸易的商场。

在十七世纪，也许能够找到一位俄国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领袖吧？不管怎样，这些工厂都是俄国冶金工业的先导。阿尔别科夫开始搜集散落在十七世纪的材料。他意外发现了许多情况，他觉得这些情况犹如长篇小说和人物形象的种子。马尔谢利斯在科洛姆纳[1]附近季季洛沃村参加建造了俄国第一艘“雄鹰号”巡航战船，即下水一年半以后，有预示地在阿斯特拉罕被斯捷潘·拉辛焚毁的那艘船。但是阿尔别科夫在档案馆里彼得·马尔谢利斯的禀帖中意外发现一句话，马尔谢利斯在禀帖中给沙皇阿列克谢写道：季季洛沃的军政长官扎穆罗夫斯基“派出全部哥萨克前往沃罗涅日河，参加您的，皇帝陛下的平底船战役”，这发生在1674年，就是说，沃罗涅日船队的建立不是始于彼得大帝时代，不是彼得大帝建立的，而是沙皇阿列克谢建立的。档案材料重新梳理了历史。寻找档案材料使阿尔别科夫走进了历史博物馆，走进了列宁图书馆——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和时间投入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时，寻找也就把十七世纪拉近了，仿佛它就在昨天。来了一些研究十七世纪比研究1935年春天更出色的熟人。新朋友们送来许多礼物：一个上面饰有双头鹰、可插五枝蜡烛的十七世纪的烛台，一件酒器，一只金属锅，一只铜墨水瓶（带有两个小环，因为在十七世纪，司书们大概把墨水瓶挂在腰间的皮带上随身携带和把羽笔夹在耳朵上一样，好使大家能认出他们来）。他们还赠送了一幅三折圣像，即画有三幅圣像的折叠圣像，装在一只镶着厚皮革的铁匣子里。折叠圣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赠送者说，他要派一位修复家来。这幅折叠圣像阿尔别科夫完全不需要，可是赠送者是那样关切地、认为有充分价值地赠送了这幅折叠圣

[1] 莫斯科州城市（1781年设市），莫斯科河流入奥卡河交汇处的码头。

像，以致阿尔别科夫在接受礼物时，竟用十七世纪鉴赏家和爱好者的口吻说：

“是啊，当然，修复家是必不可少的，请您派他来吧，谢谢！……”

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乘汽车同行的第三个人正是这位修复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他是在这次出行前两天到阿尔别科夫这里来的，是早上来的，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俄罗斯早就不见有上了漆的带帽舌的工匠帽了，工匠服既不是西装，也不是常礼服，皮靴像手风琴折层似的，衬衫不塞在裤腰里，腰间系一条饰有穗子的带子。齐齐剪成“一圈”的发型，差不多像助祭那样的式样，也完全消失了，大胡子和唇髭也消失不见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来了，他既留着齐齐剪成一圈的发型，又蓄着稀疏的、长到了脖子上的大胡子，还戴一顶上了漆的有皮帽舌的便帽，穿一身富于形象的黑衣服，一副极古老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修复艺术家，”他微微一笑，那微笑的眼神完全像小孩子似的。他摸了摸折叠圣像，好像珍本鉴赏家摸古版书[1]一样。他的手指修长，两手软弱无力。他的年龄大概有二十五岁或二十七岁。他望着折叠圣像，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他用十七世纪的语言开口说起来。显而易见，他是个行家，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难道是阿廖沙，是卡拉马佐夫[2]不成？可这是在1935年啊！谈起了拜占庭对俄国圣像画术的影响，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

---

① 公元1501年前印刷术发明初期，用活字版印刷的最早的书籍，形状类似手抄书。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幼子。

雅罗斯拉夫尔、莫斯科的画圣像风格。卡拉什尼科夫原来不仅是地地道道的俄国圣像画术的行家，而且精通整个俄国历史。阿尔别科夫问道：

“怎么，您在做遗留下来的圣像修复工作吗？您是帕列赫人吗？您是哪里人？”

“不，我是莫斯科人。我从小就对古代心驰神往。我父亲是细木工。我刚满七周岁就到国立修复工作室学习去了。学习期满后就工作了。”卡拉什尼科夫也问道：“您去过许多国家吗？”

“去过。”阿尔别科夫回答说，“去过许多国家。”

“我没有机会出国，我不了解，但我推测，没有比俄罗斯人更好的了。俄罗斯人民是优秀的人民，是诚挚的、有文化修养的、善于思考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沉默了一会儿，“是对人亲切的人民。等我什么时候有了空闲时间，我就去旅行，乘火车和徒步。我去过弗拉基米尔，很遗憾，没有走到苏兹达利……我去过伟大的诺夫哥罗德、伟大的罗斯托夫、佩列亚斯拉夫利-扎列斯基、普斯科夫……古代俄罗斯人民是亲切热情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去帕列赫。这条路正好经过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伊万诺沃和舒雅。二十一年前，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这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大概才五六岁。战争、革命、新国家、一代代新人，——而阿尔别科夫面前却坐着一位突然从十七世纪走来的小伙子，手里拿着折叠圣像，并且他的眼睛和手指是干瘪的，但他的体格高大魁梧，保养得很好。阿尔别科夫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小伙子文静、温和，是个圣像修复工匠，可是阿尔别科夫根本不需要圣像。他看出小伙子是个好奇的人。

阿尔别科夫说：

"后天我要去伊万诺沃，经过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

"应该顺路到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①]去看看，一定得到那里去看看，把博戈柳博沃[②]绕过去也不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叹了口气，垂下眼睛，好像用回忆把眼睛遮挡住了。

"那好，您跟我一起去吧。您坐车到伊万诺沃，从那里再坐火车返回来。您后天下午三点钟过来吧。"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像少女一样脸红了，把眼睛垂得更低了，小声说：

"我去……我一定去，如果您允许的话……十二世纪！好几个世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来了，正好三点钟。他穿一件旧时的短上衣，不知叫什么款式，好像是司祭穿的大氅，没有带任何东西，甚至连肥皂和毛巾也没有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工人，汽车事业家，立刻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起了个外号，把他叫做修士，无用之物。他们耽搁了，七点钟才出发。阿尔别科夫开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行驶时仔细听着汽车、马达的运转、弹簧的咯吱声。行驶了五十分钟到达诺金斯克。从诺金斯克开始，每行驶十米都要提到楚多尔特兰斯，说他的坏话：道路真是糟糕透了，比没有道路的地方还要糟糕得多，如果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可以行车的话。在到达诺金斯克的一路上，修士尽情地享受着飞驰的车速，一边说："我就像坐在飞毯上飞行一样！"过了诺金斯克，他欣赏着雾霭，美人鱼[③]的辫子，景色，——这更加使刚才提到楚多尔特兰斯和鄙弃景色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心情不好了，既使在这样一

① 弗拉基米尔州的城市，1778年设市。

② 弗拉基米尔州的城镇，建于1158—1165年。

③ 东斯拉夫人，特别是乌克兰人和南部俄罗斯人神话中的形象。

条糟糕透顶的道路周围景致旖旎。这条极其可恶的道路一点儿也不爱惜汽车弹簧和他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劳动和神经。

真的，雾覆盖住了路上的坑坑洼洼。夜莺在弥漫的雾中啼啭，有几十只，上百只夜莺。诗兴在雾中渐渐消失了。雾霭、美人鱼的辫子使人想起基督教以前的俄国民间创作。黑夜向来不能彻底战胜白昼，霞光总是与霞光相遇。天空是绿色的，辽阔的，模糊不清的。雾霭后面和六月的天空下面的绿色景致使人想起梦境。白桦树发出一股又苦又甜的气味。旧的弗拉基米尔公路——弗拉基米尔卡——是一条苦役犯们和关于他们的传说的道路，一条强盗的真理和强盗的修道院、锒铛的镣铐声和死亡的道路，——被从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开出的汽车压毁了，仿佛一个新建筑工地。路边燃起了篝火，是夜牧归来的小伙子们、行路人和修路工人们燃起的。篝火述说着弗拉基米尔的传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篝火后边，在篝火的烟雾中看到了他刚才说过的美人鱼。他们把汽车停在篝火旁，吃点东西。

于是他们听了伊凡沙皇的故事。

他们沿着美人鱼、带镣铐的犯人和楚多尔特兰斯的道路，于凌晨一点到达弗拉基米尔，全体安然无恙。他们下榻在一个古老的旅馆里，旅馆的院子里必定停着作家索洛古布[1]的四轮马车，是果戈理时代的，而在旅馆的餐厅里，如果作家赫尔岑当年在弗拉基米尔久住的话，那么一定会变成酒鬼。汽车停在大街上一个十字路口，离警察的岗亭不远，估计汽车在这里比在停着索洛古布的四轮马车的院子里更安全。修士带着一个笔记

---

① 索洛古布（1813—1882），俄国作家，著有描写外省风俗的中篇小说《四轮马车》。

本，他在上面用教会斯拉夫文连体字记述了有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情况。

在到达弗拉基米尔的路上弄清楚了，修士身上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洋葱和阿利芙油的气味，以致沾上汽油和润滑油气味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郑重其事地考虑他是否要在汽车里过夜。睡前，他们吃了东西，可是修士由于心不在焉，把准备到达伊万诺沃吃的面包全部吃光了。

翌日早晨，他们参观了古迹。弗拉基米尔的文物都与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①]和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与十二世纪有联系。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有城门，即所谓的金门，还有两座大教堂。从金门那里起，两侧有壕沟，在壕沟附近，准确无误地表明，在将近七个世纪以前，鞑靼人正是从这里闯入了弗拉基米尔（事情好像就发生在那个星期）。弗拉基米尔区执委会的城市公用事业部门如今把一只带电动发条的钟表挂在了金门上。十二世纪的教堂——其中一座在最近大约二十五年里出现了许多裂纹——正在坍塌和将要坍蹋，如果建筑修复家们不到这里来，对裂纹不进行加固的话。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教堂建筑中，所有的教堂圆柱和拱顶上都饰有雕狮。在十二世纪科利亚济马河畔和涅尔利河畔，这些雕狮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年鉴记载，说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与红胡子腓特烈一世[②]有血统关系。还有一种推测，说这两座大教堂是伦巴第[③]的建筑师

① 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约 1111—1174 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1157 起），建都于弗拉基米尔城。在博戈柳博沃村自己的府邸被贵族杀害。

②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约 1125—1190），1152 年起为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③ 意大利北部的地名。568 年，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伦巴德人侵入意大利，并建立早期封建王国。该地名由此得名。

们建造的，雕狮也是他们运来的。但是，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和芬兰人的雕狮却是国徽。弗拉基米尔大教堂里圆柱根部的雕狮是不是从那里运来的？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国徽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即被鞑靼人所包围的和曾是弗拉基米尔人最后一座堡垒的那座大教堂，曾保存了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圣尸和保存着安德烈·鲁布廖夫[①] 的壁画，以及从十二世纪以来希腊人所创作的经过清理的壁画。年鉴对博戈柳博夫斯基的情况作了记述，说他傲慢而威严，从来没有低过头，说他非常留心，从来没有完全闭上过眼睛，甚至睡觉时也这样，说他是被一个贵族库奇卡及其儿子们砍死的，而且痛恨他的贵族们在他死了之后还在砍他。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圣尸被挖掘出来，从大教堂里迁至博物馆。根本没有什么圣尸，只是一具遗骸，但这具遗骸证实了年鉴上的记载。在许多遗骸上，在胳膊和腿的遗骸上，在肋骨和颅骨上都留下许多剑击的痕迹。科学院的组织学家们对这些遗骸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在起初遭到击打死亡之后，又遭到长达数小时的击打。组织学家们确定，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颈椎由于患巴塞杜氏病而接合住了，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不是由于高傲和留心才不低头和不闭眼的，而是因病所致。安德烈公的身量高得不可思议——比彼得皇帝高出半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公-封建主的颅骨和遗骸拿在手里。没有任何神圣的激动，——拥有这具遗骸的、八个世纪以前的这个人很可怕。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默然无语地、像修士似的站在遗骸旁边。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颅骨拿在手中，掂了掂它

① 安德烈·鲁布廖夫（约 1360/70—1430），俄国画家，莫斯科画派的著名大师。

的重量，放回原位，转向阿尔别科夫说道：

“您怎么看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们和我们的汽车能把博戈柳博夫斯基的整个王国征服了吗?要是我能取胜就好了。要是我能像上帝那样对他们进行袭击就好了。他们只消碰上一个我的德国佬，便会四散逃窜而去……只是我们正在睡觉时，说不定他们会偶然发现我们吧? 或者假如汽油用完了? ……”

旅馆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警察离开了自己的岗哨，来到汽车跟前，请围在汽车旁边的孩子们不要滞留，而对成年人则讲着有关苏联汽车制造业的情况。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和风习习，天空湛蓝，空气清新，自由自在。夜莺们没有注意到已是早晨，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中间、在蔚蓝色的晨曦初照的带露水的草地上啾啾啼啭。早晨显现出来，弗拉基米尔市无论如何不像非行政中心的城镇，到处是年轻人，学生，青年男女，用小皮条扎起来夹在腋下的课本，盛开的丁香和樱桃，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他们下午一点离开弗拉基米尔，向博戈柳博沃和位于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进发。在博戈柳博沃，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富丽堂皇的府邸保存下来一部分，根据完全不可靠的修道院的解释，安德烈公就是在这所邸宅里被打死的和被奉为圣骸的。如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克鲁格洛夫住在博戈柳博沃，保管着博物馆的钥匙。他这人像博戈柳博夫斯基一样不弯脖子，与博戈柳博夫斯基不同的是，他不弯脖子另有原因：他是游击队员，红军战士，彼列科普战役的参加者，他曾被白卫军俘虏。他身上至今看得见一颗受刑时被刻在皮肤上的五角星；白卫军把他枪毙了，他被埋在阵亡将士公墓里，他从地底下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回到我们的人这里，在彼列科普附近参加战斗，他的颈肌变了形，脖子不能弯曲。他对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

的富丽堂皇的府邸永志不忘。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碰见他时，他正坐在凳子上，凳子摞在紧挨着天花板下面的桌子上，他在给自己的住所刷白，住所被安排在都主教的内室。

位于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是荒凉的极端象征。教堂坐落在涅尔利河与克利亚济马河交汇处，在被水淹没的草地中间，方圆数公里荒无人烟。甚至教堂附近也阒无人迹。教堂破败得不成样子。在阴雨天的夜晚，那些运气不济的人们大概需要在这座教堂里过夜。教堂的门是铁的，是用十二世纪拜占庭的铁打制的，但门框是木头的，于是那些不走运的人们为了进教堂而把其中一个门框烧毁了。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附近一切都荒芜得不成样子，甚至连乌鸦和寒鸦，这些专事破坏的鸟也都纷纷离开了环绕在教堂周围的白柳。白色的教堂。太阳，白柳的绿荫，风。连鸟儿都从这里飞走了。一片苍凉景象。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去参观古迹，他把汽车停在两个小丘之间，爬到汽车底下，一来是为了避免太阳晒，二来是为了给弹簧上油，还可以从容地仔细观察鸡雏。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古迹厌烦了。

他们出发前往苏兹达利。伊万诺沃工业州的路比弗拉基米尔公路好走一些。苏兹达利使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心情感到十分压抑。这座城是俄国历代沙皇的都城，不是帝王的，是沙皇发怒和沙皇发慈悲的都城，是修道院和皇后以及免去教职的神父流放的都城，在这里，教堂多于住宅。实际上有许多教堂。实际上有许多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纪非常卓越的教堂古迹。实际上可以写一部关于中世纪妇女命运和被流放在苏兹达利女修道院的彼得大帝第一位妻子的小说。实际上待在这些世纪里令人厌倦。实际上所有这几个世纪都被破坏了。所以应当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起发发慈悲之心。使雅科夫·

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抑郁的不是这几个世纪的伟大，而是破坏。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本能地不喜欢和厌恶被破坏掉的、被摧毁的和未完工的东西。他把古迹也看作是未完工的。唯一一座没有遭到破坏和保存完好的古迹是高高耸立的中世纪的宏伟建筑——关押免去教职的神父的监狱——涂着玫瑰红色，森严而无法靠近，这就是苏兹达利的绝缘体，革命前的修道院。所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内务部的活动深受感动。

“喏，您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们真行！不管干什么，都干得极出色！……着手建修道院，修道院就建得完美无瑕！……简直了不起！这可不是您的那些历史学家！……有看头！……”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圣像修复家。苏兹达利修道院遗址，苏兹达利博物馆里收藏的圣像，苏兹达利大教堂的科尔孙[1]大门——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他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决定留在苏兹达利。他想呼吸呼吸十七世纪的空气。他打算看看彼得大帝的第一位妻子曾经看见并从窗户里看过的那些景致。体魄强健的小伙子，他从苏兹达利的古迹中开始亮起来，犹如涅斯捷罗夫[2]的蜡烛。其实，他身上本来就散发着一股阿利芙油和洋葱的气味。阿尔别科夫所想的都做到了，他知道，卡拉什尼科夫又信神，又把现代生活当作“神的恩赐”，并且深信，十七世纪比现代好得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唯一的，同时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万军

① 科尔孙，古罗斯的古城，今称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

② 米·涅斯捷罗夫(1862—1942)，俄罗斯画家，创作有富有诗意的宗教形象，如《少年巴格罗缪的幻觉》等。

之主[1]。他就是阿纳伊[2]。在1935年，在巨大的权力和革命的理智中，这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好像是个无意义的东西，但他的存在却是事实。既然有这么个实实在在的人存在（他有一双怡然自得的眼睛，不爱洗脸，从莫斯科外出旅行不带毛巾，为了学写教堂斯拉夫语连体字和差不多说的是教堂斯拉夫语，在莫斯科几乎受到过高等教育），那么，可见在莫斯科什么地方，在莫斯科的小胡同里保留下来了使人们倒退到十七世纪的社会环境和有相互关系的社会力量。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不好意思地说他迷上了苏兹达利，不好意思地讲出他从莫斯科出发时身上只带了十八卢布，不好意思地请求借二十卢布，他像修士那样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便到博物馆去过夜了。从莫斯科到诺金斯克的道路铺上了沥青，因而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自我感觉极好，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之间进行了下面一段谈话：

“现在需要碰上漂亮的姑娘，”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温情地说，“让她们坐进汽车里来，好跟她们接吻。”

“这怎么接吻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问道。

“非常简单。把汽车停下来，上前鞠一躬，彬彬有礼地说：‘你们好，小姐们，我们也许是同路吧？请上车吧，我们来接吻，免得寂寞！’”

“她们会上车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问。

“假如说话的口气友好、快乐、不粗野，而主要的是，假如她们是几个人在一起，两个或者三个，那她们肯定会上车的。”

“可是她们肯定会接吻吗？”

---

① 犹太教中上帝耶和华的称号之一。

② 犹太教中表示雅赫维神，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主。

“为什么不？每一个人接吻都会感到愉悦，她们也一样。这就好比是开开玩笑，逗逗乐。只是不能粗野。接吻是一定要的！——大家都觉得愉快，无恶意，高兴。而且没有任何坏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沉默了片刻，低声说：

“我……我有过一个心爱的姑娘，可是我连亲都不能亲她一下……”

到达苏兹达利，卡拉什尼科夫刚一下汽车，到博物馆去过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就一丝不苟地整了整手套筒部，欣然地把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略带狡猾地说：

“您要是把那个修士甩掉，您也会高兴的?！废物一个！……您要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不看报，我没有工夫。所以当国务活动家我不够格，我是个汽车活动家。但是我有一定的政治准则，这些政治准则在我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譬如——国家政治部。[①] 比如说，我认为国家政治部的存在对我有好处，我生活得更方便一些。如果我需要打听一个人，我就开始不关痛痒的谈话，如此这般地说一通。国家政治部有过，但现在已经撤消了。现在是内务部，而以前有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如果一个人害怕国家政治部，那么，这个人就是冒牌的。我注意到：谁害怕，谁就坐牢。”

日已西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加大油门。路很好走。司机们都知道，日落的时候，汽车发动机运转得最好。

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当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摆着在一百年以前就已停摆了的十八世纪的座钟的房间时，座钟由于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面前感到害怕而开始走

---

① 原属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1923年为国家保安机关，后改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起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台留声机和汽车。为了表彰他的竞赛才能，莫斯科汽车俱乐部赠给他一辆摩托车。众所周知，摩托车的变速箱里没有逆转的小齿轮。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却把这个小齿轮安装上了，令莫斯科的司机们大为惊骇，他倒骑着摩托车，围着汽车俱乐部全速地兜圈子。钟表、收音机、煤油炉和汽炉实际上都害怕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骑着摩托车去遍了莫斯科的剧院，甚至还去过莫斯科大剧院，他一天也没有学过钢琴，但却会给三角大钢琴和立式钢琴调音。我们从白军手中缴获的、运到莫斯科的第一辆坦克破烂不堪，快要散架子了。当时莫斯科连一个懂得坦克构造的工程师也没有。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连好几天爬到成为一堆废铁的坦克上，几乎没有从上边下来过，他唱着《华沙工人之歌》，开着坦克从车站来到克里姆林宫，把坦克作为礼物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握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手，向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机械师表示祝贺。1931 年，阿尔别科夫从美国运回来一辆汽车。并学会了美国式开车，就是说无论对发动机还是对变速器，他都没有任何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作为司机回到莫斯科以后，一方面与汽车俱乐部的汽车爱好者和汽车业发展及公路改善促进协会[1]会员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又跟一些骗子搞在了一起，并很快吃了那些骗子的苦头，以致汽车停开了。当时在汽车公路-汽车俱乐部的圈子里，他遇见一个在司机们中间非常受尊敬的人——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他们是邻居。西尼岑开着代号叫“龙”的自己制造的汽车，他没有车库，而阿尔别

①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 1927—1935 年间的一个以促进汽车业发展与改善公路为宗旨的自愿结成的团体。

科夫有一座院子，院子里可以建一个停得下两辆汽车的车库。西尼岑的车开始在阿尔别科夫那里过夜，西尼岑对阿尔别科夫的汽车进行了检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而这时，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都正在闹离婚。“龙”暂时不开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着自己的车，把车弄坏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开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车，把车修好了。西尼岑对阿尔别科夫的朋友们这样作自我介绍说：“我叫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热衷于汽车的司机！”实际上也是这样。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了解汽车的全部历史，从汽车事业只是作为一项运动时起。当朋友们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聚会，开始谈论国家大事、集体化的成就、美国钢铁公司[①]和日本时，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总是对阿尔别科夫小声说：“这里不开心，我去看看汽车！”说完，他起身到车库去了。可是当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成小时地讲着汽车的牌子和套管，讲着汽车比赛和发生的事故。他对莫斯科所有的汽车都十分了解，像了解好朋友一样。他不知道人民委员格林科和美国大使布利特，但他知道他们的汽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汽车、钢琴、钟表、收音机的统治者，它们都害怕他。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本人害怕的是纸，这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假如说到纸，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必定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所以这正是友谊的保证，其实是真正友谊的保证。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车库主任，突击手，他把从《真理报》上剪下来的带照片的剪报重新涂上机油作为纪念，随身带着，他调度着一百五十辆齐斯牌汽车、格里弗牌汽车和雅罗斯拉夫卡牌汽车。阿尔别科夫在写作。闲暇时间他们

① 美国的钢铁工业垄断组织，1901 年建立。

总是在一起度过。他们开车去过全国许多地方——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斯摩棱斯克和高尔基市。他们还到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故乡——西部地区。直到现在那里还挂着一个父亲留下来的牌匾，上面画着一只茶炊，写着“茶”。父亲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并从那时起当了布尔什维克，牺牲后安葬在巴黎公社社员公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父亲是党员，而您怎么是非党员呢？”但是儿子，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回答说：“要知道，我相信同志们，让他们去从事革命活动吧，我搞汽车运输来偿还！”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个轻信和温厚的人，真正的无产者，工人，一个地下工作者-无产者的儿子。

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跟妻子闹离婚的时候，他那汽车钥匙的钥匙链上挂上了阿尔别科夫住宅的钥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渐渐成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家庭成员。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家的墙上到处挂着他多次参加汽车竞赛荣获的奖状和证书。

日已西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加大油门。日落的时候，发动机运转得最好。前面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纺织城，这座纺织工人城是从封建的村落演变而来出现在森林和沼泽地上的。从前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城市从农奴手工工场变为资本主义，从前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村落变为社会主义的城市。公路的左右两侧是密不透风的、几乎是原始的森林，松树和云杉，它们一点也没有预示出再向前行驶几十公里便是拥有纺织工业、工厂和二十万无产者的苏联的大城市了。在穿越森林的路上碰上两个提着箱子、背着背包、打着赤脚的姑娘。不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主动提出让她们乘车的，而是她们自己请求顺路搭车的。汽车停了下来。两位姑娘的颧骨是瓦灰色的，体魄健壮，真是罕见。最后弄清楚了，她们是工厂技校的学生，回家

去了，指望早晨能碰上公共汽车，但却没有碰上，她们已经步行了三十公里，前面还有三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累了，而明天早晨八点钟必须上班。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担心地说：

“如果不提箱子的话嘛……你们的箱子会把座椅的包面剐破的，瞧瞧，你们带了多少东西啊？……”接着，他又严肃又高兴地补充说：“不过，好吧，让你们搭车，但要用实物酬谢我们才行，每行驶一公里吻一下。”

“你别开玩笑了，”年纪较大的姑娘说，“我们带着东西步行了三十公里，简直累坏了，”于是，她不容分说地开始往车上放箱子。

汽车确实被装满了。她们上了车，坐下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驾驶座上，挨着他坐的是一个姑娘，挨着姑娘坐的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另一个姑娘坐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腿上。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说服姑娘坐在他腿上，好使她真心诚意地吻他。迎面一下子驶过三辆货车。挨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姑娘对他说：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连一辆汽车都没有碰上，而现在一下子就过去了三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道：

“那么我的汽车，就是你现在坐的这辆，叫什么呢？”

“当然，”姑娘庄重地回答说，“叫出租车呗！”她又非常温柔地、轻信地、谦虚地补充说：“虽然我是农村来的，但也学过点东西。”

姑娘们请求在市郊停车。西尼岑要求接吻，作为实物酬谢。坐在阿尔别科夫身边的年纪较大的姑娘说：

“别开玩笑，小伙子，别丢丑了！……我们的嘴唇不是钱！”说完，她转向阿尔别科夫：“你也许为我们破费了，你说句话，需要什么，我们会付钱的。”

“不，付钱倒不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如果你吻一下，把我同伴的鼻子擦干净，他一路上都在请求你的女友呢，可你们却吻了我。”

“那有什么，吻就吻。你这老头子对这事会有什么快感呢？”

“那你就吻一个再说，让你的女友也吻我一下。”

“那有什么，我们吻就是了。纽拉，我们吻他一下。”

“你们也得吻吻我的同伴，他是好人。”

“我们不会让你们再死乞白赖地哀求了。要不然一路上就知道实物啊实物的——竟有这样风流的人！……你都老头儿了，或许只是长得像老头儿吧？”

姑娘们对他们俩人一个人吻了一下，在面颊上吻了一下（她们拒绝吻嘴）；只许在面颊上吻一下（不许吻嘴），握了握手，笑了一阵。当汽车开动时，其中一个姑娘在另一个姑娘的哈哈笑声中喊道：

“小伙子们，你们什么时候路过这里，请来喝茶！工厂技术学校第二栋宿舍，纽拉和卡佳！……”

前面就是著名的纺织工人城，俄罗斯纺织工业城，俄罗斯无产者城。

关于1919年被选举执政的伊万沙皇的故事

现今的伊万诺沃工业州的面积包括从弗拉基米尔和基尔扎奇到乌格利奇和波什-沃洛达尔斯克，还有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到丘赫罗马和索利加利奇到马卡里耶夫和谢苗诺夫。对于每一个记得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来说，每一个被叫出名称的人类的定居点既是俄罗斯事件又是历史的一个篇章。州的中部是伏尔加河。经济分布图上密密麻麻地标出了工厂区、机器制

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区、棉纺织工业区、亚麻加工工业区、硅酸盐工业区、泥炭工业区、食品工业区、淀粉糖浆工业区、酿酒工业区，使伊万诺沃州的这些地方大为增色。分布图上还标出了新工业建设区和电器化网络区。在整个州的分布图上都标出了居民手工业合作区、役畜供应区、乳品畜牧业区、绵羊养殖区、居民区、兽医和医疗服务区、各区的电话联络区。在所有这些分布图上，标出来的谢苗诺夫区、马卡里耶夫区、帕尔金区都是一片荒漠，除了一个分布图之外——森林覆盖分布图。这个多林的地区就是谢苗诺夫区。那里有一条韦特卢加河，原先的韦特卢加村庄（现今已经从俄罗斯地图上被抹掉了），就是梅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1]描写过的那些地方。那里的森林是原始的，无法通行的。那里的森林和村庄稀少，假如关于这些定居点，不管是顿河还是扎波罗热[2]，是由于那些社会原因而出现的论点被接受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过分的历史的牵强附会。但是在顿河和扎波罗热有游牧民族的大草原，有辽阔的地方，有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而这里森林环绕，正是这些森林把从家园跑出来的人藏匿了起来。应当在这些森林里定居和隐藏起来，应当干活，为了糊口和养活孩子。人们为了摆脱封建主，为了讨一个封建主式的公道，逃到了森林里来，但他们在森林里躲避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俄国的资本家。要知道，1934 年在这些地方发现了一个村落，这是个早就不知下落、没有身份证、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示出来、位于森林中难以通行的地方的村落，但村落里的人们经常出来到邻村买东西和出售自己的产品！……1914 年爆发了世界大战。1917 年皇权垮台了。根据现在所谈到

① 梅利尼科夫-彼切尔斯基（1818—1883），俄国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林中》和《山上》。

② 乌克兰第涅伯河畔的历史区域。

的这些人的理解，政权崩溃了，那些村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当时没有闲暇时间去寻找这些村落，——政权崩溃了，犹如时代的生死攸关的联系瓦解了。为了恢复观念的联系，可以建立和应当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在舒雅的一个新拓小村，农民们选举出了农民伊万，一个公正而英俊的人来执政和治理国家。伊万四十岁左右，目不识丁，家里人口众多。他开始当朝理政了，甚至在胸前画十字也很公正，在自己的木屋里设立了宝座，他穿着腋下打白补丁的红衬衫和草鞋，坐在宝座上对国事作出评判。在不上朝的闲暇时间里，他便制做勺子和耕地。他被称为贫穷的沙皇。他像从前一样，极其严格地命令自己的孩子们赤脚奔跑。他是古老信徒派教徒和农民，他从全国把东正教的神父们、乡里的录事、木材商、守林人、小警官、教师、医生召来了，希望他们赶快离开王国。巫婆和巫医迁到了医院里来。读过许多书的人到学校去了。人头税取消了。在劳动和面包分配中，大家人人平等。拼命离开王国的那些东正教神父、守林人、医生和乡里的录事急忙到当时的一个省，沃洛格达去了，他们报告说，森林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王国。这件事把沃洛格达苏维埃当局弄得困惑莫解。沃洛格达人飞速前往森林了解情况。他们来到了王国。森林无法通行。村庄被栅栏围了起来，为了使牲畜不到森林里去，熊也不便溜进村里来。沃洛格达人在栅栏跟前遇见一个人，他拉着大车，穿着草鞋，红衬衫，蓄着浓密的大胡子，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十分和善。

“据说，你们这里有一个沙皇，是吗？”一个为首的沃洛格达人问道。

“是的。”庄稼人回答说。

“什么样的沙皇？”沃洛格达人问。

“人民的沙皇，大家选举出来的，好使他问心无愧和公正无

私地为民办事。”

“这个沙皇在哪里?”

“我就是这个沙皇,”庄稼人回答说,“和平选择了我来执政。”

在沃洛格达进行了审判。但是伊万沙皇被宣告无罪,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请求他离开家乡,不得返回,可以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去。伊万沙皇表示愿意举家迁往阿斯特拉罕城,在那里的渔场安家落户。穷人伊万,俄罗斯最漂亮的大胡子的人,甚至在位时也仍然是穷人。就算他像茂密的森林一样,使古老信徒派的上帝与巫师和巫婆结合了起来,他毕竟是伊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人。

关于伊万沙皇的故事是在波克罗夫和弗拉基米尔之间的弗拉基米尔公路上,在篝火旁讲的,当时是夜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把车停在水渠那边,使发动机冷却一下,他们也趁机会吃晚饭。篝火驱走了蚊蚋,雾悄然降临到篝火旁,夜莺在弥漫的雾中啼啭,而雾里散发出一股铃兰气味。讲伊万沙皇故事的是一个修路工人,他是顺便讲起来的。工人们都安排好要睡觉了。可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想起坑洼不平的路,便对全俄公路大师楚多尔特兰斯有一肚子冤气,打算趁他不在的时候向修路工人们发发牢骚,请工人们抽支烟。结果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谈话。一个修路工人一边讲述伊万沙皇的故事,一边吸烟和吐痰。他是顺便讲起来的,是为了证实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而讲起来的。那个修路工人的穿着大概正是当年伊万沙皇的穿着,只是他比伊万沙皇瘦弱,没有伊万沙皇那样体面和好看,也没有那样的大胡子。

“苏维埃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我对你说吧,老兄,伊

万沙皇不知道它叫什么名称，他实际上最多不过是贫农委员会主席，弄不好是集体农庄主席。我和他是一个地方的，他幻想着在公正的劳动中所创建的公社。既然他搞错了，那么他只有同巫师和由于自己在森林里没有文化所起的沙皇的化名在一起了。”

夜莺发出铃兰气味。

汽车已驶入俄罗斯乡村。要想开好汽车，当一名优秀司机，开车时必须不去想你在开车。开每一辆车都应当这样。应当觉得汽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像自我的一部分。会开汽车——这是一代人以前在俄罗斯所没有过的一种感觉。驾驶汽车的人，真正的司机，不是老想着汽车，然而却一秒钟也不曾把汽车忘掉。他能感觉到每一个螺丝帽和点火装置的每一次启动与熄火，无论他的视线看往什么地方，他的思想跑到哪里，他都看得见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坑洼，而且单凭汽车的节奏就能看见它们。确切地说，他是掌握方向盘的司机，他看到的一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汽车的节奏在求出距离和景色的积分。握着方向盘可以很好地进行考虑、思索，求出思想的积分——求出速度、运行节奏和景色的积分。——经过一代人之后，一场最开诚布公、最深思熟虑的谈话将发生在两个开着汽车的人的旅途中，他们将同样拥有汽车的感觉。

在从莫斯科到帕列赫的途中，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思考着——这怎么说呢？——形象？艺术？他使自己的思想进入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里没有所需要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术语，因为概念——形象——是很不准确的。可以想一想国际象棋和汽车。从出现国际象棋之日起，作为一门手艺，向来就有许多棋手（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他们想制定只

赢不输的比赛规则，想制造国际象棋机。这些发明家们被遗忘了，但是卡帕布兰卡[①]、拉斯克[②]、阿廖欣[③] ——伟大的国际象棋作家——甚至伊林-热涅夫斯基[④]，都经常出错，当然，经常输棋——当他们空谈理论的时候——想必常常说出许多错话。倘若象棋机被发明出来，象棋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汽车发动机是数学积分学的天才研制出来的，而普通司机不一定要懂高等数学。决不能提议在艺术中使用象棋机，因为把艺术扼杀掉是得不偿失的。艺术就是发明，就是政治，就是爱情，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艺术的对象。所以卡帕布兰卡对象棋规则当然比年轻棋手了解得更多，他应该知道为他而制定的全部规则，并且为了在需要时运用这些规则，同时也为了破坏这些规则，制定出自己的一套规则，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像托尔斯泰，也正是由于此。了解和掌握不是一回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当美国司机，他知道了汽车发动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但他却不会制造。而美国人连发动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见过。美国人只开汽车，而且开得比俄罗斯司机要好得多，因为在美国大概平均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会开汽车是通过熟练的技巧和实践达到的。理论上了解——这还不等于实际上掌握。只有当掌握和了解协调一致时，才会达到真正的掌握。了解不应超过掌握，否则就成评论家了！……每一位作家每天要忽略许

---

① 卡帕布兰卡（1888—1942），古巴象棋手，世界冠军（1921—1927）。著有《我的象棋生涯》等书。

② 拉斯克（1868—1941），德国象棋手，哲学和数学博士（1902），世界冠军（1894—1921）。著有《国际象棋教程》。

③ 阿廖欣（1892—1946），俄国象棋手，世界冠军（1927—1935，1937—1946），俄罗斯联邦冠军（1920）。1921年移居法国。著有《我最满意的几局棋》、《通向象棋最高成就之路》等书。

④ 伊林-热涅夫斯基（1894—1941），国际象棋大师（1925），俄国革命活动家，评论家，《真理报》撰稿人。

多题材。每一位作家有时花几年时间创作同一个形象，平均一年写大约十页纸。在十年制学校里，在物理研究室里做这样一项试验：把铁屑撒在桌子上，拿一块磁铁放到它们跟前。铁屑开始移动，呈几何顺序，粘在磁铁上，彼此粘附在一起，变成有规律的形式。在把磁铁移近铁屑之前的铁屑，是一个过路的乞丐艺术家所看到、听到、感觉到和考虑到的许多现象和情况，是头脑记忆中的一堆破烂。产生了形象，形象就要工作，如同磁铁一样：从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的铁屑中筛选出所需要的东西，铁屑运动起来，进行分类，彼此相粘，变成形式，产生出形象。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所看到的，所深思熟虑过的东西重新回到记忆中，开始存在，如果形象需要这个的话。说什么从事生物研究的人被说服去搞文学创作，另一个将成为工程师，而第三个将成为音乐家，把音响当作现实生活——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可以教兔子学会划火柴，这也决不是无稽之谈。但兔子决不会因此而成为艺术家。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历史时代里，在这样的人类的个体（成为他的时代，他的环境，他的阶级的财产的个体）那里涌现出来的。当形象的磁铁被拿到想象和所感受到的东西的铁屑跟前时，了解才开始动作。要想使形象在纸上体现出来，那就需要本领。有时对一个新入伍的红军战士，甚至对一个大学生发口令："左脚走！"而他往往迈右脚，这是因为他想的是自己的脚。这就像司机一样，他开始计算，而不是感觉距离，就是说，他没有把意识转变为感觉，所以把车开到水沟里去了。一个作家对事物的掌握应该像司机会开车或者像不用思索就会迈左脚的红军战士一样。掌握是一个词。一个有重量、有前景的词，尤其是词的组合。词的组合决定句子的前景，不仅是决定句子词义的轻重程度，而且还决定句子感情色彩的浓淡程度。说——"他很快

走开了”，“他走得很快”，“他很快地走了”——这是三个在丰富的感情色彩方面不同的句子。在读古典小说时，一定要经常努力不要拿自己去替换主人公，就算是这个主人公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阶级的观点对于读者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被前景的规律所预先注定了的。每一部中篇小说中都有作者要从头做起的那个前景，那个点，读者应当从这个点去看艺术家的两个半直径的画。古典长篇小说对于读者来说一开始就左右了主人公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试试拿主人公来替代自己，既然只用主人公的眼睛就看得见，既然要从另一个地方来进行观察——这无异于坐在剧院里背朝着舞台。前景永远是线图式的，所以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应具有自己的线图——从一个句子到一个段落，从一个章节到整部作品——而且作者也应注意读者将会如何去读故事。有时，读者应当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坐在房间里，有时他应当从莫斯科关注帕列赫、哈萨克斯坦、夏西河和穆尔曼，关注东京和纽约。如果作者需要让读者着急，那么他可以在第一座高炉开炉时就把他派往库兹涅茨克建筑工地。——如果作者需要使读者放心，他可以在第一座高炉开炉一小时以后把他派往斯大林斯克，或者可以把他留在安静的莫斯科的长沙发上，而折腾小说中的人物，就像干部人员去影院看电影一样……但是语言是实用的。假如作者想要描写一位漂亮女人，给她取姓为什罗科诺索娃[1]，那么不管作者如何努力，读者决不会相信她的漂亮，这样一个姓氏将会把纸上的美人毁掉。假如作者将要用我们的记录用语描写森林景色——《森林的宗旨》、《小树林的对策》，那么结果必定只能是一个在印花布连衣裙上打呢子补丁的裁缝。决不能用资本主义的词汇去描写

① 意为“大鼻子”。

封建主，那样的话，封建主将成为又穿燕尾服又穿环甲的封建主了，并且环甲将会用作西服背心。描写农村运货用的四轮大车不能用汽车术语，四轮大车的年龄长于汽车，它有它的年龄语汇。读者决没有相信艺术家的义务。作者应当不仅用保证的话，而且要用证人的供词令读者信服。一部手稿。一位年轻作家。第一页叙述的是女主人公如何聪颖和非同凡响，这不是别人，而正是在第一页上就陶然心醉的作者本人，在第二页上，第四页上叙述的是女主人公又聪明，又漂亮，又不同寻常。而第五页上出现了女主人公，“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皂气味”，她坐下来，“跷起二郎腿”，说：“关于一个人应当更多地把时间抽出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体育上面抑或用在精神文化修养上面的这个问题对于我尚未解决！”对于读者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意义要重大得多——这是一个关于不聪明的不仅仅是女主人公，而作者也不聪明的问题。读者请求不要把作者的赞赏强加于他……形式——长篇小说、长诗、短篇小说、扬抑抑格、抑扬格，都是人为规定的，当然就像人为规定的女人穿裙子，男人穿裤子一样。我们莫斯科地铁的女工作人员把裙子脱掉了！……长篇小说的形式是艺术的人为的规定，这里边也有“愿上帝饶恕，愚蠢的东西”，也有小丑似的表演。一个演员，倘若他像公鸡那样叫唤，定会使孩子们感到非常惊讶，如果一旦孩子们弄清楚了像公鸡那样叫的不是演员，而是演员桌子下边真的公鸡，那么孩子们定会蔑视这个演员，因为他欺骗了艺术。作家应当使现实、真正的生活和真实联为一体。作者论证自己的情感不应用空话，而要用染上与真实相配的颜色的事实，以便使读者对它们有个道德的和实际的见解。因此，为了使读者在自己的见解中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和没有发现作者教训人的指示，那么作家就必须在艺术的人为规定中巧妙地周旋。读者从古典作家们

那里对作者的指示感到腻烦了。要想摈弃自己的指示，作者有时必须在读者面前把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有时需要给读者以自由，仿佛这是库普林、波塔佩科和其他几位他们的同时代人中的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革命前的时期所做的那样。以上被指名道姓的几位作家聚在一起，喝红葡萄酒，讨论艺术，讨论如何更好地塑造形象。他们决定当场描写弗里娜，描写她如何走进古雅典的最高法院，如何以自己的美貌使法官们折服，他们决定描写弗里娜的美貌。库普林把弗里娜描写得惟妙惟肖，犹如他描写的苏拉米菲一模一样——酷似一只大碗的肚子，酥胸、双眸、嘴唇、乌黑的头发。波塔佩科写了五页，头发是棕红色的，又是酥胸、面颊、手指、眼睛。他们写的时候，安德列耶夫在喝酒。轮到他读了。他拿起波塔佩科写的那五页，拿起一支红铅笔，统统勾掉，开始读道："弗里娜走进古雅典最高法院，他美丽得惊人，以致年老的法官们肃然起立，对她的美貌顶礼膜拜。"念完了，就这些。安德列耶夫赢了，因为有些读者更喜欢弗里娜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而另一些读者则更喜欢棕红色的，但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读者的这个自由是不存在的。八十年代的一些俄罗斯作家运用惯常的手法迫使女主人公害肺痨病，据说是富有诗意的病，脸色潮红，娇慵无力，永恒之风，可是医生们读了这些关于"富有诗意的"病的段落，却捧腹大笑，因为八十年代这些作家们描写的肺痨病，像有些当代作家对"伯爵"和"公爵"的描写一样。在对公爵描写中的无知，如同对肺痨病的描写一样，真是谬误百出。

日落。太阳的斜辉。发动机的机心像怀表一样跳动着，与思想融为一体。汽车开始攀山了。任何地方，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无论在欧洲，无论在美洲，无论在亚洲——都没有这样的景色，没有像从山丘上放眼望去的俄罗斯中部这样的景色，

绿油油的田野，辽阔的地带，小溪，远处的村庄，日落时金灿灿的斜辉和恬静。

古典长篇小说的人为规定根据一系列原因——首先决不是根据审美的原因，培育了对大自然的描写。俄罗斯古典长篇小说如果不说是神秘的，那么也是泛神论的。古典小说的人为规定中，要求有对大自然的描写是为了使小说根植于“土地”，“与土地、大自然、宇宙联系起来”，“与封建领主联系起来”，以便使小说像现实生活一样“来自于土地归于土地”，以便使小说中的大自然（暴风雪和海燕）平息下来或者迫使其狂吹起来。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对大自然的描写当然是神秘的。优秀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写出了优秀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可是读者唾弃了肖洛霍夫对大自然的一切描写，——这些描写被肖洛霍夫从俄罗斯古典小说中机械地搬到了肖洛霍夫小说叙述部分中社会主义的内容里。

不！形象不仅仅是有重量的、有前景的、持实用态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也一定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可以拿托尔斯泰，拿《战争与和平》为例，把书放在左边，把一张白纸放在右臂肘下边，从第一页，从对国际政治和库拉金封建把头式的悭吝的封建的谈论中把托尔斯泰人物的所有本能和促进这些本能的各种情况摘录下来，——本能、情绪、感情，叫什么都一样。从第十页起将要开始出现某种顺序，只消在下边加上小木棒，便可做出统计。小说结尾时所有的本能都知道了，利用了这些本能的不惟托尔斯泰的人物，而且还有托尔斯泰本人。人的本能，人的感情是从原始的人，从猿猴类，从动物状态的时期经过许多世纪而积累形成的。它们从那时起便在逐渐改变。社会的本能从人拿起粗木棍的那个时候一直积累到现在。它们经历了中世纪的觉醒，经历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它们积

累过，生存过，消亡过，它们又重新产生了，活在我们身上。一些石器时代的本能好不容易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的本能。然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还非常年轻。本当举出许许多多我们的作家，包括党员作家，把他们的小说放在左臂肘下边，就像放《战争与和平》一样……如果一个作家想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作家，成为真正有共产主义感情的人，并且只有到那时才有能力创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小说的话，那么让作家撇开觉悟去检验一下自己的本能吧！……

苏联俄罗斯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历史，完全合乎规律的历史，也有了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文学使个人的命运退居到应有的未来情况中。显然，阶级的命运是伊万们和伊万诺维奇们、单独的个人们的有重要意义的命运。当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来到新的地方，来到新的住宅时，他们希望把东西按地方分别摆好，想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文学是特写的和有认识功能的。阶级开始改造国家。一个最最不得了的，最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便是国家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一座城市，对这些村庄和城市又不加以改建和重新建造。当田野里开始有机器操作和工厂生产的熟练技巧时，粮食的收获和围绕粮食的劳动才得以改造。把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工厂、石油、钢铁、煤炭、化学、纺织重新得以改造和建设。从前的历史创造者们的阶级连同它的经济结构、知识、道德、美学一起消失了。这比任何充满浪漫情调的杜撰都更加值得注意。《消息报》第一版比第三版底栏刊登的轻松读物更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时代的长篇小说选择了原始的河岸、住着僧侣的蛮荒的密林，或者有扎波罗热传说的草原。人们来到那里，于是在那里兴建工厂，而且事物和对事物的态度把人们改造成了共产党人。长篇小说选择了“令

人神往的俄罗斯的”农村，在那里建起了集体农庄，拖拉机开到那里，于是那里建起了育种场，而且拖拉机和对拖拉机的态度把人们改造成了共产党人。对人们的改造体现在阶级斗争中。从前的历史创造者一边在渐渐毁灭和死亡，一边去动刀子打架，饿得沿村乞讨，像被添加在新机器上的螺栓一样多余而无用，作家们描写了这种破坏活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古典小说中的人为规定被搬到了我们现代。小说中有主人公——共产党。小说中有“反面人物”——从前的阶级，破坏分子。根据文学发展前景规律的实质，这种结构是不真实的。主人公成了党组织书记的化身，一个人担负起有着千百万党员的政党，把政党融于自己个人的特征之中，从而在千百万党员中失去自己的面貌，破坏分子变为反面人物，这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

这对于文学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司机要成为真正的司机，只有当他们已经开车行驶了许多小时，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思想远离他们正在行驶的道路，远离方向盘时，因为东西——汽车、发动机、发动机的节奏和运行——还有他，司机——都是一回事。于是生活开始了。

（在伊万诺沃，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在伊万诺沃旅馆的摩天大楼里住了一宿，去了机场，伊万诺沃的企业在这里迎接从莫斯科飞来的宣传鼓动飞机“真理号”，后来同州执委会主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去了一趟未名湖。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会谈到。）

他们快到傍晚时来到帕列赫。出行未名湖，夜间谈话，在伊万诺沃火车站接妻子和孩子以及保姆，以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过去的一夜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帕列赫，给他们预备好了澡堂和农民的房子。房间里摆着铃

兰。日落时，夜莺开始啼啭，就在窗户跟前。夜莺的叫声和铃兰的芳香混在了一起。意识头一次在生活中以春天，以世间的仁慈把铃兰和夜莺并列起来。他们一路劳顿，太阳刚一落山他们就躺下了，这时夜莺睡醒了。关于夜莺和铃兰的思想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最后一个思想。夜间，特殊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有许多不知是什么活物在房顶上奔跑。于是童年时代立刻浮现在脑际，占据了全部意识。在莫斯科和世界上那些大都市后面，在高层楼房里，这个声音，从童年起就熟悉的声音，被遗忘了。无数的雨点汇成水流，在农民木屋的铁皮屋顶上流淌。窗外是夏天，呈现出一片绿色。房间被磷光照得通明，这磷光仿佛是透过墙壁射进来似的。房子上空响起阵阵愉快的雷声。雨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屋顶。夜莺在啼鸣。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房间里，湿润的铃兰发出馥郁芳香，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夜莺婉转啼鸣。这一切令人陶然心醉。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什么时候？……

萨拉托夫。萨拉托夫第一中学。一年级。在学校里，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中流行着酷爱玩翎毛的风气。中学生的口袋里装的净是翎毛，“拿破仑式的人物”是玩翎毛的英雄，不能使翎毛倒栽下去。他们在课间休息玩，在课堂上也玩。他们经常被班级训导员抓住。一个绰号叫佐季克[1] 的班级训导员经常把翎毛没收去，强迫学生把口袋翻过来。为了杜绝祸害，佐季克把翎毛，有好几百支翎毛统统投到炉子里付之一炬，从以前各届中学生留在那里的翎毛算起，想必现在已经有几千支翎毛了。一年级学生凯勒尔，后来叫阿尔别科夫，跟一年级学生舒霍托维奇商量好了。在第一次课间休息时，舒霍托维奇告凯勒尔的状，

① 意为“伞”。

说凯勒尔打了舒霍托维奇，于是，训导员把凯勒尔留下来一个小时，不许吃饭。第二次课间休息时，凯勒尔告舒霍托维奇的状，说舒霍托维奇打了凯勒尔，于是训导员把舒霍托维奇也留下来一个小时，不许吃饭。放学以后，凯勒尔和舒霍托维奇双双留在了教室里。讲台搬到炉子跟前。课桌搬到讲台上。舒霍托维奇爬到课桌上。凯勒尔爬到舒霍托维奇身上。于是，凯勒尔站在炉子上，身上沾满了灰尘、纸箭和许多翎毛。这时佐季克就站在门槛上。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还来了两个看守人，凯勒尔扶住两个看守人的手从炉子上下来。过了一刻钟，他们来到设在厢房里的学监办公室，等待学监出来，舒霍托维奇在哭鼻子，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雷雨，电闪雷鸣……

1935 年春天，在全苏联，完全中学十年级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这是自 1917 年以来在苏维埃时期出生和被造就出来的少男少女的节日，是一个人成长和成熟的节日……下诺夫哥罗德，1913 年，毕业生班——“中学应届毕业生”。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

“真是什么也没干，那就好好听讲！放学后留半小时，不许吃饭。”

这是二十二年前的事！……这段对话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这段对话一星期重复大约两次，所以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感到奇怪），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喜欢“应届毕业生”凯勒尔，所以经常“逮”他——当时有这么个词儿。于是凯勒尔留校半个小时，“不许吃饭”——一星期大约留校两次。凯勒尔后来成了作家……一块儿的同学费奥多尔·博戈罗茨基后来成了艺术家，谢尔盖·普列捷琴斯基成了小说家，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阿尔谢宁·米特罗法诺夫成了诗人，

他们还和许多同学一起组织了文学小组，出版手写杂志。普列捷琴斯基和凯勒尔在《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文学小组的成员经常读莫斯科报纸和厚厚的杂志。于是实科中学学生凯勒尔被叫到一间特别黑的办公室里去见学监茹德罗。办公室的墙壁让人觉得可怕，不亚于长得像甲虫似的茹德罗本人。茹德罗说：

“谢尔盖·凯勒尔，据说你在写作，是吗？”

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是一所不入流的学校，阿尔别科夫在这里读“普通”学科，他是因为玩翎毛和嘲弄不许吃午饭的惩罚制度而被开除出萨拉托夫中学的，他是为了扬善和主持正义而离开了博戈罗茨克实科中学的。就是说，凯勒尔当时已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

于是他两手垂下，贴着裤缝，对学监茹德罗回答说：

“是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在写作。”

“你写的是什么？”

“我在写微型小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打算以后当作家。”

“我还听说，你把自己的小说拿到《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去发表，好像你还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是吗？”

阿尔别科夫目光泰然地撒了个谎：

“不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班级训导员还向我报告说，你，凯勒尔，在吸烟？”

阿尔别科夫的眼睛变得恭顺了，小声而悔过地回答说：

“是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吸过几次。”

茹德罗由于意外而沉默了片刻。茹德罗对这直言不讳的坦白做出了评定。茹德罗说：

“你既然吸烟，那你就吸吧，再过一年你就是大学生了。但

是如果你被训导员或者学监碰上，你的品行就只能得三分。如果，”茹德罗脸色阴沉下来，“如果我再听说你写小说和到《下诺夫哥罗德小报》去刊载，——你将被开除。应该好好改正！……”

像在帝国所有的中学一样，在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晚上八点以后禁止离校到外面去。学生只有根据检查机构的简要通告才能去影院和剧院。实科中学毕业那天，毕业生和大学老师才平生第一次在一起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甚至同中学老师生平第一次逛了妓院。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的班级、课桌、数学课令人永志难忘。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

“什么都没干，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

“你要好好听讲！留校半个小时，不许吃饭！……”

一个法国人，按民族是瑞士人，说：

“哎，亲爱的，您没有把功课学会吧？——如果我给您打零分加皮鞭，这就足够了吧?!”法国人满足而温和地眯起眼睛。一年以后，各家报纸对这个瑞士籍的法国人做了报道，他由于刑事追诉从俄国逃走了，因为他是鸡奸癖者和学生们的教唆犯……

从那以来经历了怎样一个时代啊！……帝国用世界大战猛烈射击自己的制度。十月革命一边把帝国连根除掉，一边向企图把十月革命淹死在它自己的血泊之中的十四国开枪回击。1935年春天，一批在1917年尚未出生的青年男女学生中学毕业了，他们是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受胎和出生的。在这些年里，阿尔别科夫从一个幼稚的少年渐渐走向成熟，并且在从前的学生凯勒尔的位置上出现了两个新的凯勒尔——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学的学生。从前的学生凯勒尔曾

是个难管教的孩子，他从萨拉托夫转到博戈罗茨克，从博戈罗茨克又转到下诺夫哥罗德并不是偶然的，他能够中学毕业才是他命中偶然的。那时还不能断言凯勒尔将来能够成为作家阿尔别科夫，但是这小男孩从小就训练自己写作，正是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学校来说是最难办的。现在儿子和女儿都长大了，儿子比女儿难管教。甚至大概比父亲还难管教，即使是因为与老凯勒尔不同，他没有给自己定出任何目标。他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刚刚十三岁的小小年纪就想出歪点子，就对读书抱着至少是无所谓的态度来气父亲，对所有的体育项目却了解得非常清楚，他经常旷课，利用旷课时间到方圆很远很远的科洛姆纳郊区参观，对郊区十分了解，而对在科洛姆纳十年制学校所学的各门功课却知之甚少，以致有一次在父亲家里接待作家们时，他竟然向父亲提出这样一个请求：

“爸爸，你什么时候把普希金邀请到咱们家来喝茶该多好啊！……”

父亲把儿子从蒙昧的科洛姆纳乡村接走了，把他转到莫斯科第二十五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任职的是一位女校长，姓格罗扎[①]，这个姓对儿子很合适，《消息报》也经常在这里进行辅导，当然不是来教训学监茹德罗和他对报纸的一般态度，特别是对《下诺夫哥罗德小报》的态度。父亲在社会崩溃与兴盛的那些岁月里对学校不持任何态度。他通过孩子们的眼睛重新看到了学校。一般说孩子们在重复生命，迫使人既变得年轻，又看到往事。父亲通过回忆，通过女儿和儿子的眼睛把两所学校加以对比。父亲当年被吸引参加了学校的社会生活，按照十月革命前的传统，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因为只有到健康蓬勃的童年

① 意为“大雷雨”。

的精神从“学府”中消除掉时，学监茹德罗才准许家长的精神进入“学府”。

这一切发生了多么大、多么引人注目的变化啊！应该想什么呢？想学校有自己出版的周报，老师和学生同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作品，编辑部关心学生们发表的作品？……应该想什么呢？是啊，这所学校的学生与二十五个民族——从美国的中学生到北极地区的中学生保持着通信。

> 科尔古耶夫岛，学校。
>
> 你们好！现在所有的涅涅茨人都加入了劳动组合。他们在一起捕猎。鹿不在一起，鹿应该在一起。涅涅茨人都住在圆锥形帐篷里，过着游牧生活。涅涅茨人在红色帐篷里学习，涅涅茨女人，女孩子们不上学，她们明年将开始上学。这里有通讯社，有医院。学校开办一年多了，有二十六名学生，分两个班。我们学习了关于列宁的劳动组合，关于红军，关于巴黎公社，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学习了在有资本家的地方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这里有墙报，有广播，有影院。学校里有少先队员……

这是信的一部分，是科尔古耶夫岛的学生们用德语写的，是二十五中学的一名学生写的。一名澳大利亚悉尼的学生阿兰·沙茵在信中写了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写了关于澳大利亚铁路根据新闻检查机关的英美的老惯例拒绝运送共产主义报纸，“因此我们很难在墨尔本收到这些描写共产主义的报纸……上个星期，国家政权机关把所有的《工人周报》都没收并销毁了……”

从印度，从浦那市写来了信。纽黑文的特罗戈蒙学校从纽

约州往美国钢铁公司写信和寄礼物给“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从哈萨克斯坦的别尔恰库尔车站写信说：

“我们，别尔恰库尔学校的学生，给你们寄去我们衷心的问候。寄往遥远的莫斯科……”

1913 年！——帝国的三百周年和最后一年！……凯勒尔的青年时代，一场场风暴，一次次曙光——总之青年时代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弄明白，什么都想汲取！……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奥沙尔大街住着一位法国女人，说着满口法国腔的俄语，当她从旁边走过去时，实科中学学生用手指着她，不作声，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外国女人，对她毫无了解，因为在这个外国女人的形象后面想象出遥远的、令人不解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一无所知，如同应当去幻想这些国家，如同对某些无法实现的事情进行幻想一样……青年时代，一场场风暴，一次次曙光！假若凯勒尔当时可以往科尔古耶夫岛、墨尔本、纽黑文写信的话，他的一生大概会是另一种安排吧？……印度人克海夫 1934 年 1 月 15 日从浦那市写信，其中说：

“罢工失败了，因为主宰者把工贼带来了。那些工贼都是伊斯兰教徒，对我们佛教徒怀有仇恨。他们在孟加拉的所有地主都是佛教徒，所有他们像憎恨阶级敌人那样憎恨我们。而在我们这里，在孟买省，所有的警察都是伊斯兰教徒。英国人，印度的主宰者，利用了宗教纠纷，并力图唆使佛教徒迫害伊斯兰教徒。但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这一勾当得逞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和孟加拉人结为了兄弟……

当时，这个时期之前，实科中学学生凯勒尔对印度的概念是从英国保守党党员吉卜林[①] 的长篇小说中，从描写被欧洲封建主从神秘主义中恢复的瑜加宗的书籍中形成的，——印度是魔法师和巫师的国度，这些魔法师和巫师能够遥视人的思想，用针扎自己，经年辟谷，凭着个人的意志随便多少次死去和复活，印度是这样的人的国度，他们一点儿也不像欧洲人。假若那时阿尔别科夫读一读印度人克海夫从浦那市发出的信就好了！……的确，“所有的涅涅茨人现在都加入了劳动组合。他们在一起捕猎。鹿不在一起，鹿应该在一起。涅涅茨人都住在圆锥形帐篷里，过着游牧生活……”涅涅茨的中学生所写的每一句话难道不是摆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吗？摆在地图上和社会历史书架上的每一句话难道不会在小凯勒尔的记忆中永远变成一种现实的感觉吗？他和同学们一起收到这封信，一起给科尔古耶夫岛的同学们写回信，当别尔恰库尔的哈萨克学生收到关于他们的莫斯科同学的情况通报时，莫斯科对于他们真的是那么遥远吗？可是在二十五中学，在凯勒尔第二的学校里，这封通信决非偶然情形，甚至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认识，而是革命前帝王“古典”中学最枯燥最无意义的科目的教学法——地理教学法。

茹德罗说：

“好吧，如果你吸烟，那你就吸吧，但是如果你被碰见，那么你的品行只能得三分。”

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放学后留半个小时，不许吃饭！”

---

①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吉姆》等。

小阿尔别科夫是个不省事的孩子。茹德罗和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帝国“纪律”的“创始人”。二十五中学曾经有两个学生。战时人们的大批死亡和饥馑，无家可归和失去父亲的放纵散漫使我们的许多孩子以到美国和印度去流浪的幻想代替了对胜利的幻想。这两个学生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偷东西，殴打同学，在班上发号施令，征收作为电车费的贡品。他们觉得需要旷课就旷课，——他们俨然像封邑的公爵那样当起了封建把头。当这件事暴露以后，家长们和教师们进行了干预。家长们提出采取旧传统的机械措施——把危害分子开除出学校。班长不同意这个措施。召开了全体同学参加的班会，同少先队辅导员进行了最诚挚的谈话以后，向“危害分子”提出了写日记的建议，让他们把自己的纪律情况记录下来。他们也同意了这样做。孩子们必须每天把日记拿给家长、班主任和辅导员去看。措施开始生效了，而且非常快地生效了：写日记和撒谎比撒谎和打闹更难，写日记需要付出努力，而且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思考才能写出来……学校里最招人的地方之一是教导处主任办公室旁边的黑板。这块黑板上有非常多的红色和蓝色小旗子，这些小旗子是表扬各班的情况和生活、学习成绩、纪律、比赛、少数几个优等生和差等生、学校里的各种小组，如文学小组、音乐小组、戏剧小组等等，……法国籍瑞士人和刑事犯在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说：

“您的功课很糟糕，我的朋友，您认为我会给您打怎样一个分数呢？您不认为，假如我给您打零分加皮鞭将是大好事吗？不是这样吗？那么我就给您打这个分数！”

瑞士人很幸运。以《消息报》命名的二十五中学把“提高老师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水平、掌握所教给学生们的材料看作是争取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按照二十五中学的观念和传统，

学生得零分不能怪学生，而要怪老师，而且学校把学生百分之百升班视为自己的骄傲，在标着红色和蓝色小旗子的黑板上对他们予以表扬，并且除了红色和蓝色小旗子之外，根据学生们的体质，还有黑色小旗子，在学校事务的实际情况中，这种黑色小旗子是不存在的。小凯勒尔刚转到二十五中学时，第一学期各门功课都不及格，他对这样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按照科洛姆纳的传统，他没有因此表现出不安。第三学期，他只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并得了一个“良”，甚至两个“优”，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由于自己的分数和学校的情况，他好像确实表现出了健康向上的激情，收集了大量的书籍，指望带到夏令营去阅读。

那么女儿怎么样呢？……他们其实是对的：当批评家由于自己的职业老是吵架时，关于优秀的、理性的、纯朴的东西写起来往往很难，没有可写的，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枯燥无味的，假如写一写原生的东西，或者写一写愚蠢的东西来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那就完全不同了！……一月份，女儿希望父亲给她弄一套去年全年的《消息报》，并坚决要求他不要动她的《共青团真理报》。二月和三月，她把父亲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都给挑去了。四月里一天，天已经很晚了，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那天晚上，她去共青团区委会通过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她从预备团员转为正式团员。当时只向她提了三个问题：关于基辅-沃洛涅日铁路的出售，关于艾登[①]和拉瓦尔[②]的来访，关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因。

① 艾登（1897—1977），英国保守党人，曾任首相、外交大臣等。

② 拉瓦尔（1845—1913），瑞典工程师、发明家。

“在斯特雷扎召开的欧洲部长会议之前签订过什么协议?”

“苏联和法国之间关于在战争中互相帮助的协议。”

“好的。”老共青团员们说,“你怎么评价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呢?你看,要是德国人不进攻我们而进攻法国的话,那么你,一个共青团员,在这种情形下将会做什么呢?”

“列宁教导说,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斗争,为国内战争。”

女儿那天晚上很激动。她回到自己房间,久久不能入睡,把许多书摆在身边,死记硬背学校的考试。这对于永不停顿的青年时代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把一些事物抛开,面对新的事物,青年时代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搞明白,什么都想汲取。天已经很晚了,父亲来到女儿房间,想再问一问,——他说,那么,苏联以卡拉汉[①] 的照会于1920年拒绝了租让合同和不平等条约之后,没有拒绝出售基辅-沃洛涅日铁路吗?为什么?

女儿说:

“爸爸,你走开!”

“你在写什么?”父亲问道。

“写日记。你走吧!……”

青春真好!……五月三十日是十年制学校学生毕业典礼的日子,是新人,新一代收获的日子,是人们创造的、从童年时代迈向少年时代和步入生活、迈向新的知识和新的工作的日子。青春年少的男生和女生个个都衣着漂亮、喜气洋洋,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他们和同样也穿着漂亮衣服、喜气洋洋的老师和家长们一起来庆祝朋友们和苏联两代人的友谊的这一喜庆日子。学生、老师和家长吃肉馅烤饼、大米馅烤饼和甜食,喝茶

① 卡拉汉(1889—1937),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现实生活面前，大馅饼是我们苏联命运公有的大圆面包。五月三十日晚上，莫斯科还下了一场如注的、令人开心的大雷雨。

是啊，新的一代，十月革命，1917年，对于新的一代是生日的分界线，是历史，是存在，在这一存在中当时还没有它，这新的一代。

在孤寂和夜阑人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是用谈话来思考，而是用感觉。譬如，阿尔别科夫就是用感觉思考自己的青年时代和自己的子女。假如有人叫住他，问他在想什么，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房子上空又响起一阵隆隆的雷声。夜莺在啼鸣。铃兰发出馥郁的芳香，盈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夜莺婉转啼鸣。

其实，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竟没有发现我们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像我和我儿子的学习那样发生了变化。

天渐渐亮了。在酝酿着雷雨的乌云下，东方完全是暗红色的。插着荚蒾花和铃兰的两个高水罐摆在昏暗中的桌子上。荚蒾香气淡雅，没有铃兰那样浓郁。荚蒾开花是一串一串的。每一串上面，在每一串的边缘上，都开着看得出来的、漂亮的、洁白的、星状的花朵，而在这些花朵后边，在每一串的中部却开着不同的花，这些花非常小，轻易看不出来，但它们的雄蕊和雌蕊长得很长，远远地伸展出来。如果仔细地闻一闻，那么就会发现，漂亮的星状花朵和生着雄蕊轻易看不出来的小花发出的香味不同——雄蕊的香味刚刚能闻到，而且只有靠近才能闻得到。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么就会发现，那些看得出来的漂亮的花朵是不结果实的，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诱惑物而已，能结出果实的是那些轻易看不出来和发出淡淡芳香的小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特别认真地观察着荚蒾花，原来轻易看不出来

的小花的香味更怡人，更持久，更高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大雷雨刷刷地倾盆而下。夜莺听不见大雷雨，它在啼啭，没有注意打雷……

到了秋天，荚蒾会结出苦味的果实。自阿尔别科夫实科中学毕业以来，轰轰烈烈的生活过去了。阿尔别科夫的童年是在县里度过的，他记得封建的俄国，俄国的乡间土道和警察，地主和农民，三区轮作和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大学时正值莫罗佐夫家族①、里亚布申斯基家族②和弗托罗夫家族③的鼎盛时期。革命已经结束了，阿尔别科夫在从东京到洛杉矶的土地上认识到倘若没有1917年的革命，俄国的莫罗佐夫家族-弗托罗夫家族结果会是什么样。他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写了许多书。而在这一切背后却有一种不可宣扬的实质的生活，——童年、少年、成年，前面是老年。在这不可宣扬的生活中有爱情，要生儿育女。实际上，在男人的天性中大概有两个爱情播种期——春季和日落前。阿尔别科夫在春季生育期成熟了，生养了两个孩子——长女和长子。后来有十年没有生育，归根结底是因为跟女人没有爱情生活，不需要她生孩子。后来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婚后一年生下一个儿子，这是爱情的播种。阿尔别科夫和这个女人的爱情的播种是如此完美、壮丽和充实（没有别的语言可以形容），这不仅仅是从前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也是没有料想到的。可以说句玩笑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离开莫斯科来到伊万诺沃，就是为了在伊万诺沃车站迎接妻子。他还接了她们和早晨六点钟到达的列车。他抱着儿子离开车厢，来到汽车跟前，并且为了爱护儿子，他行驶时绕开路上的每个坑坑洼

---

① 俄国资本家、纺织企业主。
② 俄国企业主和银行家。
③ 俄国金融寡头的代表，拥有弗托罗夫父子公司及许多工业企业等。

注。

农舍里，铃兰馥郁的芳香令人昏然欲醉。夜莺的啼鸣很像铃兰的气味。铃兰旁边摆着瓦罐，里边插着荚蒾花。儿子在隔壁的小床上睡觉，床是绑在汽车顶盖上从莫斯科运来的。父亲走到儿子跟前。儿子在睡觉，把小被子登开了，两只小胳膊张开着，——这个人类的和父亲的躯体的小小一部分。父亲俯身看着儿子，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小脑袋由于熟睡而湿乎乎的。儿子呼吸轻微而均匀。雷声隆隆作响，小雨淅淅沥沥。世界的仁慈，感谢世界与生活，庄严、纯朴、美丽、复杂，——比夜莺、铃兰、荚蒾和大雷雨更加庄严、美丽和鲜艳，更加安详，——充满了父亲的意识和感觉。这是生命、出生：爱情的感觉。这像生命一样完美和有充分价值。这是孩子的感觉。无论是铃兰，还是夜莺，抑或荚蒾——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感觉中的组成部分。

在伊万诺沃，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去了机场，后来他们和阿格耶夫驱车前往未名湖

机场上人山人海。飞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了几遭，徐徐降落了。参加飞行的二十七个人走下飞机。正在进行群众大会。飞机把最受尊敬的伊万诺沃的工人们载上天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观礼台上。

今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莫斯科，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发生了一个急人的场面。儿子没有按预定的时间，提前把头探进父亲的房间，小声说：

“爸爸，你大概已经不睡了吧？大家都到齐了。你给罗伯特·彼得罗维奇或者杰伊奇同志打个电话吧。”

"还刮风吗？天上有云彩吗？"父亲问。

"没有云了，风也不大，"儿子回答说。"我想，这小风会停的。"

"我这就打电话，"父亲说道，并给图申机场航空俱乐部主任马尔克·谢苗诺维奇·杰伊奇打了电话。杰伊奇同志说，风不大，可以飞行，但未必肯让小儿子去飞行，他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岁。这天早晨，阿尔别科夫的儿子和朋友们被允许参加飞行，这是父亲对他们的馈赠。父亲也照例向马尔克·谢苗诺维奇·杰伊奇和罗伯特·彼得罗维奇·艾德曼为孩子们请准了这件令人高兴的事。父亲对儿子说，他，儿子和飞行爱好者们，未必能飞行成功。儿子安静下来，情绪低沉，保证说，他并不是那么想要飞行，倒是很乐意观看别人飞行，但在路上他央求父亲说：

"爸爸。也许我们到罗伯特·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一趟吧？说不定他会允许我飞行的，如果杰伊奇不允许的话？"

艾德曼的别墅坐落在通往图申机场的途中。父亲想象得出来儿子的脑瓜里在想什么，于是破了戒——为了替儿子说情，驱车前往艾德曼的别墅。罗伯特·彼得罗维奇没有干预杰伊奇同志的指示。但说服他们飞行结束以后到他的别墅来，谈谈感受，一起吃早餐，打排球。他们乘 K-4 在空中进行了飞行。马尔克·谢苗诺维奇还是心疼小阿尔别科夫，对他说：

"哎，小家伙，赶快上车吧！……"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孩子们依次被载上天空和着陆。杰伊奇和阿尔别科夫坐在汽车跟前闲聊天。一架架飞机在天空做日常飞行。一队拉载的马走过去了。"真理号"安特-14 飞过去了。从中心机场，从泛着银光的针叶林后面，"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出现了，渐渐爬高，在图申上空，在杰伊奇和阿尔别科

夫的头顶上空转弯了，向莫斯科飞去。有两架歼击机在“马克西姆号”机翼的左右两侧飞行。左侧的歼击机渐渐飞离开去，右侧的歼击机开始翻跟头。

“我不喜欢这种把戏，用不着这么近地绕来绕去翻跟头，”杰伊奇同志望着天空，不急不忙地说。

这时，右侧的歼击机停止翻跟头，突然升高到“马克西姆号”上面，朝“马克西姆号”左翼的根部撞了一下。“马克西姆号”猛一震颤，摇晃了一下，仿佛想要把歼击机从自己身边甩掉似的。“马克西姆号”向右翼倾斜了。恐惧没有马上出现。觉得还有希望，还抱有出现希望的强烈愿望。在“马克西姆号”上方冒起一股黑烟。一切都从意识中消逝了——天空、天空中其他飞机、大地，脑子里只有“马克西姆号”，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定要努力，不要坠落下来，不要使机头栽进地里，不要看见这是如何发生的，不要发生这种事，要制止住，要防止发生这毫不意义的事。这是恐怖的感觉。“马克西姆号”渐渐坠落了，“马克西姆号”在空中断裂了，散成一个个碎片。“马克西姆号”一片片地掉到地上。自己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了。为孩子们而高兴，因为他们刚刚领略了最宏伟的、人类所创造的最庄严的场面，领略了对天空的胜利，他们刚刚在空中飞行过，——为孩子们而高兴变得微不足道了。人的天才，人的本领，人的意志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真的，如果可以防止无谓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马克西姆号”坠落在森林后面了。坠落的时间从时间的进程中除去了，——这可以成为永恒，但这只有短短几秒钟。杰伊奇同志的动作变成了机械的动作。杰伊奇同志坐进自己的汽车里。孩子们的面孔变得不认识了。孩子们爬进汽车里。

当汽车拐弯朝艾德曼的别墅驶去时，阿尔别科夫才感觉到

汽车在运行。这时已经知道了：不，不，不，人的天才是不可战胜的。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应当再摆出一架新的“马克西姆号”，一架更好的和更大的，可是驾驶员、机械师、人们呢?！……荒谬，意外的荒谬！意外的情形！荒谬之极！……人们啊，人们！亲爱的同志们！……艾德曼是航空指挥官之一，他可以不看见飞机坠毁，但他必须了解它，他现在就应当行动起来，此时此刻！……

艾德曼不在家，他到邻居家的别墅去了。阿尔别科夫用拳头敲起门来。朋友们在饭厅里。

“马克西姆号”的坠毁大概在阿尔别科夫的脸上表现了出来，因为大家对阿尔别科夫的话还没有弄明白，就朝他走过来。阿尔别科夫喊道：

“罗伯特·彼得罗维奇，‘马克西姆号’刚才坠毁了，五分钟之前。我们赶快去吧！”他又说了一遍：“刚刚坠落，坠毁了，‘马克西姆号’！……”

恐惧感从阿尔别科夫的脸上转到了人们的脸上。艾德曼变得动作利索了，像杰伊奇，像机械一样。原来，艾德曼没有汽车。阿尔别科夫让孩子们下了车，让艾德曼坐上去。

于是，汽车开始全速疾驰起来，汽车向森林驰去，向乡间土道驰去，向公路驰去，但无论是森林，还是乡间土道，抑或公路都看不见。公路上，人们在奔跑，“马克西姆号”坠毁了，碎片散落在好几个街区。“马克西姆号”的机械装置及其主要部件落到一栋房子上，把房顶砸塌了，悬在了房子上，房子被堵住了。消防队已经赶到，红军部队也来了。在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性。消防队员们从飞机残骸中抬出一具具尸体。红军战士封锁了坠毁现场。红军战士面朝一堆钢和铅的残片列队站立。有时命令他们：“后退五步走！”红军

战士们向后退去，一边推开站在他们后面的人。

伊万诺沃机场上聚集了大约十万人，个个身着节日盛装，还有各工厂自己的乐队。人们非常快乐和友好，说着令人振奋的话。曾是“马克西姆号”坠毁的见证者“真理号”，把受尊敬的无产者带上蓝天。阿尔别科夫在思索“马克西姆号”的坠毁。群众大会结束以后，阿尔别科夫和阿格耶夫在日落之前，在黄昏之前，驱车到湖上去，伊万诺沃的负责人员经常驾车到那里去钓鱼，点燃篝火，偷听大自然、日落和日出。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湖，荒凉，寂静，湖水清澈。茂密的森林中间的通道是到湖上去的必经之路。湖岸上支着帐篷，那里住着一位老爷爷，这在荒凉的湖岸上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按民族，他是鞑靼人——看来是个独身者，就像密不通行的森林中的湖泊一样。湖岸边停着一只摩托艇和两只皮艇。松树下边有一块生过篝火的地方。伊万诺沃是一座工厂和无产者的城市，是俄罗斯的工业城市之一。阿格耶夫是伊万诺沃州执委会、伊万诺沃苏维埃主席。今年春天伊万诺沃苏维埃庆祝了十三周年纪念日。在伊万诺沃，工厂烟囱林立，高耸云天。

（下面会讲到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历史。）

阿格耶夫在荒凉的湖岸上休息。老爷爷大概出生在森林里——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森林居民。阿格耶夫大概想在这里的森林中做一个像老爷爷那样的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脱掉上衣，卷起袖子，把一只皮艇推入水中，坐了上去，打算让侄子也坐进来，笨拙地动弹了一下，皮艇一摇晃，灌进水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脚还在船上，但他本人已经坐在水里了，他索性跳入水中，朝岸上走来，他非常开心。在老爷爷这里，找到一条没有穿过的红军战士的棉裤。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穿上了棉裤和干爽的上衣。篝火上方挂着阿格耶夫

湿淋淋的东西、内衣、裤子和皮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光着脚，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窃听者，而且也是大自然的事务的参加者。大家都在篝火旁坐下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时想讲一讲，并且讲述了关于“马克西姆号”的坠毁和他白天在机场上时那种喜悦感。当时，他为那些坐在飞机上的人，为那些亲身体验到自豪的人而高兴，因为他们接触着不仅把思想，而且把物品也带到天上去的天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发现自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在湖边讲述“马克西姆号”和“真理号”时，他才为自己的孩子们感到高兴，因为在“马克西姆号”坠毁时，他们正在天空中。

六月里，霞光与霞光相遇。湖上的夜晚渐渐过去了。湖那边起雾了。在淡白的天空下，湖水显得那样深不可测，仿佛天空一样。一只猫头鹰从松树之间飞过去了。松树挺然不动，倒映在水中。湖对岸大雾茫茫。

人类的交通工具是腿，自己的和马的，假如人骑马的话，雪橇和大车，火车，轮船，汽车，飞机，——假如设想一下，人的工作结构可能是简单的，像徒步行走或乘大车一样，也可能是复杂的，像飞机的简单一样，那么阿格耶夫的工作结构就是飞机的结构。在湖岸边，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想当老爷爷，当劳动者，像徒步行走那样。飞机实际上主要是被更复杂的计算的天才的简单弄得复杂了。飞机做这样技术上的计算是为了避免死亡，因为任何一个计算错误对于飞机都是致命的。飞机做这样的计算是为了生命能够战胜死亡。“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是一次意外。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一走近飞机就想到死亡。死亡，这当然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将会死亡，并且也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死亡是意外。

死亡！——关于死亡的念头不可宣扬地隐藏在那里，即隐藏着爱情和儿女出生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死的躁动不安。

关于死的念头有时使人拖延很久；有时它们黑压压一片一齐涌来；有时它们像一群游击队员进行袭击。死的念头一般在谈论所经历过的事情时出现，人有权把自己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所思所想与所发生的事，所做出的事作个对比。在十年制学校里，在物理教研室里，揭示出创造的规律。当作家那里出现一个形象时，铁屑开始运动，形成几何次序，变成合乎规律的形式。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死亡之夜把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时代初期所选定的事和第二次爱情播种之前所做出的事，在对死的念头做出统计时，把故事的素材记在了自己的草稿纸上。

在列车上，在到站前一个小时，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列车驶入泰加森林，向北开去。窗外渐渐显出一片昏暗的绿色，整整一夜都是昏暗的绿色。一个宽肩膀的人坐在桌子后边。刮得光光的人的样子，如果他们在五十岁开外，——刮干净的后脑勺、颧骨、嘴巴——总是有点厚颜无耻。这样的人往往在克制老年的邋遢，掩饰年迈，他们的年龄被磨掉了，于是他们老是特意表现出自己的愿望。那人彻彻底底地刮得干干净净。绿色的眼睛全神贯注，意志集中地望着。他穿着皮夹克和擦上油的皮靴。列车傍晚时抵达车站。那人拎着公文包下车了，没有带其他物品，尽管他乘火车行驶了一千五百公里。在泰加森林和沼地上，北方荒僻的小车站方圆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都没有人烟。那人在车站上没有停留。他朝道口那边绿色的夜晚和泰加森林走去。车站后边的泰加森林立刻接纳他加入自己有一千

年的气味、喧嚣和运动之中。在枕木后边，很快有几只丘鹬在头顶上空飞过。一群飞行的松鸡立刻发出咯咯的求偶的叫声，右边，左边，前边都是松鸡。一只可怕而巨大的猫头鹰从云杉之间飞过去，它害怕了，大概把人当成了猞猁，它突然急转弯，叫了一声，叫声像是孩子们的啼哭和在亚热带胡狼的号叫。那人掏出指南针，离开铁路的枕木，径直朝没有人烟、只有沼地的那边走去。春天的森林散发着霉烂气味、针叶气味、蘑菇气味、潮湿气味、复合及多种气味。春天的夜晚发出深邃的天空的绿光。一小时以后，那人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他吃力地穿过杂乱交错的枯枝，摆脱开蜘蛛网和去年的帚石南。云杉、落叶松、卫矛、刺柏、矮小的白桦、赤杨树丛长期以来使自己交错盘绕，无法通行。这里的老云杉和落叶松枯死了，倒在紧邻的树上。那人就这样爬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这个没有被许多世纪所破坏的一千年的夜晚，在这个驼鹿和熊居住的地方。泰加森林开始变得稀疏起来。而且云杉也矮了一些。大地在脚下晃动起来。在严寒的、可怕的、凝然不动的、结了冰的沼泽中的云杉混交林里的旷地上映出了天空。泥淖越来越多。枯死的云杉倒在泥淖中，摇晃的大地使它们陷进去。那人在一棵这样的云杉上坐下来，云杉的树根扎在地里，但枯死的树干倒在了水中。那人把干云莓和红莓苔子拢在一起，点上篝火。那人用心地仔细查看着自己的衣兜和自己的公文包、一本从中间翻开的书、钱夹、身份证、党证。那人慢悠悠地把它们丢进篝火中烧掉了：公文包、书、钱夹、钱、身份证、党证。那人愉快地吸了一支烟，把剩下的烟连同烟盒一起扔进篝火中。篝火燃尽了，那人把烟蒂扔到水里，用青草把烧焦的地面盖起

来。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踩着枯死的云杉树干走去，一边扶住干树枝，走到云杉混交林中间。他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一秒钟，两秒钟，他的身体一动不动，然后扑通一声仰面跌倒了。水溅了起来，映在水中的天空摇晃了一下。过了一分钟，水像先前那样静止不动，映着淡白色的天空，发出冰冷的寒气。森林喧嚣在开枪以后静了一秒钟、两秒钟、五秒钟，尔后，在离燃烧篝火处五步远的地方，一只松鸡悦耳地叫起来。天已经放亮了。一只猞猁从云杉林里走出来，朝云杉混交林走去——去喝水。

在莫斯科，信件被拆开了。

“当一台车床磨损了时，由于无用而把它抛弃或者把它送到平炉里重新锻造。我决不口是心非，——人的衰老就是一种磨损。我决不口是心非，——我曾不得已掩埋过许多人，有朋友，有敌人，也有兄弟，而且这都是假仁假义的，无聊的，谁都不需要的。人的尸体——这不是人。对一个人，一个活人会感到怜惜，而一具尸体向来引起厌恶。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一想到我将会更加衰弱，将会像老年人那样变得痴呆，我就感到极其厌恶。一想到我将会给我的朋友们带来这样有失体面的担心，到时候他们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是仪仗队的演员，为悼词中那种合乎情理的虚伪感到无聊，对摆在面前的尸体感到嫌弃，我就觉得羞愧。谁都不需要！我也决不需要。一个人当然是公有的财产。他的生命属于阶级，属于党，属于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同样也应该是有体面的。当一个人自己感觉到他的生命力之簧拗开了，他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的平衡对于社会是消极的时候，他有权自己支配自己。这不是意志薄弱。这是决心和意识，即意识到不是生命指挥我，

而是我指挥生命。我没有子女，我的兄弟也早已去世。我有病，一切最好的事情，凡是我能够做的，我已经做了。同志们，我知道什么是秘密活动，我之所以把我的尸体这样销毁，是为了它永远不被任何人找到，也不必去寻找它。前途属于青春、朝气和健康！”

伊万诺沃的负责人员，各个专业组成的人员，像飞机一样，经常到湖上去休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湖，但这个湖却使他想起他曾把自己死的念头埋葬掉的那片云杉混交林。

生活中的一切并不像故事中所讲的那样。形象的物理性能的磁铁把故事从阿尔别科夫的现实中引到了无名的云杉混交林。

第一次爱情播种之后没有孩子的生活，实质上是同女人没有爱情生活，不需要她生孩子的十年使阿尔别科夫陷入谷底，一蹶不振。当时整个房子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他觉得整个世界上就他一个人。那个夜晚令他刻骨铭心。那是春天，已是黄昏时分。他在院子里忙活着，给菜畦松土。后来他把各房间的门都巡视了一遍，检查是否都锁好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无须做的。他脱了衣服，在很大的、空荡荡的、被毁坏的房间里躺下。他拿起一本书，立刻把它丢开了。他关了灯。他觉得世界上完全就他一个人。他没有想自己的头两个孩子。他好像觉得，他的房子蒙上厚厚一层灰尘。在这灰尘里，他看见了他一生所写的书。在这灰尘里，他看见了自己的世界和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在思索尘封的所经历过的事。尘封的往事无足轻重。不，他决没有考虑可能会死，尤其是今夜死亡会来临。前面的生命历程还很长，但是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不算什么，死亡是虚无，没

有任何感觉。死亡被觉得是一只长癞的看家狗，可以让它进到房子里来，但也可以把它从房子里赶出去。生命比死亡强大，其实可以同死亡做游戏，就好比猫和老鼠做游戏一样。生命和死亡好像就在西服背心的口袋里。房子照旧蒙着灰尘，厚厚的一层灰尘。房子里，各个房间里，都笼罩着中亚细亚的闷热。他又觉得世界上完全就他一个人。他觉得非常寂寞，寂寞得要命。房子空空荡荡，阒然无声。房子、工作、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把自己的需要统统搞乱了。一切都无聊到无所谓和无奈的地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作家。磁铁开始工作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起床了，打开灯，在桌子后边坐下来，把为一个短篇小说准备的素材记下来，这个短篇小说描写的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他把自己埋葬在泰加森林里，把关于个人有权选择死亡的信留了下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写的时候曾两次大声说：

"不，同志们，我是财物和事业的主宰者，而不是事业主宰我！"

故事写完了，但夜晚还没有结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重又躺下了。死亡——这不算什么，无足轻重。阿尔别科夫一向认为生命就是做事。如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按所规定的数量读书和写作度过了一天，甚至哪怕这一天很快乐，那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会觉得这样的一天就像是偷来的一样。阿尔别科夫也许觉得对生命欠了债，他应当——他这样觉得——以写作向生命来偿债。

"那么，如果不工作，把自己当作实际上的废物吗？死亡——这不算什么，无足轻重，没有感觉，是的，是这样。可是你瞧，活着仅仅是为了见识见识吗？了解的不是自己，不是房子，而……"

阿尔别科夫听见了喧嚣声，首先是社会的喧嚣声。他听见

了世界，首先是无论如何不像沼泽地中的泥塘和无名车站的自己的祖国，他听见的祖国是一个发生过引人注目的情形和事件的祖国，一个改变了历史、使各族人民摆脱了封建主，从而转向社会主义的祖国；他听见了各族人民从虚无中，从城市、道路、工业中的诞生；他听见了千千万万的人的个性的命运，在这些命运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命运比春季产卵期的一颗鱼卵还要小；他听见了千千万万开采难以置信的采石场的人的命运，这些采石场是为改造着劳动、大自然、历史的高炉和新开河流而挖掘的。阿尔别科夫感觉到了历史破冰船、拖拉机、高炉的道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阿尔别科夫在地球上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破冰船和紧随其祖国的破冰船的道路之后掀起的那个历史旋涡。这一切都是奇异的。

难道为了看到这个时代不值得活着吗，哪怕只看一看？难道当个时代的泥瓦匠不更加奇异吗?!

房间里和夜晚笼罩着中亚细亚的闷热，那么今夜蒙上灰尘的房子、书籍对于泥瓦匠的活儿来说，难道就不是材料吗？难道它们不能继续用了吗?难道不能写出像时代所需要的书籍吗?

一个党员公民的、一个自己国家中阶级的人的新的、另一种磁铁工作了。

关于有死亡危险的沼泽地的故事被删掉了。

夜晚已经过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睡着了。四十年来人们产生的感觉是二十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在古代人们那里，老人们治理国家不是偶然的，而在四十年里，人民的领袖永远是领袖。对于阿尔别科夫来说，人们在二十年里既当英雄又当领袖的那个时代是决定性的时代。在科洛姆纳，阿尔别科夫有春天播种的两个孩子。在今夜之前的一个月里，在剧院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遇见一个姑娘。

爱情！……它比形象更高大和无所不包！那么关于第一次，关于最后一次爱情的论点并非必然，那种一边使人结合在一起，一边给予和索取一切爱的权利的爱情是人的生活中基本的东西，它使人们相和谐，使人们相适应，——一定要生孩子，如果没有孩子，同样是抬起头来的极美好的一对也不可能有爱情。但是当女人（或者男人）有了孩子，孩子们身上没有体现出人性，那么同样也没有爱情可言！

像形象的磁铁从所见所闻的事情的无数铁屑和粉尘中挑选出与作家的意识和感觉相适应的东西一样，在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走过去的无数女人当中，有一个姑娘流露出深深的爱慕之情，当时是在剧院里，得知她三天以后要回故乡，回山里去度假。

早晨醒来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他有许多他已经很熟悉的朋友，在苏联和全世界，他有千千万万个他不熟悉的朋友，也在世界和苏联。他觉得自己非常牢固地被安置在无数人的中间，他多亏有这无数的人，这无数的人对他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权力。世界上有许多阳光，一切都充满了阳光。那天早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电话找油漆工，请他们重新油漆门窗和重新裱糊房子的墙壁。那个早晨把没有孩子的十年从房子里赶走了，而实质上是没有爱情生活，以空荡荡的房子为结束的十年，当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觉得整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了。这十年被整个没有孩子的十年的不贞行为毁掉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油漆工打完电话，翻弄起书来。他知道，他生活在世界上，和世界在一起。黄昏前，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来了。两个单身汉做了一顿单身汉的饭。手工烤肉——许多肉，许多黄油和许多葱头——真是美味佳肴。谢尔盖·伊万诺

维奇的房子空了，这是因为他刚刚办完离婚。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正在办离婚。他们吃着饭，俨如两个美食家，谈论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事情，俨如两个离婚的行家。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同妻子过了十三年，过得很冷淡，他用在汽车事业上的时间比用在妻子身上的时间多。有一天，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下班回到家里，按了门铃，一个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叫别德罗索夫，您前妻的未来的丈夫。"此前大约三天，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妻子都不在家，在闹"家庭硫酸盐"，正如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所断定的那样。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什么丈夫，什么妻子的丈夫？"您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丈夫，我和她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我对婚姻有不可改变的观点，我认为当情人是不诚实的，我来这里是要同您把话挑明！"第二天早上，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去了一趟户籍登记处，转而开始了单身生活。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家，她缄口不言，她没有去上学，在织补长袜。她突然问道："这算什么事嘛，你为什么老是避而不答？——我们什么时候分财产，你什么时候给我新住宅！"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又坐不住了，他说："至于谈到财产，请把你的东西拿走就是了。关于住房嘛，你自己去张罗，管你的丈夫去要好啦，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到你的新丈夫家去吧。"妻子把所有东西陆陆续续地全拿走了，放到各处，但她哪里也没有去，也不在家过夜。突然又闹起了"硫酸盐"："这算什么事嘛，不给我房子，我得住在两个家里，我来不及上学，我会被学校开除的，已经向我提出警告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两手一摊："妈呀，亲爱的朋友，什么道德里有这一条，说因为你协调不好夫妻生活的快乐和学习，我就在你的学

习中有罪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别德罗索夫看作一个严肃的人，给他打了电话，约定在饭店里见面。他们见面了，说已经拖延了一个半月了，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他说，假如别德罗索夫确实只有一间房子，没有妻子住的地方，那么应当共同考虑，像男人那样去考虑，应当共同找房子。别德罗索夫说：“我向她提出二十个方案，我的住房也并不是那么糟糕，可是她，她，一方面认为她没有理由把房子给您，让您好过，根据家庭法典第十条，她有权分得一半房产，从另一方面，她不愿意像一个穷亲戚那样到我这里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别德罗索夫说：“您是男人，您是丈夫，可是你们在蜜月里就打打闹闹，互不信任，作为丈夫，您要好好劝劝妻子!”别德罗索夫下了保证，答应坚决要跟妻子谈谈，让她搬进他的房间来住。他们告别了。会面以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顺路来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里，谈了谈协商的情况，一起商量商量，然后他就回家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转回来了，一副嗒然若丧的样子。他讲了发生的事情，——他回到家里，看见家庭女工吓得战战兢兢，因为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非规定时间来了，号啕大哭，抓起桌子上的桌布，拽下来扔到地上，把盛水用长颈玻璃瓶打碎了，自己往长沙发上一倒，用手捶打沙发，过了一会儿，她紧靠着墙壁，把所有的墙壁都靠遍了，哭的声音已经小了，数落着哭哭咧咧地说：“我的两个，两个，两个丈夫都被夺走了!……”这是家庭女工在前厅里告诉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房间。果然，餐桌上没有桌布了，妻子坐在写字台后边，正在写东西，她的脸开朗，平静，凶狠，她望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眼，冷言冷语地说：“这一下您可高兴了吧?达到目的了吧?您可以庆贺了!——我要和别德罗索夫离婚，我要留在这里，哪里都不去了!”后来事

情闹到了民事法庭。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愉快地推论着，说，这样会有结果吗？两个人共同生活了十三年，有过美好，也有过不顺，对于不顺心的事我们尽量不去注意，不去记住，可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切都成为泡影了，见他妈的鬼去了，美好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撒泼胡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哈哈大笑。他臆想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他觉得更开心，于是他用悲伤的语调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讲述道：

“格林威治时间下午五点钟，在所有的经度上，在整个地球上，在各城市和所有有人定居的地方，在田野和森林里，在轮船、火车、汽车上，在工厂、饭店、政府部长们的府邸里，到处，凡是有人的地方，所有的妻子都对丈夫说了同样的话，几乎是所有的妻子，只有千分之一的例外，妻子们都很温顺、多情、殷勤，但她们行动起来却个个像月夜狂患者，虽然她们的眼睛很明亮，比方，她们说了如下的话：‘波利，帕乌利，帕布洛，保罗，西多尔，伊济多尔，奥托-基齐，王力，阿卜杜拉希姆。’她们操着各种语言，说出世界上所有男人的名字。‘我应该把对你隐瞒的真情告诉你。我曾经对你有过不忠。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当时我还是姑娘，这一点在婚前我向你隐瞒了……你在干活，你那位住在拐角上的朋友……你正在割干草……我们却在一起，记得吗，我们那个共同的熟人，我们一起跳舞，后来到外面去吸吸新鲜空气，当时你在争论危机……我在休息……’女人们的坦白，当然都采用许多不同的情节，大大超过了薄伽丘[1]的《十日谈》。众所周知，地球绕着自己的地

[1]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

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不停地运转，以格林威治时间计算，在新的城市和国家里，每一分钟都是下午五点钟。五点二十分，全球响起了男人们暴怒的叫喊声：‘下流！可耻！背叛！这就是你，你，你，我如此宠爱的、把一切能够给予的都给予了的你吗?!你竟如此地背叛了我，如此地嘲弄了我，如此地认为背地里那个卑鄙小人比我好?!简直像任何动物一样可耻，一样简单?!下流！我们离婚！……而口口声声把我称作朋友的这个下流胚，——我要跟他把话挑明，我要向他证明，他是坏蛋，我要决斗！……’五点三十分，人间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电报机停止发报了。电车、火车、轮船停止运行了。飞机着陆了。各工厂和各部委办公室都空了，没有锁门，也没有发生盗窃。电梯、大街、广场、道路上空无人迹。在以格林威治为界的遥远的西方各国（这里还不到五点钟），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军事舰队严阵以待，准备向敌人发起反击。号外推测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鼠疫!’‘一场战争!’‘同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无线电话中断了!’‘西方的沉默在日本军界被认为预示着不祥……’‘这场迄今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鼠疫蔓延到了纽约、华盛顿、费城、奇科……’格林威治时间六点钟，各条街道上突然挤满了男人。他们穿得乱七八糟，有的人没穿上衣，差不多所有的人，部长们和农民们，都没有戴帽子，手里握着极不像话的东西。大街上信号灯关闭了，独身的司机们驾驶着汽车，以二百公里的时速在大街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驶，畅通无阻。总之，一切都在飞驰。步兵们快步前进，他们看不清楚，互相推挤着，根本不说道歉。家家户户的门，书房的门，卧室的门一律敞开着。小酒馆的门敞开着，可是夜里十点钟之前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行人拐弯时碰见两个朋友在拐角处彼此作着解释。两个朋友互相揪住对方的肩膀，于是两个人都容不得不

同意见而狂怒地、不容反驳地大喊大叫起来，说着一模一样的话：'您听我说，仁慈的先生！您是我过去的朋友，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我的妻子……'两个朋友彼此重复着，好像回声似的。两个朋友半天都没有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这时两个朋友开始互相仔细打量，仿佛头一次认出来。他们的手放下了。他们的眼睛变得呆滞了，仿佛他们都很心虚。他们的眼睛变得完全一样了。他们沉默着。他们不说话，也不告别，看样子，他们好像彼此没有认出来和从来就不认识似的，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跑去。他们跑了几步，他们的脚上好像绑着哑铃似的。后来他们把哑铃扔掉，轻松地飞奔起来。大约晚上七点钟，尽管这是愚蠢荒唐的时间，一群一群的男人把各户籍管理处、宗教事务所、公证所、市政府的门统统砸了——要刻不容缓地办理离婚。大约将近十点钟，小酒店里开始挤满了男人，小酒店的门默默地打开了。无论是小酒店还是小酒馆里都没有店员。顾客们亲自钻到柜台后面，往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斟满了酒，鄙视地把法郎、先令、比塞塔、美元、大洋、卢比、里拉、马克、德拉克马、克郎往柜台上一扔。当然，夜里没有一个人睡觉。大约快到早晨五点钟时，天快亮时，丈夫们审问妻子们，要求她们对情变、背叛、撒谎作出心理上的解释，提出心理分析的辩护理由，而且丈夫们痛心地抱住脑袋，靠在墙上，揪扯头发，一边用左轮手枪威吓自己和妻子。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那天夜里地球上既没有发生一起杀人，也没有发生一起自杀。很自然，那天早上既没有煮咖啡，也没有烧茶，没有做任何事。从心理上审问完妻子后，丈夫们开始扪心自省，每一个人都在独自地扪心自省。可以假设，社会的联系以及时间的联系中断了。由于妻子们的变心，以及由于喝酒过多和失眠，丈夫们把湿毛巾缠在头上，牙痛得直哼哼。地球绕着自己的地轴自行运转。从世

界上人类的破坏性剧变开始，整整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也就是说，现在又是五点钟，第二个破坏性剧变发生了。男人们瞪着明亮的眼睛（尽管这些眼睛因喝酒过多和失眠而发红），用温情的声音说起来：'玛丽娅，玛丽，梅丽，泰克拉，菲克拉，托列科，法季马，'他们操着各种语言，说着世界上所有女人的名字，'我应该把真情告诉你……你要明白，地球上妻子们变心的数量等于丈夫们变心的数量，因为女人和男人都在变心……当时我还是个少年，这一点结婚前我向你隐瞒了……'这是此前一昼夜男人们所发生的事的重复，偏差不大。女人们的特点基本上是，如果男人们仍然想要深省，甚至渴望独处，那么女人们一般把不愉快的事向女友们倾诉一番后，急急跑回娘家去或者去找别的女人（她们的丈夫没有背叛她们）。女人们渴望合作。女人们不要求丈夫们做心理分析的基本练习，但是她们却不睡觉，也不让丈夫们睡觉。第二个昼夜，世界没有睡觉。到三个昼夜，地球睡着了。所有的人都睡了，在城市里、在田野上和森林里，轮船上、火车上和汽车上、前厅里、卧室里、床上、地板上、青草地上，甚至顶间的混凝土上，到处都有人睡觉。他们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摆脱了疲劳，恢复了精神。丈夫们望望妻子们，妻子们看看丈夫们。他们不是愤恨地，而是不好意思地彼此转过脸去。一个人从角落那边迅速地穿好衣服，要去上班。他来到大街上。在拐角处，他碰见从拐角后边走来一个朋友。两个人一时都停住不动了，然后他们彼此迎面走过来，极其友善地摘一摘帽子，以示致意。他们工于心计地微笑着。他们彼此说着同样的话：'人类进入了道德的新纪元，不是吗?!'拐角上已经在卖号外了。文学家们、哲学家们和道学家们在辩论新纪元的话题。晚报满篇都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消息，刊登着一位法国催眠疗法的女医生的照片，这位女医生以自己的催眠

才干搞出了举世闻名的破坏性剧变。在刊登社论的位置上刊登了对这位法国女人的采访：'……伟大的学者，这位催眠疗法的女医生，一个有天赋的人，一个还很年轻的、相当漂亮的女人，以巨大的不懈努力使男人和女人彼此倾听和述说性的真相，她坚信，这个赤裸裸的真相的知识将会改造人类的道德，消除妒忌的本能，扬弃爱情中所有权的残余，磨灭虚伪的性的自尊心，从而给人类带来福祉……"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听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故事，开怀大笑。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大笑着说道：

"第四天还有两条经学者们论证过的消息。第一条，这位催眠疗法的女医生为了出口怨气，把对她变了心的丈夫进行了世界性的责骂。第二条，晚报上补充说，这位为世界声誉所激动的催眠疗法的女医生启程到瑞士休养去了，而在那里，一伙法西斯歹徒突然碰上了她，把她打死了，算作他们同自己的本国妻子所经受的那些痛苦的惩罚！……"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越发开心地捧腹大笑——他们在笑自己。

第三天，飞机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到哈尔科夫、顿河罗斯托夫、矿水城、马哈奇卡拉、巴库、梯弗利斯。应该在梯弗利斯打听一个宛若磁铁般在莫斯科剧院给人留下终生不忘的印象的那个姑娘的地址，汽车沿着格鲁吉亚军用道路向山口驶去。与阿尔别科夫同行的有齐齐安·塔比泽和申格拉亚。申格拉亚晚上就在科比村寨订好了马匹。他们在卡兹别克车站过得夜——在卡兹别克山口，卡兹别克山附近，一所曾经住过卡兹别克历代农奴主的房子里过的夜，其中一个生活在九世纪中叶的农奴主亚历山大·阿兹别克，曾是格鲁吉亚的大作家。炎热

的白天过去了，山口寒气逼人。黎明时，没有云彩遮挡的、终年积雪的卡兹别克山看上去离得很近，不到一公里远。凌晨，汽车把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送到了科比村寨，齐齐安，传奇的宴席主持人，留在了卡兹别克车站，想要猎获野山羊，准备晚上烤肉串和做酒宴。在科比村寨，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换上马。捷列克河在科比分汊了，而且两条捷列克河为了谁大谁小的名分彼此争执不休。一条捷列克河流向特鲁索狭谷，从山岩之间悄悄汇入冰川。阳光充满了世界，马匹沿着捷列克河，在山岩下边和捷列克河上边，几乎挨到了积雪，向狭谷走去。巨大的山岩耸立在左右两旁。阳光火辣辣地烧灼着世界！天空与马匹和群山相毗连。捷列克河流过一个石滩又一个石滩。在有些地方，石滩现显出灰白色的矿物钟乳石。这些矿物钟乳石是从山的深处冲下来、被捷列克河溶解和重又变硬的。在罅隙间流出来的纳尔赞矿泉水旁边放着山羊角和绵羊角，供行人用来喝水。在炎炎烈日下，散发着氢气味的纳尔赞矿泉水清凉宜人。在捷列克河的喧闹后边，在高高的山顶上，几乎在空处的山川那边，显得格外静谧。山顶上蔚蓝色的光亮把空处弄混了，这时卡兹别克山犹若真的近在身边。特鲁索狭谷里是一片原始状态。马匹有时走小路，每当这时骑马者的一只膝盖便蹭在山岩上，而在另一只膝盖那边，捷列克河呈垂直线奔流。山岩上分布着从原始时代留下来的散散落落的村寨，在这里，经济单位（祖传的家庭式的）的住所不仅仅是住所和羊栏，而且还是一个堡垒，这使阿尔别科夫想起北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区。在那里，人们可以攀着可挪动式梯子走家串户；在那里，必定有秘密的地方和暗道；在那里，一座石头房子的房顶就是另一座石头房子的露台，房子四周是围起来的拌上石头的土墙，在墙上方矗立着高高的塔楼、谷仓、在原始战争中劫掠和祖遗的血族复仇

的堡垒、传说的发源地、躲避火灾的藏身处。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来到了坐落在紧靠着冰川、紧靠着积雪的一个村寨。村寨里到处阳光灿烂，十分静谧！她不在村寨里，他们却是为了她而来的，她到冰川那边的山上采伐木柴去了。一个赤脚的牧童骑着没有鞍子的马疾驰而去，叫她去了。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躺在房子里休息和等候，从这座房子的房顶上看得见从积雪下边流出来的捷列克河的水源，也看得见青草丛生的谷地、斜坡和陡岸，绑架牲口① 的原发地。村寨上空塔楼高耸。村寨里空空落落，人们到牧场和田间，到山岩上贫脊的零块的大麦田里去了。一位记得叶尔莫洛夫② 的百岁老人把自己的氏族带到了地洞里。地洞通往村寨的广场、内院和塔楼下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踏着石英岩梯级攀到了塔顶。他独自待在这空中和寂静中。太阳把村寨晒焦了。在村寨下边，在捷列克河那边，一个骑者从山坡那边的森林里走出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并且用袭步趟过河去，仿佛马贴在地面上似的，朝村寨飞奔而来。骑者高傲地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在大街的台阶上走着慢步。这是她。她打着赤脚。她的手臂、脸庞和赤脚晒黑了，宛若橄榄油。她没有认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她在屋子里换衣服，老半天没有出来。已是日落时分。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告诉她说，他们是专程来请她的，说齐齐安·塔比泽正在卡兹别克山上捕猎野山羊，说马已经备好了，现在就得动身，以便使自己和留在科比村寨的司机不致挨冻。从这里到科比有三十公里路程。她准备停当了。一出村寨，他们就袭步疾驰起来。申格拉亚远远

① 从前流行于各游牧民族的一种报复行为。

② 叶尔莫洛夫（1777—1861），俄国步兵上将。参加过 1805—1807 年俄法战争。1816—1827 年任高加索军军长和格鲁吉亚驻军总司令，发动了高加索战争。

地跑在前面。可是夜色追过了马。在这个南方的国度里，天一下子就黑了下来，正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给高加索起的名字一样。这时隆隆地响起一阵雷声，仿佛山崩似的。大雷雨离得还远，回声久久地在山间的悬崖峭壁上回荡，于是回声重复着雷声。申格拉亚调转马头，来到阿尔别科夫跟前。他勒住马，仔细谛听着隆隆的雷声，他是山民。

“得加紧赶路，”他说道，“大雷雨快来了，下边将会涌起急流，捷列克河要涨了，我们到不了科比，可能就会发生山崩。”

不管跟她比还是跟申格拉亚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都没有他们骑马骑得好。申格拉亚又跑到前面去了。她的马和阿尔别科夫的马并排走着，马镫有时互相碰撞，发出丁当响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注意到，在陡峭的小路上，她的马总是走在靠近峭壁的紧边上，马在奋蹄赶路。可是大雷雨追过了马。又响起了雷声，在山间隆隆滚动。闪过一道电光。这是阿尔别科夫生平头一次看到——电光不是在他上方，而是在他下方忽然一闪。下边下起了大雷雨。他们在大雷雨上边。她的马镫碰了阿尔别科夫的马镫，丁当响了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黑暗中伸出一只手，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在一片漆黑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马撞在了申格拉亚的马屁股上。申格拉亚欣赏着大雷雨。山下边电光闪动。磷光和黑暗被阵阵雷声和回声劈得粉碎。群山列列，仿佛山岩在滚动。

“格鲁吉亚的军用道路上正在下大暴雨，”申格拉亚说，“会把路冲坏的。”

山顶上边的天空中群星闪烁。变得稀薄的空气严寒砭骨。

在大雷雨之上，在山顶旁，人们可以认为他们在宇宙里。

下边下着大雷雨。马走着慢步。在闪电的反光中，在右边和左边，在前边，旁边，从下到上，从格鲁吉亚的军用道路到

冰川，到卡兹别克，云彩很快地飘动起来。它们急急地飘动着。它们单片地和连片地游移。它们使马笼罩在谷地里的雾气和温暖之中。它们越来越多。它们把马和山藏到了自己的怀抱之中。在旁边，在十步远的地方，乌云骤然裂开了，以致马彼此躲闪，挤住了她和阿尔别科夫的膝盖，一时间，电光闪闪，雷声大作。闪电在炫目的光亮中划破了黑暗，一束急遽的亮光倏地射到山岩上。雷击打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百个山岩之后，卷走了光亮，使空气为之一颤。山岩仿佛在轰轰隆隆的响声之中坍塌了。刹那间，又一道闪电划过，被雷声劈得粉碎。大雨如注般地下起来，这时小溪、湍流、瀑布从山岩上哗哗地奔腾而下。雷鸣和闪电急急向卡兹别克赶去。乌云已悬在头顶上空。

雷声从高处滚落下来。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从天空，从山上直泻而下。像在平地上一样闷热。他们从宇宙的混沌中返回到地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握住了她的手。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了科比。时间已是半夜。汽车没有等他们，由于担心路被冲坏，开到卡兹别克去过夜了。牧人的房子成了她、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过夜的地方。这是牧人和牧羊犬睡觉的房子，有一股绵羊的气味。睡前，他们吃了科比产的奶酪。这个姑娘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妻子。

在俄罗斯夜莺啁啾啼鸣的黎明时分，同时也下着大雷雨的时候，铃兰散发着芬芳，盈溢着清新和勃勃生机，在帕列赫，在农舍里，在父亲旁边的间壁后面，他的出色的儿子怡然自得地摊开四肢正在睡觉。但不是儿子，而是他母亲那不可宣扬的整个生命的形象的磁铁，这块磁铁把阿尔别科夫生活中这十年的全部铁屑都结合和安排在合乎情理的、充实和明朗的形式之中。正是由于这个明朗愉快的合理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两个大孩子才开始同他生活在一起，给家里增添了共青团员的活动

和少先队员的活动。正是由于她，一个完美的爱的形象使家里、心里、空间、时间都充满了欢乐。

于是在去了山口几天之后，当时在高加索，在梯弗利斯，在“东方饭店”，天一亮，碰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在伏案工作，写东西，画圆圈，做计算，完全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甚至有点儿调皮。那天拂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在睡梦和幸福中时感觉到了死亡——一种冷飕飕的、凉冰冰的、毫无意义的恐惧。一切都将会开花，太阳将会照耀，新作家将会写出新歌曲，而你，你的我，你的命运，你的思想和感情，将会变得微不足道，将会消失，这种凉冰冰的死的感觉是无法用口头上的感觉来表达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带有潮气的荒谬中醒来，你瞧，在梦和现实的分界处，恐惧留在了梦中，意识里有一种愉快而狡黠的欣喜。这是发明活动。阿尔别科夫的创造性仪器——磁铁！——把消息送到了他的意识里：

“有了，凯勒尔同志！有回避死亡的方法了！找到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觉得，他正在做一项举世闻名的发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脸大概像小孩子似的洋溢着喜悦和调皮。死的恐惧完全被忘在了脑后。阿尔别科夫坐在桌前，画着圆圈。

“在二十四小时里，地球绕着地轴自转……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就应该弄清楚！……地球的半径有多长？比方说，顺着空间，顺着调马索，莫斯科运转的速度有多快，这可以算出来。要知道，一颗被拴在绳子上和被淘气的孩子用手转动的小石子都有自己的速度，那么犹如小石子绕着孩子的手转动一样，位于地球半径末端的莫斯科同样在绕着地轴运转……应该算出来。地球，陆地上的莫斯科，绕着地轴转一圈，是二十四个小时，那么，如果昨天中午十二点是七号，那么二十四小时以后的中午

十二点则是八号。应该算出来莫斯科运转的速度。而且还应该制造出能够飞行任何速度的飞机。假如飞机在莫斯科上空以莫斯科绕着其调马索飞行的速度向西飞行，那么它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飞行莫斯科所能飞行的那么长的距离，就是说它将停在莫斯科上空。假如它向东迎着莫斯科飞行，那么它将在十二小时以后遇上莫斯科。这还不是发现。假如飞机飞得比莫斯科的运转快一倍，那么飞机今天中午十二点与莫斯科一起起飞向西飞行，飞机十二小时飞的距离，莫斯科则需要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以后，飞机将从西追上莫斯科。地面上的人们已经过了两个昼夜，但飞机上的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只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假如飞机今天，七号，中午十二点飞上天空，在飞机上过了一个昼夜的人们九号则会立刻降落到莫斯科。时间对于住在莫斯科的人是必须的，对于莫斯科人是绝对的，但时间本身决不是绝对的。那么如果飞机飞得将比莫斯科运转快四倍，飞机上的人们在二十四小时里将会过莫斯科人生活中的四个昼夜，从七号飞起，他们将会在二十四小时里于十一号降落。假如人们于1933年1月1日从莫斯科起飞，飞行三个月，他们将于1934年1月1日着陆。那么假如飞机的速度将比莫斯科的运转快八倍、十六倍、三十二倍，人们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这样的飞机上过一年——只须一年——那么着陆时间将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没有极限！——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千年！只是需要制造出这样的快速飞机，才能使死亡产生错觉。时间不是绝对的。那么假如时间不是绝对的，能不能使时间倒退呢——鬼才知道，——应该计算一下，也许当现在活着的人能够活一千岁的时候，梯弗利斯的公民在这段时间只能来得及在上班之前盥洗和吃早餐？……要做到这一点，会帮忙的将又是飞机。应该给这样的飞机取个什么名称呢？同温层飞机？宇宙飞机？应

当想出个名称来！……譬如说，比莫斯科运转飞得快三倍的飞机，同样也是中午十二点起飞，向东飞行，将会碰上莫斯科。它将在六个小时以后碰上莫斯科。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人表上的白天时间将只有六个小时，而人从飞机上却已经看到了晚上，也看到了早晨——或者，换一种说法，人过了十八个小时！？……”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样子非常和善而愉快，甚至有点狡黠。他不擅长摆弄数字。他觉得他在搞一项有重大世界意义的发现。他在纸上画着圆圈、莫斯科和飞机，试图追忆起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从前教过的数学——就是曾经经常说“留下来半个小时，不许吃饭！”的那个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他吸着烟，喝着酒，重又画着圆圈，把飞行速度加在一起。

白天，有人对阿尔别科夫说，他所想到的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的，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非主要函数中的一个。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灰心丧气，因为时间不是绝对的！……

在未名湖畔，讲述了“马克西姆号”的坠毁以后，阿尔别科夫回忆起了自己这个发现的故事，用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的快乐时光。“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毫无意义，现在已经很清楚，十年以后将要制造的同温层的、星际的飞机将会在苏联制造出来，到那时，“马克西姆号”在同温层飞机面前难道不几乎就是洞穴远祖吗？同温层飞机难道不会对人的死期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吗？就让现在走近飞机的人暂时还想到死吧，在“马克西姆号”上罹难的人们为了战胜人的死而作了斗争。

俄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历史

现今的伊万诺沃工业州包括从弗拉基米尔和基尔扎奇到乌

格利奇和波什-沃洛达尔斯克，还包括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到丘赫洛马和索利加利奇到马卡里耶夫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所说出的每一个定居点既是俄国情况的一个篇章，又是俄国历史的一个篇章。从莫斯科到帕列赫的道路经过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到达伊万诺沃。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保留着俄国十二世纪的文物古迹，俄罗斯最古老的地方。州的中部是伏尔加河。经济分布图上用不同的重彩标出各工厂工业，而占首位的是伊万诺沃——从前的伊万诺沃村和沃兹涅先斯克镇。

1935 年 5 月 26 日是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三十周年。

而三十年又两个星期之前，当时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当时被称为俄国的曼彻斯特，实际上是一片分布在六俄里的地带上，由于破旧而发黑的一贫如洗的木头房子。由于极端贫穷，有些地方偶尔有商人们的石头房子和长长的厂房。基本上都是干草和薄木板，肮脏的木房和小木房，贫苦和穷困。通常的村子，——那些小酒馆和那个少不了的、招牌上画着巨型怪物似的茶炊的小饭馆。木屋和厂房后面是荒芜的空地。空地后面是森林。商人和无产者住在城里。由于急活儿，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增加到十五个小时。在漂白分车间和轧染分车间——这里的空气非常刺眼——工人们使用的解毒药是大葱。在烘干分车间，工作在六十度高温下进行，所以工人们赤身露体地干活。冲压工们在制作浮雕时不得不借助于浓烈的、所谓的“皇家”伏特加酒，他们的牙齿都脱落了，因为冲压分车间的空气里充满了“皇家”的酒气，以致白报纸在这里弄成碎屑，两个小时以后就变黄了。工人在洗涤机上干活超不过两年。在印花布厂，工人平均每月挣十个半卢布，而在纺织厂——十三个卢布。到了冬季，单位工资就降低了。工人们由于“说话粗鲁

与行为放肆”和“品行败坏”而被从薪金里处以罚款，但是当年轻女工几乎必须与师傅、掌柜、工厂主的儿子同居时，则并不认为是“品行败坏”。工厂里有工人监狱。按照老传统，一切都有外号。商人-工厂主杰尔别涅夫的外号叫烧碱。雕刻分车间的外号叫酸洗。工人区的外号叫亚马、扎维尔塔和雷利赫。失业和挨饿——为韦特罗夫-古利亚耶夫干活儿。农民的木房子——一个房间——住大约十五个人，有男人和女人，有老人和年轻人，有成了家的和独身的，他们睡在高板床上和胡乱地睡在地板上。

伊万诺沃的居民有三分之一死于结核病。据国家统计，百分之八十被征兵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出生的人，由于身体虚弱而被认为不合格。

人的命运？——冬天和夏天他常常穿着短皮袄，棕红色的皮靴上套一双用黑鞋油擦得锃亮的皮套鞋。像鹅一样长长的弯脖子上围着带花点的绿色毛巾，来回摇摆。带穗子的围巾两头脏污不堪，成了手绢，冲压工就用它们捂着擤鼻涕和咳嗽以后擦带有褐斑的苍白的嘴唇。冲压工痛恨地咒骂着，卖力干活。当他在冲压机上干活时，他那细脖子上的淡紫色皮肤便鼓胀起来。脸涨得通红，嘴唇上的褐斑变得苍白，有如苔藓。他咳嗽着，发出嘶嘶的罗音，把胸部抵在冲压机上，这样一来他好像不是用冲压机，而是用自己弱小的身体在锻锤上压出图案来。有一次，过完节以后，他来到车间，身子晃晃悠悠，眼睛呆滞无神，死盯盯地望着冲压机，没有对着任何人，声音嗄哑地说：“我要到莫吉廖夫去了。喀-喀……你们真该死，让我们临别来干一杯！”而且他第一次笑了，他的牙齿黑乎乎的，稀稀拉拉。他请求一个帮工到官营专卖酒店去买酒。当那个帮工拿着伏特加回来后，他把闪闪发光的一只套鞋从棕红色皮靴上脱下来，当作酒杯，把

伏特加满满地倒进套鞋里，向所有默不作声的雕刻工敬酒。“喝吧，别舍不得！一死方休！”他把绿围巾猛地从脖子上拽下来，像娘儿们似的在头顶上挥动，跳起舞来。

他唱道：

在气味难闻的乌沃季
矗立着我们巨大的城市——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

他还想再唱点儿什么胡闹的歌，可是他的喉咙里发出了汩汩的声音，他用手捂住了嘴。血从他那戴着几枚黑戒指的颤抖的手指间渗出来，顺着胡须流淌。冲压工死了。

商人？——资本家？——这是显然的。

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苏联政权的楷模，而且也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因为纯粹的伊万诺沃无产者自然找到了纯粹的无产者的政党。

伊万诺沃工人总罢工持续了七十二天，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工作了七十二天。罢工是5月25日开始的。5月26日苏维埃开始工作，把自己当作俄罗斯沃兹涅先斯科镇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致省长要刊印自己的命令都要得到苏维埃的准许才行，并且那个省长给帝国内务部写信抱怨他的神经——他“心动过速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在发展”。

工人们提出了哪些要求？（企业主作出了怎样的答复？）

1. 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企业主的答复是：工时将不予改变，因为这是国家规定）；

3. 取消急件（“取消是不可能的”）；

5. 男女工人最低月工资二十卢布（“不可能执行”）；

7. 准许产妇在产前休两周假，产后休四周假，保留原薪（“……在国家法规未颁布之前不可能执行……”）；

8. 工厂里应设托儿所（“我们认为设托儿所极为困难……”）；

14. 取消搜身（“很遗憾，取消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让女人对女人进行搜身”）；

22. 取消工厂警察和工厂监狱（“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现象，这不归我们讨论”）；

23. 长官和军队不得在罢工期间干涉工人的事情，否则后果无法担保（“不归我们讨论”）；

24. 有权自由集会和讨论自己的需要（“……不归我们讨论……”）；

30. 开办互助的工人储蓄所（“……不归我们讨论……”）；

31. 把5月1日和2月19日定为节日（“鉴于2月19日和5月1日是东正教和沙皇的盛大日子，我们认为把这两天定为节日不妥”）。

“长官和军队不得干涉……”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向当局声明它的存在时，当局为其提供了小市民管理局的地方作为开会的场所……伊万诺沃苏维埃命运中的一切十分引人注目，这个苏维埃以塔尔卡苏维埃载入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备忘录，载入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史册，这一情形也十分引人注目。

现今，红塔尔卡——伊万诺沃附近一条河的名字——是一条平静的河流，流经一片树干高大的松林，绿草地。苏维埃经常在露天地里、在塔尔卡河、在草地上和红树干的松林里开会。苏维埃同自己的军队，同三万名工人一起开会，成了这些工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大学”，正如内务部所下的定义那样。每逢早晨，当夜莺还在啼鸣，夜雾渐渐散去时，苏维埃全体会议在

森林里的护林室，在草地上，在塔尔卡河畔召开了，会上讨论罢工情况，昨天和当天所发生的事件和新闻。全体会议往往以与复选代表的联席会议而告结束，这时代表们轮次登上一只从城里滚来的、当作讲台的焦油桶，对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作关于形势和事件、同企业主们的谈判、同当局的联络、致内务大臣和工人弟兄们的信的报告。代表团在这里受到接见和从这里派出。这里，经常宣读苏维埃的通讯报道、贺词和恫吓。这里，设立了无产阶级法庭。这里，把从工人弟兄们那里收到的钱按每个单身罢工者十戈比和有家眷的罢工者三十戈比分配下去。当这些事情结束以后，演讲者往往出来发表演说，他们所讲的都是工人们想要了解的。工人们什么都想知道，于是演讲者就讲给他们听——关于我国和世界工人阶级状况、关于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热里雅博夫[①]和薇拉·菲格纳[②]、关于杜勃罗留博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普希金和果戈理。当演讲者和听众感到疲劳时，演讲者和听众便唱革命歌曲。唱完以后，演讲者重又讲起来，使罢工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陛下身上。法国的1793年、1848年和1871年，——在俄国的历史道路和乡村中，——在伊万诺沃土地上的大道和乡间土道上，被工厂主们用石头围墙牢牢地围了起来，比苏兹达利修道院的墙壁还要坚固，而工人们把自己埋入伊万诺沃的亚马、扎维尔塔和雷利赫的赤贫之中，关于蜘蛛和苍蝇，关于靠哥萨克皮鞭和三面神支持的富农。这是一所自由的大学。五月和六月过去了，这时霞光和霞光靠近了，夜莺啾啁啼啭，夜间云雾缭绕。许多罢工工人夜间待在塔尔卡河边，于是松树下

① 热里雅博夫（1851—1881），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民意党及其军事、工人和大学生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② 薇拉·菲格纳（1852—1942），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作家。

燃起了宿营地的灯火。罢工工人们在篝火的灰烬中烧烤土豆，蘸很多盐来吃，——当然透过云雾和夜色，他们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倘若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的弟兄们。于是，他们唱起了革命歌曲，非常好的歌曲。黎明时分，从地下印刷所送来了革命报纸《工人代表苏维埃公报》。新的一天来临了。这是无产阶级的营地——最好的宿营地——有自己明文规定的管理和无产阶级纪律的传统，谁破坏了这些管理和传统，谁就必须当着同志们的面讲清自己的罪过，这是对犯有过失者的最高惩罚。

"长官和军队不得干涉……"除了纺织工人外，参加罢工的还有封建的手工工场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女工和洗衣女工，饭馆和小饭铺的跑堂、伙计、铁路工人、印刷工人。舒雅、捷伊科沃、科赫马都加入了伊万诺沃的行列。列日涅夫、罗德尼克、奥列霍沃-祖耶夫的代表纷纷来到苏维埃。舒雅县的农民向苏维埃咨询："如何夺回土地和消灭地方行政长官？"穆罗姆县的农民派来代表，想让他们向伊万诺沃工人学会"罢工"。伊万诺沃苏维埃的代表捷连季同志到科斯特罗马去组织科斯特罗马的工人罢工，把他们带到了科斯特罗姆卡河畔，像在伊万诺沃塔尔卡河畔那样。在莫斯科、萨拉托夫、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都为伊万诺沃筹措了钱款，并且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发放了伊万诺沃事件的传单。苏维埃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战斗队。苏维埃建议从弗拉基米尔来到伊万诺沃的省长在罢工期间关闭伏特加酒和啤酒商店，酒馆和赌场也要关掉，于是省长把它们统统关掉了。工人在巡逻工厂。苏维埃的命令对于工人就是法律，省长的命令事实上只有得到苏维埃的准许才得以执行。苏维埃把政治要求送给内务大臣，——通过省长，省长派人把它们送去。城市成了两个阶级的军营，这时每一方都在

伺机较量。工厂主们结成了“同盟”。他们通过省长要求把罢工者的身份证发送到他们的家乡，以便在身份证发送之后罢工者各自解散，被押送回乡，苏维埃不准许发送身份证。工厂主们禁止把工厂里小铺的食品出售给工人，苏维埃取消了这一命令。工厂主们给内务部写信、拍电报，——伊万诺沃的“拳头[①]”没有吝惜发电报。

“……由警察局长所调遣的部队的数量不足以恢复和平和秩序，城里的居民坚决请求阁下前来帮助我们。城市正面临着被彻底破坏以及不久的将来将遭受饥饿和屠杀的威胁。每天都举行集会，这些集会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为了政治问题。游行队伍举着旗子，旗子上面写着污言秽语……无政府状态十分猖獗……伊万诺沃市和沃兹涅先斯科镇的居民终日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当局无所作为。官方消息说，工人们很安顺，这纯属捏造。我们极其恳切地请求阁下刻不容缓地予以保护。恐慌达到了极点。居民们纷纷从城里逃走。签名……”

官方的情报是可靠的：工人纠察队不允许居心叵测的黑色百人团到处“游逛”。内务大臣建议当局“采取行动!”省长除了向内务大臣和宪兵队长报告了自己的神经状况外，还报告了以下内容：

“……鉴于罢工警卫队的正确组织，逮捕为首者是不可能的。”

“……鉴于各方情况变幻不定，预见罢工的结局是不可能的。”

“……集会的结果在于做出继续罢工的一致决定（至少，从表面看是这样）……”

---

① 指富农。

“……工人们天天集中在塔尔卡河畔，进行谈判，讨论，听演讲者的演讲，当了解到他们的决定后，便和平地各自散去。这种情况日复一日……”

“……虽然城里很平静，但城外的集会具有反政府性质，领导运动的工人党掌握了广大群众”……“由于军队的战斗力不强，集会很难被禁止”……“我恳切请求派一位授以全权的有巨大影响的人来把所有主管部门的工作联合起来，我觉得自己力不胜任……”

“……从另一方面，假如驱散集会，那么可能将会出现抢劫和纵火；城市及其近郊区将会发生危险；工人运动将具有公开暴动的性质。”

“……军队对自己的秩序维护者的作用极不以为然，因为它们脱离了自己直接的使命……”

内务大臣建议当局“采取行动！”。

于是，6月15日哥萨克在伊万诺沃到处张贴有副省长签名和在弗拉基米尔警察印刷所印刷的命令。

“鉴于每天有关于工人的消息传到我这里说，聚集在塔尔卡河畔的人不只限于讨论自己的纯工厂事务，而是搞起了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并且个别人擅自发表显然是反政府的煽动性言论，我认为，继续允许许多人在塔尔卡河畔，甚至在城市其他近郊区集会是不行的，所以我预先警告，破坏本命令的犯罪者将受到法律责任的制裁。”

6月16日早晨天气晴朗。苏维埃在开会。工人们写了抗议书，反对副省长的命令。这天早上天刚一亮，由警察局长科热洛夫斯基指挥的哥萨克就分别部署在工人营地周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在一阵步枪齐射之后，哥萨克们吆喝着，打着口哨，举着鞑靼军队留下来的马刀和皮鞭向工人们，向手无寸铁的工

人们冲过来。哥萨克开枪射击逃跑的人。科热洛夫斯基逮捕了苏维埃主席和书记。河边和森林里的旷地上躺满了浑身是血的人们。

罢工要求的第二十三条称："长官和军队不得在罢工期间干涉工人们的事情，否则后果无法担保。"

开枪之后过了一小时，伊万诺沃的电报和电话线都被掐断了，从塔尔卡通往城里的入口被街垒堵塞了，加杜林工厂的仓库起火了，各仓库和市长家的房屋玻璃横飞。日落时分，工厂主的别墅在伊万诺沃方圆数十公里熊熊燃烧，火光闪闪。夜间，工人战斗队向哥萨克骑兵侦察小分队和警察开枪射击，把他们赶进营房。这天夜里，工厂主们，有些人换了装，离开伊万诺沃到莫斯科去了，通过被破坏掉的电报线向省长和大臣发电报说，在伊万诺沃没有恢复"法律秩序"之前，他们决不回去。可是连省长那天夜里也带着一个哥萨克骑兵连逃出了伊万诺沃。

工人代表苏维埃随着其主席和书记的逮捕而夭亡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了塔尔卡。回到塔尔卡的工人们一致决定：

"继续罢工。"

"要求释放同志们。"

"要求法庭审判科热洛夫斯基。"

罢工在继续。同志们被释放了。省长从弗拉基米尔请求苏维埃准许在伊万诺沃颁布他的关于解除伊万诺沃警察局长科热洛夫斯基职务的命令。工人们迈过了塔尔卡的血泊，取得了胜利。工人们以工厂主庄园的熊熊大火回答了塔尔卡的流血。

为了做出关于复工的决定，这时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一次与工人们一起聚集在塔尔卡河边，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决议：

"我们在工厂里从事着繁重劳动的同时，将着手准备另一种

斗争，严肃的斗争，生死存亡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那个时刻到来之日，就是全体人民武装起义之时……”

这决不是预言，但却是有意义的话。

这是在三十年前，在1905年红霞满天、花蜜飘香的六月和割草的七月里发生的事。1905年以后，从1907年到1914年又过了几个年头。1905年在1917年面前是曙光。大多数人，曾经在塔尔卡参加过集会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塔尔卡曾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红塔尔卡是苏维埃政权的楷模。塔尔卡使阿尔别科夫想起死的念头的未名湖。在那些岸边开始了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生活啊！……

……生活，生活！——生活得朝气蓬勃，心情愉悦，和同志们一起生活，在集体里，在阶级里生活，有爱情，有孩子……在未名湖畔，在夜莺啼鸣、铃兰飘香的不可宣扬的帕列赫之夜也有这样的生活，——决不是徒步走向云杉混交林，走向死亡的那种生活，生活得像飞机结构一样，生活在历史的破冰船上，这样生活，为了使生活中充满阶级、革命、孩子、爱情的壮美的大雷雨！……

第 三 章

……而生活……

塔尔卡之后过去了三十年，阿尔别科夫来到了帕列赫，在塔尔卡的苏维埃开始那一天之前一昼夜，他在帕列赫逗留的时间几乎与塔尔卡，塔尔卡的日子，持续的时间一样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生活应该像艺术，于是他来到了美好的艺术之故乡。

……假如象棋机被发明出来，
象棋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帕列赫现在实际上驰名世界，是艺术的泉源。它的情况的示意图以其矛盾而极难于置信：这是一个出圣像画匠、九世纪就组织起来的、外出打短工的手工业者的村落，直到十月革命

前变为“封建手工工场”，为俄国社会最保守的阶层干活，画圣像和给教堂彩绘。这个村本来应该被1917年抛弃掉，不仅因为它无用，也因为它名声不佳，可是1917年之后，这个村突然以卓越的艺术而大放光彩。帕列赫好像以“反面的”、荒唐的证据肯定了自己和我们的时代。在采矿工业和化学分析实验室，大家都知道，在新型合金坩埚里或者在作为废料的元素分解中，有时会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混合物，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些混合物，但这些混合物原来却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把这混合物想象为帕列赫。村里的手艺因为无用而被抛弃，但村民们在生活中留了下来，手艺在他们的眼睛里和手指上留了下来，他们的眼光和生活在革命的坩埚里改变了，——帕列赫人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的初期和他们的艺术都是时代带给他们的，——这一步棋对于帕列赫未必正确。

帕列赫曾经是，现在也是凭借俄罗斯的规律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俄罗斯的一个乡村。在自己的几个世纪里损失过许多许多的帕列赫依然把鲁布廖夫、奇林[①]、季奥尼西[②]的传统从十七世纪保留到1917年。拄着桧木拐杖走在帕列赫戈利科夫大街上的发狂的戈利科夫[③]没有画骑着白马咬人的龙、常胜将军格奥尔基，却画了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④]式军帽、骑着红马咬人的反革命多头蛇，——安德烈·鲁布廖夫的技巧和传统再现了，布琼尼成了神话，我们的时代与布琼尼的神话一起发生了，艺术体现出来了。每到傍晚就和小孙女坐在巴卡诺夫大

① 奇林，俄国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斯特罗加诺夫画派的画家。
② 季奥尼西（约1440—1502/03），俄国著名画家。
③ 戈利科夫（1886/87—1937），俄罗斯装饰美术大师，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
④ 谢苗·米哈伊洛夫·布琼尼（1883—1973），苏联元帅，国内战争英雄。

街自家附近的长凳上的学院派的和纯理论的巴卡诺夫没有画圣母和约翰，却画了两个人——他和她，他们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在十五世纪的圣像的“棱线”之间，天蓝色和粉红色的云朵缭绕在他们身边，他把这幅作品称之为“初吻”。普罗科皮·奇林的技巧和传统使接吻变得神圣，成了艺术。功勋艺术家科图欣把村苏维埃的会议画成了最后晚餐的陈列……这一切对于帕列赫是不真实的。说帕列赫在鲁布廖夫的教堂圣像画的传统中保存了下来是不真实的。说帕列赫被封闭在神话和变成神话的古代是不真实的。说帕列赫将与自己的前辈一起死亡是不真实的。

帕列赫艺术博物馆与帕列赫艺术家协会的画室紧挨着。与博物馆毗邻的是帕列赫中等美术学校。一般说帕列赫是俄罗斯的一个乡村，村里有艺术家和集体农庄庄员，过着普通的生活，而且有些集体农庄庄员梦想成为和正在成为艺术家，以及有些艺术家梦想成为集体农庄庄员。老一辈集体农庄庄员和艺术家们的妻子都具有同样的品质和同样的地位，而且艺术家们根据一系列艺术的-日常生活中的情形称自己的妻子为“警察”，为了摆脱开她们，艺术家们在家里安装了无线电广播，免得她们感到寂寞。帕列赫村有两条大街——巴卡诺夫大街和戈利科夫大街，这两条大街都有用当地的方言俚语起的绰号——“弗戈列”[1]（即巴卡诺夫大街），“斯洛博达”[2]（即戈利科夫大街，在帕列什卡河后边），伊林斯洛博达[3]（这个名字还没有人叫），这就是帕列赫村，为了对艺术家们表示尊敬，现今为区中心。这些艺术家主要来自最普通的俄罗斯农家院，他们都有“庄园”、

① 意为“在山里”。
② 意为“自由村”。
③ 意为“伊林自由村”。

菜园、板棚和谷仓。帕列赫村不同于其他俄罗斯乡村的只是帕列赫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挂着表现出帕列赫手艺的绘画和肖像。犹如街道有自己的外号一样，艺术家们在方言俚语中也有绰号。戈利科夫的绰号叫塔拉干[①]，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的绰号叫伊万·扎别洛伊。

……了解——这还不等于掌握。

翌晨，艺术家、前艺术家事务主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瓦库罗夫（不是那位著名的功勋艺术家）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女东家（她把自家的整个农舍都让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住了，自己因此而搬到顶间）报告说：

“我们家这群牲畜真新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公牛在吃母牛的奶呢！”

翌晨，两位艺术家来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朋友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和朋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他们一起到劳动组合，也就是到艺术家协会管理委员会找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朋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去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喜欢上了十六世纪俄国圣像画的颜料，更为奇怪的是，他酷似荷兰人，画了一幅《海湾的绿橡树》，把自己画成一只猫学者的形象，戴着金链子和金眼镜，和普希金在一起，他的绰号叫伊利亚·费多托维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瓦塔金收藏和喜欢上了十二世纪的圣像画、十五世纪的色彩和十七世纪装饰图案的风格，他捍卫帕列赫的风格到了保守主义的地步，故此，他的绰号叫叶尔莫

① 意为“蟑螂”。

莱·奥霍特尼克，也叫韦洛西佩德[①]。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协会管理委员会主席、专职批评家和协会传统的捍卫者，他的绰号叫博罗纳[②]。朋友几个相约去捕鱼。

“别吱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说。

“什么都别说，”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说。

“就这些，”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

四点钟之前，艺术家们在工作。四点钟，他们出发到邻村佳基列沃找艺术家-哲学家和朋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季诺维耶夫，他提前离开去准备大鱼网了。在到达佳基列沃的途中，碰上几匹显然是戈利科夫、布托林、德德金共同创作的一幅画中的马，这些马也是长着那样的脑袋和弯曲的脖子。他们到柳列赫湖去捕鱼，湖里长着芦苇和睡莲。柳列赫湖没有塔尔卡河大。艺术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季诺维耶夫（他就是库兹马·西多罗维奇）和采办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著名功勋艺术家伊万的兄弟（即亚历山大——皮斯通[③]）是这次捕鱼的发起人。柳列赫湖向黑魆魆的森林流去，两岸小树林中草地如茵。起初，艺术家们没有下水，后来不知想起了什么，他们钻进水里，往外拖大鱼网，可是每一次撒网捕捞上来的都是一条小狗鱼，两条小鲈鱼，要么就什么也没有捕捞到。鱼是没有捕到，但艺术家们的热情没有消退。浑身湿淋淋的艺术家们在大鱼网上边，在长着睡莲和芦苇的绿茵茵的湖岸上，非常像好嘲讽人的人、诗人和帕列赫的法国人、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在他的关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所画的以及许多其他大师们所画的那些细腿渔民。艺术家们

---

① 意为“自行车”。
② 意为“耙子”。
③ 意为“雷管”。

往黑魆魆的森林里拖着大鱼网。夕阳西下，在巴卡诺夫、祖布科夫和瓦库罗夫看来，夕阳是不同的。这时在黑魆魆的森林这边，捕鱼结束了。捕了三条小狗鱼，八条小鲈鱼，大约十五条拟鲤。带来的煎锅、亚麻油、面包、腌黄瓜放在黑魆魆的森林里的松树下，当然还有伏特加。采办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皮斯通——占了指挥者（好用长官下命令的口吻说话的人）的上座。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秉承了人民演员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的风格和品质的演员。他派其他艺术家去捡枯树枝了，于是他便生起了篝火，着手刮鱼鳞，并亲自用亚麻油煎鱼，动作优美娴熟。他放了许多盐，鱼煎得齁咸。太阳落山了。森林里静下来，笼罩着一片绿色的昏暗。浑身湿淋淋的艺术家们开始把裤子和衬衫脱下来，变成了赤裸裸的圣像，把裤子和衬衫在篝火上烤干。鱼做好了。太阳落到地平线后面了。森林里黑了下来。篝火的火星向暗淡的星星迸溅。森林重现了未名湖上的夜晚。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斟了第一杯酒。他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叶尔莫莱——都是歌手和领唱。他们唱起来：

我的小小银酒杯，摆在金盘上，谁来喝下这杯酒，谁把这杯酒来喝下？……

艺术家们彼此请唱歌和敬了酒。在明亮的天空映衬下，松树和云杉仿佛既是被翻倒在了天空中，又是别连捷耶沃海底的多枝杈的树干。他们的面孔和赤裸的身体有点发绿。又喝了一巡酒，雾气从河那边漫上来，酒使黑魆魆的森林模糊不清的轮廓更加不清楚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赤着脚，没有穿裤子，穿着别人的大衣，走到篝火旁的旷地上，他像挥动头巾那

样挥了挥荚蒾树枝，用脚画了一个8字形。他唱道：

从森林后边，从黑魆魆的森林后边
走来两个年轻人……

艺术家们随着唱起来：

啊人啊人，两个年轻人！

艺术家们站成一个圈，手拉着手。艺术家们转起圈来。

两个年轻人，两个单身汉，
他们一起走，鞠了一个躬！……
　　啊人啊人，鞠了一个躬！……
他们吵翻了，分道又扬镳，
为了一个漂亮女郎，
　　啊人啊人，为了一个漂亮女郎！……

赤着脚、没有穿裤子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在圈子中间走来走去。他开始俏皮地走8字形，在笑声中挥动着荚蒾树枝，他一边认真地结束唱歌，一边踏着轮舞的节拍轻盈而优美地转圈，完全忘记了他既是皮斯通，又没有穿裤子。协会里没有女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用最最纯真的动作，实际上几乎像女人那样，啪的一声击掌打拍子，开始跳起舞来。

他们唱起了另一首轮舞歌曲：

在空旷的田野上，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我在漫步，
我在徘徊，
把苦恼与寂寞丢弃！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我丢弃了忧愁与寂寞！……
我的寂寞长熟了，
好似一颗青草……

森林很古老。篝火把火星向天空抛去，针叶冒着袅袅青烟，驱赶着蚊子，使烟和雾混合在一起；篝火向黑暗，向松树和云杉的行间，向躲藏在这片森林里的狼和驼鹿延展。朋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管理委员会主席、批评家和差不多是个好讽刺的人的人，绰号叫博罗纳，也叫利特维诺夫，坐在一颗被伐倒的云杉上，不时笑笑，吸几口马哈烟。为了让人听见他唱歌，他尽量高声唱起来：

在密密的森林里，
走着一伙强盗，
他们健壮的手里
抬着一个同伴！……

大家随声合唱起来：

他们健壮的手里
抬着一个同伴！……

担架非同一般，
是用火枪编就，
而且钢剑
横挎身边！……

“强盗们”举止得体而庄重地互相请唱歌和敬酒，又喝了一杯，艺术家们停止唱歌，抱干树枝去了，篝火熊熊燃烧，火焰和火星窜起老高，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飘散出燃烧的针叶气味。篝火的火焰一向神神秘秘。艺术家们站在篝火旁。这些艺术家们所画的数百篇童话中的宝剑、强盗和骑士统统在篝火中烧尽了。六月，霞光与霞光相遇。已是午夜时分。德米德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在午夜里唱歌。在同志们默默的关注下，他眼睛里噙着泪水，独自在唱。

在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
我全心爱着一个少女。
她的眼睛是天蓝色的，
脸上洋溢着爱的激情。
她面前有你，五月的早晨。
你，茂密的树林-母亲绿茵如盖！……
草原，青草如丝一般，
朝霞、黄昏、具有魔力的夜晚，——
她不在的时候，你们多美好，
把忧愁和寂寞与你们共同分担。
有她在的时候——没有你们该多好。
与她在一起，冬天如同春天，黑夜如同白昼。
我忘不了我最后一次

对她说的话，——请原谅，亲爱的……

显而易见，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把自己整个的心投入到这首歌里了，也许还有命运，——他是单身，是叶赛宁[①]式的多情善感的人。朋友们不作声了，沉静下来。认真听他唱歌。篝火已经灭了，只有树根还在阴燃。在离篝火十步远的地方，在松树和云杉后边，绿色的夜晚渐渐过去了，雾悄然漫上来，凉飕飕的，森林里有一股松脂、霉烂、蘑菇的气味。树木凝然挺立，静寂无声。夜鸟在森林里交相啼啭，蚊子在白桦树旁发出嗡嗡叫声。

天渐渐亮了。

这一切：捕鱼、篝火旁的夜晚、轮舞、唱歌——所有这一切，布托林、季诺维耶夫、祖布科夫、巴卡诺夫、马尔基切夫、瓦库罗夫、科图欣、切库林，都已经画过数百次了；篝火和日出、森林、强盗和骑士、金鱼和金鸡，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美丽的少女，啊，人们啊人们，美丽的少女……没有醉鬼。全是幸福的人们。

当他们去过佳基列沃和离开佳基列沃前往帕列赫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即伊利亚·费多托维奇，说：

“女人们说，我们家畜群里，一只公牛在吃母牛的奶呢，——真是怪事！”

他们回到日常生活中。开始议论起妻子们。

“‘警察们’又要找碴儿了。”

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丘尔金，绰号叫托波尔[②]，

---

① 叶赛宁（1895—1925），著名俄罗斯抒情诗人。

② 意为“斧头”。

是伊壁鸠鲁[1] 主义者，胡子比列夫·托尔斯泰的还要大，他是一位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一位擅长讲长诗《乡村生活美景》的人（他用拟声朗读这首长诗），一位共产党员，白发青年，艺术家，正在写社会的不公正的长诗和《往事与随想》的作者赫尔岑流放的故事，他说：

“从广播里听听这些事情对女人也好，丈夫们不在家，有人可听，有东西可学——她们也不会落后于时代的。”

他们在帕列赫的围墙跟前告别时互相吻了三次，以示友谊。为了不让妻子们，也就是警察们，知道他们去过什么地方，艺术家们都商量好了。

“别吱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神秘地说。

“什么都别说，”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也神秘地回答说。

“就这些！”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肯定道。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勤奋地工作到四点，午饭前，他们和学生们，和“大学生们”一起工作，午饭后，他们彼此避开，在漆器上画出自己最好的画，或者画好以后再涂一层漆，用食指把金粉和颜料和开，并且用蛋黄稀释颜料，用牛牙研磨金粉和银粉，用狗牙或狼牙研磨效果更好，透过放大镜，用比蚊子的鼻子还细的画笔来画，缜密思考自己的构图，把它们画在漆器上。

帕列赫生活着惊讶的人民，对世界上和他们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的艺术家们，工匠们。祖辈们惊讶而快乐地走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现在由于年事已高不再参加社会生活，只是指点指点，像季诺维耶夫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那样，但他们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能够一杯接一杯地喝伏特加，摇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不时地得意地笑笑，说："真有你的，多幸福啊！……"长辈的工匠们惊讶地走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曾经是圣像画工、世界大战的士兵、红军战士，丢下自己古老的手艺，被吓跑的能工巧匠——他们现在仍是能工巧匠。第二代能工巧匠惊讶地走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是巴热诺夫、卡乌尔采夫、图林、索洛宁、索洛巴诺夫、巴拉诺夫。1922年，在做出从事艺术或制作毡靴哪个更好一些的决定时，他们颇感棘手。不感到惊讶的只有年轻人。

这个村里的马其实很像戈利科夫画的马。这个村里的集体农庄庄员其实都在成为艺术家，而有些艺术家，特别是他们的妻子，向往着集体农庄。这里的女人其实不管在节日还是平日总是戴着她们的丈夫和兄弟所画的胸针，并且胸针上绘有鹿和扁角鹿的图案、歌词和童话。这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艺术。孩子们从三岁开始就搞艺术，——他们与生俱来有一双艺术家的手，一出生就会握画笔。

一百年前和三十年前，一部分帕列赫人从事了艺术，另一部分人离开了艺术，当了熟皮工、鞋匠、裁缝。种田养活不了家。艺术家阿里斯塔尔赫·德德金的父亲是个庄稼人，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阿里斯塔尔赫·德德金不同凡响地把弗鲁别利[①]、中世纪的波斯人和米开朗琪罗[②]的风格融入了自己的漆画中。他识字不多，六岁开始学画，在革命前，在劳动组合前，他当了二十年圣像画工。德德金的孩子们——三个儿子——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土地测量员，一个是连长奇库林。奇库林是圣

① 弗鲁别利（1856—1910），俄国画家。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像画工的儿子，识字不多，曾跟尼古拉的一个士兵学过文化，他的儿子们都是老师、团政委、工艺工程师、医生。布托林是个粗通文墨之人，单身汉，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的独唱者，他有两个侄女，都在帕列赫当老师，和他一起生活，叫他叔叔，对他十分尊敬。

所有艺术家们都是这样的情况。整个村里都是这样的情况。

族长萨拉平，帕列赫最年长的居民，年事已高，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问，为什么我们从前画圣像？因为我们要赚钱……”

萨拉平知道，尚在十七世纪，帕列赫就有了画圣像的手艺，再早些时候，他对这事就一无所知了。他非常清楚，帕列赫隶属于地主布图尔林和格里亚泽夫，这两个地主只管让帕列赫人承担代役租，对他们画圣像的事情并不干预。布图尔林的庄园管理人是萨福诺夫家族、帕列赫的封建领主们的家族、圣像作坊的所有主们的家族，他们在帕列赫为自己建起了石头房子和帕列赫圣像工场的作坊兼工人集体宿舍。萨拉平不知道有档案记载。布图尔林老爷们和伯爵们住在莫斯科。住在帕列赫的是工长和庄园管理人——萨福诺夫家、诺戈维岑家、瓦库罗夫家。布图尔林老爷们经常给乡下的庄园管理人写“命令”：

“某某工长启。收到本命令，您要对我们的农民们严加看管，使他们服服帖帖……如果我们的农民之间发生什么争吵，把吵架者找出来，对其加以严惩——笞杖抽打。此事不必写信告诉我们，也不要枉然地来打搅我们……”

庄园管理人鞭笞了吵架闹事的农民，把他们抓起来，戴上镣铐，课以没收财产的处罚，使其服兵役。

“本村居民大多采用希腊的圣像画法，而画好的圣像大多数发往各个城市去出售……除了每星期三有集市外，本村于9月

14 日还举办一年一度的交易会……”

帕列赫人向庄园管理人缴纳实物贡赋、人头税和土地税，女孩子长到成年和寡妇在集市上买马才纳税。根据“一八四七年一月上半月的代役租清册”庄园管理人萨福诺夫缴纳了五十五卢布五十戈比，“并为他的女儿交税两卢布十戈比”。1917 年的革命没收了萨福诺夫六百万卢布。这件事萨拉平不知道。萨拉平记得，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前大约五年，布图尔林家和格里亚泽夫家闹翻了，吵架之前，两家关系很友好。闹翻以后，他们用简易的方法把自己在帕列赫没有划地界的土地划分了地界：朝阳的一面归布图尔林所有，背阴的一面归格里亚泽夫所有。被分别登记在布图尔林和格里亚泽夫之间的农民既住在左边，又住在右边。地界很快划定了，所有布图尔林的农民很快搬进了右边的农舍，而格里亚泽夫的农民搬进了左边的农舍。有些从简陋破旧的小屋里搬出来的农民住进了用主墙隔成两间的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有些农民则搬出了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住进了简陋破旧的小屋。萨拉平知道，——萨拉平以自己的方式给“外国人”这个词下了个定义。按照他的理解，凡不是在帕列赫出生和居住的人都是“外国人”。萨拉平记得，七十年代，“外国人”费利莫诺夫将军来到帕列赫，招募除了萨福诺夫以外的工匠去修复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他委托工匠别洛乌索夫来招工，后者从此开始走上坡路，成了萨福诺夫的竞争者。

萨福诺夫年龄较大，非常保守，他恪守“老风格”，拜占庭-诺夫哥罗德-苏兹达利-雅罗斯拉夫尔风格。别洛乌索夫比较机灵、年轻，不那么有权威和富有，所以他更多的是遵循“招牌风格”，看重欧洲影响和合适的市场。萨福诺夫和别洛乌索夫祖孙三代都识字不多，但对自己的行当，对俄罗斯圣像，对它的

时代与风格却十分精通，对于孔达科夫[1] 和扎别林[2] 来说，在这一行里，他们是无庸置疑的鉴赏家。祖孙三代都当着伊万诺沃的工厂主，穿着紧腰长外衣，吃烤馅饼，喝伏特加，都是酒糟鼻子，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去承接定货，但他们却住在帕列赫，住在石头房子里，门口拴着狗，养着吃得白白胖胖的情妇。他们之中唯一一个小萨福诺夫，当时他根本不识字，由于行贿而获得人民教师的称号，目的是要摆脱义务兵役制。他在克拉斯诺耶村建了一所教会小学，雇了一位教师来代替自己，但他仍给自己保留了学校主任的职位。萨福诺夫的头衔是“世袭荣誉公民”和“陛下宫廷的供应者”，因此他家里和作坊里——为了让人惧怕——贴了许多巨大的镀金双头鹰。1917 年十月革命没收了萨福诺夫家靠画圣像积攒起来的六百万卢布，但是目不识丁的萨福诺夫们竟然对资本主义颇为精通，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数百万卢布存在俄国银行里，而且还存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银行里。

所以，所有现在的艺术家们，老一代，从六十五岁的巴卡诺夫起，都上过萨福诺夫和别洛乌索夫的同一所学校。除此之外，这些惊讶的、出色的人还有一副极硬朗的身板。九周岁时，母亲把他们每一个人都领到主人跟前跪拜——带一小包蜜糖饼干——然后送到掌柜那里。

掌柜把蜜糖饼干分给其他半大孩子们，于是这些孩子们就开始了学徒生涯。徒工被指定由师傅来带，夏天从早晨五点学到晚上十点，冬天从早上七点，但晚上还是学到十点。他上的第一堂课是画“圣容”、“上帝的手”，然后画把三个指头捏在一

① 孔达科夫（1849—1925），俄国拜占庭史学家、古俄罗斯艺术史学家。
② 扎别林（1820—1908/09），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起的手，然后再画拿着短鞭子（学徒的象征！）的手。徒工们学习打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开，还学习调色。学习《贝察塔拉》这本书。学会用铅笔画和临摹以后，转而“学刀刻”，学使用颜料。画圣像是有统一规格的，是分开来画的。画工们有分工，有画面部的，有画躯干的，有涂底色的，有搞模压的，就是说，有的准备制作圣像所用的木板，有的画“圣容”，有的画圣像的衣服及其位置——带大理石板（即圣像阶梯）的大地、庙宇、天空、云彩和大海，以及画“富丽堂皇的书信”和“盖圣餐的布”，还有的是模压工——给圣像装金框。徒工学习画面部，画躯干或者学模压。徒工很快知道了有三百三十个圣母：“滋润万物的源泉”，“三手”，“一棵烧不坏的灌木”，“意外的喜事”，“永不凋谢的色彩”，“助产妇”，“坏心肠变软”（四个圣母——四个软心肠圣母，四副不同的“面孔”），救世主多极了，几乎都有了，连显灵者“湿胡子救世主”都有了。徒工很快就尝到了挨鞭子的痛滋味，在第三次画圣像的课上，他画了鞭子。掌柜向来把鞭子揣在怀里。每一个圣母和每一个救世主都必须临摹，要临摹得十分精确才行，只能临摹，因为画得不合乎神圣的规格会被认为是渎神行为。徒工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师傅看，而每逢星期六，掌柜要检查徒工的所有作品，——进行“展示”，于是徒工知道了，如果掌柜把他的作品放到一边，不马上还给他，检查过圣像的“展示”以后，徒工将会挨一顿鞭子。为了以防万一，每逢星期六徒工便穿上次等的染色土布裤子，把围裙塞到裤子里，以便遭受鞭打时减轻一点疼痛。徒工知道，六月份不画圣像，掌柜要打发他为主人摘浆果、草莓和黑果越橘，水越桔、马林果；在割草期，他要为主人翻干草；等到长大一点，他要为主人放鹅，为师傅们打酒，师傅们下工以后，他要收拾作坊。这样要持续六年。但是在这六年期间，徒

工仔细看过了许多画，有拜占庭的、有俄罗斯的、有诺夫哥罗德的、有雅罗斯拉夫尔的、有意大利的，见过了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世纪的色彩，见过了人类非凡艺术中的一门艺术的构图，即使这门艺术已经衰落，但它至今在自己的本源中仍是极好的艺术。徒工学会了认识这些画，并通过它们认识人间万物；徒工学会了调色，并了解了十二、十五、十七世纪的色彩规律。徒工了解了这几个世纪的图画和构图。徒工知道了反透视法，知道了把圣像画得那么美的"秘诀"，徒工获得了古代艺术中的技巧（在古代，古代艺术与民间创作的起源有着密切联系）。徒工看到了封建主义的赤贫，并了解到有三百三十个圣母，在他步入人生、学会制作上帝之前，他已经见过上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听过了神甫和修士的故事——徒工现在已经不信东正教的上帝了。

第六年的学徒生涯结束时，主人给了徒工一块涂上底色的木板。徒工（如果他是躯干画工的话）自己酌量着在这块木板上画一个或几个圣像。其他画工在这块木板上补画上"面部"，进行了模压。这幅圣像取名叫《出行》；它归徒工个人所有，它是考试，主人拿这幅圣像祝福徒工出徒了。于是，主人给徒工"存上"了薪俸——年薪十个或十五个卢布，有时主人拿发面煎饼或公鸡顶替他的薪俸。

徒工成了画工，每到冬天就在萨福诺夫家或别洛乌索夫家的圣像作坊里画圣像，——"因为我们要赚钱"，——正如族长萨拉平所确定的那样，——而到了夏天，他则"出远门"给修道院和大教堂去画彩绘，有许多修道院和大教堂——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基姆雷、穆罗姆、科斯特罗马、萨马拉、萨罗夫、比斯克、托姆斯克、基辅洞穴修道院、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伊帕季耶夫圣三一修道院（罗曼诺夫王朝就是从这里登上俄国

皇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季耶夫别墅的地下室里结束了自己的存在)，就是说圣像画工们通过教堂和教堂的日常生活使自己对现实和俄国有了认识，他们为现实所迫，既不信鬼也不信神。

这就是工匠、外出打工的手工业者，像熟皮匠的皮革一样，画圣像就是他们的行当。

这一行当通过目不识丁的萨福诺夫家族和学识渊博的孔达科夫深入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堂、多棱宫、莫诺马赫[①] 的宝座前、帝国和帝王的柱石们和宝贵遗物[②] 前。

这一行当教会了瓦斯涅佐夫[③] 和涅斯捷罗夫[④]。

可是手工业者们回家作短期休息（家里有母亲和妻子，她们从事农业，画圣像对于农业只是一种补助），过着“为了赚钱”而外出打工的俄国手工业者的生活，决不拿自己与孔达科夫、瓦斯涅佐夫、涅斯捷罗夫相比，除了少数几个“被色彩的游戏所征服”的人以外，这是戈利科夫的定义。画工们不怀疑他们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他们毫不怀疑瓦斯涅佐夫、涅斯捷罗夫和哈尔拉莫夫院士应该向他们学习。

画工们在“陛下宫廷的公民”萨福诺夫和萨福诺夫-别洛乌索夫圣像作坊的镀金双头鹰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离开别洛乌索夫到萨福诺夫那里，可以离开萨福诺夫再回到别洛乌索夫那里，仅此而已。他们生活在“多神教”里，就是说掌柜经常告密和窥探。画工们都是不留姓名的，他们不在自己的作品下面署名，只在作品背面署上“宫廷公民”。

---

① 莫诺马赫曾为沃伦、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等地的公。

② 指耶稣或其他圣徒的遗物。

③ 瓦斯涅佐夫（1848—1926），俄罗斯画家。

④ 涅斯捷罗夫（1862—1942），俄罗斯油画家。

在地窖里什么地方，或者在森林里，或者在板棚下边，藏有极好的帕列赫的宝物，找到这个宝物将会被认为是对帕列赫博物馆的卓越贡献，——重有九普特[1]的1905年革命地下活动的文献，是当时（时间正好与塔尔卡相吻合）帕列赫地下革命小组的财产。参加这个小组的圣像画工有当今的功勋艺术家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图欣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有当今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和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尼基季奇·维岑，有第十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帕列赫的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协会管理委员会委员、艺术家和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奇库林及其兄弟阿列克谢，有祖布科夫兄弟俩，有亚历山大主席和嘲讽者、诗人和法国人伊万，有画了一幅《加夫里尔号颂》作为礼物赠给保护文化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和艺术家伊万·科列索夫，以及萨拉平，霍赫洛夫，米哈伊尔·科马罗夫，斯温佐夫，科林（在莫斯科为自己建立荣誉的艺术家之一）和其他人——大约三十人。

为了学习，他们常常在森林里聚会。在别洛乌索夫的作坊里，他们自愿捐出工资的百分之二，订了报纸、杂志和书籍。

亚历山大·祖布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图欣外出打工时在萨马拉附近，在穆索尔卡村，把革命者的枪支藏匿在教堂圆顶下边，并像农民那样，参加了关闭教堂，把一丝不挂的神甫从村里赶出去。

萨福诺夫把四十名工人逐出自己的作坊，在家里窗户上安装了铁栅栏，并从那时起，开始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十月十日在“聚餐会”上，这时作坊转入冬季工作，即作坊里晚上开始

---

① 1普特合16.38公斤。

点灯，——按照传统，这天晚上画工们与主人别洛乌索夫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喝酒，——但是在聚餐会上，圣像画工们拒绝同主人喝酒，——向他提出八小时工作日、新的计件工资、派专职清扫工（代替画工们下班以后进行清扫的徒工）作为庆贺。别洛乌索夫哼哼哈哈地请吃准备好的丰盛食物，请喝伏特加，想把事情化为玩笑糊弄过去，但他以十小时工作日和雇一个清扫工，甚至还给作坊订了《农村通讯》、《绘画评论》、《田野》、《祖国》和《祖国言论》把事情了结了。

在使帕列赫教堂里新的被修复的圣像壁神圣化的时刻（别洛乌索夫成心这样做来刺激萨福诺夫），恰好在这一时刻，帕列赫的围墙上挂出了帕列赫人画的漫画和预先准备好的、画着可怕的嘴脸的别洛乌索夫、萨福诺夫和那个由于红塔尔卡而心动过速的省长列昂季耶夫。朋友德米特里·布托林，从少年时代初期就多愁善感的人和佛拉芒人，当时还是个半大孩子，穿着破鞋，露着脚后跟，拿着传单满村子跑。当天夜里，当主人们，省长、神甫和警察们正在参加宴会时，胶印器在卡拉瓦伊科夫的地下室里工作着。萨拉平和拉宾在印教堂庆典的传单。露着脚后跟的布托林拿着这些传单也满村子跑。米哈伊尔·科马罗夫那天夜里提着一小桶颜料守护着黑漆漆的夜。他在刚刚使神圣化了的教堂里用巨大的字母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打倒剥削者！”在别洛乌索夫家（省长在这里参加宴会）的大门上，同时还在萨福诺夫的双头鹰的下边，他写下了：“打倒专制制度！”从桶里滴出来的颜料的痕迹黎明时把县警察局长引到了科马罗夫的农舍。米哈伊尔被捕了，他在监狱里遭到警察的毒打，被打得咯血了，他被判处三年徒刑，并患痨病而死。他在狱中画了一幅画——一个胸部受伤的人迎着一位行者渐渐抬起软弱无力的头，行者把装着水的水壶递给受伤的人，行者旁边站着一头

驯顺的毛驴，周围则是孤零零的一片沙漠。科马罗夫死于痨病。这幅画收藏在伊万·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那里，挂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惊讶的艺术家们至今还在争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是不是到帕列赫来参加了地下党的会议。有些人坚信他来过。另一些人则说，他原本应该来，但没有来到。至于格拉乔夫同志，塔尔卡工人代表苏维埃书记，他的确来过帕列赫。

所以有一次，当酒喝到后半夜和跳过轮舞时，惊讶的艺术家们便回忆1905年，坚定不移地揣度宝物究竟被图书收藏家尼古拉·拉宾藏在了什么地方。好像找到这宝物，重新读一读，回忆回忆朝气蓬勃的和第一次读这宝物时所产生的意识和心灵的震颤的青年时代该多好啊。于是亚历山大·祖布科夫这时便讲述他是如何把这宝物的一部分从萨马拉随身带出来的，他至今讲起来仍用小声说：

"当时在梁赞的车站上要检查行李。轮到我们时，主人的儿子出示了证件，证件上列出了我们携有教堂壁画，我们的行李都是颜料、金粉和圣书。连主人的儿子都没有怀疑他携带的是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就没有被搜查。我们把全部文献完好无损地送到了，而到达以后，我把它交给了我们的图书馆……就是这么回事！……"

圣像画匠和模压工亚历山大·尼基季奇·维岑从1905年以来留在党内搞地下工作，坐过监狱。他像大乌鸦一样在帕列赫绕来绕去，因为在帕列赫乡管理委员会有一份关于立刻逮捕

---

① 伏龙芝（1885—1925），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军事活动家、军事理论家。1905年领导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工人罢工。

在逃“苦役犯”，将其押送到所指定地点的“公文”。1917 年，维岑与伏龙芝一起在舒雅建立了一支红色近卫军……

不言而喻，圣像画家和修士都知道宗教的幕后勾当，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言而喻，圣像画家和修士经常在一起喝酒，味觉敏锐地品味着黑豆叶露酒或黑豆芽露酒（哪个更好呢?），他们一边畅饮着黑豆芽露酒，一边说着“知心话”——关于事儿和“娘儿们”。修士的事儿就是祈祷、显灵、圣尸。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圣像画匠和一个修士司祭为了换换花样在洞穴修道院一起喝伏特加，把装有圣尸的圣骨匣摆在桌子后边，他们喝过了量，便把圣骨匣打开了，除了圣尸，他们在圣骨匣里鲱鱼罐头下边发现了一只盒子和一些空瓶子，显然是先前的酒鬼们留下来的。而“娘儿们”，——在家常俚俗词语中，一般不叫修士们的名字帕弗努季或瓦拉希阿尔，而叫公马。在进修士的单间居室之前要说一句：“托我们神甫的福，我们的上帝耶稣，请宽恕我们吧！”假如修士不回答“阿门”，那是绝不能进他的居室的，因为要么他喝酒喝过了量，要么他正在跟“娘儿们”寻欢。修士们住在邻近的自由村里。商人的妻子和寡妇小市民到修道院里来是为了在对上帝的敬奉中和禁欲中得到极大的愉悦。有些人被用“上帝的幻想”和吩咐勾引坏了。有些人被诱骗到单间修道室里作忏悔。许多人被强奸了。帕列赫有个画工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希什金，是一位出色的圣像画家。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雇他到修道院圣像作坊当老师。他携家眷启程前往修道院。他九岁的女儿有一次到修道院食堂去取面包时被修士们强奸了。修士们由于酒足饭饱和无所事事，经常干一些难以诉诸笔墨的勾当，在自己的小修道室里穿女人

的衬裤，扮成轻佻女郎[1]。修女被称作“上帝的小母猪[2]”，按照当时的传统，在修道院里，妇女的命运比男人更艰难，更不幸。假如大多数修士到修道院来是因为懒惰，因为挫折，因为道德缺陷，是为了白吃的饭，那么不管怎样，他们都是自愿来的。而绝大多数妇女则是被别人，被父亲的诺言，被生活的挫折和痛苦从周围的人们中所抛弃而打发到修道院来的。根据帕列赫的印象，说实在的，修女似乎就应该被强奸。圣像画工爱上了见习修女，见习修女爱上了圣像画工。见习修女通过老妪把念经穿的便鞋、餐巾、马哈烟以及便条捎给圣像画工。圣像画工通过老妪把诗、自己亲手画的女人头像和希望幽会的苦苦哀求的便条送给见习修女。圣像画工们哀求见习修女出来一下，哪怕在墓地或者小树林里散散步也好，哪怕出来一小会儿，看上一眼也好。如若修女来到小树林，她就该被强奸，因为那种极端情况，即她们向上帝许诺要当基督的未婚妻，她口头上永远不会答应做那种事，而她们不开口说话往往就意味着非常满意。修女身上有一股神香气味，修女到小树林来了，于是第二次，第三次，圣像画工的鼻子判定，神香气味里混合着一股香水气味。圣像画工明白了，这香水是为他们而喷洒的。圣像画工弄不明白的是灾难深重的人世间的贫穷与苦难！……

帕列赫有过一位圣像画家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希什金，一位出色的画工。他曾受雇于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的圣像作坊。他的女儿被强奸了。有见证人。他跟修士和大修道院打官司，结果他在所有的法官面前反倒成了罪人，他被判了罪，被逐出大修道院，蒙受了耻辱，变得一贫如洗。关于这件事圣

---

① 法国小说、喜剧里常见的一种角色，多为女裁缝、歌女等。

② 指下贱的人。

像画工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基辅洞穴大修道院里，除了对观察者开放的圣尸洞穴，除了可以说是跳舞用的洞穴以外，好像还有一个刑讯洞穴。在这个洞穴里，对不听话者进行拷打，其中包括修士，也包括妇女和儿童，受刑者被吊在拷刑架上，被施以脚镣，中世纪所有的行刑方法都用尽了。有些人在这个洞穴里经年戴着镣铐，并在镣铐上慢慢死去。第聂伯河一带有许多洞穴的山林土壤具有使人体变为木乃伊的特性，制木乃伊的专家们也曾被派到这个刑讯洞穴来。这个洞穴里制作的木乃伊就是在这个洞穴里被折磨致死的那些男人和女人。木乃伊用作了圣尸。关于这件事圣像画工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行当就是附属于教堂、附属于修道院的行当。

他们的行当通过不识字的萨福诺夫家族，通过博学精深的孔达科夫和知识非常渊博的扎别林深入到了帝国的柱石们那里。

他们的行当教会了瓦斯涅佐夫和涅斯捷罗夫。

这与圣像画工无关，他们都是不留名的。圣像画工们知道，萨福诺夫、孔达科夫、帝国的大修道院——都是一回事，是柱石——不要跟他们打官司，像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希什金打的那场官司那样，——把宝物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像图书馆的宝物、1905年的宝物、塔尔卡的同龄者那样被藏起来一样。

……当然，卡帕布兰卡
比年轻棋手更了解象棋规
则，其目的是为了运用他们，
也是为了破坏它们……

在帕列赫，在很早以前的时候，人们就喝酒，喝得很凶，只

有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手工业者才会这样喝酒。但是在帕列赫比在图拉喝得多，因为帕列赫人被“色彩的游戏”毒化了，由于明白易懂的原因，他们既不信神也不信鬼。这是恶性的酗酒。在帕列赫，人们甚至编了这样一句谚语：有事干就不酗酒。

狂暴的和惊讶的戈利科夫在《帕列赫论坛》上撰文说：

> ……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一生都在画圣像和绘制教堂装饰。画笔和颜料一代传一代。画圣像的营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是糊口活命之粮。按照主人旨意画出来的作品遏制了我们的创作激情。自己这一辈子不得不上百次地画同一个能显灵的尼古拉。把自己的东西表现在圣者的脸上——这被看作是渎神行为。作品不过是老套子，没有任何艺术的新花样。诚然，我们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人，色彩的游戏使他们超越了圣像和教堂。这样一些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却被认为是失败者。他们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发脾气，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持，常常借酒浇愁，变为酒鬼!!!

这样的狂喝滥饮在帕列赫再也没有了。

在“世袭的荣誉公民和陛下宫廷的供应者”萨福诺夫的、布图尔林老爷家从前的农奴庄园管理人的双头鹰后面，几乎是神的半无产者们和帝国的柱石们一起要么变成酒鬼，被色彩的游戏所损害，要么抱着以萨福诺夫的方式摆脱困境，重振家业，发财致富，当小业主的幻想，——照当时来看，这种情况发生了，出现了。科罗瓦伊科夫家族，帕里洛夫家族、索洛乌京家族，以及不识字的、却相当懂行地把自己大笔的钱存到里昂信贷银行和伦敦银行的萨福诺夫家族善于搞这一套，把头伸出来，只要

照他们脑瓜上狠狠一击，定叫他们重又落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之后又沉湎于伏特加之中。

俄国历史走到了 1917 年。

惊讶的戈利科夫在《帕列赫论坛》上写道：

> ……我们，艺术家-圣像画家们，落到非常困难的境地……许多人绝望了，不再从事艺术这一行当，认为它被永远埋葬了。而我不信这个邪，我常常这样想："我们有画笔和颜料，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对劳动政权有用的人吗？"于是我开始渐渐认清形势。苏维埃政权改变着许多东西。把资本家关进监狱，没收其财产，而对艺术博物馆却丝毫未犯。并且我看到出现了新的绘画和宣传画。我由此断定，就是说，艺术在共产党人那里是受欢迎的。可是革命中哪里有我们的地位——我长久无法确定……

戈利科夫在舒雅和基涅什马画布景。巴卡诺夫、祖布科夫兄弟、季诺维耶夫在耕田种地。布托林在贫农委员会当主席，并为了挣土豆而在周围的村子里画肖像画。奇库林做木工活和画肖像画。瓦塔金在彼尔姆铁路上当司磅员。亚历山大·祖布科夫当过奥地利的俘虏。戈利科夫当过红色近卫军和红军。所有的人都在帝王的军队里干过。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记得，在 1922 年 12 月还是在 1923 年 1 月，惊讶的戈利科夫在莫斯科找工作时在手工业博物馆里看见了费多斯基诺[①] 的漆器，画在用高韧性纸坯做的盒子上的装饰画。

① 位于莫斯科州的一个村子。

我一门心思想着这些盒子。我寻思："如果我们帕列赫人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取下来，大家就都能吃饱饭了，不用再发愁了！"我和同伴找到了博物馆馆长，开始谈关于样品的原料。可是当他得知我们过去是圣像画工以后，他连谈也不跟我们谈了！

在戈利科夫的朋友那里发现了一个用高韧性纸坯做的小显影盆。戈利科夫把这个小显影盆的四边裁掉了，用金和银在它的底部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戈利科夫把这个盆底送到手工业博物馆，就是莫斯科列昂季耶夫大街上那座博物馆。戈利科夫的手艺从显影盆的底部看上去很漂亮，很精湛。这只盆底现今作为珍品收藏在博物馆里。这个盆底是帕列赫艺术家协会的基础，协会的五名会员，包括戈利科夫，都是苏联功勋艺术家。这个盆底是建立帕列赫博物馆的起因，现在博物馆里挂着许多奖状和获得全球金质奖章的证书。这个盆底是庆祝1935年3月13日帕列赫艺术十周年纪念日的起因，实际上帕列赫人从1917年以来十年间对艺术所做的比十七世纪以来三百年间所做的还要多。

在帕列赫周年纪念日活动的日子里，在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去伊万诺沃和舒雅的车票。列车车厢变成了艺术俱乐部。伊万诺沃和舒雅的车站上悬挂着欢迎代表们的标语，从直抵帕列赫的公路上开来的汽车和公共汽车等候在车站上。帕列赫在纪念日到来之际变成了区中心，这条公路就是专门为帕列赫而铺设的。到这里来的有数百名代表，电报局发来数百份电报。人民委员布勃诺夫隆重宣布大会开幕。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白雪闪烁，人们喜气洋洋，欢乐非凡。喜庆的时刻从寒

冷的黎明就开始了，持续了两昼夜，人们连续两昼夜没有睡觉。参加庆典活动的除了乘火车来的代表以外，还有邻近各村的人们，他们是坐宽敞的大雪橇和步行来的。从早晨起，三架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飞行，首先撒了第一期《帕列赫论坛》，然后把最著名的帕列赫人载上天空。管乐队在村子里演奏。当飞机在自由村外徐徐降落（这一天，自由村易名为戈利科夫大街）时，邻村的谷物干燥房在许多男女老少的踩踏下坍塌了。游艺场的旋转木马免费为儿童开放。小货摊把读物和糖果分发给大家。在飞机下方的广场上举行了集体农庄的大走马竞赛，迈达科夫集体农庄养马场的马匹使人们不胜惊讶。俄罗斯联邦政府向参加纪念日庆祝活动的人表示祝贺时通知说，政府资助十万卢布用于建立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州政府证实说，假如帕列赫在一个月之前从区里的一个村庄变为区中心的话，假如去年秋天之前只能乘原始的大车吃力地到帕列赫来的话，那么两年以后帕列赫将是一座美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城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讲话内容和大会内容从帕列赫社会主义文化宫播发出去，通过莫斯科，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转播。并且跳舞会同时在两所房子里进行，在这里，酒杯和洋酒以及第一次在这里奏响的爵士乐混合在了一起。

惊诧不已的帕列赫村两昼夜没有睡觉！……

人民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伊万诺沃州委书记伊万·彼得罗维奇·诺索夫，以及全俄执行委员会委员、伊万诺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整整一天都在挨家走访艺术家们，而艺术家们请他们喝茶，吃肉冻、蘑菇、馅饼和果酱。

永远惊讶和狂暴的戈利科夫在妻子和儿女们的陪伴下整整一天都在发表演说。他那惊讶的黑眼睛转来转去，打量着天花

板和桌子下边，盯着浓密的唇髭，充满了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呼吸影响了说话，眼睛和手却帮助了说话，——于是他谁都听不见，只管不停地说着：

“普希金当然是极有天才的，戈利科夫也是极有天才的……戈利科夫就是我，尽管我的外号叫塔拉干，像田野上的一株艾菊。秋天艾菊是红色的，叶子发黄，森林里辽阔而静谧，犹如天才的普希金那里一样……当然，涅克拉索夫也是极有天才的……戈利科夫，也就是我，拿着一束野花，仔细地看着，素描着自己的会战，因此戈利科夫的马是红色的，宛若石竹，或者矢车菊，——结果成了生活的花束……而戈利科夫有七个孩子，但整个房子里却连一张床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是戈利科夫，外号叫塔拉干，就像田野上一株艾菊！……”

周年纪念日以后，帕列赫艺术作品博物馆在帕列赫保留下来。戈利科夫的蓝色和红色马匹发狂地在博物馆里驰骋。州政府发给戈利科夫九张床和与之相应数量的被子、床单、毛巾、桌子和椅子——戈利科夫的木屋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医院。周年纪念日之前，州政府派车到帕列赫来接戈利科夫，想要拉戈利科夫到伊万诺沃一个裁缝那里，使戈利科夫也拥有一件真正的西服上衣。当汽车第二次来接戈利科夫去试衣服时，戈利科夫没有去，声明说：“随便让谁穿上试试就行了，我没有时间，我忙着呢！……”这件上衣还是给戈利科夫做好了，他找到一双擦上油的皮靴来配这件上衣。戈利科夫的妻子老是陪伴在他左右。戈利科夫老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他每一次讲话都忘不了他们，妻子和孩子们，他是个模范的顾家人。戈利科夫工作起来，一干就是一昼夜。当戈利科夫从协会的商店里领到糖时，他不把糖撒在茶杯或茶碗里，也不是一星半点地撒，而是把糖全倒进茶炊里，让全家都来喝。协会给戈利科夫买了七次母牛，七次的

结果全都一样——当母牛使戈利科夫和他的妻子感到厌烦时，他就把母牛给宰了，戈利科夫家的烟囱连续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冒烟，因为戈利科夫家在吃肉。

戈利科夫对自己有这样的记录：

> ……游玩、轮舞、舞蹈。跳舞时小伙子或者姑娘表现出精湛的舞技。手风琴在远处什么地方弹奏。余音缭绕，令我铭记不忘：怎样一种心情啊。清晨，赶着牲畜去放牧，晚上，牧人吹着牧笛。集市。捕鱼。一伙人喝醉了，自己也在其中。由于情绪激动，眼泪不住地流出来。儿童游戏。真正穷人的贫穷，而不是装穷的穷人。冬天的晚上，妻子在唱歌。特别是画了许多“马车”。我喜欢画疾驰的三马车。妻子唱歌时，我甚至都在画草图：一辆跑得飞快的三马车在大道上狂奔。我画了许多会战，因为我本人就是战斗的参加者，亲眼目睹了骑兵冲锋和会战，城市和乡村的火灾，逃难者，儿童，老人的可怕情景。我什么都画过。

惊讶的戈利科夫当然令人惊讶。博物馆陈列柜的玻璃下边陈列着他的《伊戈尔远征记》——马匹和会战。他怎么会把色彩和动势赋予如此强列的表现力和神韵呢？就算是十七世纪的圣像中有瞭望台的“大理石石板”，有“盖圣餐的布”，有雅罗斯拉夫娜哀伤的“富丽堂皇的书信”——保存下来——要知道这就是马蒂斯[1]的兄弟！……那么戈利科夫究竟是怎样偷看了米开朗琪罗呢？还有拉斐尔[2]？……而且由戈利科夫天才地重新

①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代表。

上色的《尼瓦河》的临摹画呢!?这里必须有关于剽窃的规律吗?情节向来是借用的，或者只是这样一个讲究礼貌和文明的传统——作出说明，即这一切都是根据普希金、根据巴扬手风琴或者歌曲创作出来的，这是非同一般的保守主义，这样的保守主义，由于自身的原因，即由于保守主义的原因，以致把一切标准都破坏掉吗?……不，这当然不是鲁布廖夫，不是米开朗琪罗，更不是拉斐尔，也不是马蒂斯，决不是。这是戈利科夫，是戈利科夫本人，是自己给自己订了规律的戈利科夫。戈利科夫的马有多么严肃和强悍的脸啊!……

> ……一个演员，如果他学公鸡叫，使孩子们感到惊讶，那么如果孩子们搞清楚了学公鸡叫的不是演员，而是演员桌子下边真的公鸡，孩子们定会蔑视演员，因为演员欺骗了艺术……

但是戈利科夫不是院士，决不是，也不是老师。假如把戈利科夫分解为要素，那么《尼瓦河》将会超过无论是鲁布廖夫，还是马蒂斯。帕列赫博物馆有一位院士，确切地说是学院派——帕维尔·利沃维奇·帕里洛夫。帕里洛夫没有保留下来任何俄国圣像，他甚至连“富丽堂皇的书信”都没有。他是“意大利人”。他画莱蒙托夫的恶魔。而且他还是叶戈罗夫院士和莫列尔院士的兄弟。他非常现实，像学院派们对现实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借用规律是他所熟悉的，他绕开了它们。他对绘画要素规律很有研究。所以帕里洛夫是一个蹩脚的彩色画匠。他不像帕

列赫，而像卢库京[1]，莫列尔和叶戈罗夫除外。

在帕列赫博物馆里，数世纪以来过堂风的感觉和发狂的感觉、还有技巧、对天才的赞叹，决不只是从伊万·戈利科夫那里传出来的。功勋艺术家巴卡诺夫、季诺维耶夫、瓦塔金——学识渊博的人，帕列赫艺术“风格”和鲁布廖夫、弗里亚津、乌沙科夫和奇林的传统的捍卫者、拜占庭以来俄罗斯圣像画术规律的专家；巴卡诺夫和瓦塔金画游行的场面；巴卡诺夫画“农业的工业化”；瓦塔金画“切柳斯金号”的船员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见；而季诺维耶夫画从宇宙到猛犸到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的历史”，画莫斯科港；并且从十一世纪、从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和弗谢沃洛德·博戈柳博夫斯基时代以来，圣像画术的技巧在这些学识渊博的人的漆画中无影无踪了。巴卡诺夫把意大利绘画和诺夫哥罗德人结合起来。功勋艺术家瓦库罗夫把十五世纪诺夫哥罗德的圣像画术和弗鲁别利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阿里斯塔尔赫·德德金既体现出了弗鲁别利的风格，也体现出了米开朗琪罗以及波斯人的风格。不知是从拜占庭到波斯，还是从波斯经过拜占庭到罗斯，但是帕列赫博物馆里有许多波斯人的画。于是，功勋艺术家科图欣突然心血来潮，在帕列赫把从那些无用的死画中的中世纪的波斯小型细密画、把十六、十七世纪加以修复，使其重现昔日风貌，波斯人哈佐夫比功勋艺术家科图欣更出色。波斯那边是中亚、印度、中国、久远的岁月。但是这座博物馆里，功勋艺术家马尔基切夫——既是佩鲁吉诺[2]，又是早年的拉斐尔，在雅典之前。这里还有佛拉芒人布托林，他的皮肤有点儿发红褐色，性情有点冷漠，体

---

① 十九世纪莫斯科近郊漆器作坊的作坊主。

② 佩鲁吉诺（1445 至 1452 间—1523），意大利画家。

格干瘦劲道。这里还有大写生画家伊万·祖博夫，法国人，十七世纪的克洛德·洛伦[1]。十八世纪的弗拉戈纳尔[2]，——注重色调、空间、大气，——祖博夫本人虽然没有见过洛伦，也没有见过弗拉戈纳尔，但他却坚信，没有比他在照片上见过的拉斐尔更优秀的画家了！……

不，“公民供应者”所画的圣像被打得粉碎，所剩无几，但这幅圣像里产生出了漆和金。第二代——巴热诺夫、卡乌尔采夫、图林、索洛宁、索洛巴诺夫、巴拉诺夫——他们不惟不像圣像，而且他们也不像老前辈，——线条画家巴热诺夫，精于虚构者和修辞大师卡乌尔采夫、写生画家巴拉诺夫和图林，并且图林既是马利亚温[3]，又差不多是当代法国人。

拜占庭以来的俄国圣像画家好像运用了大约三十年前法国极左画家传授的方法，作为绘画发现的一个新名词——反透视法，“红方块王子”画社[4] 的画家们在俄国运用了它。帕列赫博物馆里收藏着小辈巴拉诺夫的一幅画，画中的题材取自普希金的诗《我站在高加索之巅》。这幅画其实是根据普希金的诗，采用反透视法而画成的，就是说，艺术家在自己方寸之间的漆画中创造了透视法，这时其作用得以发挥，并从普希金那里得以表现，这时观众通过透视法在山巅和在云彩之上看见的不是普希金，而是普希金的朵朵云彩和列列群山。小索洛宁画了一幅《费加罗的婚礼》，柱廊——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帕齐小教堂、布鲁内莱斯基[5] 建筑师；圆柱的装饰图案——十八世纪的法国；

① 克洛德·洛伦（1600—1682），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② 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
③ 马利亚温（1869—1940），俄国画家。
④ 莫斯科画家团体（1910—1916）。
⑤ 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意大利建筑师、雕刻家和学者。

乐师们的人像——华托[1]；特征、服装、头饰——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和佛拉芒人，尤其是凡·戴克[2]。索洛宁潜心研究了多少书啊！……

博物馆收藏着功勋艺术家巴卡诺夫画的一幅十七世纪圣像摹本——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真正的十八世纪的圣像，——救世主颂；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功勋艺术家科图欣的作品——《沙皇萨尔坦的故事》；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不仅被分别画在十五和十七世纪的两幅圣像画中，而且其中一个作为多顿[3] 沙皇出现在科图欣的波斯漆画中。

不，"公民供应者"的圣像被革命和帕列赫人打得粉碎，被帕列赫的马顺风吹散了，不仅仅是戈利科夫的马。一些不留名的"工匠"为萨福诺夫干活。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每一幅漆画上都用金写着艺术家们的姓名。这些漆画是合作工场的同志们画的，他们在集体里工作，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作。而且漆画上也定准用金写着帕列赫字样，因为这正是集体的帕列赫，是那个帕列赫，那所集体的绘画学校，那所花了苏联十年时间、不能与世界上任何东西相提并论的、在帕列赫数百年的废墟上、在那些为地主布图尔林卖命的不留名的圣像画工们（地主布图尔林指使对他们"进行惩罚——鞭挞"，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所以他们在1905年就为1917年做了准备）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学校，要是鲁布廖夫和弗鲁别利、莫列尔和弗拉戈纳、波斯人和拉斐尔在这里过过夜就好了，要是抄袭的规律对于戈利科夫不存在就好了。

---

①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② 凡·戴克（1599—1641），弗兰德斯画家。
③ 童话中的沙皇。指笨拙、难看、丑陋的人。

帕列赫生活着惊讶的人民，他们用古老的色彩在漆器上，在漆器的方寸之间作画，而且必须用金，并用牛牙，最好是用狗牙或者狼牙进行抛光，所以漆和金是帕列赫“风格”的要素。

三十年前，一位艺术家在帕列赫附近住下来，他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哈尔拉莫夫，是帝王的俄罗斯彩色画院士，维克托·瓦斯涅佐夫的志同道合者。他在离帕列赫五公里的地方给自己盖了一个画室。在圣彼得堡美术学院毕业以后，艺术家，神甫的儿子，像瓦斯涅佐夫，他的同学那样，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画教堂壁画。他给教堂画彩绘。按照他的草图，建了一座“流血星期日”镶嵌教堂，教堂建在在彼得堡处决亚历山大二世的地方。他给华沙俄罗斯大教堂画彩绘，因此获得彩色画院士称号。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擅长画肖像画，便画了，并且迄今还在画肖像画，现在画的是伊万诺沃州领导人的肖像——阿格耶夫、诺索夫。一个受过高等学校绘画教育、周游过世界、具有丰富的世界和本国绘画史知识的人，知识分子，他在帕列赫生活了三十年，他画教堂壁画，给教堂画彩绘，也就是说他做了帕列赫人所做的。华沙大教堂毁于波兰人之手。由于完全合乎规律的原因，这座大教堂是俄罗斯帝国征服波兰的象征。“流血星期日”教堂引起现代俄罗斯人自然的鄙视。哈尔拉莫夫已年近古稀，这位有着丰富绘画知识的艺术家的大好年华全部浪费在各时代的垃圾场上了。他回过头来画五十年前在美术学院所学过的那些肖像画，画那些也是不完全需要的和不完全体现技巧的“学院派的”画像，纵然它们事实上是学院派的、是很内行的。革命的艺术把哈尔拉莫夫，一个住在离帕列赫五公里的地方，回过头来重操旧业的人遗忘了。他非常孤独，

哈尔拉莫夫。三十年来他的房子里没有任何变化，像一个修理厂，日渐萧疏。他那巨大的画室里靠墙摆放着巨大的教堂壁画的毛坯，耶稣、圣父、圣母。哈尔拉莫夫知道，三十年前他在帕列赫附近定居下来是为了向帕列赫学习，他，院士。他向帕列赫学习了。他知道，帕列赫人的小型细密画中的红军战士、工人、牧人、集体农庄庄员、丑陋者、普希金，是在帕列赫人把圣像和圣像画标准打得粉碎以后才出现的，帕列赫人对解剖知识知之甚少，有时骑手突然比马高两倍，而豪华宅邸的门却比马矮两倍；他，院士，还知道他是向帕列赫人学不会的。他不知道帕列赫人是怎样使艺术繁荣起来的。他可是具有渊博的绘画知识，但他画的圣像却被抛弃，遭到鄙视。哈尔拉莫夫其实重复了青年时代一事无成的祖布科夫所画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时哈尔拉莫夫以丰厚的绘画知识看待那些圣像，没有文化的帕列赫人却正是由于那些圣像当上了苏维埃功勋艺术家。巴卡诺夫、戈利科夫、瓦库罗夫、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都是功勋艺术家，从圣像画的废墟中了解了苏联的艺术，并首先对技巧惊诧莫名，他们的文化水平其实很低。这些功勋艺术家革命前都是“面部画工”和“躯干画工”，就是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只会画“面部”，不会画其余部分，而另一些人则只会画其余部分，不会画“面部”。

几年前，当帕列赫的合作工场已经享有盛誉，也有了关于自己的文献时，一位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的女儿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曼捷利来到了帕列赫。她当年二十四岁，刚从莫斯科雷贝格[1]绘画学校毕业。她请求到合作工场里来当学生。她被接纳了，决定让她跟着“大师”，最优秀的艺术家，伊万·米

---

① 雷贝格（1869—1932），苏联建筑师，俄罗斯联邦功勋科技活动家。

哈伊洛维奇·巴卡诺夫学习，像当年艺术家本人那样学习和像他们的后代，现在正在学校学习那样。她跟合作工场签了合同；她应该学习两年，然后在合作工场里工作不少于两年。她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不是两年，而只过了一年，她就以同等的大师身份被吸收为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她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把帕列赫拣起来，像哈尔拉莫夫那样，她是艺术名人的女儿。她无法配合好协会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无法成为合作工场的同志。她应该离开合作工场。但她没有离开帕列赫。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和细木工在帕列赫住过，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索洛宁，六十多岁的巨人和思想超脱的人，粗通文墨，酷爱读书，老是打着赤脚，敞着衣领，露出毛烘烘的胸脯，留着浓密的花白长发，不戴帽子，不认可用带水龙头的洗脸池洗脸的方式，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在帕列什卡河里洗脸，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脸，准是不戴帽子和打着赤脚。他有家室。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曼捷利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她。他们同居了。他离开了自己年迈的妻子。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帕列赫人看见了赤脚的索洛宁，他后边跟着曼捷利，也光着脚，鞋拴在细绳上搭在肩上，他们徒步到莫斯科去。大约有一年时间他们不在帕列赫。尔后他们回到了帕列赫，租了一所闲置的木屋。索洛宁和年迈的妻子打官司，结果判给他一头母牛。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个女孩。于是她现在在帕列赫养育着孩子，放牧着母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哈尔拉莫夫认为，细木工索洛宁迷住了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的老朋友和同事艺术家亚历山大·曼捷利的女儿。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非常热烈地、如痴如醉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她认为她很幸福。假如她能够回到合作工场的话，那她就幸福透了，可是那里现在不会接受她，将来大概也不会接受，因为合作工

场有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骄傲，有一次被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破坏了。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相信，等女儿不用她抱了，能离开了手脚，她就会拿起画笔，像帕列赫人那样去画画。她现在觉得，使她成为帕列赫女人的她的细木工丈夫和帕列赫人索洛宁比巴卡诺夫在更大程度上教会了她帕列赫艺术。她没有把帕列赫拣起来，帕列赫把她拣起来了。年轻漂亮的女人，知识分子，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与帕列赫女人毫无二致，无论是穿的衣服还是说话的方式，她抱孩子也是这样，放牛也是这样，完全像帕列赫女人一样。

帕列赫的画工都非常喜欢作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扎鲁金。扎鲁金爱上了帕列赫。扎鲁金是作家协会为帕列赫服务的工作队成员。扎鲁金是帕列赫周年纪念日和庆祝活动的永久佳宾。一个庆祝帕列赫喜获丰收的节日——功勋艺术家巴卡诺夫和戈利科夫被授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证书。整个合作工场里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一片欢腾，庆祝活动持续到夜半时分。工场外寒气逼人，工场里暖意融融，心犹如金子一般在温暖中溶化开了，“和开了”。艺术家们携妻子相聚在一起，每一位妻子来的时候衣领上都别着别针。人们交谈着，像喝醉了酒那样兴奋若狂。钟情于帕列赫的扎鲁金也兴高采烈地说着。他说得娓娓动听。他的话语和大脑彼此追逐着，冒起阳光般灿烂的泡沫，他声音高亢，像在酒宴上唱歌那样。实际上，扎鲁金那天晚上很美，他的话也很美，像歌一样。于是一个帕列赫女人出来走了一圈，为了使所有的人都听见和表示赞赏，她欣喜而高声地对扎鲁金说，她已经寡居六年，一直在缅怀她的艺术家丈夫，她少年时代的好友，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扎鲁金说的话，就好比是对亡夫的颂歌和悼念，搅得她芳心大乱，说她

满怀真情恭请他，“尼古拉尤什卡[1]”，赏光到她的寒舍与她分享自她丈夫逝世以来不曾与任何人分享过的羽被和睡眠。她向扎鲁金深深鞠了一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扎鲁金脸红了，红得像罂粟花一样，他说不出话来了。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足资垂训的荒唐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话。她期待着。她再次向扎鲁金鞠了一躬，于是她恭敬地、庄重地、非常聪明而直率地说：

“你不能去吗，尼古拉尤什卡？你说吧，如果你说这不必要，我决不生气。我是诚心诚意邀请你，而并非我诚心诚意不需要，尼古拉尤什卡。”

于是她转着圈子又幸福又悲伤地唱起来：

在海面上，蓝色的海面上……

大家听见了她唱歌，所有的人，男男女女，都随着唱起来：

一只天鹅在悠游，白色的天鹅……

帕列赫人彼此起外号是有缘由的。朋友德米特里·布托林，他就是多列诺夫，外号叫伊利亚·费多托维奇。帕列赫曾经有一个挖井工叫伊利亚·费多托维奇，他为帕列赫和方圆左近的村子挖井。假如伊利亚·费多托维奇在将近老年时有一次挖好最后一口井，不往那口井里吐唾沫，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留在帕列赫人的记忆中，更不会用他的名字称呼极优秀的艺术家和极优秀的人布托林了。重要的还不是他诅咒自己的命运——布托林决不诅咒命运，——而是他往井里吐唾沫，破坏了这样一

[1] 尼古拉的昵称。

个真理："不要往井里吐唾沫，这是饮用水。"真正的极优秀的艺术家和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的极优秀的人，好抒发感情的人和决不贪图私利的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不珍惜自己的生活。"唾[1]!"——结果他成了光棍，当年他本来可以娶村里最好的姑娘，他现在也可以结婚。他当了光棍，拼命干活，养育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两个侄女。当帕列赫人为割草着急，担心干草是否够用，把镰刀磨好，准备去割草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却一点也不着急，不上火，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割草，想利用割草的假来画普希金的笨蛋。

按照帕列赫的传统，这不是正事，这样一位大师不该这样做。按布托林的方式——"唾!"——因此，给他起外号叫伊利亚·费多托维奇。应当爱护和珍惜自己的劳动，应当在顽强的劳动中量力而行，创造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直至垂暮之年。

帕列赫的另一位单身汉和功勋艺术家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关于他，绝对没说的。他本人井井有条，用栅栏围起来的房前的小花园里种着芍药、天竺牡丹和紫菀，都开花了，他到别人家去做客，别人也到他家来做客。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是功勋艺术家，他在工作。他那些女人的事是保密的。所以他有一个豪壮而骁勇的外号——伊万·扎别洛伊。帕列赫人善于劳动和尊重建设生活的正事。

十年前，合作工场开始穷了，合作工场的成员每人摊两卢布会费和十卢布股金。合作工场的成员既不会造高韧性纸，也不会上漆。不叫他们"蹩脚的"圣像画匠了，而更鄙视地把他们叫做"制小匣工"。合作工场的成员的生活极其困难，忍饥挨饿。他们工作、学习、破坏、学习，与一百卢布的"资产"共

[1] 原意为"吐，唾"，转意为"唾弃、蔑视、瞧不起"等。

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洛欣曾经是，迄今仍然是合作工场成员，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空想家，优秀的画工。在每一次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洛欣的发言现在总是老一套。

“请原谅我吧，同志们，”他说。“我承认，我对大家有罪，我请求——原谅我吧！请恢复我的工龄吧！……”

合作工场伊始，当合作工场的人一边顽强地劳动、学习、犯错误，一边忍饥挨饿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马在耕地，他也到莫斯科去找比较轻松的活儿去了。他作为一个不劳动者退出了合作工场。他重新被接受加入合作工场时，是他从莫斯科回到帕列赫以后，这时合作工场已经强大起来了。但他已经不算合作工场的创办成员了。他算是第二次征来的工匠。工龄没有给布洛欣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他想恢复工龄的目的是，恢复自己的合作工场的名誉。

哈尔拉莫夫在帕列赫附近生活了三十年。戈利科夫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经典艺术家，对于帕列赫，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经典艺术家。帕列赫博物馆里收藏着帕维尔·帕里洛夫的作品，他非常现实，借用法对于他是必不可少的，他对绘画要素进行了研究，而且帕里洛夫还经常画石印画。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人，甚至戈利科夫，他们不再在漆画中使用金子，不再恪守“风格”时，用他们的说法，他们便扎进了石印画和版画中。那么，协会主席和批评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说：

“画得不怎么样。”

在建筑物壁画博物馆——帕列赫第二博物馆——附近有一座墓穴。墓碑上有这样的铭文：

> 黑暗的墓穴里长眠着艺术家们的朋友和顾问。他好像拥抱你，好像为你而自豪！……

这是作家叶菲姆·维赫列夫之墓。第一个著书立说介绍帕列赫的伊万诺沃的无产者，共产党员叶菲姆。叶菲姆的全部作品都与帕列赫有关。倘若没有叶菲姆的作品，帕列赫就不会是它现有的样子。他出生在舒雅，受教育在伊万诺沃，出身于艰辛的织布工，无产者，工农速成中学学生，1901年出生，十九岁加入共产党，他通过舒雅和伊万诺沃的织布工，实际上是他当了帕列赫的勇于献身的人以后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勇于献身的人的概念，1935年1月2日，叶菲姆溘然长逝。他离开莫斯科来帕列赫组织周年纪念日活动，在那里生病了，在离开帕列赫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死于舒雅。他被安葬在帕列赫。叶菲姆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 在帕列赫之前，是我的少年时代。我对帕列赫准备了十二年。我终生都在寻找它，纵然它近在咫尺——在离我生长和度过少年时代的舒雅城三十俄里的地方。为了找到它，我需要赶数千俄里，穿越过一场场国内会战的轰隆声，扒在车厢相连处的缓冲器上，手端步枪出现在资本家的宅第里。我与我的国家一道奔向未来。我曾写过许多拙劣的长诗。我渐渐长大成熟，把它们全撕掉了。我愤怒过，残暴过。经过少年时代的种种考验，我终于在少年时代即将结束时找到了这个奇异的国家。

……卡帕布兰卡当然了解得更多……

帕列赫人善于劳动，善于做事。数百年来，帕列赫人在木

板上，在涂上阿利芙油的列夫卡斯底色涂料上不停地画着。戈利科夫把显影盆的盆底高韧性纸、漆画送到了手工制品博物馆。这是一个发现，但是从发现到合作工场的开始还有许多十字路口。帕列赫人既不会造高韧性纸，也不会制漆器——首先是漆器，这种漆器产于古代中国或者印度，从那里流传到波斯和日本，而流传到俄国卢库京那里已经是十八世纪末叶了，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合作工场开始赤贫了，每个成员分摊两个卢布的会费和十个卢布的股金。合作工场的成员通过手工制品博物馆领取费多斯基诺村的半成品，这些“制小匣工”把这半成品送往费多斯基诺村去进行抛光。

当合作工场自己开始制造高韧性纸和漆时，合作工场发生了一段寻找技巧和“秘方”的光辉历史，这段光辉历史持续到1933年，差不多十年时间。

第一个到费多斯基诺村去找“秘方”的是合作工场第一任主席，当今的功勋艺术家朋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图欣，最后一位是油漆工朋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洛欣。

科图欣把最重要的秘方随身带了出来。他看见了高韧性纸是用什么做出来的，他看见了压制机、压力机和制动块。他在帕列赫附近找到了“菲利[①] 的上底色的颜料”，即所谓的粘土，费多斯基诺人就是用从莫斯科近郊的菲利附近采掘来的这种粘土当泥子把高韧性纸抹平的。科图欣从费多斯基诺人那里带回来了储备的漆器。发明家、细木工和朋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巴巴诺夫为合作工场发明了一台压制机；科图欣请费多斯基诺人喝了大量伏特加才探听出纸板型号——二十号和四十号，“芬兰型号”。合作工场的人从一次次错误中汲取经验，对

① 十九世纪莫斯科附近的村落，现为莫斯科市郊区。

材料、纸板、油漆进行晾干、半干、干透，使翘棱、烤焦、弄坏，——学会用油浸渍高韧性纸，学会胶合、晾干、烘烤、抹泥子、去污、涂色和上漆。无师自通者和发明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巴巴诺夫是位天才，他很快学会了制作各种式样的盒子，做得比费多斯基诺村的更结实、更美观、更适宜。

上漆——还是费多斯基诺人上漆上得更好一些。科图欣从前从费多斯基诺人那里带回来的漆器储备品用完了。

他们在莫斯科附近弄到一件新的漆器，进行了抛光，漆器没有干，要么是干透了，翘棱了，裂纹了，变暗了，发黄了，退色了，而且一下子就花了五万卢布——五万啊！产品退给了合作工场，因为油漆流了，粘手，使装饰画变得模糊不清了。

那时，全俄小手工业合作委员会把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瓦西列夫斯基派到了帕列赫，现今他是帕列赫博物馆馆长助理。帕列赫灾难临头了，它的艺术百无一用，油漆匮乏，上漆工艺不过关。伊万·伊万诺维奇·瓦西列夫斯基和主席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着手寻找漆和做准备工作。

原来，油漆的“奥秘”就在于熬制的方法。费多斯基诺人说，他们没有什么“秘方”，他们在加工旧的储备品，马蒙托夫[1]处方学的三十九号，即那种漆，在帕列赫业已失传了，而马蒙托夫的配方和马蒙托夫一起在革命中失掉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扎戈尔斯克找到一个叫阿福尼亚的修士，他就是阿列克谢·格奥尔基耶维奇，他好像为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熬过漆，知道熬漆的“奥秘”。阿福尼亚说，是的，他知道，先用葵花籽油熬，后用罂粟籽油熬。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阿福尼亚那里去了二十来次，对阿福尼亚的漆检试了二十

[1] 马蒙托夫（1841—1918），俄国资本家，文化艺术资助人。

来次，在帕列赫把东西毁坏了二十来次。阿福尼亚被愤怒地拒绝了。

艺术家雷布尼科夫，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修复家，建议伊万·伊万诺维奇着手科学工作——向油漆和颜料研究所求教，介绍他认识了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员乌拉诺夫同志。乌拉诺夫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乌拉诺夫和伊万·伊万诺维奇根据从中国人那里读到的配方，就是说按照科学配方在研究所里用玷玘树脂即热带植物树脂熬漆，用研究所博物馆的陈列品熬漆。他们把博物馆的储备品针叶松脂、贝壳杉、马尼拉麻、热带植物树脂用来熬漆，有时用玷玘树脂同油一起熬制，有时冷却成底结，这取决于两者的温度。乌拉诺夫本人重新学习了这种熬制法。他们终于熬出了五公斤油漆。他们带着这些油漆起程前往帕列赫。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暖和过来和喝点解醒酒，便出发到圣像工场对熬好的漆进行试验。他们上了漆，刚一放进烘干室里，漆便产生了，像严寒中窗玻璃上一道道白霜，结果没有成功。他们开始就地进行发明。他们发明了。他们违背了科学，把钴的干燥剂撒在油漆里，油漆开始保持住了，但油漆彻底使色彩变暗了。结果没有成功。

整个合作工场都待在上漆室里，痛苦地思索着。有一次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图欣拿来一只从费多斯基诺人那里弄来的漆罐，这只漆罐还是马蒙托夫的，是从前储备下来的。罐上标有漆号——四十，而不是三十九，就是说费多斯基诺人撒了谎，说他们用的是三十九号漆。

乌拉诺夫对四十号漆一无所知。乌拉诺夫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带着旧漆罐和凝结在罐底的几滴油漆飞驰莫斯科，飞驰油漆和颜料研究所，进行化学分析。除了知道神秘的油漆不是用

玷杷树脂-马尼拉麻，而是用玷杷树脂-贝壳杉熬制的以外，分析没有提供出任何确切的东西。

开始用贝壳杉熬漆了。研究所的整个制漆车间都在熬。乌拉诺夫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连几夜目不交睫。结果没有成功。

开始寻找马蒙托夫的人，找到一个英国人安内特先生，他曾给马蒙托夫运送过玷杷树脂。安内特不知道配方，但知道熬漆的“奥秘”。他们钻进档案馆里，翻遍了档案材料，找到了配方——贝壳杉加沸腾的亚麻油（决不是阿利芙油！）加矿物焦油加松节油。

他们进行了熬制。整个博物馆都被熬了，但没有请安内特先生参加。

他们又起程前往帕列赫。

油漆不再起“蘑菇状的泡泡”了，出现了平滑的表面，但却使色彩变暗了，不发亮了。

他们又飞驰莫斯科，直奔安内特先生。安内特说，他们熬得不得法，没有什么“奥秘”，于是他亲自动手熬起来。他们得到了玷杷树脂-贝壳杉和矿物焦油的进口许可证，伊万·伊万诺维奇到沃洛格达去采购松节油。包裹从国外寄来了，但矿物焦油没有寄来，开始在俄罗斯寻找矿物焦油，并在姆斯乔拉镇[①]附近一座废弃的漆厂里找到了。他们同莫斯科油漆颜料厂签订了合同，工厂要求造一口铜锅。伊万·伊万诺维奇去搞铜，搞到了。他们着手进行熬制。就在熬制前，安内特先生吓唬说，漆应该存放十年，说漆只有在经过良好的沉淀之后才会“成熟”，接下来他安慰说，他还知道一个如何避开漆的这种状况的“秘方”。

① 姆斯乔拉镇位于弗拉基米尔州，以在高韧性纸漆器上画细密画而著称。

漆有了！

无论是马蒙托夫，还是安内特先生，抑或费多斯基诺人，或者整个苏联都再也没有漆的“秘方”了！帕列赫发掘出了所有的玷玘树脂、贝壳杉、马尼拉麻、针叶松脂、矿物焦油。伊万·伊万诺维奇成为一名并不比乌拉诺夫逊色的化学家。帕列赫做出了漆的发现，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它的艺术。

那么抛光——费多斯基诺人的抛光是最优秀的。

漆没有变暗，也没有起蘑菇状的泡泡，但帕列赫人没有费多斯基诺人所拥有的那种金刚石般的表面。总而言之，漆作为一种危险业已出现在费多斯基诺面前，也出现在姆斯乔拉面前。姆斯乔拉人和费多斯基诺人开始向帕列赫人要漆了。帕列赫人向他们提供漆是有意图的——想要看一看这漆在费多斯基诺人那里将会如何发光。后来他们作了比较：“我们的渐渐死去，而他们的却拼命叫喊，”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洛欣，帕列赫的抛光工这样断言说。情况变得一清二楚了：奥秘不在于漆，而在于如何抛光。费多斯基诺人所知道的那点东西，帕列赫人却不知道。

那时，1932年，在莫斯科曾举办过一个俄罗斯油漆、帕列赫人、费多斯基诺人和姆斯乔拉人的展览会。展览会上组织了一次生产会议。乌拉诺夫作了关于油漆的报告，费多斯基诺人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报告。但是对于如何抛光的问题，费多斯基诺人却守口如瓶，他们不停地抽烟，窃笑，但却没有把“秘方”供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动手干起来。他想起了“父辈的遗训”。他把管理委员会成员召集在一起，管理委员会派抛光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洛欣到费多斯基诺去“科学出差”，像会议记录中所讲的那样，其目的是

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把“秘方”打听出来。给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三百六十卢布不用报销的差旅费，并指使他不要吝惜钱，要把整个费多斯基诺村灌酒，但无论如何得把“秘方”偷出来。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讲述了自己这趟出差的情况：

“我来到费多斯基诺，去找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他出示了证件。他对我说：‘你去参观一下生产吧，’于是他领我来到工场，介绍我认识了工匠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他直盯着我看，简直像狼一样。主席离开以后，他对我说：‘我们知道帕列赫人全是大滑头，您常到我们这里来走动走动，就把我们的漆全都舔干净了！’我看他如何工作，可他什么都不干，光盯着我。我要抽烟，他就管我要烟抽，我一走开，他就干活。我一来，他就望着我，不时地轻声骂几句，要不然就不吱声，一个劲儿吸烟。我们就这样坐了一整天。第二天，我来了，说：‘我们来做两件产品吧，我把自己的漆带来了，让我们来试试。’而他对我说：‘我有什么可试的，我都试了四十六年了！’‘喝一杯怎么样，您喝酒吗？’我问。‘我们是工人，’他回答说，‘酒倒是会喝，只是得有钱才行。’我闭口不谈钱的事，我说：‘商店在哪儿？’他说：‘商店是有，不过商店经理因盗用公款被关起来了，商店由于在盘点现在不营业。买酒得到三俄里之外的商店去。’我去了，买了四升酒，酒菜我还有，是从莫斯科带来的。回来的路上，我用小细绳把装着约有三升酒的几个瓶子的瓶颈拴住，放进小河里，藏了起来。我带着剩下的一升酒去找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怎么样，回来了，搞到了吗？’‘搞到了。’我说。‘那好，我们现在来喝点解醉酒，’他取出一只杯子，‘为主人干杯，斟酒吧！’我给他倒了一杯。‘祝我们身体健康，’他说，一口气喝光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往窗户里看了看，站起身来，戴上大檐帽，说：

‘好了，再见!’说罢，他扬长而去。瞧，这就是给你的‘秘方’!……我去找事务主任，从小河里取出一升酒来，整个晚上我都在赞扬事务主任，他的干亲家来了，我说：‘我再去弄些酒来。’他们问我：‘你到哪儿去弄酒?’‘我有准备好的酒。’我又从河底取出一升酒，我们一起喝酒，开始谈正事，他对我说：‘不，孩子，我们学了多年，而你一个星期之内就想把什么都弄明白，这办不到!秘方倒是有，但我不能把它告诉你!’”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到小河里去取最后一升酒，这时天已经黑了。他听见好像有水牛在水中打响鼻和乱扑腾：两个费多斯基诺人在水中慢慢移动，没有穿裤子，其中一个是刚才去过事务主任那里的干亲家。他们在水中寻找布洛欣的酒，他们偷看了他藏酒的地方，他们在水中折腾得疲惫不堪。第二天一大早，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洛欣又买了四升酒，又把其中的三升沉在小河里，便到工场里来找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他们喝了一整天，但没办正事，那才真正叫喝酒喝过了量呢，而“秘方”没有。晚上请事务主任喝酒。第三天，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根本没有来上班，事务主任也不露面了。事务主任和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整整三天躲着布洛欣，费多斯基诺人对布洛欣的酒感到害怕。到了周末，他们屈服了，坚持不住了，又过量地大喝了一通，于是白喝了许多酒的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把“秘方”供了出来，他说：“你们总是按帕列赫的方法蛮干，当漆变干一些时，用一小块呢子和浮石去擦拭，而这样处理以后仍然会留下划痕，那么此后必须用硅藻土打磨干净。此外，你们总是按帕列赫的方法用矿物润滑油擦拭浮石，其实应该这样处理——用低等橄榄油擦硅藻土，而不是擦浮石。这就是全部秘方……哎，你们呀，真是大滑头!……”

第二天早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完成了科学出差回到

了帕列赫。“秘方”找到了：应该用硅藻土进行抛光，应该用低等橄榄油彻底擦拭干净，而不是用矿物润滑油。“秘方”找到了，从而“秘方”也就不存在了。

苏联有最好的油漆和抛光方法，这是帕列赫人，是持续了不少于十年的光辉历史消除了“秘方”而创造出来的。

那么油漆——

油漆产生于大约两千年之前的印度或中国的什么地方，是从有毒的树脂和多年生粗壮的草本植物中提炼出来的，而上世纪中叶之前，在日本用漆制造了武器、箭和铠甲。中国人在漆器上面作画，或画好以后涂上一层漆，这些画都有上千年的历史。漆在中国是涂在木器上的。自耶稣诞生以来第二个一千年伊始，漆从亚洲东部传入伊朗，传入波斯，并且漆在波斯用于高韧性纸。到了十六世纪，高韧性纸和漆器辗转流传到欧洲，首先传到英国和法国，尔后，在十八世纪初叶，传到了德国的布伦瑞克。1795年，商人科罗博夫把漆器和高韧纸从布伦瑞克带到莫斯科近郊的费多斯基诺村，商人科罗博夫的女婿卢库京也是商人，他建了一个漆器作坊，这个漆器作坊临近1917年时变为费多斯基诺手工业合作工场。漆器在世界各地辗转了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被人们用熟了。漆器从中国经波斯和欧洲传到帕列赫，把帕列赫自己的“秘方”消毁了。

除了帕列赫，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在漆器上面使用画圣像用的、用蛋黄和开的颜料，无论是在费多斯基诺人那里，无论是在欧洲，无论是在波斯，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在日本，世界上唯一在漆器上面使用的颜料使帕列赫的漆器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漆器。这些颜料本身并不新颖。古代彩色画运用这些颜料达到了极致。对于现代彩色画来说，这些颜料已不复存在。帕列赫致力于复兴这些颜料，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来关心这

件事了。

漆——颜料——金粉。像寻找漆一样，帕列赫人重新找到了金。古代圣像运用水胶圣像画术。水胶就是用蒜汁熬成的一种粘合剂。画图案装饰用的就是水胶。纯金研成了粉末。黑面包瓢揉软了。研成粉末的金子和面包瓢和在一起。金子粘在了水胶上，水胶渐渐变干。于是金图案装饰呈现出来。帕列赫人开始采用水胶圣像画术以后，摈弃了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对于小型细密画是很笨拙的，在小型细密画上有时需要这样来涂金，即涂上的金只能借助放大镜才看得出来。他们像和颜料一样，用水胶，用粘合剂把金子（还有银子）和开，并且他们破天荒地恢复使用了牛牙，而狗牙或狼牙更好一些。

帕列赫曾经善于劳动，现在仍然善于劳动。帕列赫不得已寻找过许多许多。它做出过许多许多，这令人惊讶的人民。每逢十五日和三十日委员会都要集中一次；年尊辈长者围坐在艺术家协会管理委员会房间的桌子跟前，祖布科夫担任会议主席，布托林担任会议秘书，气氛非常庄严隆重。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从匣子里依次取出小型细密画，合作工场两个星期之内制作出来的产品。委员会成员仔细地审视着，叹息着，没有说话。

“喏，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批评意见吗？”祖布科夫问道。

“写什么评语呢？”布托林问道。

“这幅画出了一条腿，你们瞧瞧，”瓦塔金说，叹着气，歪着头。“如果按照风格来说，可以不遵守解剖学，不过风格不甚鲜明，是啊……”

“是啊，不真实，”最公正的巴卡诺夫说，“不够真实……而且金涂得很毛糙……我赞成定为一级。”

除了个人的评定之外，分为六个等级——A、Б、B、一级、

二级、三级。等级是根据尺寸大小而定的——A级——一厘米十卢布，三级——两卢布三十戈比。

“就是说，画得不怎么样？”祖布科夫问。“金涂得马虎？……”

“写什么评语呢？”布托林问道。

“你这样写吧，风格不真实，小伙子毛毛糙糙，”奇库林说，“他是毛毛糙糙的，但作为画工，技艺他还是有的。”

“关于那条腿加上一句，的确是这样，”瓦塔金说。

他们非常严格，这些元老们。布托林所作的记录如下：

……科里拉，三级。四匹马——蹄子太大。

……别洛乌索夫，二级。四轮轿式马车挡住了握着手枪的手。

……杜申，作品退回，重新修改。委员会提出不要粗制滥造。

……帕利坎，三级。修正沙皇之子的头部。委员会提出不要减低工速。

……科罗瓦宁，与后景相比，前景要大大加强。黑麦画得不好，要重画。小匣子上面的装饰图案千篇一律，图案应该各式各样。

……科图欣，“B级”。把凶狠的瘦老头[1]的腿的尺寸缩小。

巴卡诺夫，一级。把红牛画长一些，把绿牛的腿部画出来。

……叶列明，犯了一个错误——青年人坐在船上，一条腿却耷拉在水中。

[1] 俄罗斯童话中的人物，据说拥有宝藏及长生秘方。

……霍赫洛夫，漆器上落了灰尘。可以画品位更高的东西。

……雷兹尼科夫，不要画杀人这样的题材。

……马拉霍夫，作品退回，重新修改——给沙发椅加一条腿，正确地画出沙发椅的扶手。

……佩尔申，女人离得太远，因此拥抱姿势带有不自然的特征。

……霍赫洛夫，“B级”。构图和细节中有改进。

……游乐、轮舞、舞蹈。跳舞时小伙子们或者姑娘们表现出高超的舞技……一伙喝醉酒的人，自己也在其中……

伊万·戈利科夫

7月6日，星期六，在佳基列沃庆祝了本堂弗拉基米尔节。7月7日在克拉斯诺耶庆祝了本堂施洗礼者节。草莓和黑果越桔已经成熟了。黑麦、小麦、燕麦、亚麻的花已经开谢了。洋甘菊、矢车菊和三叶草开花了。欢欣鼓舞的人民已经做好了割草的准备。到亚美尼亚作家协会去做客的年尊辈长和最受尊敬的功勋艺术家朋友们科图欣、马尔基切夫和瓦库罗夫，7月5日从高加索，从亚美尼亚回来了。功勋艺术家们到塞凡湖（这个湖不久将不复存在，将变为七个新的湖，灌溉外高加索）上看了看，到了埃里温，在建筑工地和集体农庄里转了转，便在埃奇米阿津，在埃奇米阿津图书馆里待了两个星期，埋头研究亚美尼亚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手写文献。他们对这些古代手写文献的书末图案、书眉装饰图案和插图进行了描摹。他们把

极好的、令人吃惊的东西带回来了，这些东西任何人都不知道，甚至连亚美尼亚的艺术家们也不知道，——极其出色的图案、色彩和颜料、奇特新颖的构图。7 月 5 日，星期五，功勋艺术家们在澡堂里洗了蒸汽浴。星期天三点，他们集体前往佳基列沃，到朋友们那里：思想超脱的季诺维耶夫和热爱美好的农村生活的奇库林。

假如帕列赫人从 1917 年之前数百年的一个夜晚，能够把自己小型细密画的新漆、颜料和金拿出来昭示于世的话——惊讶的人民从而便会带来新的快乐，像戈利科夫的诗那样保守的快乐。假如每天四点以后举杯痛饮，那么这样的痛饮是令人惊讶的。佛拉芒人当年在自己最美好的岁月里大概就是这样饮酒的。格鲁吉亚人是这样饮酒的。帕列赫人没有酒鬼，没有醉酒后的胡闹。绝大多数帕列赫人喝的都是奇希里红葡萄酒。帕列赫人从前喝烈性伏特加，现在却喝奇希里红葡萄酒，同时唱着歌，作着画，犹如画圣像用的列夫卡斯底色涂料换成了神话般的漆一样。

俄罗斯乡村的孩子们前来向奇库林和季诺维耶夫祝贺节日。他们又喝酒又唱歌，一块儿到柳列赫湖里去洗澡。在街上跳起了轮舞——显而易见，这是戏剧表演。男女演员们载歌载舞，表演得生动逼真，富有生活气息，宛若歌里所唱的那样。年轻人开始跳轮舞，他们一点不觉得惊奇——奇库林的儿子是军人，制服折领上戴着菱形章；季诺维耶夫的女儿是老师，以及其他老师、工程师-建筑专家和工艺师、医生、农艺师、学前女童、计划工作者和许多大学生，首先是帕列赫绘画学校的学生们。奇库林当军人的儿子“扮演”未婚夫。这是已经不感到惊讶的人民，男女青年身着盛装，年龄虽轻，但个个举止稳重，唱着鲜红色的和天蓝色的轮舞歌曲：

……我转着圈，跳起欢快的轮舞……
　　可爱的小白兔！……
我在寻找，我在挑选有钱的岳父……
　　可爱的小白兔！……
我找到了，我选好了有钱的岳父……
　　可爱的小白兔！……
我要转着圈跳起欢快的轮舞……
　　可爱的小白兔！……
我在寻找，我在挑选有钱的岳母……
　　可爱的小白兔！……
我找到了，我选好了有钱的岳母……

“岳母”和“女婿”走出来转圈，他们又满意又难为情，大家对他们微笑表示认可，他们转起了圆圈，犹如演员一样仪态端庄步履从容。接下来，歌曲中唱到“内兄”和“小姨子”，于是扮演“内兄”和“小姨子”的演员走出来转圈，他们也是那样满意和难为情，他们开始表演，仪表端庄，步履从容。尔后，“未婚妻”也走了出来，她是帕列赫托儿所所长。

我找到了，我选好了有钱的未婚妻！……
　　未婚妻，小白兔！……
你做我的妻，我做你的夫！……
　　我做你的夫，小白兔！……

接下来开始了报复：

我纵酒狂饮，打了岳父的脸。
我吃光了馅饼，对岳母饱以老拳。
我骑坏了马儿，把内兄赶出家园。
　　可爱的小白兔！……
我把贵重的礼物送给年轻的小姨子。
贵重的礼物——丝线拧成的短鞭。
　　可爱的小白兔！……
我好快活，快活的是只剩下我一个，
只剩下我一个和我年轻的爱人。

扮演“未婚夫”的奇库林博士高傲地、我行我素地走着，一边手舞足蹈，“未婚妻”跟他走在一起，感到满足和由于不好意思而显得老成持重，她是帕列赫托儿所所长。演员们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才华进行了表演，毫不惜力，发出阵阵笑声。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而轮舞本身巴卡诺夫、瓦塔金、季诺维耶夫、奇库林、戈利科夫都已经画过许多次了。没有喝醉酒的人。跳轮舞的人增加到了大约两百人，达到了神秘剧的规模，——朱砂颜料、鲜红色颜料、浅蓝色颜料、金黄色颜料、赭色颜料、锡安土颜料。手风琴弹奏、唱歌、表演，一片欢腾。主席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心忍不住了——他开始转圈，做着蹲跳舞蹈动作。他还讲了话，好发议论的人。

“同志们，”他惊诧地说，“这是什么场面啊！……我们这里是在过什么节日啊，你们知道吗?！首先，今天我们这里是宪法节，也是合作社节……”

“……第三，是弗拉基米尔节！”布托林讥讽地插了一句。

祖布科夫不愿理睬地挥动着手，没有听清。

“首先是宪法节，同志们，其次是合作社节，第三是，同志

们，你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明白吗？到佳基列沃来参加节日活动……”

“参加弗拉基米尔节……”布托林插了一句。

祖布科夫没有听清，不耐烦地挥动着手。

“……第三，同志们，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明白吗?！有两辆小汽车开到佳基列沃来参加庆祝活动，而且其中一辆归于我们，也就是归于古代彩色画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工场所有。这就是我们功勋卓著的无产者的盛大节日……那么第四……”

“弗拉基米尔节……”布托林插话说。

“米季卡[1]，别捣乱！……第四，而且是最主要的，同志们，你们明白吗?！我们的朋友功勋艺术家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从高加索科学出差回来了！……你们要明白，我们的同志不是在萨福诺夫那个时代给教堂彩绘圣像，而是为了科学前往亚美尼亚，在埃奇米亚津对十一世纪的亚美尼亚艺术进行了潜心研究，在他们之前没有任何人做过研究，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欢乐。除了宪法节，这也是我们主要的节日。”

“……还有弗拉基米尔节……”

“米季卡，别捣乱，让你的弗拉基米尔迷雾见鬼去吧！……所以我提议，同志们，为我们功勋卓著的朋友们唱一支《祝酒歌》吧！……”

老一代的帕列赫人身体非常健康，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岁。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两个朋友，身材魁梧，力大无比，阿德米拉尔和伊万·扎别洛伊可以作证。他们戴着高加索式草帽来参加庆祝活动，一路走来，风尘仆仆，还没有彻底缓过劲来，不失庄重地待了好半天，后来他们融入了年轻人的

① 德米特里的昵称。

轮舞中，融入在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中间，他们自己也成了年轻人，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宿，融入在夜色之中，融入在青年人之中。

七日，大家工作到四点钟，而在四点钟，以科图欣、马尔基切夫和布托林为首前往克拉斯诺耶——朱砂颜料、鲜红色、浅蓝色、钴、轮舞表演的赭色和金黄色。他们在柳列赫湖里洗了澡，跳了轮舞。又是这些医生、农艺师、工程师和大学生们，即帕列赫的青年们，搞出一场神秘剧，唱道：

端庄的瓦尼亚
走在新雪上，
他走的不是路——
是人家的菜园！……

八日，惊讶的人民工作了，在家里休息了。九日，下工之后，下午四点钟，他们出发到那片大松树林里，到森林里去了——三十年前革命地下小组经常聚集的那个地方。去那里的人当中还有该小组里存活下来的人。除了伏特加，他们还带了羊肉。高加索人在帕列赫用篝火烧烤新式菜肴——高加索式羊肉串。

宝物找到了，——帕列赫地下小组的图书被埋的地方找到了：把图书埋起来的不是保管员尼古拉·拉宾，而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外号叫皮斯通，帕列赫最好的和最杰出的讽刺轮舞演员。图书被埋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即伊万·扎别洛伊家的房子附近，正对着朝小胡同的第三个窗户。

他们谈及宝物，逐一回忆着过去的三十年。大松树真正是硕大无朋，有上百年的树龄，树冠高耸于森林之上。他们附近，

采伐基地上刮来一阵微风，飘散着草莓的清香。太阳按照帕列赫绘画原则渐渐向森林后边落去。

七月五日、六日、七日连续三天跳过轮舞之后，青年们来到田野上，来到柳列赫湖和帕列赫河上，继续唱歌、欢笑、接吻、演神秘剧，卿卿我我地温存。夜幕四合，他们在夜的黑暗中狂欢，用快乐驱赶着黑暗，把狂欢带给家家户户，这时鲜红的太阳已冉冉升起。帕列赫绘画学校的课程结束了，考试考完了。1935 年春天，绘画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了，与苏联十年制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一样，他们是在拼写法、在俄罗斯历史知识和政治常识中有文化的帕列赫艺术家们的第一批毕业生。倘若阿尔别科夫父子的学习有惊人的差别，那么艺术家伊万·伊万诺维奇·祖布科夫和他的女儿塔玛拉、艺术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和他的儿子尤里的学习的差别就更大了，大得更加惊人了。铃兰和荚蒾开谢了，林中的白紫罗兰、洋甘菊、薄荷、酸模、三叶草正在开花。每天早晨，黑麦田上空会突然冒起一股烟，在黑麦田上空袅袅腾腾，没有刮风——这是黑麦的雄蕊花粉在飘散，庄稼在受粉，在结实。椴树开花了。黎明时分和下午三点，牧笛吹响了，使畜群集中在一起。儿童和妇女们在帕列赫湖和柳列赫河里洗澡，身子没在挺立在帕列赫河岸上的松树和赤杨的绿荫覆盖的水中，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欢声笑语。歌声彻夜缭绕，手风琴奏出忧戚的曲调。在田野上的黑暗中，在后街的树下边，在社会主义文化宫前，传来女人们的轻笑声。演出了一幕幕夜间神秘剧。太阳渐渐升起来了。帕列赫每一个育龄妇女必定都抱着孩子，而另一个孩子则拽着母亲的裙子。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许多孩子，甚至连单身的布托林也有一个满地跑的女儿。在帕列赫，孩子一出生就会握画笔，一出生就认为艺术家的身份是一个人的自然身份。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

惊讶的戈利科夫在笔记中写道：

……不单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就连妻子们也要拿起画笔了。是的，我们的孩子们的妻子也将成为艺术家。她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绘画学校里读书了。我们在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的生活正在变得像我们的彩色绘画和装饰小匣一样美丽。革命使我们枯燥死板的劳动变为重大而自由的创作。现在没有那种富有灵感的艺术家酒鬼了。我们成了最优秀的大师，并被授予功勋艺术家称号。我们为此感谢苏维埃政权……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

从史前期数百年以来，从十月革命以后，在我们严峻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时代里，帕列赫看上去总是充满喜悦、快乐、诗意——技艺——神话。实际上，在离莫斯科三百公里、离铁路三十公里的地方，与一百二十名学生、与大型工场、与国家博物馆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一位，也不是两位，而是数十位艺术家，他们被联合在合作工场里，被联合在发展个性的那个集体的劳动里，被联合在创办起学校的那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协会里，并且在这所学校里安排的劳动像在贝利尼绘画世家和拉斐尔时代那样，伟大的绘画大师培养着伟大的学生。这所革命所诞生的学校不惟使真正的俄罗斯艺术得到了复兴，并且指出，这些同志的对全世界的艺术具有很强理解力的文化水平，这所学校就是最近这十年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最合乎规律的社会主义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画工们到工场去上班。窗户跟前摆着工作台，

艺术家们坐在工作台后边。每一个著名艺术家的工作台跟前都有四五个学生。画工们穿着衬衫，裤子背带露在外面，有时几乎赤着脚，房间里有马哈烟味。用蛋黄和开的颜料——浅蓝色、赭色、红色和绿色——分别倒在被锯掉把的木汤匙里。画笔是自制的，是用松鼠尾做的。金子和银子旁边放着牛牙和狗牙。干这种活肉眼是看不见的，要用放大镜才行。徒弟们注意观察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观察他如何把浅金黄色涂在眼睛上或者如何用炼钢生铁来画，——如何用很冲的马哈烟茎卷烟，不时抽几口，眯缝起一只眼睛，长时间地审视自己的构图，仿佛沉思地唱起来，——“唉唉嗨，星期-期六……”有时，师傅一边打量着他们的作品，一边对徒弟们，对小伙子和姑娘们说：“你瞧瞧，你搞的这是什么，凶狠的瘦老头的腿比他本人还长，而他的绿色母牛有点小了，你这构图是怎么画的？你说说看，你用的是什么透视法，让我看看……你要精心修改！……”师傅拿着报纸（报纸角被撕下来卷烟用了），把上面的帕列赫透视法和解剖法打上线。徒弟们为了看起来更方便，靠近师傅肩膀站着。“你瞧瞧，看见了吗？对了，这才叫构图呢。明白吗？构图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地方，那就是要十分抢眼，令人看不胜看，这个——对了，接着画下去……”师傅们构思着自己的构图，把它们画在纸上，有时画在碎报纸上，然后直接复制到漆器上，这样就不用铅笔画了，用白色颜料打底子，帕列赫所有的颜料和金子最后都将涂在白色颜料上面。师傅们把画好的东西摆在光线最充足的太阳地里，因为帕列赫的颜料与一般颜料不同，在太阳底下，会变得更加亮丽和纯正，而在黑暗中则没有光泽。太阳落山以后，画好的东西，还没有做第一遍抛光和涂金之前，要用高温烘炉来烘干。房间里很安静，有一股马哈烟味，有时会响起低微而沉思的歌声。人们在劳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

第 四 章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牧人沐着朝霞在吹笛子。"警察们"，也就是艺术家们的妻子们——在院子里挤了牛奶，把牛赶往帕列赫第二建筑壁画博物馆，即被清理过的和被变为博物馆的教堂。牧人赶着母牛、未配种的小母牛和绵羊到牧场上去。女人们清早起床，被露水打湿了赤脚，感到冷了，紧挨着暖和的丈夫躺进被窝里暖和一会儿。她们比丈夫早起一个小时，起床后要打水，侍候丈夫喝茶，给他烙饼。丈夫们到工场去上班。妻子们有一堆家务要干：喂孩子、生炉子、做饭、洗衣、扫院子、收拾地窖、澡堂、喂鸡和闲聊，除了这些公益事业——为集体的田里除草，为集体的菜园浇水，用集体的粪车送粪，剩下的就是女人集体的日常生活与男人集体的日常生活的不同了。

男人们生活在惊异和艺术之中，而妻子们……独一无二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是酒量最小的艺术家，他喝着

希奇里红葡萄酒，歪着脑袋，多情地说："这就是我的安德列夫娜，这位——是的，我对她说：安德列夫娜，我想喝点酒，她问道：什么酒——白酒还是甜酒？……"

妻子们被认为是"警察"。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家的整个木屋让给了阿尔别科夫，自己搬到顶间去睡觉的艺术家的妻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女东家神秘地说：

"我们家畜群里发生的叫什么事呀，这种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公牛偷吃母牛的奶呢。"

"那么牧人对这件事怎么看呢？……"主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回应了一声，他的绰号叫科尔巴斯金[1]。"我们的这些女人雇牧人不是为了干事，"他对着空间说，"牧人笛子吹得好，可见是个优秀的牧人，而牧人对正事一窍不通，除了笛子……"

"这意思是说，牧人是为了我们吹笛子？"

"肯定是为了让你们感到高兴，感到快乐！……"

"那你就三点起床，挤一会儿牛奶，——替我去快乐吧。"

"这不是我的事。"

"当然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就知道喝酒，跟女学生胡扯……你昨天上哪儿去了，啊，上哪儿去了？"

"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出于万不得已……那几位功勋艺术家外出又回来了。"

"你们当中谁采的花送给纽尔卡·科里娜了？"

"嗨，瞧你说的。这是顺便采的，脚底下到处是各种无用的东西……"

"尽人皆知的无用的东西在姑娘们脚下呢。"

帕列赫的男人非常健康，任什么都摧不垮。并且他们个个

---

① 意为"小香肠"。

都是诗人。而妻子们……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家务缠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她是个温顺的女人,谁都听不见她说话。她要管一家人吃饭,还要喂牲口。她要洗地板,扫院子,给菜园除草,种了两畦麝香草莓,两畦西红柿,两畦蒜和葱。天刚一亮,在一家之主醒来之前一个小时,她就到林子里采浆果和蘑菇去了。她每天摸鸡,看有没有蛋,使孵卵鸡不再抱窝,并和一只孵卵鸡一起培育鸡雏。黎明时分和下午三点,牧人吹起牧笛,把牲畜召集起来。中午一点和晚上八点,牧人把畜群赶回家来。在苏维埃广场上,在巴卡诺夫大街和戈列科夫大街上,畜群扬起尘土,母牛发出哞哞的叫声,天生糊涂的绵羊发出咩咩的叫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走在尘土中,一边查清小牛和小绵羊跑到德德金、巴卡诺夫、瓦库罗夫家的院子里胡闹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该挤牛奶了。该趁着凉快担些水来,浇浇菜畦。该做晚饭了。

当帕列赫成立起集体农庄时,艺术家们的合作工场整个都加入了进来。后来,合作工场作为工业企业,而不是农业企业,退出了集体农庄。所以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集体农庄的茶比合作工场的茶好喝。他们脑子里装的除了艺术就是艺术,我们可清楚他们的艺术是什么东西。他们每天晚上喝奇希里红葡萄酒,而且每个人都有招人喜欢的姑娘陪着,他们才不管从什么地方把她们弄到手呢。可是我们——给他们做了午饭又做晚饭……关于巴卡诺夫或者祖布科夫,关于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我说不好,反正他们挣很多钱,做什么都足够用了。可是我的丈夫或者拿另外哪个人来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里挣的钱会更多一些。而且集体农庄里有账目检查,在那

里，女人比男人挣得多，谁养活谁，在那里看得清清楚楚。而这里除了艺术就是艺术，可是我们——待在家里，等丈夫回来，别指望对我们说声：'谢谢'。他们管我们叫警察，可是他们忘了，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今后还要生活……不，集体农庄里好一些，在那里一个劳动日算下来我比他挣得多。至于孩子们，集体农庄庄员的孩子们七岁上学，和我们的孩子一样。"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有一次说：

"我们向各区委会和各区苏维埃赠送了汽车，一年以后，全州都将通上公路。"

公路从帕列赫通往佩斯佳基[1]和尤扎[2]。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济明，帕列赫的军政长官，帕列赫区执委员会主席，像到北极考察的南森[3]一样，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敷设了通往各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亚麻田的公路，集体农庄庄员按割大麻的钟点完成劳动日，拉砂子和碎石，把路堑中的粘土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姑娘们干活用铁锹，"排列整齐地翻土"，并说着俏皮话为济明同志送行，她们说，汽车迷！……路上仍然有坑洼不平的地方。有一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由于路上颠簸而疲顿不堪，在新路的电缆沟里，在割大麻的小时工旁边的松树下边坐下来。割大麻的小时工顶着炎热在给马喂饲料。为了防止马蝇叮咬，马从头到尾巴和肚子下面都挂满了花楸树条、山杨树条和白桦树条，像一个个活动的窝棚。集体农庄庄员们在篝火上烤土豆。空气里散发着在太阳的炎热中融化了的松脂气味。

"圣像画工别洛乌索夫好像自多棱宫修复之后成了小业主，

①② 伊万诺沃州的城市。

③ 南森（1861—1930），挪威北极考察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898）。

他修好了圣像壁，为了故意刺激萨福诺夫，他从神父那里拿到了书面证明，证明圣像壁是他修好的，而不是萨福诺夫，他的竞争者。正巧，萨福诺夫和别洛乌索夫都适时地死去了，两人不期而然地在地狱里又碰在了一起。萨福诺夫问别洛乌索夫：‘你怎么带着圣像壁的证明下到地狱里来了呢？’别洛乌索夫回答说：‘从人间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天使长，他妈的狗崽子，只会用拉丁语看东西，不懂俄语，他对俄语一个大字不识，根本就没有看证明，鬼东西！’”

“那么一个搞科学工作的先生乘小船渡卢赫河时，问渡手：‘你懂化学科学吗？’‘不，’渡手说，‘我不懂。’搞科学工作的先生难过地摇晃起脑袋来，渡手却由于自己没有学问而感到羞愧。正在这时，由于这场科学谈话，小船突然翻了。渡手问道：‘你会游泳吗，教授先生？’‘不会，’搞科学工作的先生回答。‘喏，为了你不致沉没，那我只好救救你这条科学的生命了。’”

集体农庄庄员都是熟人，都是帕列赫人，有兄弟俩，一个叫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一个叫叶菲姆·阿尔欣波维奇。罗曼·阿尔欣波维奇随身带着魏列萨耶夫[①]的《医生笔记》，放在篝火旁。他们俩从前是圣像画工。其中一个曾和布托林在帕列赫贫农委员会里一起干过，另一个曾在舒雅县维岑手下供过职。叶菲姆·阿尔欣波维奇的女儿，共青团员，走到篝火跟前，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您见过活着的叶赛宁吗？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我都喜欢。”

她最喜欢的作家原来是狄更斯。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一百年前，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引进俄国的就是这种土豆，

① 魏列萨耶夫（1867—1945），俄罗斯作家。

而此前约五十年，法国人把它引进了法国。法国人是这样引进来的。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到处都种上土豆，派身材高大的人去看管，并吩咐他们——要透过手指缝，转着圈地看管。过路的农民经过土豆地时问道：‘这里种的是什么呀?’身材高大的人回答说：‘宫廷御膳，海外的品种，名字叫马铃薯或者土豆。’庄稼人开始偷皇帝的御膳，想要尝一尝皇帝吃的东西，后来他们自己也种上了……我们的情况有些不同。尼古拉一世把土豆分别送至各省长，省长送至县警察局长，县警察局长送至警察，警察最后送到庄稼人手里，——种上吧，狗杂种，没有可争辩的！关于土豆，谁都不了解，人们只是这样理解的，既然皇帝干预了此事，看来不会有好。发生了所谓的土豆暴动。土豆被宣布为鬼的种子，被宣布为毒药。神父们做祈祷。有个地方，县警察局长被杀害了。由于土豆，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那么我现在请问您，——禁止我种植土豆，可是不种土豆，我将做什么呢?”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沉默了片刻。“我身上这件皮袄是从萨福诺夫，从陛下的公民供应者身上扒下来的，我现在穿到不能再穿了……起初，我们没收了富农的生产手段和土地，竟然没有发觉我们自己被洗了脑子。这事以后我再给你讲吧……”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下面将要讲到被洗了脑的故事。）

“正值我们这里庆祝制小匣工十周年纪念日。其实是我们集体农庄欢庆丰收的日子。事情很简单——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亚麻收割完了，叫上邻居去参加酒宴，拨出酒宴用款一万五千卢布。而且餐具要做上记号。萨福诺夫从前也经常举办酒宴，他的生产手段和土地被没收了，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各种

盛鱼和鹅的盘子，能装下两维德罗[1]汤的大汤盆、托盘和锅。只有在集体农庄里我们才用得着这些餐具。我们在果戈理渔业合作工场买了一条狗鱼——听说过卢赫河畔有个果戈理村吗？——非常有名的村子！——我们买的狗鱼比萨福诺夫的狗鱼个儿大。临傍晚，大家都聚齐了，整整一夜，汽车络绎不绝，佳宾纷纷从各地赶来，明晃晃的车灯使马受到惊吓。迈达科夫养马场为了显示自己派来了大走马。宴会在社会主义文化宫里，在萨福诺夫从前的作坊里举行，你要知道……来了一百五十位客人——各村苏维埃和各集体农庄主席、工作队长，后来我们集体农庄被挤得满满登登，真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好不热闹。客人们有步行来的，有骑马来的，整夜尽情狂欢。喏，这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坦率地说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社会上也是这样认为。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喏，他们还讲了话——真真正正是国家的话，给诺索夫同志和阿格耶夫同志写信致意。我们硬让所有相邻的农庄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给我们报告一下他们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听一听他们集体农庄的情况，他们的成就和混乱，以便一切都弄个清清楚楚。我们也报告了工作情况。结果像一场清洗。显然——不是普通的人们，而是具有国家意义的英雄。巴拉莱卡琴手们的乐队在钢琴伴奏下进行演奏，直到凌晨三点。向各位主席敬了酒。当然他们都喝下去了。老太婆们和我们一起跳舞。没有醉酒的人。发言的大多是妇女，言辞激烈——简直像暴风雪，她们挣的劳动日也更多一些，她们在夺权，她们的国家观念的意志觉醒了……

“从十二月到春播，我被通过集体农庄雇去挖大伏尔加河

① 1维德罗合12.3升。

——大运河……在那里，在运河工地上，我竟遇见了安东·伊万诺维奇……喏，我们来到了乌格利奇附近，也是干这事——运土，就像现在在公路上这样，我们那会儿运土不是为了修公路，而是为了将来的运河。我们每天就这样挖土、运土。但这个开头不是主要的。在那里干活的有——我们、集体农庄庄员、工人、红军战士、工程师，此外还有囚犯。而且我们那里一切都是按工作队划分的，有共青团员工作队，像我这样的支援者工作队。还有囚犯和戈普，也就是流浪汉和无赖工作队。还有流动红旗，其实就是传给最优秀的工作队的那种红旗。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红旗在共青团员队里。我们一眼就看见了。在我们的地段上，挥汗干在前面的是流刑犯队。我心想：这是为什么？——挖运河就是反对他们的制度，全国都在反对他们……于是我和他们的队长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怎么，你真的当了共产党员吗？你和自己的劳动队这样挥汗大干，你要红旗干什么呢？'他沉默了片刻，吸了一会儿烟，说道：'不，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世道变了……世道是不可能变了，世道变不了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卖劲地干呢？因为我们想在制度下生活，像大家那样……我们想在群体中生活，享有苏联法律，而除了劳动，我们别无选择！'……你明白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明白？……”

他们抽了一会儿烟。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和叶菲姆·阿尔欣波维奇吃完了土豆，套好了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到坑洼的地方和汽车跟前。已经时过中午，炎热渐渐消退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想起了卢赫河和果戈理哈村。阿尔别科夫看见过果戈理哈村，但没有在这个赫赫有名的村子里待过。卢赫河流经一片沼泽，芦苇丛生，泥塘遍布，以致要想过到河中间去是不可能的；河里有两公斤重的鲫鱼，以致沿岸村子里的居

民甚至无法在河里洗澡，因为水藻很多，无法靠近水域。果戈理岛则位于卢赫河中部，位于卢赫河与柳列赫湖交汇的地方，而果戈理哈集体农庄就坐落在这座岛上。从三月到十一月末，有时到十二月中旬，无论以什么交通方式都不可能过到果戈理哈村去，甚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乘小船驶到那里去的，因为需要有在芦苇丛里不迷方向，在水藻里不被淹没的本领。除了集体农庄的亚麻，果戈理哈村还以渔业合作工场和去年冬天置法律的严厉措施于不顾打死了七只驼鹿的猎人而驰名，并且还以蚊子多和盛产浆果而闻名遐迩。使果戈理哈村出名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可怕的传说。只有冬天乘雪橇才能驶到果戈理哈，这个时候河水和泥塘往往结冻结得很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视察过亚麻田和各村苏维埃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济明到果戈理哈去了一趟，在雅科夫列夫村苏维埃主席，在带领自己的村苏维埃集体农庄以出色的春播上了光荣榜的基拉·伊万诺夫娜·贝奇科娃家里做客。基拉·伊万诺夫娜·贝奇科娃是个寡妇，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像艺术家们的孩子一样在上学读书。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基拉·伊万诺夫娜进行了关于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的谈话。关于帕列赫地区的个体农民——最后弄清楚了——仍然是个体农民的只是那些完全打算放弃农业和农村，在伊万诺沃、莫斯科、斯大林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和工厂找到新的工作的人；还弄清了一个问题，即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的劳动决不能等量齐观，——集体农庄庄员工作得更有头脑，更有成效，也更加出色……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提到了乌格利奇市，——瓦库罗夫、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去过了塞凡湖。塞凡湖将从山上放水，形成新的湖泊群，覆盖亚美尼亚，灌溉亚美尼亚的沙漠，抛开整个外高索联邦各共和国的电力。而乌格利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帕列赫收到了从莫斯科到了苏兹达利的修复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来信。

最尊敬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我很荣幸地向您禀告，您的折叠圣像即圣母圣像，我已经修复好了，送到了您的府上。正如我已经告诉过您的那样，这帧圣像是雅罗斯拉夫尔的画法，经过清理以后，发现它原来与十六世纪末叶有关。我不知道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否考虑过您现在住的地方离恰好于十六世纪末叶发生过我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页的地方不远。我指的是乌格利奇和无辜的王子德米特里[①] 在那里被杀害。我们这帧圣像是否作于那个宏伟的时期？……我想起乌格利奇，是因为我在报纸上读到在修建大伏尔加运河时这座古城被淹没了。我请求您，极可尊敬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请把我修复圣像应得的钱寄给我，因为我起了意图，想即刻启程前往乌格利奇，对它那恢宏的古迹顶礼膜拜。

千年的伏尔加河啊，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的河，将要淹没发生过谋杀的城，发生过一页页黑暗的俄国历史的城，德米特里王子不知是不是在那里被杀害的，因为不知道格里戈里·奥特列普耶夫是不是德米特里王子，——让像歌中所唱的伏尔加河将这些俄国的羊皮书[②] 统统淹没吧。

为了休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艺术家朋友们，与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在帕列赫。他每天与儿子和太阳一起醒来。他徒

①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1582—1591)，俄国沙皇伊凡四世的幼子。1584 年与其母一起被送到皇室领地乌格利奇。去世情况不明。

② 写在羊皮纸上的文献或手稿。

步和开车到森林里和田野里到处转转。他把水罐和奶罐用作花瓶，插上了鲜花，馥郁的花香使木屋变成了林中窝棚，使头脑在甜蜜蜜的感觉中变得迟钝不灵。

他从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那里听来了她所理解的村里的并不复杂的事情：说什么邻居家的母牛把另外邻居家的菜园给祸害了，说什么福尔西克，看家狗，整整哀叫了一夜，大概或者有人翻过菜园去偷草莓，或者有两个人溜进了果园；说什么有人送来了浆果，萨拉平的孙子到他这里来作短期休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观察着儿子，观察着一个人，无阶级社会的未来公民，如何一天天地成长，观察他如何露出牙齿的印痕和长出两颗上牙，他如何一边吃牛奶果汁羹，一边把牛奶果汁羹抹得满脸都是，他如何养成蹲便盆的习惯，他如何先说："阿爸"，"爸"，并终于说出"爸爸"！他如何叫猫"叽呵"，叫鸡也叫"叽呵"，叫母牛也叫"叽呵"，并突然叫出母牛"哞"，而两天以后发出了"阿妈"，"妈"的音，并终于说出了"妈妈"！他起初如何站立，用两只手扶着，害怕自己身下边的空间，如何开始用一只手扶着，很快便把两只手都放下了，他在干草垛旁拣起一片干花瓣，他没有发现他在用自己的腿站立，但他发现以后，感到十分惊讶，十分害怕和狂喜不已，他面对卓越的发现欣喜若狂，对于他来说，这个发现并不比他尚不知晓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小，令人欣喜若狂的是，他发现他能够用自己的腿站立了！……母亲如何用自己家乡的语言在傍晚绿色的昏暗中守在白色的小床边唱歌：

伊亚夫纳纳，瓦尔多　纳纳，
伊阿夫纳纳　纳哟……
——小小紫罗兰睡觉觉，小小蔷薇睡觉觉，

小小紫罗兰睡觉觉吧，睡觉觉，——

儿子如何随着母亲唱起来，使自己静静地入睡，“伊耶夫—阿—阿”!……爱——这是一种像世界一样的生命的感觉和像生命一样的世界的感觉。爱贯穿一切，房间、空气、衣服、花朵、桌子、窗帘。爱——这比帕列赫博物馆的直观还要大……

在帕列赫那边，在帕列什卡河后边是扎沃达松树林，飘着针叶气味。扎沃达松林那边曾是库达舍夫森林，现在被伐光了。在伐树辟出的林间通道上，草莓花开得十分茂盛，接着草莓成熟了，这种甜甜的、略带苦味的果实犹如爱一样。戈列科夫大街后边，在沿着通往波多列诺村，又名奥博连斯科耶村的路旁是一片小白桦树林，白桦树下边长着紫罗兰，每到晚上，白桦树林里雾气弥漫，散发出白桦树又苦又甜的气味，宛若黎明时的接吻，宛若八个月的儿子搭在父亲脖子上的两只小手。佳基列沃-别连捷耶沃森林散发着桧树的苦味，驼鹿出没其中……

艺术家们经常到台阶上来坐一坐，抽支烟，聊聊天——工作一天之后，讨论讨论明天会有什么创举，并证明，在库兹涅奇哈村举行的群众游园会是一定要去参加的，因为那里有一盘古代水磨，河底有很深的坑，在那里，人们在水底深坑上边的大坝上游乐，在水底深坑上边的大坝上跳轮舞。

星期三是逢集日。全村有事没事都来赶集。早上五点钟，男人们和女人们、艺术家协会和集体农庄庄员、有功勋的人和无功勋的人彼此问候，交谈，各自散去，重又相遇，有的人买东西，有的人不买东西。出售的货物有：牛奶、黄油、酸奶油、鸡蛋、浆果、猪肉、羊肉、小牛肉。艺术家们认为买“站着的”肉更好一些，就是说买长成个的牛、猪或羊。入股者们在集市上随便找个地方就把买来的东西宰杀了，过称和切开，有时还把

用来做传统风味的肉冻的“蹄胖洗干净”。

星期六，在澡堂前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来了，拿着剃须刀和理发推子，拿着吓人的剪刀，他让一个剃了一半头的人在澡堂前面的花园中间一个老树墩上坐下来，又是给他剪发，又是给他刮胡子，那个忙活劲儿简直像个真正的理发师。星期日向来歌声不断。帕列赫博物馆就在旁边，在大街对过……

为了防蚊子，窗户都关上了，睡在花香四溢而闷热的木屋里，仿佛这时睡梦里都充满了香味，梦是不受限制的，——而真正的、现实的、过去的昨天，过去的十年前，你出世前的过去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记得他还不存在的那个时期，也不记得他开始存在的那一时刻）的白天的现实，在夜间和花香中，现实与梦交织在一起，画出梦的构图，这一幅幅构图与帕列赫画工们的被涂上世界、空间、日期、时间的构图是同样的复杂……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的关于被洗了脑的故事

……我们严峻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时代……技艺，神话……十年来社会主义的结果……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收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信的这一天听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的故事。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你指出的是对的，照过去的旧生活，那时所有的人，倒也不是所有的人，是许多人，都幻想成为萨福诺夫那样的人，成

为富翁，成为所有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大师，幻想拥有财富。那时制度就这样。那我就给你讲一讲关于我被洗了脑和我如何挨打的故事吧。五十七年前，我和安东都出生在自由村，现在叫做戈利科夫大街，我们上了一年学，后来一同进入萨福诺夫的作坊，学了六年徒……”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里思忖道：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小事’的时代，契诃夫和那些刚刚当上的地方行政长官。帕列赫。圣像画工。伏特加。木屋，黎明，炉子。不久刚被煤油所取代的松明，当时把煤油叫做‘福特根’。粘土烧制的洗脸池。蘸克瓦斯的面包，大葱。父辈的毡靴。小男孩在很深的、天亮时发蓝的雪地上奔跑。作坊里散发着阿利芙油和马哈烟的气味。作坊里漆黑而瘆人，并且每一个年长者都可以饶恕和毒打徒工。作坊外面的墙壁上画着巨大的涂金的鹰。第一堂课是基督的“圣容”，第三年——《贝察塔拉》……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来修复这个《贝察塔拉》吧。”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我们同一年出了徒，当时我们还不到十六岁，我们画了一幅《圣母出行》，萨福诺夫给我们定了年薪为十五卢布，我们干活不在他的作坊里，而在砖砌的工厂里，我们没有画圣像，而是揉粘土，我们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季。秋天，我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回来作短期休假，来过冬季尼古拉节。应该说，我舅舅摆脱了萨福诺夫，在莫斯科一个小业主潘克雷舍夫那里干活。潘克雷舍夫也是我们帕列赫人，只是比萨福诺夫年纪小一些。舅舅说，孩子们干吗要给萨福诺夫揉粘土呢，我要送他们到潘克雷舍夫那里去做事，于是便着手带我们离开这

里。我们在夜里三点动身了，舅舅、我和我终生的朋友与凶手安东·伊万诺维奇。这是过了尼古拉节的第三天，天刚一落黑就刮起了暴风雪。我的母亲和安东的母亲把我们送到克拉斯诺耶村。我们徒步走到舒雅，走了三十俄里。我们所带的东西就是一只背囊、一双包脚布、一件衬衫、一把小梳子、一双替换毡靴的皮靴以及母亲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抹上土豆泥的黑麦面饼，就这些，那个时候穿长衬裤我们连指望也不敢指望。雪粘住了眼睛，风直往脖子里灌，脚下的雪就像松散的流砂一样。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从傍晚开始就和父母一起喝酒话别，他豁出去了，说：'瞧着吧，狼不会袭击我们！'可以听得出，舅舅的声音在发颤。夜渐渐过去了，天亮了，而我们一直走啊走啊，像狼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并且觉得好像真的有狼在号叫……我悄悄告诉你说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照我理解，没有比人碰上人更快乐的了。我们来到了舒雅，待在一家带饭馆的旅店里，我头一次见到舒雅，这里房子很大，令我惊诧不已，而在旅店里，我听到了关心体贴的话，我觉得这些话无比亲切温暖。我现在想起那个夜晚，是因为我迄今害怕狼和任何一种狼，对于我来说，没有比人碰上人更愉快的事了，人我倒不怕，我喜欢人，而安东却害怕人，不喜欢人，我现在是这样看的……我们坐上了火车，这又是我有生头一次，我们坐的是三等车厢。我觉得，我离开农村以后走进了王公贵族的豪宅——在农村时，我住在我们家木屋的炉炕上，炉炕下面养着鸡，而炉炕后面是小牛和一群猪崽，离开农村，离开我们家的木屋，我头一回看见没有窗框的窗户——这样可以把墙砌高。而在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就在文明社会碰得鼻青脸肿。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把我们交给了主人潘克雷舍夫，潘克雷舍夫给我们定了月薪八个卢布，管饭，并给我们三天假参观莫斯科。老

乡带我们到了菲利波夫的面包店，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去处。应该了解这个博物馆。我们生活在农村，虽然会画圣像，但毕竟只是吃面包，饲弄牲畜，有面粉、牛奶、黄油，都是劣质的，毕竟是庄稼人，而我们来到菲利波夫这里，我，现在是集体农庄庄员，而当时是庄稼人，我一看，像饼一样的扁形白面包、挂锁形白面包、加糖酒的圆柱形甜点心、小甜面包圈、蛋白酥甜点心、奶油蛋糕，——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我，一个庄稼人，无论对脂油，还是对黄油或别的什么一概分不清！……我们是三个人，一个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小伙子送我们出来，门口站着一位衣服上饰有金色镶条的大人物，给先生们开门的。大人物大概看见我们馋得流出了口水，对我们呵斥了一声，小老乡大喊道：'快跑！'于是我吓得从大人物那里朝人群跑去，当时人很多。只见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从斜对面朝我跑过来，我本想躲开他，结果我没有闯到人堆里，却闯进了镜子里，脸撞在了代表文明的镜子上，撞得满脸青伤，两个星期没有消退。从前我可想象不到，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镜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想：

"……是啊，从帕列赫到莫斯科……把十七世纪和布图尔林伯爵们的要塞村搞混的，被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毁坏掉的帕列赫……一个十六岁的农村青年和莫斯科。假如把他顺便带到纽约，而不是莫斯科，想必他的大惊小怪不过如此。的确，菲利波夫的文明镜照出来的现实完全不是像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所看到的……但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不会在菲利波夫的挂锁形白面包跟前不知所措。"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人们当时幻想着发财致富。财富是小窗户里唯一一线光

明。财富意味着能吃饱饭。财富意味着有衣穿，有鞋穿。财富意味着人们要受你支配。财富意味着权力。潘克雷舍夫的圣像画工们——差不多个个都幻想着发财致富，拼命往里钻，就像鱼硬往笼式渔网里钻一样，结果一场空，他们便喝酒……而财富这东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用谚语来告诉你吧，——没有被抓住的不是小偷，而羞耻不是烟，不呛眼睛，——还有，低头鞠躬，脖子不疼，——这是东正教的谚语……说实在话，地方行政长官和萨福诺夫都是帕列赫人，并且任何一个庄稼人都这样认为，他的骟马有时比妻子，比儿子（特别是如果儿子年幼，没有挨过打）还要贵重。俗话说，两个外行抵不上一个内行嘛。为什么我们那时只有十六岁就到莫斯科去了呢？——那时有这样的说法，——庄稼人'由于贫困'而干活，更准确地说，是由于饥饿。顺便说说，庄稼人这个词对于农民来说是个侮辱人的词，现在对于集体农庄庄员来说那就更是这样了……其实，辛辛苦苦干活发不了大财。那么萨福诺夫是怎样从庄园管理人发迹的呢？——他靠庄稼人哄骗老爷，靠老爷哄骗庄稼人！……那就听一听发财的各种故事吧，——有的人把商人排挤掉了，有的人跟寡妇结了婚，有的人行骗，有的人抢劫，还有的人把东西偷个净光！……可是一切都被上帝和我们的圣像遮挡住了，而怎么画圣像，这个我们懂，我们就是画圣像的。书中写道，资本主义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这一点我这一辈子是没有看到，这比我们要早。一个老画工酗酒，堕入赤贫，可见他是个失败者，他自作自受。一个人变富了，可见他是个好人，是个成功者。至于他可能是个骗子，这对他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最主要的是——黑暗，哎呀，怎样的黑暗啊！只有两步远都看不清楚，搞不明白，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真正了解！……苏维埃政权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啊——令人大开眼界，假如不

是我本人，那么我儿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了解这一切。青年时代——总是什么都想知道……而我们……也许，我们在潘克雷舍夫的作坊里，在罗戈日城门旁生活过了，画过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想：

“……俄-俄-俄罗斯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路对于我们的兄弟来说，正如童话里所讲的那样，你往右走是死，往左走还是死。我给你讲的不是关于安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关于我自己，关于如何给我换了眼睛和如何被洗了脑子，而不是给他。我是个中游的画工，干活也是中游，按列宁的话说，是个半庄稼人，半无产者。我只管把自己的活干完了事。顺便说说，革命不是1905年开始的，更早一些，而且革命不是自己发生的，是人们，是无产者发动起来的。如果把童话翻过来，——往右走——到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那里去发财致富，往左走——参加革命，而我，持有期限为一年的农民身份证的帕列赫圣像画匠居中，不左不右。我没有绕到石头后面去。我喜欢看书，喜欢诗，上了星期日业余学校，喏，这就是我的生活。现在我来说说安东，我的凶手。我们当时是在规定的时间结了婚，可以说把工人都分别安置妥当了。最隆重的婚礼一般在圣母帡幪日之前和圣诞节开斋期举行。我们是圣母帡幪日之后结婚的，是在同一天结的婚。父亲当时忙着割草。婚礼之后，我和安东·伊万诺维奇的生活道路便显现出来。安东对我说：‘你不会成事的，罗曼，你会虚度一生的，你成天没心没肺，嘻嘻哈哈，可就是不会利用生活！’——我的确是个快乐的人，而且我很机敏，由于年轻，有点好胡闹。我自己有时候也琢磨，安东·伊万诺维奇反对我是有道理的。我喜欢看报，喜欢上剧院，尤其经常去科尔什老大爷那里，——经常到叶戈

罗夫的小酒馆听管风琴演奏，现在那里盖起了一座摩天大楼。我们组织了一个自学小组，马尔基切夫和伊万·季诺维耶夫经常到这里来，——帕列赫的青年人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了图书，背着主人每天晚上在一起读书。安东·伊万诺维奇没有参加这个小组，不过说实话，他在主人面前掩护了我，否则我非倒霉不可。结婚前，我们的月薪已经拿到三十卢布了，按当时的钱，这是一份不菲的薪水。按照当时的风俗，结婚——我娶了妻子——要变得老成持重。可我没有变得老成持重。安东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乡下，而我把自己的妻子带了出来，租了一间紧邻我们作坊的房子，我想，——就让她跟我住在一起，让她惊奇一阵吧！……早晨，我们在我们的小屋里一醒来就欢笑，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我们早上六点钟来到作坊，而安东·伊万诺维奇已经把颜料和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他坐在那里——默默地工作，——而我的颜料却和得马马虎虎，圣像画得也马马虎虎……我唱歌。婚后一年，我的薪水仍然是三十卢布，而安东的薪水——三十五卢布。我要攒钱，要提前从作坊里溜出来，我嘱咐安东说：'如果主人来了，你就如此这般地说，说我刚刚离开，大概解手去了。'——我带着妻子到处逛，那时有电影了，我把所有的电影都看了个遍。安东·伊万诺维奇就知道成天忙活，工作。不能说他是个吝啬的人。他很仔细，一切都井井有条，但他决不乱花钱。我们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跟我一起住在莫斯科，而安东的孩子——在乡下，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我们在潘克雷舍夫那里干了大约五年以后，安东·伊万诺维奇在乡下盖起一座新房，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带雕花饰框。七年以后，他买了一头有驼峰的尚未下仔的良种牝牛，买了一匹半纯种的马驹。他的妻子到莫斯科来过谢肉节，住在我们家里，她是个仪态端庄步履从容的妇人，穿着城市流

行的狐皮领子大衣。可是打从双亲过世以后，我的木屋就钉死了，而且那木屋还是父母在世时盖的。而我，也就是我妻子有一件陪嫁时的呢子大衣，她就在莫斯科穿着这件破旧大衣陪我一起到科罗什老大爷那里买顶层楼座票看戏。除非我妻子学会了认字，像我这样读报……"

阿尔欣波维奇这一代没有赶上1905年之前的俄国，没有赶上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修建被1905年和对马岛海战击溃的铁路和工厂、封建主的腐朽时期。在这个时期，1905年迫近了，出现了无产阶级觉悟的最初的溪流，一边寻找着自己离塔尔卡和普列斯尼亚还很遥远的通往红塔尔卡和红普列斯尼亚的轨道，事实上，那时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和安东·伊万诺维奇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在浑浑噩噩的意识中，——这个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是个从历史的小胡同里走出来的人。对于阿尔别科夫这一代，那个时代渗透了他们的童年。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我爱人们，人们也爱我，有多少好人与我擦肩而过啊！……而安东却成了我终生的旅伴。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应该承认，我有时忌妒安东·伊万诺维奇。我毕竟看见他在蒸蒸日上，大家为此而尊敬他。喏，我知道，他拿主人的颜料干外活，并且通过他都能把金子从作坊里弄出来，还有稀有颜料，——本来嘛——东西都是主人的，那么谁不是主人的敌人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差不多整个帕列赫，瓦库罗夫们、马尔基切夫们、科图欣们、祖布科夫们，以及当时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主人的仇敌，而安东有自己的企图，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你看，他向主人点头哈腰，说，非常感谢，请不要记恶，我坦白自己今天的私事！……顺便说一下，安东·伊万诺维奇还有其他想往，他另有考虑：'我谁都不想依靠，我的愿望是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我要再攒一些钱，攒到一定的数额，我为自己考虑好了，我要在帕列赫的帕列什卡河畔安装一台打亚麻机和亚麻榨油机，要把农业搞好，将来独立自主地生活！'……有时跟他在一起交谈，我不免沉入幻想：我将在自由村拥有自己的住房，我的马比安东的还好，都说我这个画工不如他，难道我就画不出像样儿的各种耶稣圣像来吗？——晚上，我对我的菲玛说：'明天天不亮就把我叫醒，应该懂事了，明天中午趁大伙儿吃饭的时候你到作坊里来一趟，我把上好了列夫卡斯涂料的木板和颜料交给你，——今后每天晚上我要在家里画圣像，到了春天，你就回乡下去，我们应该像安东那样积攒一些钱！'我就这样不停地画呀画呀，连腰都不直一直，画得眼睛发疼，而到了第三天，我突然想：'如果我住在莫斯科，我要马干什么用呢？——青年时代没有菲玛在身边我为什么感到那么痛苦呢?!'——我忧郁起来，开始喝酒，请安东·伊万诺维奇的客，于是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应该说，1905年帮了我的忙，还有我们的自学小组。安东·伊万诺维奇把1905年绕过去了，而我却和大家，和同志们在一起。记得吗，曾经有这样一本小书《蜘蛛与苍蝇》？——我反复读了二十来遍，——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俄日战争开始了，尔后爆发了革命。我们听说，萨福诺夫和科罗瓦伊科夫在帕列赫被烧死了，朝萨福诺夫开了枪。当时我们感到既害怕又高兴，工人们对这样的力量，对沙皇举起了手，而我还没有完全脱开农村。我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助革命，但不知如何下手。沙皇把革命镇压下去了，在莫斯科，谢苗诺夫分子[1] 把革命摧垮了，我和大家一样躲藏起来。——

① 指谢苗诺夫团，俄国近卫军中最早的一个团。1905年曾镇压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装起义。

‘那么既然你同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一道胜利了，——你有势力，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你有理，也决不能下结论说，我应该不停地为潘克雷舍夫干活，他反对我们的力量加强了，去他的吧！’……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就像在童话里一样：往右走——走向潘克雷舍夫，往左走——走向革命。我并不是非要绕到石头后面去不可，我当时还没有完全脱开农村，我又要提到祖布科夫、马尔基切夫、霍赫洛夫了，他们多少有点文化，而我，——唉呀，愚昧无知！……沙皇胜利了——应该向他屈服。而安东却在工作，抱着指望，做着努力，他离开童话中的石头向右转了，他不赞成革命，——他说：‘那不是正事，要想生活好，就得干活，没有人妨碍你，你将来发了财，那是你的荣耀！’好好干吧！……怎么干呢，我的作品归于我，而不是去扩大潘克雷舍夫的事业?!我和安东都是服装画工，躯干画工，像裁缝一样，给圣像穿衣服。真是枯燥，而不是作画，我们在为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欺骗而工作。1905年以后发生了反动，一切都暂时停止了，沙皇掌握着权力，庆祝自己的王朝三百周年。1913年前后，我们，圣像画工，画了大量作品，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差不多在三年的时间里，辟出一条沙皇出行专线，并且在这条线路上到处修复了教堂，在莫斯科、在科斯特罗马、在苏兹达利、在下诺夫哥罗德。安东·伊万诺维奇以伙计的身份外出干活去了，挣了一大笔钱。1914年春天，他在帕列什卡河畔安装了一台亚麻榨油机，他如日中天，大受尊敬，人人都对他鞠躬致意。而我在莫斯科，我妻子那件大衣已经完全穿坏了，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不再到科尔什那里去了，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们买铅笔和练习本用了，不得不节俭度日……”

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如果这发生在一个时代

之前，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革命的话，一切都非常清楚。假设安东安装了榨油机。假设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安葬在罗戈日公墓，也许变成了酒鬼。假设他妻子躺在他身边。假设莫斯科剩下了三个年轻人，也许是三个圣像画工，也许是三个出租运货马车的车夫，也许是古容[①] 工厂的三个工人。画圣像——这是一种耻辱的劳动，不诚实的劳动。人们当然不尊重自己的劳动。不尊重自己的劳动，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可怕的。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生活得像一棵风滚草。安东……罗曼诺夫王朝走过了三百年，这是帝国的胜利！——安东沿着从伊帕季耶夫圣三一修道院到莫斯科的帝国之路给教堂画彩绘。当然，但愿安东受到尊敬。但愿罗曼像活着时那样作为一棵风滚草被安葬，但愿他的坟墓上的十字架在两年之内腐烂掉，那么一切该怎么忘掉就怎么忘掉……而生活，这时人——已经不是人，而是一条里海拟鲤，是“帝国”水流中一颗里海拟鲤的卵……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1914 年，战争开始了。1915 年，我们这些有大胡子的人，免服兵役的人，被抓去编入 182 步兵预备团，为沙皇老爷作战。从 1915 年至 1920 年，我被调入陆军服役。我是自愿离开沙皇军队转入红军的，即使我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当然，我自己说出了自己。1920 年秋天，我受伤以后回到帕列赫时，我的菲玛住在完全埋进了土里的木屋里，像哥萨克那样头上歪戴着帽子，除了冻坏的土豆，菲玛屋里一无所有，连蟑螂也没有，怎么会有母牛或者猪崽呢！……而挨着我家房子的就是安东·伊万诺维奇的房子——他家道殷实，非常富有。他当兵回来得比我早，

---

① 古容（1854/58—1918），俄国资本家。

他满了期限，离开了沙皇的前线，回帕列赫定居下来，过上了有积蓄的生活。我现在回来了，要找安东·伊万诺维奇谈一谈，不过我暂且给您讲一讲我的革命思想吧。我原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生活中有自己的位置。在旧俄国，我不尊重劳动，倒不是说辛辛苦苦劳动发不了大财，您自己想想看——圣像！……革命开始了，我的老天爷，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大悟！……而且我明白了，我决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决不是风一吹就倒的人，但我不想逆来顺受，不想单单追求金钱，金钱毫无价值！——这是革命向我阐明的道理。而且恍然大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俄罗斯人。革命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啊……革命前，安东·伊万诺维奇，是啊，是个有威望的人，——革命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你自己想一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革命前我确实像个风一吹就倒的人，而革命一开始，我就不停地干啊干啊。我不害怕的是什么——是干活。我感到痛苦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现在在我们这里，不仅仅在我们帕列赫，而在全苏联，人们不好好地工作，我现在考虑问题总是以国家为基点！……我没有像维岑那样当上领袖，甚至没有像科列索夫那样成为党员，我是一个抱有同情心的贫苦人。我也没有成为富翁，——而把我们这个地方所有庄稼人的裤子脱下来看一看——裤子里边穿的是长衬裤，树皮鞋不再穿了。干活儿！……我快五十七了，老了，脚患有痛风，受过伤，可是我活得挺硬朗，走路飞快，仍然能干活，心情舒畅。这里还有一个情况，——结果是对的，革命前我那样生活是正确的，——这是最令人惊奇的！……当然，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可以从1905年开始就去同沙皇作战，——那我就会成为英雄，而不是圣像画匠了，可我是平民百姓，是过去的圣像画工。我生活得很快活！我常常

上剧院，读书看报，我们相亲相爱的青年时代，可爱的妻子没有因为我使她过着孤寂的生活而感到痛苦。我们早上醒来，高声大笑，我们快乐而无忧无虑！……要是没有革命，——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为孩子所累而死掉，可是现在我的大儿子是道路技术员。不过我被洗了脑的事我还没有讲完。下边会讲到的。我回到了家里——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去找我终生的朋友安东·伊万诺维奇，我们依次互吻了三下，在桌子后边坐下来。他的房子真阔气，家道殷实，生活富裕。我们没有谈成话。安东问我：'你现在是什么人？'我高兴地回答他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他咯了一声，不满地说：'是这样……''那么你是什么人？'我问。'我是社会革命党人，'他说并咯了一声。我高兴地说：'你失算了，安东，你美好的前半生白过了，你白劳动了，钱白攒了！'安东·伊万诺维奇不悦地回答说：'就算白搭吧，可我在银行里还有八百卢布活期存款，等到一普特面粉值一百万的时候，我就把它取出来。'我对他说：'你大概对革命不满吧？''我打错了主意。'我对他说：'应该重新生活，要知道，你在社会上生活，社会上的自发势力不会容你，你今后会更加艰难，萨福诺夫被除掉了，尤罗夫·帕里洛夫、别洛乌索夫、索洛乌京、沙拉金被消灭了，我们的潘克雷舍夫被打入另册。据说，你和潘克雷舍夫过从甚密，交情很好，是吗？你置办了亚麻榨油机算白搭，你最好把它交公，否则将被没收。'他说：'我一辈子在各方面克勤克俭，没有得罪过人！'我对他说：'那么关于我们是不是得罪过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谈，——我和你可是一起画过圣像。'我又补充说：'安东·伊万诺维奇，我终生的朋友，为了你能公正地理解我，我要告诉你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是——我跟你谈话就像跟兄弟谈话一样。你看，我们一起生活过，我知道你是爱干活儿的人，我知道你有聪明才

智，但我也知道我们共有的愚昧无知，我还记得1905年，你当时对它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谈这个了，——我不打算责怪你。我们认为你没有任何罪过，但革命前的生活是有罪的，你曾以那个生命攸关的制度为支柱，可它却把你欺骗了，而不是革命，你要好好弄懂我的哲学！……别人不像我这样了解你，他们看见的只是你和潘克雷舍夫有交往，看见你很富有，也许认为你是骗子，是没有被抓住的小偷，假如你已经发了大财！……你说，你对革命打错了主意，那你就重新打算一遍吧，生命比你的财富更宝贵，不要跟新生活顶着干！……榨油机榨出一普特油，你就征收两俄磅[①]半，你怎么能不是富农呢？你养着大走马是为了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而我却是徒步从舒雅跑回来的，身上还带着伤。把榨油机交公吧——你去吧，鞠个躬，鞠完躬以后你就说：我把榨油机捐献给革命——这样你就跟大家伙儿一样了。你要是拒不交出，将会采取武力予以没收，你就会像潘克雷舍夫那样成为最次的人！’安东固执己见，问道：‘我以前是不是骗子？’我说：‘哦，你以前是骗子，稍许有那么一点儿，比方说，——不是！’‘我是凭自己的劳动积蓄起来的财产吧？’‘凭自己的劳动倒是凭自己的劳动，但却是凭画圣像，——比方说，——是凭自己的劳动。’‘那么，这一切都是我的，如果要把我的东西没收去，那么就是抢劫，那么就是强盗，那么你，——就是强盗们的帮凶。榨油机是我的，——我用自己的钱置办的，他们不愿用我的榨油机，那就不要来好啦！……’我对他说：‘安东，伊万诺维奇，——革命人民决不会到二十公里外的他乡来！——但从另一方面，你有榨油机，而其他人没有，这是因为你在浑水里摸着了鱼！……’我们的谈话

① 1俄磅合409.5克。

谈崩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家。我和他在一起生活过，曾是好朋友，——那么下次就很难坐到他跟前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自己的一代人清楚地记得那个改变真理、信念和观点的卓越的时代，那时，现今苏联的全部土地用一切来证明自己有理，尤其——用手中的枪和斧子，那时，掌握了又是真理、又是时间、又是土地、又是人们的无产者的手在暴风雪般的各种事件中被越来越坚强有力、越来越牢不可破地描绘出来。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我现在给你讲一讲潘克雷舍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比我们大二十来岁。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的长子现今还在莫斯科当律师，另外两个儿子侨居国外，女儿在莫斯科，嫁给一个工程师。与萨福诺夫不同，潘克雷舍夫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虽然是圣像画匠。同萨福诺夫竞争，文化帮了他的忙。他给孩子们在马拉霍夫卡[1]盖了别墅，而他自己经常到帕列赫来，在柳列赫湖里钓鱼，一大早起来就开始长时间地喝茶，凡是不睡懒觉的人都可以到他这里来喝茶，他像匈牙利人那样穿着睡衣，赤脚穿着漆皮鞋，向大家讲他有很多钱，讲他的房子，讲他的子女，他们的学习情况，讲他的朋友，考古学家乌瓦罗夫伯爵们。我们这里都这么说：‘走，到潘克雷舍夫家喝茶去，听他如何吹牛！’就这样整整一个夏天，他还没有说完。从旁来看，潘克雷舍夫是个善良的人。革命到来了。眨眼之间使潘克雷舍夫破了产。他来到帕列赫，不知是他本人烧的还是别人放的火，他的房子烧毁了。潘克雷舍夫失踪了。第二年夏天，潘克雷舍夫露面了。简直没有了人样儿，认不出来了，胡子拉

① 现为莫斯科州的城镇。

碴的，胡子上沾着碎屑，赤着脚，穿着裤子——没地方找到比他穿得更破烂的了，衬衫破碎得到了肚脐，而胸前却挂着锡十字架。他没地方住，在一驾被毁坏掉的砖红色带篷四轮马车里，在扎沃达的松树林里过夜。他成天在帕列赫别人家窗户下边转来转去，希望买他的日历，而这些日历却是上年的。他不卖圣像而卖起了日历。他完全不正常了。他让人家买日历，当然没有人买了，可他纠缠不放，逢人就讲他过去多么有钱和多么有名，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而现在全完了。千万可别问他：难道生活真的来了个大翻个，以致你连双破鞋都给自己买不起或者连件衬衫都做不起吗？这一下好了，他会一整天给你讲如何使他破了产。我们有人在莫斯科，听说潘克雷舍夫在莫斯科到处串圣像画匠经常光顾的小酒馆，兜售陈年日历，冬天光着脚。‘儿女们怎么看呢？’有人问。‘儿女们为他感到难过，对他毫无办法，不管儿子给他穿鞋穿衣服穿多少次，可他还是自己那一套。’‘那么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人们问。‘住在儿子家里。’人们说。‘真奇怪，儿子是律师，竟然允许这种事情。’冬天，又有我们的人在莫斯科。我们有一个人顺道去看望潘克雷舍夫。他按了潘克雷舍夫儿子家的门铃。一个陌生女人开了门，她说：‘您是找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吗？请到他房间来吧！’他走进来，房间里挂着意大利风格的绘画，铺着地毯，摆着长沙发，真是老爷气派。叶戈尔·帕尔菲内奇出来了，走到他跟前——穿着灰色西服，黄色低帮皮鞋，一副老爷派头，只是那部大胡子还保持着革命前的风采，而且梳理得十分整洁，不像在我们乡下那样，胡子上沾的净是碎屑。我们的年轻人感到很惊诧，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叶戈尔·帕尔菲内奇，据说您在我们帕列赫是那副样子，我们那里都在责怪您的儿子呢！……’而他对他说：‘我的儿子——我要对他大加称赞，你亲眼看见了我在

儿子家生活得怎么样。我光着脚出门，是要故意作对，要凑到人们的丑脸跟前给他们看看，人们在革命中被弄到了什么境地，人们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我说过，——给，拿去吧，坏蛋，你们直观地欣赏吧，看看好人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结果！……’就在当天晚上，人们在啤酒馆里看见了他——拿着日历进去了，裸露的胸前挂着十字架，胡子一绺一绺的，沾满了碎屑，打着赤脚，这可是在冬天啊。在帕列赫，所有的人都避着潘克雷舍夫，可是我终生的旅伴安东突然出现在他那里，他们一起共度时光。在实现集体化之前的那年夏天，潘克雷舍夫在我们这里扎沃达小河湾里死了，死在了一个坑里，光着脚，散发出恶臭，胸前戴着十字架，谁都不愿意埋葬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埋掉了，而他裤腰里却缝着金子和钻石。他死以后，小孩子们在坑里玩耍，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有熏肠、饼干、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你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个潘克雷舍夫简直是个超级坏蛋！而潘克雷舍夫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安东·伊万诺维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了想，拿圣像画工潘克雷舍夫和圣像画工卡拉什尼科夫作着对比。

“……嗯，是啊，要是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要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潘克雷舍夫家的老鹳草后边的小凳上多好，要是他用自己神圣的眼睛望着角落处的黑暗，说出下面这段话多好：‘神圣的，神圣的，神秘的，神秘的事情在伟大的乌格利奇城发生了，俄国最古老的三座城之一……神圣的事情在神圣的德米特里王子身上发生了！……’”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而潘克雷舍夫最要好的朋友——安东·伊万诺维奇。真为他感到不解和难过……我现在给你讲一讲未遂的杀人和火灾，

然后再讲被洗了脑的事。革命照常进行。我参加了贫农委员会。安东根本不到我家来了，我也不登他的门，我下定了决心：决不向傻瓜低头哀求。事情是从房子开始的。安东的房子是一座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有四个房间，有厨房，有差不多挺暖和的厕所。除了这一切之外，最重要的是——革命就是国民教育和集体劳动，时不我待。我们这里正在成立合作社，艺术合作社、缝纫合作社、皮靴合作社、毡靴合作社，我们还在建学校。贫农委员会里说：我们把主要资本家的生产手段和土地都没收了，但还是有人落下了。大家提到了安东，孩子们在黑暗的角落[1]里学习可不是事，而且到了该给老年人扫盲的时候了，可是没有资金，也没有材料，事不宜迟，革命如火如荼。于是一条小路通往安东的房子。决定把问题提交村苏维埃全体会议，让全民来解决，但目前不能说，不能声张，安东·伊万诺维奇可不好惹，一个顶仨，而孩子们四十个人一个班。我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我要是安东，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财产交出来，要知道，我住在斗室里，生活得有意义，而安东的榨油机看守室就占了两个房间，生着俄罗斯式炉子。情况就是这样，但从另一方面——我和这傻瓜在一起生活过，我了解他。我因一时糊涂想出个主意，——我去找那傻瓜，去最后一次，我要像告诉朋友那样告诉他，——你自己主动交出来吧，这样你才能归队，反正一样，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就是说，你将被没收，被阉割，被搞得声名狼藉。——我现在才知道，由于我没有被洗脑才干出了这种事，而当时并不知道，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件事。我没有沉住气，我去找了安东。临近傍晚时我去了，从后街悄悄地去了，大概用了不到五分钟。安东·伊万诺维奇在

① 指农村木屋中靠近炉子的地方。

厨房里接待了我，他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就他自己。我现在才知道，隔墙有耳，——贫农委员会里有安东的耳目，袋子里藏不住锥子，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决议。我发现，在我面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狼。我发现，安东·伊万诺维奇没有眼睛了，眼睛塌陷进去了，成了两个洞。我还发现，安东·伊万诺维奇手里拿着斧子，而且那只手慢慢地举了起来。我给你说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打了五年仗，——我用尽全力，照准安东·伊万诺维奇的嘴脸，啪的一下，他立时栽倒了。我扭身而去。我边走边想——这是为了人民的思想动了斧子，这些带罂粟花的玩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狼，我在前线学会了如何使用斧子，把这些玩笑抛开吧，安东·伊万诺维奇！……我寻思：'这是怎么回事，竟然从木屋后边，从树后边，从玻璃和铁器后边，向朋友举起了斧子？这是怎么回事，公正在哪里？——我可是像找老朋友那样来找你的，白痴，而你却自我毁灭?!'后来我甚至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自己敲了敲自己的脑门，我大概自己对自己大声说：'嘿，我呀，我这是怎么啦？唉，傻瓜，傻瓜！……怎么，我倒成了钻入革命组织中的奸细，如果我要去告诉别人，别人不单单会说我这是活该，而我事实上成了富农的间谍，我到富农那里去把我们革命的牌摊开了，我拉了富农的手。富农想把你，间谍，砍死，这还不够，苏维埃政权还应因你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而对你予以惩处……'我现在坦白说，我当时胆怯了，我暗暗决定，此事不可声张，就此打住，今后再也不到安东那里去了，再也不管安东的事了！够了！我保持缄默。我现在才知道，我由于没有被洗脑，又犯了机会主义。我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他的房子被没收时，我没有出面，他的榨油机和大走马被没收时，我也没有出面，——人们当着我谈论他时，我不吱声。我有时甚至想过，甚至期盼过，他会到我

这里来的，把情况说一说，突然改变自己，悔过，站到人民一边，给我叩头。——房子被没收了，榨油机被没收了，马匹被没收了，他日子过得很难，但他也不作声。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干活挣钱去了，回来以后仍然沉默不语……那么后来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刚一开始，安东·伊万诺维奇一夜之间就把自己从前的五面承重墙结构的房子，把自己的榨油机烧掉了，同时把我的房子也烧掉了……这就是机会主义，因为我使富农分子在外逍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应该谈的不是安东，——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劳动，是许许多多革命前就不知去向的人们，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优秀公民和劳动者！……我一心扑在集体农庄上，勤勤恳恳为社会工作，我是国家公民。我现在被洗了脑了。我现在来坦率地讲一讲这件事。我给你说过了，从十二月到春播，我被通过集体农庄雇去挖大伏尔加运河，我给你讲过了关于红旗和囚犯劳动队的故事。我终生的朋友安东·伊万诺维奇原来竟是他们的队长，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一生，我现在转述给你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你将来好好写一写富农。晚上，我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坝上坐下来，谈了整整一夜。他对我说：

'……在乡下到处是黑暗、臭气、赤贫、饥饿，我们所有的人都沾上了阿利芙油味，而莫斯科却有房住，有美景，人们穿得好，吃得好，生活阔绰。我躺在作坊里板床上，听他们谈论财富，——太好了！我到潘克雷舍夫府上去祝贺节日，——他家的地板打了蜡，擦得明光发亮，前厅里摆着塑像，他的女儿穿着细纱连衣裙，在屋里走来走去，犹如天使一般，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本人穿着灰色西服上衣和黄色皮鞋，——真漂亮！……可是我由此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思索，我妒忌：为什么我的命运竟如此不幸，难道我比别人差

吗？——我们的活儿——画圣像，我知道这是诈骗行为，我们在欺骗人民，为这事我也高兴不起来。我怕人们，我很少看见他们做好事，——我这样认为，即使我不把别人从路上推开，别人也会把我推开。于是我下了决心，——难道我比别人差吗？……我心里抱定了理想——我要爱惜每一个戈比，我要拼命干活，我要攒钱，我要给自己盖一座带围墙的房子，养一条狗，拴在大门口，用链子把围墙门扣起来，我要躲开人们，去耕地、去榨油，谁都不依靠。我为什么想要离开画圣像这个行当呢？——我想摆脱欺诈！我对一切都是从正义的方面去理解的。我想——我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我将要计算每一个戈比，人世间不可能没有真理，我一定要获得真理！……我给自己定了有限期的任务，——盖一座五面承重墙结构的房子，养许多马、母牛和绵羊，置办一台榨油机，此外再攒上一千卢布，到那时我就回乡下去，心安理得地过日子。喏，我没有吝惜自己的劳动……我也没有吝惜主人的东西，我可见过主人如何干活，那里有金子、颜料、柏木……你以为，当你和菲玛去看戏，而我埋头画圣像，背着主人悄悄到外面去干活时，我真的就不羡慕吗？当你吆喝我：给我端杯水来，我就不感到耻辱吗？我比你有钱，可是我只能乖乖地把水给你端来，——听你说声谢谢吗？……不错，我羡慕你，我羡慕所有的人，但我的理想和我的性格占了上风，我说过：我要盖新房，要买圣母像……我想得多美啊！我躺在作坊里自己的板床上，灯熄灭了，而我却在黑暗中真的看见我正在盖新房子，房子里将安装什么样的玻璃窗扇，我正在考虑的时候，玻璃窗扇真的就出现在我面前顶间旁边黑咕隆咚的地方，我如何把一只未配种的小母牛从大门里牵进来，小母牛如何在活动门限跟前执拗地不肯进来，这个小傻瓜，我在它耳朵后边摩挲，塞给它一块糖，它的嘴唇温暖、柔

软、湿润……我的老婆如何站在房顶上，两手交叉，托住乳房……唉，净说些什么呀！有理想是可怕的事情！天亮了，我醒了，我住在宿舍里，和所有的人都不接触，除了主人。我哪里也不去。我害怕，万一有人请我的客，我还得回请。我埋头画圣像，彩绘富丽堂皇的邸宅，而心里寻思：今天是圣阿列克谢节，应该把大车套好，应该往地里送粪了！我埋头画圣像超过了时间，我便暗自思忖：时辰快到半夜了，阿丽莎没有忘记挤牛奶吧？没有睡过一觉后忘掉吧？——于是我便生她的气。我过着两种生活，——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二十年。应当说，的确——我受到尊敬，不但如此，人们还害怕我，因为潘克雷舍夫让我当了管事。我和他齐心协力。而且在乡下，大家见了我也都给我鞠躬，——当时有这样的规矩……这一切都是真的，罗曼。1914 年 7 月 19 日，我攒到我理想的那个钱数后，剩下了一百八十三个卢布，1919 年，我从银行里取出了存款八百二十七卢布，——其实，这也是欺骗。当时我拿这些钱可以买到一普特面粉……唉，对于我来说，可怕的生活开始了！我是个逃兵，从前线像狼似的偷偷回到了乡下。破坏得不成样子，照我理解，——土地都立起来了。在沙皇时期，像你这样的人比像我这样的人多。你们什么都不在乎，打倒战争，打倒沙皇，焚烧庄园！……你们由于对帝国感到气愤而破坏了一切，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你们没有任何积蓄。乡下没有来信，那里在搞什么——说不定也在搞破坏。我报名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后来把枪扔掉了，我想家想得受不了，从前线逃跑了，在灌木丛里东藏西躲，三天三夜。后来我上了一辆加温车，坐在车顶上，露天行驶，从西南战线穿过整个乌克兰。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么我看见了什么呢？——我们驶近一个车站，妇女们毫无惧怕地朝加温车跑来，她们说：‘亲爱的，庄稼人把我们这

里的糖厂给分了，每人分到二十四普特，——你们谁要买糖吗?'——我们驶近另一个车站，老年人和半大孩子们朝加温车跑来，——他们说：'弟兄们，我们的酒精厂给分了，你们有人需要酒精吗?'在另一个地方，磨坊被分了，在一个车站上，一个小老头儿走出来，不是小老头，是个圣像壁，浑身挂满了镶在金环中的微型地主画像。我们坐在车顶上，由于无聊，我们打牌输掉了奥地利机枪。我可知道什么叫攒钱。我看到的净是破坏，——我坐在车顶上，心想：难道我也被毁掉了吗?——这时我听见有人议论说，肯定要就地逮捕逃兵，——难道我真的遇上了强盗吗?但愿快点回家，我心想，那里圣像画工都认识我，但愿他们快点解释清楚，说我是劳动者!——好像故意跟一切作对似的——圣像，——如果我在车顶上说我是圣像画匠，非把我扔下来不可，像扔宪兵一样!……我一辈子受人尊敬地生活，大家对我又敬重又惧怕，可是你瞧，真是大翻个儿，我倒成了骗子，坐在车顶上行驶。在前线，我毫不畏惧，获得了两枚格奥尔基勋章，——我坐在车顶上，一会儿把格奥尔基勋章藏起来，一会儿又戴上。我什么都搞不明白，也无法睡觉，我很伤心，惶惶不安，担惊受怕。到了舒雅，我从车顶上爬下来，在柳列赫湖岸边的灌木丛里藏到天黑，夜里来到帕列赫。我朝自己家走去——两手直冒汗，连只小箱子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敲门，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等到的却是杂乱无章。狗吠叫起来，我听出了它的声音，我把它从伊帕季耶夫圣三一修道院抱回来时，它还是小狗崽呢——纯种大猛犬。我听见狗叫声，十分高兴。我敲了敲门，妻子把门打开了。她说，不抓逃兵，差不多整个四周都动荡不安。我深深出了口气。整整那一夜我都没有睡觉。整整一夜我都在查看家业，房子，院落，用手摸摸，爬到房顶上，下到地窖里三次，去检查土豆；差一点没有与未

下仔的小牝牛、绵羊和马热烈地接吻，拥抱我倒是拥抱了。这都是我的东西！我是主人！我实现了宿愿！——我一切都有了，不靠任何人了，不想再要任何东西了！……天亮时，我吩咐把洗澡间烧暖，而在洗澡前，我绕着宅园走了三圈，还跑到帕列什卡河上看了看榨油机。我痛痛快快地洗了蒸汽浴，躺下睡了。晚上我醒来了，阿丽莎说，邻居和亲戚都来问好，庆贺我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可是我谁都不想见，我希望把榨油机修好，给马换上新的马蹄铁——我从前线带回来的，奥地利的——把马刷洗干净。我对妻子说：明天晚上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来看我，把大门锁上，临傍晚买些家酿酒来！——而第二天晚上开了一个什么会，没有人来找我，我对此十分高兴，我不需要人们。过了一个星期，阿丽莎对我说：'村里给你起了个外号——比留克[1]。'——于是我就走到街上，跟邻居交谈，我觉得他们对我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切和尊敬。——'因为什么呢？'我思忖道，但我没有往心里去。春天来了，我在田里干活。画圣像的事当然啦，大家都在拼命想办法搞到马，而我——万事俱备，我在干活，感到心满意足，一切顺利，而周围圣像画工们却在挨饿，缺吃少穿，他们没有学会使用马。我哪里也不去，也没有人来找我。我觉得有点委屈，但没有在意……这是真的。可是不得安宁。没有安宁。我又养了一条狗。一到晚上，我就绕着房子转一圈，把所有的门闩检查一遍。夜里醒来，我拿着斧子去检查榨油机。夜里常常心痛得醒来，猛地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出一身冷汗，感到可怕，仔细听一听——四周寂静无声。我想：这是怎么啦，有了幸福生活，又感到可怕，怕谁呢？为什么呢？我拿起斧子，去查看活计，但我不敢出去到院子里，我还算是格

① 意为“离群的公狼”。

奥尔基勋章获得者呢。白天，我在自由村里走动，碰见邻居和亲戚，可是我的舌头好像不听使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琢磨：我以前害怕和妒忌潘克雷舍夫，现在却害怕和妒忌人民和革命，哪里有公理呢？——这样下去会怎么样呢？——农业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切都有了，一切都妥妥帖帖，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干活，摆脱开了人们，但却没有安宁，似乎斧子是我最要好的同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和人民格格不入呢？——我是受人尊敬的人，那么把帽子硬从头上揪下来，这滋味是很难受的，给我起外号叫比留克！——那时我常常想起你，——你是个吹一吹就倒的人，但你的脑袋瓜比我机灵，而且你和人们挺合得来，打得火热。所以我当时琢磨：唉，罗曼这是在哪儿呀，我多么想跟他好好谈谈，问问他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刮起了一股什么风，把什么东西给刮来了，那么你给我开了句玩笑，我们便一起笑起来，你瞧，我们便同心合力地想出来点什么！1919年就这样过去了，时间到了1920年10月，革命如火如荼，萨福诺夫，以致那个帕里洛夫统统被没收了，我开始防备会对自己来这一手，——而革命却不见尽头……这时你回来了……我把你等苦了，罗曼，见到你我真高兴。而你对我说：'你失算了，安东，你白过了半辈子好生活，你最好把榨油机交公，本来大家都叫你比留克了。这一点我早在革命前就给你说过了！'——对我没有丝毫尊敬了。问题倒不是说我们谈崩了，而是我成了你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至于说我打错了主意，我自己已经发觉我前半辈子的好日子白过了，没有得到安宁，——不单是没有得到安

宁，我连睡觉都开始揣着斧子了，对妻子避而不答，像该隐[1]似的，夜里经常浑身冷汗，一跃而起，——可是要知道，我的榨油机，我的每一个窗框、门拉手、我仅有的裤子，都是我凭自己节俭挣来的，榨油机上每一个小石子中，每一块小薄板中都凝聚着我的节俭和良心，——你以为在潘克雷舍夫眼皮子底下，用他的木板、用他的颜料去干外活，我不害怕吗？……要知道，为了得到支持，为了得到帮助，我苦苦期盼过你，罗曼，像期盼亲兄弟那样，也许，我寻求过你的保护，——而你……不公正；抢劫！——而掩饰这场抢劫的却是我的老朋友，就是你，罗曼，——这反正一样，既然你打算砍掉我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这其实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我是骗子吗？'我扪心自问。——不，我的财产是我凭自己的机敏挣来的，那么这一切就是我的，那么假如要把它们没收去，——就是抢劫，那么就是强盗！而头号强盗——就是你，罗曼！我夜不成寐，活干不下去，饭吃不下去，脸色发青，双手老是出汗。我暗暗决定道：我决不交出去，什么都不交，我要通过自己的身子骨把它们统统放进榨油机里！当然，我闭门不出，也没有人到我家来。可是我女儿常去俱乐部，女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告诉了我，说打算把我的房子没收去作新校舍，贫农委员会里已经做出了决定，可是，顺便说一句，贫农委员会里也有你啊。不能说我在那种情况下挺过来了，如果确切地说，我当时甚至完全六神无主了，我简直傻了，我甚至不记得我当时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时间是怎样过去的，——我只知道我最恨的就是你，罗曼，——我认定，你是罪魁祸首！……这时我猛然从窗户里看

① 该隐是圣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妒忌杀死弟弟亚伯，因此受到上帝的谴责。

见——你朝我家走来。妻子跟我一起在厨房里，女儿在里屋做针线活，我向妻子和女儿嘘了一声，——我的样子当时大概很可怕，妻子手中的炉叉掉了下来，她们娘儿俩绝对听我的，她们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到紧头上的屋里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虽然她们看见了你，也看见了我如何把斧子放到长凳上……你原来很敏捷，罗曼……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打死了，肯定把你打死了，可是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我是后悔呢还是不后悔……我从地上站起来。房子里静悄悄的，像在棺材里一样。我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我只看见妻子和女儿像影子似的站在门槛上，没有一点儿响声，她们互相搂着，彼此紧贴在一起，她们的脸像死人一样惨白，像死人般呆滞的面孔没有一丝血色，而眼睛却瞪得如灯笼一般……这时我的故事，罗曼，将要走下坡路或者上坡路，这要看你怎么看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我断定，——你会去告发，——我开始等他们来逮捕我。我没有丝毫的后悔，只是害怕——唉，我是不是要藏到地窖里去，或者钻到长凳底下，用口袋挡住?!我硬是撑着，没有真的藏起来。我认为我完全是无罪的，而所有的人是强盗。我等了两夜又两天，妻子和女儿在家里陪着我，晚上不点灯。第三天晚上，我打发妻子到邻居家里假装借炭火，说家里火灭了，那时还没有火柴。我撵女儿去了社会主义文化宫，也就是俱乐部，从前萨福诺夫的作坊。妻子和女儿回来了，没有听说任何消息，你在贫农委员会里不露面，和所有没有马的农民在搞革命，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议论。我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杀人的恐惧过去了，担心财产被占有的恐惧又回来了，我又开始睡不着觉，逐一回想着窗框和隔板。女儿说——确定召开群众大会，县上要来人，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听了以后感到更加痛苦了，哦，痛苦极了！……有财产是坏事，我告诉你吧，是可怕的事。召开了

群众大会，我当然没有参加，给了我三天期限收拾东西并搬到榨油机那里。这三天我连手都没有动一下，东西都是她们娘儿俩收拾和搬走的。我当时比狼还凶残，我憎恨人世。我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而我认为头号强盗就是你，罗曼，——就算我从潘克雷舍夫那里弄到一些金子，——你干吗要扯这事呢？——妨碍了你也去弄金子还是怎么的？——我心里想，你之所以没有来抢劫，是因为你觉得羞耻，不敢正视我的眼睛。还有一点应该说说——我实际上很害怕，像一只被活抓的狼，我怕见人，怕邻居和亲戚。哪里有我的尊敬，哪里有我的节俭，——全没啦！……她们娘儿俩把牲畜从院子里牵出去，——把干草、燕麦、面粉、箱子、桌子、柜子都拉走了，——她们问我，那两条狗怎么办？我留下一条，另一条我吩咐带到新住处。时间到了，妻子说：'苏维埃已经来人了，吩咐说，新主人半小时以后就到了！'我非常吃力地从长凳上站起来。我心想，整个世界马上要毁灭了，可它若无其事，依然完好无损。我站起来，低着眼睛，来到屋后，朝新住处走去，像狼似的，甚至比狼还凶残。'走着瞧吧，罗曼！……'我心想。我来到新住处。她们娘儿俩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了。我在床上躺下来，立刻睡着了，睡得很死。那么我现在说一说，我的故事开始走下坡了和有财产是坏事。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阳光照在窗户上，透着寒气。她们娘儿俩在厨房里忙活，炉子里散发出烤面包气味。——真是怪事，——我心里感到很宁静！……奇怪，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好宁静啊！——简直没法和我准备离开家时那种情景相比。我起了床，洗了脸，帮她们娘儿俩做了点事，真安静！我早早地就躺下睡了，夜里一次都没有醒过，没有做梦。我感受到这种宁静，自己对自己不胜惊讶。仇恨没有消逝，这一点不能忘记，——仇总是要报的。——走着瞧吧，

罗曼，我们街上也要有大喜事啦！……我知道，周围到处在发生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所谓的阶级斗争。应该说说那种惋惜的心情，这时我还没有把房子交出去，只是在家里等着房子被没收，这种惋惜的心情比我不再是房主的那种心情要强烈一百倍还多。我现在夜里睡觉不做梦，即使把另一条狗留在了老房子里。此外，要干的活儿少了，房子小了——脏东西自然少了。而且我的看守室并不是那么糟糕，我们村里有许多人，比如说你吧，住得更糟糕。可是对整个人类的那种愤恨，那种仇恨，——嘿呀！别提啦！我尤其憎恨关于阶级斗争的那些谈话。过了两个月，我的榨油机被没收了。我又难过了一个星期，这时他们正打算没收榨油机。我又一连几夜睡不着觉，妻子和女儿拉住我的手——我打算把榨油机烧掉。东西被没收了，挂上了他们自己的锁，院子的围墙被拆掉了。我又早早地躺下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又醒来了——感到很宁静！怪事！……除了宁静就是闲暇时光，几乎什么活儿都没有，会有什么活儿呢，马被牵走拉木柴去了。一点儿惋惜也没有了——让这一切与俄罗斯一起统统见他妈的鬼去吧！照我理解，整个世界与我一起在毁灭，我有时思忖：不会有这种事，一切都将照原来的样子，到那时，房子、榨油机、马都将退还给我，外带一笔丰厚的利润，——到那时，我们将要证明抢劫是怎样进行的！——我会亲手剥掉你的皮，罗曼，连哭都不许你哭！……你要明白，罗曼，假如我被阉割了，那么就是说，——一切都是允许干的，——回到过去多好啊！……假如一切的确都失去了，那么生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为什么说我的故事将要走下坡路了呢？——因为那时是最可怕的一段时光，我想把你打死，我被从我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我刚从前线回来那阵，我傲岸不群，不愿意和人们接触，只想躲开人们一个人生活。我被阉割

了。我哪怕向张三或李四哀求哀求也好，谈一谈，问一问也好，可是我发现，人们已经不拿我当回事了，不把我当人看了。就在那时，潘克雷舍夫拿着陈年日历到我家里来了，问：‘被抢了?’‘被抢了。’我说。结果，只有潘克雷舍夫一个对我表示了同情，详细询问了所有的情况，他是真心真意的，一点都不傻头傻脑。我知道了这个潘克雷舍夫非常了不起，但我明白——我和他都好景已尽。他仍然装疯卖傻，但跟我说话却像人那样，并向我证明，我们街上也要有大喜事了。我向他讲了我曾在他的作坊里把金子扫起来拿走了。他说：‘没什么，不在于失去了什么和将来还回来什么，再等一个时期吧!’就他一个人没有把我当贼看，评价了我所做的事情。从他的谈话中，我心里升起了希望……我被阉割了。革命前我没有读过报，难道我会从邻居家借报来看所发生的事吗？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时我开始打发卡秋莎到社会主义文化宫去借莫斯科的报纸。我读报读得眼睛都起趼子了。我一边读一边切齿痛恨，把那些坏的地方都找出来。我成了可怕的政治家。春天来了，我到田里干活，一直干到秋天。全村都在一起，而我单帮，我不说话，只管闷头干活。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满腔愤恨。我读报，没有我感兴趣的政治，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恨。我期待着我们势必要行动起来的那一天，正像潘克雷舍夫所说的和我所理解的那样。我读报，正如我们的村苏维埃那样，报纸上反映的整个俄国都一个样儿。全世界都开始反对我了。我好苦闷啊。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公正。而我是个健壮的庄稼人，耕种我的份地，就那么一点点农活——不算回事。此外——在莫斯科，在买圣母像之前，我读了一本关于母牛品种的书，了解了有关肥料，有关饲料的知识。我在乡下生活了两年，等待变化，——事情要来，推也推不开。生活没有意义，一个人对付所有的人，——我想干活，可是为

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恨一切。我出发到莫斯科去了，寻找了一阵熟人，那里的情况和帕列赫一样，苦闷，没有意义。我离开莫斯科到了克里米亚，找到一份画彩画的差事。我感到苦闷，回到了家里，正值春天。夏天我在耕作，去了列宁格勒。我故意谈论政治。有一回在火车上，一个上铺的公民为这事揪痛了我的胡子，就是说，在车上要保持沉默。在列宁格勒，我还是感到苦闷，便去了沃尔霍夫斯特罗，当了彩画工。每年夏天我都回家一趟。时间在流逝，我日渐衰老，而变革迟迟没有出现。我是个被遗忘的人，像狼一样。但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榨油机、牲畜、房子——诚然，这些都是我千辛万苦挣来的，但我已经把它们失去了，失去的还有生活和生存的目的，我生活的意义被连根挖掉了。而革命如火如荼，没有尽头。我天天读报，——石头渐渐地磨光了。这就是我给你讲的，罗曼，我如何走了下坡路……潘克雷舍夫老说政体改变有望，——可他猝然死了，没有等到报仇的那一天，他死了，身上发出恶臭，长满虱子，脏污不堪。他们来找我，说：'你的好朋友死了，他像柱塔僧西梅翁[①]，使人联想到你们画的圣像，你去吧，把朋友安葬了吧！'——看他一眼都觉得耻辱。他由于仇恨革命居然落到了何等屈辱，何等癫狂的地步，我能步他的后尘吗？——有没有相反的路可走呢？——不是整个俄国和帕列赫一起来跟我和潘克雷舍夫作对，而是我在跟所有的人、跟俄国作对，把自己摆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吗？——报纸上是对的——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潘克雷舍夫。我常常回想起你，罗曼，看来，你来找我，你不是敌人，我年轻时的确打错了主意。看来，问题的全部实质不在于财产，即使除了财产，我也没有生活的目的。你

① 西梅翁（949—1022），拜占庭宗教作家、诗人、神秘主义哲学家。

看，我差不多是个骗子，而现在我却完全和潘克雷舍夫站在一起了，——但我曾对旧世界点头哈腰，从少年起就称潘克雷舍夫为叔叔，每逢过节都在他家前厅里喝一杯酒，脸上露出谄媚的神情，——那么现在为什么对世界不点头哈腰了呢，这里有什么高傲，潘克雷舍夫式的高傲还是怎么的？——潘克雷舍夫死了。我心想：怎么，我得步潘克雷舍夫的后尘不成吗？！我正在思索，这时门突然打开了，你走了进来，罗曼，我对你说：你的真理胜了，罗曼努什科[1]，但我真的不是骗子，哦，我有罪，哦，我错了，——哦，原谅我吧，我给你磕头，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房子被没收了——去它的吧，革命前，为了挣那些破烂，我拼命干活，累得腰弯背驼，而革命后，我陷进了狼一般的心绪中，该死的破烂，让它加倍地受到诅咒吧！——学校设在我的房子里，——难道这事不合理还是怎么的，取消了地界和份地，按照国家计划耕作，购买昂贵的机器，——难道这没有道理吗？——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我的房子里，在我的土地上呢？——我心里这样思索道。——潘克雷舍夫死了，——浑身脏污不堪，长满虱子，发出恶臭，——他是疯子，而不是人，——可他压根儿就没有疯，他想使革命发疯，但革命不听他的。晚上，妻子回来了，说：'村苏维埃里贴出了布告，号召人们加入集体农庄！'我一下子明白了，——完了！——永远完了！我们的财产永远不会退还了，我不会有舒服自在的日子过了，我无法剥掉你的皮了，罗曼！——当然！什么都不会退还给我！我不想发出潘克雷舍夫的恶臭！——我甚至愉快地对妻子大喊道：阿丽莎，你快去打一升酒来，准备几条鲱鱼，弄几根上好的黄瓜，我现在到我的老朋友罗曼·阿尔欣波维奇那里

① 罗曼的昵称。

去一趟，我要祝贺他成立集体农庄，应该大吃大喝一通，以庆贺集体农庄和我们的友谊……你快去打酒来！妻子因意外而惊慌失措，不知该不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又大喊了一声：'让你干什么就赶快去干！'我从穿堂里拿起一瓶煤油，直奔你的房子而去，罗曼，我走在路上，不躲躲闪闪，不偷偷摸摸，我进了院子，在穿堂里倒上煤油，扔下穿堂不管了，我放了火，朝学校走去，我放火烧了马厩，又直奔榨油机，我把剩下的煤油倒在榨油机上，放火烧掉了。我回到妻子身边，一口气喝光了一升酒，像喝水似的，没有喝出任何滋味，也没有一丝醉意。我在那里，吃着冷盘，望着远处的火光，——我感到很平静。来人把我逮捕了——我仍然平静自若。我无须在任何人面前再对潘克雷舍夫和我的一生负责了，我没有自己的意志了……'"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沉默了片刻，吸了几口烟，说道：

"关于红旗，我问安东，我说：'怎么样，你现在过得好吗？你为红旗而干活儿，怎么，你真的当了布尔什维克吗？——你和你的劳动队那么拼命……' '……不，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世道变了……' '喏，你不后悔吗？' '……不……' '那么如果世道变了，——你会把我打死吗？' '肯定会把你打死！我最大的喜事就是把你的房子烧掉了！——如果世道变了，我就亲手把你，把祖布科夫一家、马尔基切夫一家、把科图欣、维岑、科列索夫的皮剥下来，挖出你们的内脏，让你们连哭都不许哭！……'"

"关于我被彻底洗了脑的情况我就给你讲完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阶级对阶级——就像面对面一样，——没有任何机会主义，毫不隐瞒。这就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觉悟。关于圣像，应该彻底忘掉，不再提起！……"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他听的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事。帕列赫无产阶级觉悟的历史被“反面”证据揭示了出来，——犹如帕列赫细密画的反透视法一样。从前的圣像画匠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述说变成了决不仅仅是帕列赫的事业和理想的故事——这是从“反面”所证明了的阶级的和无产者的本能的成熟的述说。无产者远在1905年之前就在培养自己的觉悟，——怎样的无产者呢——帕列赫的圣像画匠，尤其是集体农庄庄员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这个最可爱的人?!——不，不是他们创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创造了他们，——因此，我们严酷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时代能够燃起那样的惊诧，那样的童话，——尤其在帕列赫的漆器中，——超越了帕列赫，不啻为了帕列赫。故事讲述了关于觉悟的社会主义改造，讲述了关于在帕列赫的圣像画工中间，在帕列赫的集体农庄庄员，从前的圣像画工中间，没有圣像画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位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其实应当像躲到基捷伊那样躲到乌格利奇去。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佛拉芒人和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的歌手，打算应学术[①]出版社的建议写一部关于普希金和笨蛋的书，为了洽谈和签订合同，他去了一趟出版社。他来到莫斯科，到了大卢卡日街，撞进苏联科学院，起先他跟一个瑞士人交谈，告诉他说，他，布托林，是从帕列赫来的，是为了写笨蛋的事来的，——尔后跟一个办事员进行了交谈。他又前往列宁格勒大道，撞进航空学院。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还去了季米里亚泽夫农科院。到了第二天傍晚，疲惫不堪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才辗转来到出版社，胆怯地

① 原文为英语。

在那里对瑞士人说："我叫布托林，从帕列赫来，为笨蛋的事而来的。"——学术出版社非常期待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到来，并不胜荣幸地接待了他。

艺术家们携妻子前来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带他们上剧院，给他们录了音。他们下榻在大都会饭店。在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艺术家们忍住了和妻子们吵架拌嘴。艺术家们要求妻子们把头巾换掉，建议她们到帽店去买圆形软帽。妻子们断然拒绝把头上自古以来就戴的头巾换成有伤风化的圆形小软帽。大都会饭店使艺术家们感到难受："我们不是皇帝，用不着这样排场……给我们住农民的房子就行了，那里下边有小饭馆，能喝上茶，可是这里连个喝茶的地方都没有，净是咖啡！"——于是他们同意了大都会饭店让他们合住在一个房间里的条件，——"其实单独住我们觉得不方便……"——艺术家们在彼此等待上面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他们一定要成群结队地行动，七个人等一个带着妻子的迟到者，等齐以后，他们便一个拉着一个走在莫斯科大街上——立刻结成了一个集体。

帕列赫人走过了一条
　　巨大的
　　　　巨大的
　　艰难的
　　　　非常艰难的道路——
——也是一条辉煌的道路——

……他们是从俄国古典小说中……被机械地照搬出来的……

……形象不仅仅是有重量的，有前景的，持实用态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也一定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了安东举斧子砍他以后他在路上的思考，他讲道：

“……后来，我甚至在大街中间停了下来，自己敲了敲自己的脑门，想必我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哎，我这是怎么啦？哎，笨蛋，笨蛋……怎么搞的，我倒成了革命的奸细，要是去把这事告诉别人，别人不光会说我活该，反而我真的成了富农的间谍，我到富农那里去摊了革命的牌，我拉了富农的手……’”

在来帕列赫之前大约三个月，还是冬天的时候，但比那要命的惶惶不安晚得多，也就是他已经听见了千百万人的声浪，知道了他处在阶级中并和阶级在一起的那个时候，阿尔别科夫写了一篇关于老人的短篇小说。这些老人不像罗曼和安东。小说中的结论恰好与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关于背叛的思索相一致，小说也正是为了这些结论而写的。

小说的名字叫做《编外人员的地位》，这是为了对叙述中部分编外情节及其人物的编外思考表示敬重而取的书名。小说内容如下：

俄国的定居点，正是——定居点是——俄国的。在几位伊凡沙皇时期，这里实行的是对分制农奴制，在几位帝王统治时期——这里设过一个县，1917年前夕，这个县被撤销了，作为编外县。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过了这个编外县，苏联地界测定局把区执委会安置在城里。本世纪初，这座城发生了一件离奇

古怪的事，随着革命的蓬勃兴起，这件事也就销声匿迹了。退休的将军们决定在城里买带花园的房子，并在这些房子里安度晚年。从城里到车站有七十一公里路程。集市和教堂在山上，不过教堂被钉死了。集市周围是从前世袭名门望族的住所，全是两层的砖石结构，有石头大门、无窗马厩、狗舍和荒芜的果园。从集市和这个居住区的两层住所往东、南、西、北望去——清一色全是带篱笆围墙的木头平房、果园、十字路口上的水井、牧场、田野、天空。

区执委会设在从前的参议会里。负责人员的宿舍设在从前带有客房的茶馆里。在原先集市上大车店的马厩里和两层石头房子里是兽医诊所，上面一层住的是主任兽医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药房也设在这里；初级兽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住在外面的厢房里。大街对过，正好窗户对着窗户，也是在二层，住着保健医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他占了整整一层楼，陈设着将军的红木家具。城里有五名医生，两名兽医，大约三十名教师。当然，每个村苏维埃都有自己的医疗诊所和兽医诊所以及自己的师资。

兽医格罗扎和保健医生涅韦利斯基是革命后来到城里的，他们相遇以后没有彼此伸出手，没有彼此问候致意，没有表示想要彼此认识认识。这是有缘由的。从前，早在1905年之前，格罗扎和涅韦利斯基都在卡利亚津[1]地方自治局供职。自卫生保健委员会召开皮罗戈夫[2]代表大会以来，地方自治局里形成一个惯例——惟有按卫生保健委员会的推举，新医生才能进入地方自治局供职，并且在供职头一年，他们只能作为临时医生

① 俄罗斯加里宁州城市，始建于十二世纪。
②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解剖学家、外科学家、野战外科学与外科解剖实验学派的创始人。

试习，以便医务界能够用各种办法对其接受加入自己行列的人选进行考察。这不是地方自治局法典中的法规，这是地方自治局通过实践约定俗成的惯例。地方自治局参议会主席和卡利亚津地方自治局首席贵族是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公爵，本地的地主和王后陛下的枪骑兵。拉斯托罗夫任军政长官，他独断专行，没有通过卫生保健委员会，没有进行试用，便聘用了两名医生永久任职。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激愤了，聚集在保健医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那里，讨论如何对待他们，以捍卫皮罗戈夫的规则。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履行了诺言，表现出卓越的演说技巧，并援引了地方自治局里主张严格规则的人的话。民主主义者们提出了民主的措施，决定重新集中起来开会，邀请大公没有通过卫生保健委员会而雇用的那两名医生来参加会议。决定友好地同那两位医生商谈商谈，说服他们主动拒绝大公的提议，最好服从惯例。最后做出决定，倘若这两名医生不接受友好的建议，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就不跟这两名医生握手，同他们断绝往来。卫生保健委员会成员重又聚在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家里，两名新医生也来了。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做了出色的讲演，他说服两名年轻医生不要把优秀的皮罗戈夫规则破坏掉，并警告说，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将采取不握手的方式为捍卫惯例而斗争。两名年轻医生认真听取了涅韦利斯基的讲演，并将其转达给拉斯托罗夫大公。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大公从涅韦利斯基的讲演中看出有反抗倾向，紧急召集卫生保健委员会开会，通知医生们说，他将在这次会议上向诸位医生介绍两名新同人，如若某些人不向他们伸手，那么这些不伸手者将被开除出地方自治局。结果医生们全伸出了手！……除了两名医生之外——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和伊万·阿夫捷

耶维奇·格罗扎。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得知大公的意图之后，在召开卫生保健委员会会议前一天提出了辞呈，赶忙离开了卡利亚津，以此规避了握手，转到一个新县去工作了。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与医疗卫生保健委员会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他出席了会议，当大公做出友好的大手势介绍新同事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却把手藏在背后，向大公行了旧式礼，郑重地说："对不起，大公，我不愿意跟这两位先生认识！"于是，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从卡利亚津地方自治局被解职了。涅韦利斯基的背叛行为比那些伸出手的苟且偷安者更加恶劣。当时，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来到卡利亚津清理自己的住宅，对自己的同事一一进行了半合法的告别拜会，他们为他举行了半合法的饯别宴，大家在饯别宴上发表了许多半合法的讲演和预言。但却没有为格罗扎举行饯别宴。为格罗扎送行的是一位医士和兽医诊所看门人。说到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那么他曾五次这样从一个县转到另一个县，为了治疗牲畜的不育症、口蹄疫、炭疽、鼻疽和马腺疫，在俄国乡间土道上行程千万俄里。就在帝国行将崩溃之时，在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在封建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和养精蓄锐中，在弗托罗夫[①]的资本主义和冯-梅克[②]的工业大获成功之际，俄国的这些乡间土道把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带到了莫扎伊斯克城。莫扎伊斯克县的地段上住着一些兽医同行，他们正在恢复果戈理时代的生活方式。格罗扎来到这里不久便在卫生保健委员会里作了关于莫扎伊斯克县兽医业的状况及其发展措施的报告。"卫生保健委员会的诸位委员先

---

① 俄国金融寡头的代表，拥有弗托罗夫父子公司及许多工业企业等。

② 冯-梅克（1821—1876），俄国资本家。

生!”格罗扎庄严地说,“我的全部生活和社会工作实践及经验告诉我,我们应把共同的、公益的事业视为神圣之事业。当人们向我指出我在社会工作中的缺点时,我惟表感激,因为我改正我的缺点就是改善公益事业。因此,我今天作报告,一开始就指出莫扎伊斯克县家畜疾病防疫中存在的不足,甚至一些极丢脸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地段上一位兽医,我就不在这里点他的名字了,我希望他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我们有一位医生用地方自治局的钱订阅《俄罗斯言论报》,而却把订报费拿去报销,好像作为药品包装的纸张费,欺骗地方自治局。这位医生像其他某些医生一样,是骑着地方自治局的良种公马出诊的,他出诊不用花一分钱,但他却在差旅费报销单上填写每俄里二十戈比,似乎他是骑出租马出诊的!”……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的报告很长。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医生和兽医,彼此去串门做客,彼此请酒,彼此向对方的妻子和小姨子大献殷勤,而报告却遭到死一般沉默的冷遇,存照“备查”。1917 年夏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时期,在正值卫生保健委员会那些医生迅速成为临时政府的委员和特使之际,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却惟其自己那篇关于卫生保健的发言,像遇到火山喷发一样,而被开除出了莫扎伊斯克地方自治局。落了个如上所述的编外人员。他孑然一身,老光棍一条,老家伙一个,没有财产。成了编外人员以后,他从早上八点钟便开始接诊,到中午一点钟结束,他自己给自己做饭,自己给自己在量杯里稀释五十克精馏酒精,吃饭,喝酒,然后睡到下午三点钟,三点钟到县里去,日落时赶回来,检查检查住院病人[①],又稀释五十克精馏酒精,在药房里把它喝掉,不就下酒菜,一边

① 指病畜。

发出咯咯声，晚上九点钟煎一个鸡蛋，吃完煎蛋以后便躺在长沙发上，盖上罗曼诺夫熟羊皮被子，反复读迈因里多夫的长篇小说，直至睡着。一到秋天，编外人员的头顶上风吹雨淋。格罗扎头顶上的破漏屋顶被地狱般的狂风吹得哗啦哗啦乱响，下雨时，好像一群穿着无跟软底便鞋的令人不快的不速之客在房顶上神气活现地橐橐行进，这群不速之客实际上很久以前就来过这里了。在这样的夜晚，当编外区一片漆黑时，把屋子里点得亮亮的，烧得暖暖的，不急着到任何地方去，和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感觉真好。住在对面的、窗户对着窗户的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家里正是这样的景象。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成为编外人员来到这里比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晚一些时候。想当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卡利亚津与格罗扎不辞而别，他作为省城的一名保健医生迎接了1917年，并从3月到10月，他先是社会民主党，尔后是社会革命党，搞国家建设，搞了大约两个星期，被称为省城的委员，身居市长的位子，后来负责省城的保健工作，十月革命以后开始衰落了，曾两次遭到军需士兵们的搜查，由于1918年在地窖里藏了二十七普特精白面粉而蒙受耻辱，转为编外人员，载了七车日用家什，离开车站，过起编外人员的生活。成为编外人员以后，他获得了将军的年资，添置了一些将军的红木家具。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妻子，一个极其粗壮和高傲的女人，戴着夹鼻眼镜，按职业是医士，是世界古典文学真正的专家和博览群书者。她开口说话就引经据典，她觉得这样比她说话不引经据典更方便。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区执委会碰见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认出了他，于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的眼睛里当时甚至露出了亲切的目光。区执委会主席特鲁巴乔夫同志说：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来了一位新卫生员，涅韦利斯基同志，请认识一下吧！”

但是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像从前在拉斯托罗夫公爵面前一样，把手藏到背后，低下头，拨浪鼓似地摇着，向特鲁巴乔夫行了个礼，庄重地说：

“对不起，帕维尔·叶戈罗维奇，我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认识！”

特鲁巴乔夫很尴尬。涅韦利斯基的眼睛变成了浅灰色，细细地眯缝起来。一般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有一副旧时代大学生、民意党人的那种派头和外表，穿着风衣，戴着帽子，留着长发，像妻子那样戴着拴黑色小细绳的夹鼻眼镜，身材瘦削而灵巧。

特鲁巴乔夫单独地对涅韦利斯基说：

“你，涅韦利斯基同志，请不要生气……他是一位优秀的兽医，只是人有点儿疯疯癫癫，据说，他独自喝酒，通宵通宵地看小说……”

特鲁巴乔夫单独地问格罗扎：

“你，格罗扎同志，这是怎么搞的，你无缘无故地执意不肯跟他认识？要么你知道点什么？如果你知道，就请讲出来吧！”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暴怒地回答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愿意谈涅韦利斯基！”

晚上，当绵绵秋雨成一个星期地刷刷落在两个编外人员的屋顶上时，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家里却十分温暖而明亮。医生和老师们都来找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沙发椅和长沙发上聊天，有时甚至对当前的形势发生争论。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订了《红色处女地》和《新世界》，这两种刊物摆在一张单独的小桌

上。大声地读新杂志，由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来读，她尤其对当代作家持热嘲冷讽的态度。雨在夜间房顶上和大街上哗哗流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从事公益事业。她组建了方志学协会和方志博物馆，从将军的家什中搜集了狼、熊、狐狸、艾虎、鹰和黑琴鸡的标本，收藏在方志博物馆里，按照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的意愿，孩子们采集了许多寒鸦、麻雀、黄雀、山雀和布谷鸟的蛋，放进博物馆里。这里还有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分挂在各处的一捆捆各种各样的禾本科植物。春天，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第一次使编外人员打排球，她和同志们迷上了排球。夏天，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组织知识分子集体乘船旅行、野餐、钓鱼、煮鲜鱼汤。在编外人员中，正如物之常情那样，春天被夏天所取代，夏天被秋天所取代，以此类推。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经常开会。但是他按照皮罗戈夫的遗训，每天六点钟之前准待在家里，吃饭，严格保持晚间祈祷和休息，黄昏时刻到城外走一走，夏天到随便什么地方的冲沟或者山岗上，或者春天和秋天到被毁坏掉的磨坊里，在这里，虽然他日渐年老体衰，但他却在等这个或那个年轻女老师，在这里谈论永恒，他妻子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却对此持讽刺态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破坏遗训。在编外人员中，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受到了欢迎和尊敬。他讲课，担任会议主席。按照皮罗戈夫的惯例，私人开业行医是不允许的，而且这也不是卫生保健医生的专业，但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算是优秀医生，原则上不搞私人行医，他只是参加会诊。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像讲述活生生的当代生活那样讲述他长久保存的关于自己从卡利亚津青年时代到成为编外人员的费解之事的历史，讲述他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星期从窗户里偷听了两个行人在他家门口的一段对话，一个行人问另一个行人：“医生是住在这里吗？”“是的。”

“医生还不错吧，是个好医生吧？”“非常好的医生，专门的医生——只是不治活人，专治死人。他不治活人……！”——而格罗扎一个人生活，很孤独，总是愤愤不平，他不出去串门，而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只有他的助手，年轻兽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并且他只喝稀释的酒精。格罗扎这时把酒量从五十克增加到一百克，一次煎八个鸡蛋。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无论如何不属于健谈型的人。夏天，夜非常短。无论是成年的牛和马抑或牛犊和马驹的保险责任一古脑儿都落在兽医身上。一到夏天，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凌晨两点半便醒来了，骑马去检查牲畜保险情况，直到八点，直到诊所开始接诊。天一亮，他便从从前的大车店里赶出马车，沿着小道，轰轰隆隆地行驶，穿着帆布风衣，戴着草帽，装着燕麦的袋子上边系着硕大的公文包。半纯种的牲畜最好，老头子最凶。夏天常常有大雷雨。说到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同志（他那些同学早已在边疆区，甚至在莫斯科工作了），那么他是本地人，出生在山下边的农庄里，渔民的儿子，封建小市民和乞丐的后裔，他打小就学捕鱼，十六岁那年，被红军的浪潮卷到了南方，他打仗出色、勇敢而忠诚，1921 年，他复员了，他既没有去上学，也没有到什么新的地方去，而是作为编外人员回到故乡，跟一个助祭的女儿-老师结了婚，留在山下边过日子，生儿育女，当了区执委会常任主席，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把事务和家务处理完以后，经常在党的会议上了解消息。当然，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邀请过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和他当老师的妻子到家里来做客。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和妻子只去过一次。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渐渐地兴致勃发，谈起

了巴克尔[①]和蒙台梭利[②]博士的儿童教育方法，援引了奥维德[③]和谢德林[④]的话，粗略地提了一句，说她天生就是扎瓦利申娜[⑤]。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的妻子喜欢上了涅韦利斯基夫妇，但是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妻子避而不答，在第二次邀请时，他向妻子严厉声明："我不去，见他们的鬼去吧，知识分子！……我求你也别去……扎瓦利申娜——话太多！——他们戴着领带！……"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一次也没有邀请过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只是有两次要求他到场院里，到诊所的练马场来，为了对漏雨的屋顶表示庆贺，他要当场大骂一通。

第一个伟大的五年计划的时刻临近了。委员会一行三人——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边区经济统计学家、女速记员兼秘书——乘汽车从边区来到这个编外人员的地方。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此前不久刚从莫斯科被派到边区，他是个微显老态的人，迈着海员的步伐，他从前当过海员、水兵，现在和司机一起在负责人员的宿舍里——从前帕维尔·秋京的带客房的茶馆——住下了。经济统计学家原来竟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的老熟人，于是他和女速记员兼秘书一起在涅韦利斯基家安顿下来。委员会的会议和许多委员会分会的会议都在分别摆着野兽标本和挂着本地植物标本的方志学博物馆里举行。在编外人员中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改变，所以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无处不在。他摘录出有关本地土壤的资料，提出关于这里如

---

①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社会学地理学派代表人物。
② 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
③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8），古罗马诗人。
④ 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
⑤ 意指十二月党人。

果不能建冶金厂，那么是否可以建水泥厂或氮钾厂的问题。他甚至对风都作了计算，因为他提出了关于航空电气化问题。土地、天然界线、乡村墓地、荒地、耕地都一一作了重新计算，对所有的冲沟都作了计算，因为真真正正提出了把消灭冲沟纳入五年计划，通过对冲沟的治理改造使其灌溉编外人员的土地，建筑饮用水水库。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提出的这一方案是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想出来的。还召开了讨论编外人员的保健和畜牧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医务人员和兽医。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是主要报告人。他以卓越的讲演技巧作了报告，报告中引用了一系列数字。他谈了关于编外人员保健的光辉未来的卓越思想。至于兽医学，他谈了关于口蹄疫、马鼻疽、炭疽、马腺疫，关于它们所带来的灾难，关于同这些灾难进行斗争的方法及消灭这些灾难的方法。数字和讲演技巧指出，在五年计划结束之时，不惟流行兽疫，如马鼻疽、炭疽，疯病、口蹄疫、马腺疫，而且甚至牛的阴道炎和结核病都将在编外人员的成畜牛和马中，在牛犊和马驹中消失。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与特鲁巴乔夫坐在一起，认真听取了报告，感到稍微有点累。与会者们就医学和兽医学展开了辩论，应当说，他们谈得令人费解，因为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其实就如同没有辩论一样，大家对报告人表示一致赞同，并对他的才能赞叹不已，特别是对关于在五年计划结束之时无关紧要的兽疫将被编外人员制服的精辟发言。顺墙摆着兔子、狐狸、狼、熊的标本，墙上挂着杜鹃、黑琴鸡、鹏鸮。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向主席团提交了决议。这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才要求发言。他的样子很凶，毛发很重。

“先生们，”他庄重地说，感到不好意思，变得凶狠起来，随即改口道：“也就是同志们！我原则上不想谈涅韦利斯基公民提

出的关于医学草案，至于兽医学问题，那么我完全弄不懂在发生什么事。我在地方自治局供职，”他又感到难为情，变得更加凶狠起来，改口说：“也就是说，我起先在地方自治局供职，后来在苏维埃政权下供职——总计二十七年，”他又难为情起来，并彻底发起狠来。“就是说，同志们，我想完全诚实地说话。我不知道，我们打算哄骗谁。我举个例子。法国、瑞士、奥地利是德国的邻邦，它们与波兰有着最不文明的国界，——然而德国迄今还有兽疫。而我们这里的草原与伏尔加河近在咫尺，那里有哈萨克斯坦，有中亚，它们同样与蒙古、与所有兽疫发生地毗邻。我必须完全诚实地说，我确信，五年之内我们摆脱不了兽疫，我们为此需要数十年时间。”

同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道从边区来的经济统计学家发了言。他的发言极其客气和脱离实际。他极其客气地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发现在格罗扎的发言中有侮辱冒犯大会的地方，因为格罗扎怀疑讲演人不诚实。接下来，极其客气的经济统计学家利用兽医学的特点为出发点，揭发了格罗扎亲德和不相信革命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和破坏五年计划的企图。格罗扎失言说出的“先生们”和“在地方自治局里”这两句话，以被烧得通红的客气和极其脱离实际的鄙视的铁退还给了格罗扎。

主席、布尔什维克和从前的水兵出面保护格罗扎说：

“不过，那位同志的确指出了关于国界的事实和我们及德国人的兽医学事业的状况。请允许我评价发言的政治意义……也许，我们要修正主席团提出的决议吗？”

经济统计学家重又发言，坚决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发了言，用责备的语调说，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一开始发言就说，决议是他拟定的，他决不放弃。他是大会上唯一一个称呼主席名字和父称的的人，

所以他有点儿讽刺地、又非常友好地说：

“请原谅我们吧，伊万·涅菲多维奇，虽然我们被怀疑有不诚实行为，那么这一次让我们来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表决吧。”

这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的样子很严厉。他的眼睛很凶狠。他没有向主席请求发言。他大喊大叫起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我声明！……我要求讨论！……我原则上不愿意与涅韦利斯基公民打交道，我声明，我像地方自治工作者那样，也就是像医生那样，工作了二十七年，我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我所谈的关于兽疫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但我原则上是回避的，因为这里有明显的歪曲事实！……因此我声明，我决不打算向任何人道歉，我退出大会。”

格罗扎把门弄得砰的一声响。编外人员这里整个夏季的炎热都透进了博物馆的大厅，于是狼、兔子、狐狸、喜鹊的标本在大动肝火的发言和愤怒的炎热中复活了，甚至一捆捆禾捆的穗子都摇晃起来。喧阗停止以后，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提议对决议进行表决，并获得成功，——特别是做出了关于兽医学的决定，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时，被制服的兽疫将在编外人员这里消失。

大会以在负责人员的房子里，秋京从前的茶馆里会餐而告结束。在医生和兽医当中原来竟有爱唱歌的人，他们唱了《船夫曲》、《布琼尼进行曲》、《积木》，甚至还唱了《我们要欢乐》。主席，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是个快乐的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在大钢琴伴奏下跳了俄罗斯舞蹈，像从前在无畏舰甲板上跳俄罗斯舞蹈那样，而且钢琴伴奏是这次舞会的组织者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天亮时大家才各自散去。黎明中，已经许多夜晚

没有好好睡一觉的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和水兵与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一块儿到河里去洗澡，在草地上的晨雾中，他问特鲁巴乔夫同志：

"你的这个格罗扎是个什么人物？"他一边想，一边大声补充说："鬼知道他们，这帮知识分子！……实际上——编外人员，草原，——一条疯狗在这草原上奔跑吧，跑上一千俄里都没有人会碰上的，害鼠疫的老鼠或者黄鼠就更不在话下了！……但从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可都不是小孩子，不是在下跳棋，——他们可都明白，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可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要知道，他们学的不比这个老头儿少啊！……他姓什么，——格罗扎[1]——有这样的姓吗？"

"就是这样的姓，"特鲁巴乔夫回答说，"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员，人嘛……是个爱惹事的人。简直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认为他这个人挺各——硬是从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那么涅韦利斯基怎么样？"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问道"老是那么风风火火的，真见鬼，像社会革命党！……他在你这里表现怎么样？"

"工作挺努力，"特鲁巴乔夫回答说，并喃喃自语地思索道："鬼知道他们，你说，——这帮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的领带都是一样的。你跟他说话，可他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任何阶级接触，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涅韦利斯基有一次请我和妻子去做客，——他的妻子知识非常渊博，把我给镇住了……她工作挺努力。我想，——大多数还是对的，——你说得对，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你直

---

① 意为"大雷雨"。

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了，说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而是在干伟大的事业，——你从此开始了，你想了解他们的意见，就像了解专家们的意见一样。我也对他们重复了一遍，不得不相信……所有他们这些人，这帮鬼东西，戴的领带全都一个样！……”

“可不是嘛——要相信！……”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边思索一边大声说，“我将要到边区去了。从边区发电报到莫斯科。你知道吗，在莫斯科的苏维埃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材料中，——在莫斯科，在《畜牧业》这一篇、在《兽医学》这一章、在《与兽疫作斗争》这一节中的五年计划核算中将要写上和纳入核算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前，你这里的兽疫将要以苏维埃政权和兽医学的措施被根除掉！……这会当着你的面写下来的。情况明确而紧迫，你自己考虑吧。”

“需要自己人，”特鲁巴乔夫闷闷不乐地说，“需要自己人，需要党员……我要以此发命令，他们会努力干的……可是我无法给你好好解释清楚——相信他们我是无论如何不情愿的。可又不得不相信。我不是医生！……而发命令——我可以给你好好解释清楚——也不是那么情愿。知识分子会顶着命令拒不执行……不得不相信大多数，而这样一来可就只剩下糊涂的格罗扎一个了。”

他们在旧磨坊附近的河里洗了澡，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和从前的水兵坐上“中国式的梅塞德斯”，正如司机们对那些颠得散了架的汽车起的外号，到边区去了。草原辽阔无垠。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没有参加在负责人员的房子里举行的跳舞会。他躺在自己的二层楼上，盖着熟羊皮被子，整整一宿没有合眼，倾听着夜晚。他一次都没有去药房冲酒精喝。他的手一动不动地平放着，像死人的手一样。他的眼睛死死盯

着天花板。他的助手和他的唯一来访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参加了会餐，天亮时从舞会上回到自己兽医诊所的厢房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等待着他走在街上的脚步声，他从窗户里喊了一声，说道："请您来一下！"他打开了门，又在床上躺下来，盖上熟羊皮被子，双手贴着身体放平，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走进黑魆魆的房间，黎明时肮脏的暗影在房间角落里搜索着，散发着毫无用处的破烂东西和无风的夜晚的气味。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闷闷不乐地走了进来。伊万·阿夫捷耶维奇递给克利姆科夫一支烟。后者急急忙忙接过烟，但却非常慢地才点上。格罗扎沉默不语。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开始吸烟，过了一会才说道：

"您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呢，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什么为什么?!"格罗扎喊了一声。

"您为什么老是在大会上发言？……既然已经发了言，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斗争，就那样丢脸地离开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有实践经验的老专家和……"

格罗扎打断了他，问道：

"通过了什么决议吗？"

"涅韦利斯基的决议，几乎一致通过。"

"您投了赞成票吗？"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朝窗户里望了一眼，非常不悦，然后仔细端详着香烟的火，开口说：

"您很早就认识涅韦利斯基吗？应当从这件事开始，应当揭露敌人。您既然反对他，那就应该利用一切方法战斗到底，而不应该丢脸地离开……这甚至不是主要的……"

"什么是主要的呢？"格罗扎严厉地问，在床上坐起来，发出咯咯声，开始嘟哝说："我认识涅韦利斯基有四分之一世纪了，

我原则上认为他是叛徒，我不向他伸手，不愿意跟他说话，尤其是辩论，但我个人不是叛徒，不是告密者，我也不打算告发涅韦利斯基。”老头儿的眼睛变得忧伤起来。“您投了赞成票，对吗？请您现在告诉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我，这里就我们俩。难道我刚才说的不是真话吗？难道我们能在五年时间里战胜兽疫吗?!”

“当然是真话！……假如不是所有的人，那么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格罗扎高兴地喊道，“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而说了这番话！我在帮助兽医事业，在帮助国家！……而您——投了赞成票！……”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把视线从烟卷上移开，望着老头儿又悲伤又高兴的眼睛，抑郁不乐地说起来：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不是我要教导您！……假如人们甚至有意说了不诚实的情况，那么难道可以向他们表示支持真诚吗？——您自已好好想想，难道可以像您那样说吗？……况且主要的不在于此。关于涅韦利斯基，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认为，他出于阿谀奉承和抢功摆好，嘴上抹油，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在关于我们，关于像我这样的人，我想给您说说……我们学习得很少，我们不是党员。不知为什么总好相信普遍的高潮，相信革命的力量，——可是从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五年之后将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这五年真的能创造出奇迹，——也许我们谁都不在人世，——谁知道呢？对成就的信心——这是一回事。微薄的知识——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万一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在我们所有的国界线周围筑起石墙，那么我们的国界将比德国的要牢固，所有患鼻疽病的马匹其实将被烧死和埋在水泥中，——到那时谁将是正确的呢——您还是涅韦利斯基？

……还有，您看看布尔什维克们，——他们多么希望一切都成好事啊。拿我们这次大会来说吧，——我不谈特鲁巴乔夫，他如果不是直截了当，那么就是转弯抹角地命令说——干吧，同志们！——请您看看主席，一个极好的人，当过水兵，老布尔什维克，——大家注意到了，他的脸是怎么被砍伤的呢？——他在会餐时说了，一个白匪哥萨克砍了他一刀，——他多么希望，他以全部政治的和人的本质希望一切都好，——他很幸福，他大概认为我们的决议是件大事和成果，认为五年之后我们这里将不再有兽疫，他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那么怎么好举手反对他呢?!——也不想使他难过，但又令人可怕——政权！——政权想要使兽疫灭绝。某些人理应害怕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异己，他们不说真话既是存心的，也是由于恐惧——恐惧在起作用！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窍不通，除了向政权说好听的话，目的是不要把关系搞坏了，以此保住性命……人的性命——可怕的东西！……”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笨拙地把吸剩的、已经灭掉的烟卷扔到堆着其他烟蒂的墙角，又抑郁不悦、高声大嗓地说起来：

“本来不该发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人的性命——可怕的东西！……喏，请您告诉我，特鲁巴乔夫同志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吗，哪怕只有一次？要知道，想要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且也是为了荣誉，为了义务！……您也不会推心置腹地去跟特鲁巴乔夫谈话的，——而且没有必要，本来就没有必要发言！……当然，所有发言的人都反对您，甚至连那些一般赞成决议的人都根据各种不同方式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他们在撒谎和夸张，而您却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说出了真话。所以我们才站到了涅韦利斯基一边，我这是说我自己。甚至可以

说，同志们在诽谤您，把您当作又是机会主义者，又是反革命分子，又是异己分子，——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干了卑鄙勾当，他将会痛苦一天，然后——他甚至不是用自己的意识，而是用自己的整个身体——为自己的卑鄙勾当寻找辩护理由，一定能够找到，一定会指责对他人干了卑鄙勾当的那个人的卑鄙勾当……本来就不该发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您这样做于事无补，您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说句真话——假如您没有从窗户里喊我，假如您没有这样友好地给我一支烟，——那么我就成了您的敌人。您的发言只是给自己树了敌……”

“岂有此理！！我不要，我不需要！”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不是在叫喊，而是在咆哮，以致窗户玻璃哐啷哐啷地响起来。“我决不让犬儒学派和叛徒们待在朋友中间！我没有向任何人出卖过自己的人格！——我没有当过叛徒！——我不要！决不要！！”

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涅韦利斯基的住宅窗户打开了，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恳求地把手交叉起来，低声央求说：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偷听呢，我恳求您小点声，我求求您，不要这样！……我是作为朋友告诉您的，真心真意地，——我求您了，——他在偷听！……”

老头躺在了床上，盖上熟羊皮被子，把手顺着熟羊皮被子放平，凝神地望了一眼天花板，目光变得极其深邃，老头儿在倾听自己，于是老头儿轻声说：“……我老了！弄不明白了！……”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非常不悦地说：

“哎呀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黎明前，灯光突然闪了一下，拉

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躺下睡觉了。天已经完全亮了，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兽医诊所里传出了格罗扎的叫喊声。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俩急急忙忙打开了窗户。叫喊声静息下来。

“这纯粹是个白痴，这个格罗扎，他那破姓也是白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说。

“那他还一个劲地声称，他不相信兽疫会被消灭掉，不想再谈什么，便悻悻离开会议走了，是这样吗？——真是白痴！——他是这么说的吗？——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已经第二十次地这样问道，并非常小声地补充说：“你没有危险吧，拉夫尔？——你不认为这太过分，边区会要求审查的?”

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装出一副痛苦的面孔、痛苦地说：

“不，当然——假如你知道我对他们有多厌恶就好了!”

“对谁，格罗扎吧?”

“不，当然是布尔什维克，——这全是灰色呓语，这一切都是愚钝呆傻！——你要是知道这一切使我感到有多么讨厌，他们使我感到有多么恶心就好了！……至于格罗扎，那么我明天依照工会的路线提出抗议……”

“是啊，那当然!”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说。

天大亮了，中国式的梅塞德斯汽车在负责人员的房子跟前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紧随汽车之后，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的轻便马车咕咕隆隆地驶来了，他要去为成年的牛和马，为牛犊和马驹上保险。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坐在轻便马车上，穿着帆布风衣，戴着草帽。他身后边装着燕麦的袋子上系着硕大的公文包。半纯种牲畜愉快地走着，身上的毛色十分漂亮。

在山脚下，在从前的大教堂那边的下坡路上，特鲁巴乔夫同志碰见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特鲁巴乔夫对伊万·阿夫捷

耶维奇喊道：

“你听见没有，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你干吗捣乱呢？你坦率地谈谈那些要命的兽疫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见鬼，都戴着领带！……涅韦利斯基搞错了——那你就真诚坦率地讲一讲吧！……”

格罗扎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哦，你自己想一想吧，我们有百分之七十的母牛患上了阴道炎，——在芬兰，在那个盛产奶牛的国家，母牛患阴道炎和肺结核的百分比是很高的，——如果你不相信德国的统计，那就拿丹麦的统计来看看吧……”

“你先别一个劲地讲科学，——你先简要地谈一谈，将来是否还会有兽疫？关于涅韦利斯基你也谈一谈，”特鲁巴乔夫说，“给你，抽支烟吧，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还会有，”格罗扎斩钉截铁地说，并斩钉截铁地加了一句：“谈涅韦利斯基有失我的人格。再见。”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挨个儿动了动缰绳。

“你站住，请等一下。你到哪里去呀？——你大概知道涅韦利斯基的什么事吧？——那好，你既然断言将来还会有兽疫，那你大概也会为将来仍有兽疫帮个忙吧？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再见，”格罗扎说，“你说的是蠢话。我要去给牲畜上保险了。”

草地上大雾弥漫。特鲁巴乔夫用雾蒙蒙的眼睛目送格罗扎下山去了。而山上仍然是俄国定居点，在几位伊凡沙皇统治时期，这里曾是田边要塞，后来被作为编外人员的居住地，在从前木制要塞的地方上是集市和被钉死的大教堂。朝南、北、东、西望去——到处是编外人员的房子和区域。每到秋天下雨的日子，这里便大雨滂沱，狂风肆虐，雪暴怒号……像自然界应有

的那样，春天被夏天代替，夏天被秋天代替。冬天，大雪封路。岁月就是这样一年年流逝。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过了编外人员，苏联地界测定局把区执委会安置在城里。五年计划实施伊始，城里教堂上的钟被摘走了，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任何结果，人民将会为钟而起来造反的，——但是钟被摘走了，被遗忘了。编外人员周围的农村纷纷行动起来了，蜂拥加入了集体农庄，——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个体农民消失了，周围出现了新鲜事物。有一次为了集体化的事，全体编外人员夜里都没有睡觉，小孩子们趴在围墙上，而年轻人则迎着朝前走去，迎接从车站开来的、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的拖拉机。拖拉机开进了已经没有钟的大教堂里，开进了大教堂的车库里。编外人员欣喜若狂地跟着拖拉机来到大教堂，他们到这里来了大约三天，对拖拉机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还到田里去看，好像他们在耕地似的。为了拖拉机的行驶，从车站到编外人员居住区的大路换成了公路，于是公共汽车在公路上跑开了。成立集体农庄以后，在山下边拖拉机的忙乱中，在被毁掉的磨坊的原址上，发电站轰隆隆地响起来，一个编外人员像要求所应得的东西那样，在区执委会里要求给每家每户拉上电线。许多编外人员从编外区赶快溜掉了。许多新人在编外区落了户。

这样过去了四年。

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准备在方志博物馆里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值十二月。编外人员的土地上还有兽疫，当时这件事被遗忘了，但都知道。格罗扎的房子在涅韦利斯基的房子对面，窗户对着窗户。已经到了除夕，——当时在莫斯科，工业党的诉讼案刚刚结束——已经到了除夕，——两辆崭新的汽车从新公路上开到了编外人员居住区。一个人从其中一

辆汽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羊皮大衣，戴着有护耳的棉帽，穿着毡靴，——他就是从前的水兵，有点见老了，脸冻得够呛，由于寒冷，从前被军刀砍伤留在脸上的疤痕发白了。方志博物馆里亮着两盏高瓦数的电灯，为了迎接节日，博物馆门前的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委员会检查了五年来所做的工作）。老水兵慢条斯理地宣读了一张张已经变黄的速记记录。站在他旁边的是特鲁巴乔夫同志，俯身看着记录。

“哎，你呀，——领带！……都不是小孩子了！……”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是最后一个被叫醒的，他被告知，让他马上到方志博物馆去。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老水兵从带有绿色椭圆形灯罩的电灯那边迎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走过来，向他伸出手，说：

“认不出我来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你好，过得怎么样？我们正在这里读速记记录呢，——这个，你瞧，记得吗，当时我们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你说过，兽疫仍将会有。它们果然还有。你能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吗？”

“您好。我认得出来。正如我从前已经说过的，兽疫还有。”

“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吧，你能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吗？涅韦利斯基用花言巧语把我们蒙骗了，——应当把他逮捕起来的……”

“逮捕？”格罗扎又问了一遍，毛发很重地微微一笑。

“逮捕，”水兵回答说。“所以，你看你有什么说的可为自己辩解吗？假如四年前你把涅韦利斯基讲出来，说不定那时就把他逮捕了——为了对事业有利嘛。你以为，人们会因为你窝藏坏蛋而尊敬你吗，啊不！……特鲁巴乔夫其实真心真意地跟你谈过！……你可以信赖吗？”

“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包庇坏蛋呢？……”

博物馆里非常暖和又明亮。博物馆后面是俄国定居点，编外人员居住区。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暴徒横行，这里有田边要塞。不过，当钟从大教堂上被摘走时，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任何结果，——可是钟被摘走了，被遗忘了，于是大教堂在俗语中开始被叫做“拖拉机场”。

这个短篇小说中大致重复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所讲的那个情况：涅韦利斯基——安东，格罗扎——罗曼。“古典小说”和“古典思维”的传统被搬到了故事中，那么，“可以拿列夫·托尔斯泰，拿《战争与和平》作例子，把书放在左肘下。”阿尔别科夫选取了正确的思想，——这思想是，向革命撒谎和在革命中做中立派是行不通的，但他描写了这样的革命、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涅韦利斯基和格罗扎与从来没有过的、也不可能有的党员们关系的这样的“构图”(帕列赫语!)。帕列赫和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无产阶级思维的改造的见证人。全国都卷进了革命中，每一个编外人员都为自己解决了革命，在那里：

“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过了编外人员，”——编外人员如是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革命从他们旁边过去了，在他们后边进行的——这样的编外人员当时没有，他们只是出现在从经典作家们那里被搬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表现手法中，就是说他们只是在感觉中和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思维的思维中。要是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到无论是涅韦利斯基还是到格罗扎那里去上十次就好了。要是特鲁巴乔夫连一个小时都没有在党内待过，没有领导过罗曼就好了，——无论是特鲁巴乔夫，还是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那里没有共产党，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它在国家中，它就是国家。对于涅韦利斯基

和格罗扎来说，见证人就是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儿子，道路技术员，是瓦库罗夫、德德金、祖布科夫、祖布科夫第二以及奇库林的孩子们，是布托林的两个侄女，——他们都是工程师、医生、农艺师、教师。布托林的两个侄女决不会去见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奇库林的儿子——医生——不仅会嘲笑地挑起关于兽疫的话题，而且会在共青团里预先讨论。边区来的统计学家对航空电气化方案……奇库林、德德金、瓦塔金的子女们，——他们将会出色地说，为了帕列赫，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从车站到“编外人员居住区”的道路不可能“未被注意”，因为道路技术员、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儿子会发动起全体“编外人员”和以父亲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为首的周围所有村庄来筑路。看来，——圣像画匠可能比编外人员更编外?! ——不，特鲁巴乔夫同志，区苏维埃主席，跟当地一位助祭的女儿结了婚，害怕领带，——不，已经陷进古典“构图”中的他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党决不——“自然而然”……在帕列赫，除了执委会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济明，还住着区委书记舍斯捷尔宁，住着共青团员们，——甚至还住着一位警察局局长，有一次他（用帕列赫的“反透视法”!）——有一次——

帕列赫有一个业余戏剧小组，经常在社会主义文化宫演出，——喏，不言而喻，——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是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就好了，——有一次这个小组确定了演出日子，贴出了手写海报，可是后来由于缺少演员没能演出，而当地警察局长半夜两点把全体“演员”召集到自己的房间，——喏，不言而喻，其中把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也召来就好了，——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演员们破坏无产阶级纪律，胡说八道，哄骗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没有可在谁面前援引当代苏联文学，对其进行嘲讽挖

苦！……）

就是说帕列赫和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一面教阿尔别科夫，教他学完，一面在实践中指出应该如何来写，——因此他们把阿尔别科夫那篇描写编外人员的小说留在了编外，这篇小说不真实，虽然它是根据关于对革命的忠诚、关于“中立”之灭亡（中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的正确思想而写成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从了国家，自己的祖国，发生过引人注目的事情和事件的祖国，改造历史和人的觉悟、从虚无中诞生的人们、从虚无中诞生的城市、工业、艺术的祖国。帕列赫的高韧性纸和漆器、帕列赫的工业、帕列赫的细密画艺术、帕列赫城，——它们都是用“反透视法”创建起来的，——它们“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当今时代的伟大，经历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升迁，像罗曼那样。他参加了挖掘新河流、使伊万诺沃州的乌格利奇和乌格利奇人、古代圣像画作者“灭顶”的前所未有的伏尔加-莫斯科大运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觉到了历史的破冰船的道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冲破千百年来的冰川的破冰船。这一切都很神奇。难道活着不神奇吗——当一名哪怕是时代的泥瓦匠，哪怕是时代的采石工——难道这不更加神奇吗？正如磁铁从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形象的无数铁屑和尘埃中只挑选与意识和感觉相一致的东西一样，——因此时代的形象……

叶菲姆·维赫列夫，一位勇于献身者和党员诗人，来到帕列赫组织帕列赫周年纪念活动，在帕列赫得了绝症，被安葬在帕列赫建筑壁画博物馆附近，即现在正在那里筹划兴建帕列赫公园的地方，帕列赫的新建筑工程正在施工的地方。这项建筑

工程将使过去的时代与现代和将来交叉起来。叶非姆的陵墓上写着普希金的诗：

> 黑暗的墓穴里安息着艺术家们的朋友和顾问……
> 他好像拥抱你，好像为你而自豪！……

叶非姆的死很可怕——全身血中毒。他是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家里病倒的，他刚一生病就说起了死，就感觉到了死。他身上很快布满了死尸的紫斑。于是他开始说胡话。在谵妄中，他在和帕列赫人交谈。在谵妄中，他在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交谈。他向领袖汇报了帕列赫的情况。他感谢帕列赫。他请求领袖在他，叶非姆死以后来保护帕列赫。

当黑麦受粉的时候，当庄稼结子实的时候，黑麦散发出尘埃和人体的气味。但这些气味勉强能闻到，被白天、风、太阳、艾蒿、矢车菊、风铃草和洋甘菊的气味盖住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在日落之前和日落之后长时间地躺在黑麦田埂旁，躺在没有割过的青草上，这时花香特别浓郁。他回家来总是拿一把矢车菊、洋甘菊、大翅蓟、飞廉和酸模。一般认为这些花没有香味，但这是不对的。

一到夜间，这些花便发出那种气味，应当把这种气味叫做夏天的气味，夏天的甜味、苦味、炎热味、尘土味、休闲味、黎明和日落味。梦在这些花的芳香中把现实与事实混合在一起，把数十年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与昨天刚发生过的事弄混了。梦中——阿尔别科夫和伊万、彼得、西多尔——当然都是阿尔别科夫，但在梦中，伊万有时对阿尔别科夫说的是真话，对这些话阿尔别科夫没有怀疑，而西多尔却玩弄手腕反对阿尔别科夫，这也没有使阿尔别科夫产生怀疑，——也就是说，意识在梦中

发生裂变，以致现实中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意识，——现实中即使有也只是在生病的时候。

而梦……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业已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当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来到新的地方时……

……在高加索，在特鲁索狭谷，阿尔别科夫遭到了大雷雨。山顶上的天空中，群星闪烁。山下，暴雨倾盆，雷声隆隆，群山伴着雷鸣在脚下急急奔去，闪电在脚下划过。在山顶处的大雷雨之上可以对宇宙进行思索。马慢步朝山下，朝谷地走去。在闪电的反光中，云彩从右面和左面，从前面，从旁边，朝着冰川、朝着卡兹别克山从下到上地飘动起来。它们单片地或连片地在游移。它们使马笼罩在谷地的雾霭和温暖之中。它们越来越多。它们把马和山岩藏到了自己的怀抱中。在旁边，在有十步远的地方，乌云骤然裂开了，以致马彼此闪避，一时间电光闪闪，雷声大作。闪电在刺目的光亮中划破了黑暗。雷声随着光亮响起来，使空气为之震颤，撞到一个，又一个，无数个山岩上。大雨如注般下起来，这时水柱、湍流、瀑布从山岩上飞泻而下。雷鸣和闪电急急向卡兹别克山赶去。乌云已悬在了山顶上，雷声从上边滚落下来。他们已经不在宇宙中，而在地面上了。几天以后，当时阿尔别科夫埋头做了一早上必须用微积分来算的计算，算出了时间的相对性，——这个相对性就是两年以后使他在伊万诺沃未名湖畔和在那个到达帕列赫的、散发着夜莺和铃兰气味的第一个夜晚所进行的思考，思考“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思考红塔尔卡……几天以后，还在高加索时，算

出了在阿拉扎尼谷地和晚间的闷热中、在黑暗中长寿的数字积分之后，阿尔别科夫倾听着从田野上传来的奇怪的吧嗒声和叫喊声。在田野上，在烟草种植场上，集体农庄庄员-格鲁吉亚人在采摘已经成熟了的烟叶，他们用夜间的叫喊声使自己振作起精神。他们叫喊的好像是“格哈姆-格霍！格哈姆-格霍！”用各种调子喊出来的”格哈姆-格霍”从一个烟草种植场传到另一个烟草种植场，鼓舞着在集体的夜间劳动中的集体农庄庄员。为了保证生产出优质烟，烟叶必须在夜间采摘，必须在天亮之前把烟叶挂在烘干室里。烟叶很像鹰的翅膀。在黑暗中，四轮大车吱吱呀呀地作响。被称作“蝙蝠”的灯笼的小火苗在四轮大车后边向烘干棚慢慢移动。烟叶成熟了，这时必须在几天之内把烟收完，收烟要在夜间进行。阿尔别科夫一夜之间四五次碰到那个不睡觉的、快活的、最积极的人，——他一会儿鼓动，一会儿不赞成，一会儿搭一把手，一会儿表扬，一会儿小声说话，一会儿像鹰似的叫喊着发出命令——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拉戈吉希区的区委书记，他什么都想亲眼看见，他无处不在，他不睡觉，也不打盹，——他现在就是烟草田的指挥官，集体农庄庄员就是他的军队，——他好像在打仗，——烟草、拖宕、时间（应当赶在时间前头）就是他的敌人。那天夜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阿拉扎尼谷地一边对烟草进行征服，一边进行收获。

……在高加索以北很远的地方，在俄罗斯西北部，在夏西河上，在拉多加湖那边，曾于 1928 年建起一座夏西造纸厂，为列昂尼德·列昂诺夫[①] 写小说《索契河》奠定了基础。诺夫哥罗德领地、奥博涅加郡、拉多加湖，——塔耶日州，奥泽尔内

① 列昂尼德·列昂诺夫（1899—1994），俄罗斯作家。《索契河》（1930）是一部描写苏联工业化进程的长篇小说。

边区，——季赫温水系。——摩尔曼斯克大道。彼得大帝的故事，圣彼得堡的故事，彼得大帝的世袭领地。从前，早在这一切之前，在有人类之前——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化石的志留纪、寒武纪、泥盆纪。冰河夏西。懒洋洋的景色：树木、石头、水、森林、湖泊、河流、漂砾、石滩。如同壮士歌中所歌颂的、像海一样的冰冻的拉多加湖。森林里居住着卡累利阿人、俄罗斯化了的芬兰人、大俄罗斯人。夏西河流入拉多加湖。瓦戈利马河流入距拉多加湖四公里处的夏西河。摩尔曼斯克大道全长十俄里。1925 年 6 月，在这里，在湖畔的昼夜中，显现出松林、沙地、河流、湖泊、漂砾、静谧、白色的天空、诺斯金村农民们唱的无精打采的歌。诺斯金在建村时，被取绰号为杜拉金[1]，在这里，妇女们割草、种植亚麻、放牧牲畜，而男人们则在季赫温河上，在马里河上放木排，在湖泊上，涅瓦河上——年年夏天，以便冬天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到远离居民点数百公里的森林里去，砍伐木材，准备流送。诺斯金村紧位于夏西河和瓦利戈马河交汇处。诺斯金村现在已经没有了。

1925 年秋天，这里来人了。人们用经纬仪测量了土地，点起了篝火，对诺斯金村人说，这里将建造工厂，巨大的工厂，还要建造城市。来人提出把诺斯金村迁移到新址。诺斯金村的人当然没有同意。当然，工厂来的人胜利了，当然，诺斯金村人断定，他们把城里人哄骗了：城里人商定，说诺斯金村将被迁移，城里人将要把新土地掘掉，说城里人将要为诺斯金村人建学校，买拖拉机。城里人愿意为诺斯金村人建造欧洲式农村，模范新村——当然，诺斯金村人没有答应：他们要求把他们的村子搬迁和建造得像从前一模一样才行，所以整整一夏天，“庄稼

① 意为“傻瓜”。

汉们”和“村妇们”往返地从新地方跑到老地方，从老地方跑到新地方，用小细绳测量，用打结的方法牢牢记住门、窗、拱腹的宽度和高度，以便用所打的绳结测量尺寸的精确度，要求建筑工人丝毫不爽地按照所打的绳结进行精确施工。

昨天，今天，明天，1928 年整整一个冬天，有四千五百匹马和六千农民（大概都是诺斯金村人）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附近的森林里，在河上干活，流送木材。他们在为已经矗立在夏西河河口、瓦利戈马河两侧、拉多加湖附近的工厂而干活，为工厂准备原料，为了工厂今年夏天开工。诺斯金村人在搞建设的这两年期间变得聪明起来了：即使是因为工厂每个月要作为薪水往这些地方投十五万卢布。夏西河的冰面上安装了巨大的起重机，钢铁构件，比当地诺斯金村的钟楼要高得多，关于这些起重机，当地一位老爹对庄稼汉们说：“你们快瞧啊，傻瓜，给你们架起了怎样的绞刑架啊，代替了上帝的小教堂呢！”——这些起重机把不计其数的原木源源不断地转运、发送到——已经不是欧洲的，不是美国的大工厂，——而是苏联的大工厂。在森林里，在夏西河的沙子上、漂砾上出现了一座宛若一艘船，一艘庞大无比的海船似的工厂，这艘船下到了无边无际的森林的海洋里，其蒸煮车间是一座十一层的高楼，这里摆着高度为二十米的一口口大锅，——工厂的中心大楼，——其蒸煮车间是船的上甲板，而顶盖是指挥桥楼，从那里放眼眺望，可以看见方圆一百公里处的森林、拉多加湖、河流、荒无人烟的地方、原始林带。人们在工厂里昼夜工作。工厂附近建起一座工人城，像诺斯金村人建新村一样，这座工人城是按照严格的设计而建立起来的，正面朝阳。从前，狼经常在那里奔走觅食，卡累利阿人唱着沮丧的歌曲，现在这里机器隆隆，汽笛轰鸣。机械师和烟囱安装工站在机器旁，更加专注地眯缝起眼睛在装配机器。一

会儿没有钉子了，一会儿水泥没有补运到，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厂工会没有配合好：工厂，森林中的、奥博加涅郡的城市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原料。

……十点钟，列车从列宁格勒开出，沿摩尔曼斯克铁路向北行驶，向奥泽尔内边区、向彼得大帝的世袭领地、向彼得罗扎沃茨克驶去。夜间，伊若拉工厂熄灯了。车厢里十分拥挤，坐满了俄罗斯化了的芬兰人、卡累利阿化了的大俄罗斯人、卡累利阿人、长着浅色眼睛和头上戴着芬兰式皮帽的人，前面是拉多加湖，奥涅加湖。车厢窗户外面——群星闪烁，森林耸立。午夜岑寂无声。两年前刚出现的伦加奇小车站。旁边是拉多加湖。车厢里夜间的闷热渐渐被夜间发出响声的寒冷、黑暗和雪代替了。小车站慢腾腾地向黑暗中爬去。同行者们在打趣逗乐。他们的小车站自愿地出现了，但小站的站长——大坏蛋，他没有报列车晚点多少时间，他穿着长衬裤来到站台上，对乘客们叫嚷道："哎，游手好闲的家伙们，过来买票啦！"同行者们朝黑暗走去。那里停着一辆轨道车。轨道车向森林驶去。天空、黑暗、云杉、松树、白雪、原始状态。行了不知多少公里——出现了工厂的灯火，铁器的丁当声、工厂之夜的簌簌声，两年前，那里也是一片原始状态。同行者们沿着枕木走去，路过一幢幢黑魆魆的厂房，紧挨着人工水渠和土壕沟以及新的建筑工地。瓦利戈马河的桥被严寒冻得嘎吱作响，桥那边是按照最严格的设计建起来的工人新村，工人城，所以与俄罗斯乡村没有相似之处。在这个黎明前的时刻，街上亮着灯。严寒砭骨，三月之夜的严寒。在为来宾准备的房子里非常暖和，灯火通明。楼下和隔壁房子里——到这里来组装机器的德国人正在睡觉。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抑或比利时人，一律被称为德国人。

夜。梦。早晨。

是啊，窗外是工人城，是一排排住宅区。是啊，窗外是诺夫哥罗德人的奥博加涅郡，松树和云杉紧靠着房子，——要么街道掩映在松树中，——森林、白雪、漂砾。奥泽尔内边区。是啊，窗外是按社会主义者们的意志正在兴建的工厂。两年前，这里只是原始森林地区、奥泽尔内边区，诺夫哥罗德的土地。同行者们朝工厂的建筑工地走去。为了埋设自来水管道，地被掘开了。地下铺满了水泥管道、砖、木材、原木——盖厂房所用的一切材料。厂房盖得像一艘带有指挥桥楼的巨船——十一层的中心大楼。人的劳动抓住了这片土地和这些森林的髻头。瓦利戈马河桥头附近架起了构件，庞大的建筑工程。这个工程建成后，废水将排放到拉多加湖里。水站将向工厂供水，工厂耗费的水将要比全列宁格勒所耗费的水还要多。为了使比加里宁境内的伏尔加河水位偏低的夏西河不遭到污染，工厂将把废水排放到拉多加湖里。天阴沉沉的。森林阴森森的。

同行者们朝夏西河岸走去，在那里，河岸的花岗石上面安装着起重机，这些起重机将把不计其数的原木投送到工厂。一个戴着有护耳的棉帽，穿着熟羊皮夹克和毡靴的德国工人正在安装起重机，对来到这里的同行者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和正在建厂的工程师们表示欢迎。他请求让工人三班倒，以便他能够在复活节之前结束工作。起重机吊在夏西河上方，压住了它。构件上挂着斗车，高高地悬在半空中，悬在有手指那么粗细的缆索上，但是旁边放着的为第二副和第三副构件所用的盘起来的缆索说明，缆索比人的手腕还粗。天空灰蒙蒙的。雪发青。这幅景色一点儿也不像谢罗夫[①] 画的彼得大帝在彼得堡漫步的那

① 谢罗夫（1865—1911），俄国画家。《彼得大帝》是他的历史画，作于1907年。

幅画。人们迈着彼得大帝的步伐走着，被风吹拂的同行者们走在他们后边。同行者们离开起重机，走在机器运送原料和不计其数的原木的那条路上，朝车间，朝工厂走去。同行者们来到不计其数的原木将变为木屑的车间。一个瑞典人在机器旁欢迎来者。同行者们踏着楼梯，迈过胡乱堆放的石头，一会儿走在木材下边，一会儿走在木材上边，从没有组装起来的散发着机油气味和用粗席包着的机器零件旁边走过去。给这里机器送来的不计其数的原木将离开工厂，通过铁路枕木发往各个车间，经数十个车间加工后，它们将变为纸张、新闻纸、封面纸、纸浆、许许多多工业产品。同行者们踏着地下施工现场、铁路枕木、堆放材料的临时工棚、起重机和升降机的新挖土沟来到一个将用高炉从黄铜矿中提炼出硝酸和其他酸的车间。被用比全列宁格勒所需要的水还要多的水冲洗过的、被分出等级的、与硝酸混合起来的纸浆将倒进所谓的蒸煮锅里。蒸煮锅被指挥桥楼的十一层圆顶盖住了。蒸煮锅有六口，每一口高度为二十米，这些圆顶形的蒸煮锅，中世纪的塔楼，教堂的钟楼。纸浆要用泵喷射到十一层这些蒸煮锅的盖顶上，以便使其落进蒸煮锅。在这里，每一口锅都比有五个房间的合作社住宅大，这些锅将要煮木头，就好比主妇煮碎麦米粥一样。这些锅将把煮好的木头糊糊送往庞大的贮水池，以便对其进行重新清洗，把硝酸洗掉，把有毒的废水进行过滤，然后通过巨大的管道将废水排入离工厂五公里外的冰冻的拉多加湖里。

要么用压力机把纯净的木头糊糊加工成纸浆，要么用机器将其制成印刷机所使用的新闻纸。同行者们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会儿翻沟越坎，一会儿踏着楼梯上上下下，一会儿踩着木材从一个厂房到另一个厂房。同行者们登上十一层的楼顶。在工厂的指挥桥楼上，风自由自在

地吹拂着。森林和拉多加湖处在同行者们下边了，夏西河向雾茫茫的远方滚滚流去。可以认为，同行者们看遍了伦敦所有的绘画陈列馆——脑子变得实在有点儿迟钝了。腿和肩膀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留在意识中的是一个紧挨一个的车间。同行者们被领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欧洲只有一座与这座工厂等大的工厂——瑞典沃利戈夫工厂。工程师们朝办事处走去，为了在那里抽支烟，看看计划。办事处还没有完全建好，只是一所简易木棚，——先制造机器，后用机器来制造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师们朝机械车间走去，这个车间建好了，天花板已经竣工。在发电站，在涡轮机身中，在工厂的心脏处，组装起两台八千瓩的涡轮机，三个楼层分别安装了配电盘。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比腿还沉重。

当同行者们返回来时，在瓦利戈马河桥畔，在供水站旁边，一个卡累利阿人模样的庄稼人喊住了他们。他雄赳赳地拉紧缰绳，他那精神饱满的维亚特卡种马拉着带篷马车，即带篷雪橇。

“请问，拉你们兜兜风怎么样?”他喊道。

两年前，这里到处是石头、森林、水和天空，诺斯金村，又名杜拉金村的农民用灰化方式耕地。诺斯金村人用绳子打结的方式把自己的村子迁走了。现在有六千名诺斯金村人在原始森林里砍木材，有四千五百匹马为这个工厂运送木材。

卡累利阿人模样的庄稼人坐在带篷马车的车座上，雄赳赳地仰起戴着芬兰式皮帽的头，豪爽地大喊了一声：

“请问，拉你们兜兜风怎么样?!”

请求就是建议。建议就是请求。两年前这里是原始森林。早晨，当同行者们去工厂时，他们看见总办事处对过，合作社和合作社食堂对过，那条主要大街上，有一个集市。人们向他们解释说，夏西河商场的集市迁移到这里来了。一个留着大胡子，

穿着短皮袄的乡下人把自家做的粘土制品摆在雪地上——瓦罐、瓦盆、可以从尾巴上吹响的玩具公鸡。一个村妇摆着透明水果糖。一个笨拙迟钝的人心有所思地用鞭子在刨雪。一个像鲍里斯·库斯托基耶夫[1]的画中所画的村姑被一个穿着皮靴和夹克衫的小伙子的彬彬有礼弄得不好意思：小伙子塞给她一件长四分之一俄尺的两头带穗的精美物品。同行者们给自己买了能吹响的玩具公鸡。

晚上，散会以后（像所要求的那样，会上一切都"捆好了"），在工厂食堂吃过晚饭以后，同行者们到街上去转悠。根据步态和两手插兜的样子，一眼就能看出是"德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小姐在大路上散步。小姐们戴着帽子。我们的人也在跟小姐们，跟自己的——我们的小姐们一起散步：我们的小姐脚上穿着皮靴，头上戴着头巾。一个反抗空间的男人热情地顶住胸口，一口气喝光了一瓶伏特加，热情地说：

"休息日，都喝醉了。"

当地一名工作人员即景讲了一件可笑事：

"我敢说，你们要明白，监狱没有作预算。这笔预算只好失去了。盖了一座省钱的监狱。木匠吹牛说，他做了一个秘密孔，如果万一他本人身陷囹圄，好逃跑。这个秘密孔他只告诉朋友们。"

像过节似的灯火辉煌的俱乐部把广播喇叭里的话透过墙壁抛到大街上的寒冷中。当地一位工作人员在讲述冬天冒着严寒在原始森林中干活的英雄主义，那时寒鸦冻得都从天空中掉下来了。昼夜不停地在建工厂。一个同行者摸着口袋里的玩具公

① 鲍里斯·库斯托基耶夫（1878—1927），俄罗斯画家。组画《集市》描绘了农民以及外省小市民和商人的生活情景，场面热闹，色彩绚丽。

鸡，思考着——人的生命的神奇，人的生命力。两个姑娘从这里路过，走过去以后便笑了起来！——生命开始了！——开始的不是打绳结测量的生命，而是用直尺测量建造起来的这些工人的住所、这些住宅楼的生命。这些楼房属于杜拉金村，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在两年时间里改建的。

在为来宾准备的房子里，同行者们注意地仔细检查着墙壁，想找到蟑螂——蟑螂他们没有找到。杜拉金村人吹着会响的公鸡玩具，转身朝工厂走去。诺斯金村人首先碰到的是工厂蒸煮车间的指挥桥楼。一切都非常清楚，无须解释。神奇的生命！

夜里，当一个人刚刚睡着一个小时就起床，那是非常难受的。缺月挂在云杉树梢上，照得天空发亮。看守人在黑暗中彼此吹口哨打招呼。同行者们踏着建筑工地上的沟沟坎坎朝轨道车走去。一个民警喊住了他们。摆脱了黑夜的这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与工厂一起出现的伦加奇车站有一位本性残暴的站长，他认为他身边的人个个都游手好闲不干活。天不可阻挡地渐渐亮了。同行者们没事干，谈论着美国，美利坚合众国，谈论着关于三十年前美利坚合众国曾是一个最最粗放型的农业国。这是关于计算纸浆的价格，关于工厂在三年时间里收回成本、关于社会主义的积累资本应以几何级数增长和十年以后这个工厂应有五个这样的兄弟厂的白天的谈话的继续。布尔什维克们谈论着创造的激情。脑子被夜晚和各种印象搞糊涂了。应该说出一个同行者的名字——马尔捷米安·彼得罗维奇·舍夫琴科，塔拉斯·舍夫琴科的孙子，乌克兰的农民，现今是列宁格勒造纸托拉斯主席。这对于黎明不是偶然的。塔拉斯·舍夫琴科从前是农奴。伦加奇车站的窗户被朝霞映红了。马尔捷米安·舍夫琴科谈着他刚刚去过的美国。

人类的天才所创造的一切都记录在纸上，人类有史以来，人

的全部脑子总是流在纸上，流在人所创造和所做的一切上，流在人类及人类的历史和建设中应有的一切上。工厂是为生产纸浆（纸便是纸浆做的）和纸张而建的。这座工厂给造纸厂生产五万吨即三百万普特纸浆。这座工厂生产五万吨新闻纸，一卷卷新闻纸销往全苏联。这座工厂生产一百三十五万普特纸浆，为此，六千人和四千五百匹马要在零下二十七八度的林中土窑里过冬。包装纸车间利用纸浆废料生产出二十七万普特包装纸。

这座工厂，这座城市建在森林里，就是为了造纸，造最伟大的文化发动机，以便把人类的思想记录在上面，——这座工厂像一艘巨大的海船，十一层蒸煮车间的圆顶就是其指挥桥楼。这艘船，不管怎样，只有一条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路。

……在拉戈吉希河东北方，在夏西河东南方，在亚洲，在哈萨克斯坦铺设了一条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突西铁路。在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前来参加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典礼的那一天，在艾纳-布拉克附近，也就是在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南北两条道路的结合处附近，正在铆接北路的最后几公里。政府的列车载着政府的代表、工人代表团、苏联新闻记者和文学家以及从美国到日本的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离开莫斯科，以以上那些人的庄重稳健驶入夜晚的庄重稳健之中。他们是从千千万万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有名望、有地位和事业。载满了休息的人们的列车在稍稍压低声音的淡紫色的梦的牧笛中稳健行驶。列车向亚洲、向原始状态、向沙漠驶去。这是发生在1930年4月20日夜到21日的事情。

已经临近了艾纳-布拉克，临近了4月20日，南部的铺路场赶上了采石工人，顶到了山岩跟前，于是铺路工人把自己的道钉锤换成了铁锹，帮助采石工人，干了一昼夜。夜渐渐向21日走来。日落时，阿芒纳炸药轰隆隆地响起来，山岩被炸开了，道

路往山里推进了。白天下了雨。殷红的晚霞即将退去，在沙漠中，在绵延数千公里的地方，——在炎热和沙地后面，——近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几乎人迹罕至，阿芒纳炸药在落日余辉中轰隆作响。于是人们向着阿芒纳炸药响起的地方拥去。黑漆漆的夜晚来临了。甚至夜色中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在被阿芒纳炸药炸开的山岩之间挂着汽灯，内燃机车把探照灯的白光洒满了狭谷。天上下着雨，工业的灯火划破了黑暗，把山岩、狭谷、人们的脊背、枕木、十字镐、大锤、铁钎、脸、微笑、旺盛的精力和疲惫不堪留在了亮处。一辆辆小斗车从黑暗中出来，吱吱嘎嘎地响着，又走进黑暗中。灯火变化着方向，所以看得见的总是一些拿着十字镐，弯着腰刨花岗石的新的脚、头、脸。哥萨克和俄罗斯人的斗车和内燃机车在轨道上往来穿梭，干得很欢，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和阵阵呼哨声，没有信号灯。斗车和内燃机车的响声和干活的砰砰声与俄罗斯-哥萨克的搬运曲混合在一起：

啊唷，来呀！——干起来哟！
啊哟，走起来哟！

人们彼此叫喊呼应，石头轰隆作响，信号钟丁丁当当，气压钻岩机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在这岩石、机器、人们、灯光和各种声音的混合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这里指挥和调度的是工业。在向右一百步远的地方，在向左一百步远的地方是——沙漠、黑暗、数千公里的沙地和没有人烟的空地。向前一百步远的地方是——峭壁、花岗岩和为了敷设钢轨而必须打通的峭壁垂直面，在这条钢轨上将要通过的第一列列车就是今天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4 月 22 日，当免票的莫斯科列车上的

乘客在到达奥伦堡之前睡觉时，铺路工人和采石工人在早上七点钟共同把最后的大块花岗岩从狭谷中清理掉，而中午一点钟，当免票列车的乘客用餐时，这些铺路工人扛着道钉锤走在枕木上，去敷设钢轨。旁边的山岩后面是艾纳-布拉克河。艾纳-布拉克河上还有一座桥保留下来。北方人-铺路工人迎着南方人走来了，想认识一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志们，但是迎面——面对面——向他们走了两年。在这两年期间发生过许多事……在齐克帕尔山口，在伊犁河那边，一队铺路工人被零下五十度的暴风雪埋住了。铺路工人行有加温车，住有帐篷。狗在严寒和暴风雪中都倒毙了，但人们在工作。在这数千公里的严寒、风雪和沙漠之中，面包、燃料、工具并不总是能及时运到。白天，人们冒着山口凛冽的严寒修路，夜间，把辎重和宿营的帐篷拉到前面，好把白天的时间腾出来干活。有一天夜里，刮着暴风雪，一节锻造车厢脱轨翻倒了。为了第二天一早就能开工干活，当天夜里必须把这节车厢竖起来。暴风雪好大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想把车厢竖起来，需要拉枕木来，用枕木做成千斤顶。于是苏尔坦·巴斯特尔巴耶夫冒着暴风雪的黑暗去拉枕木了。巴斯特尔巴耶夫陷入呼啸的狂风之中。巴斯特尔巴耶夫在暴风雪中失踪了。当时剩下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四散开去，彼此叫喊着，呼应着，去寻找牺牲了的巴斯特尔巴耶夫。巴斯特尔巴耶夫找到了，他和马一起翻倒在陡峭的山岩下边，他没能从那里走过去，陷进了雪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时挨冻的一队人开始向前赶路，那是创记录的几公里路程，既非常短又非常长，因为刮着暴风雪的这两三公里路是创记录的、是超过美国的、是铺设钢轨的两三公里。在巴尔喀什湖那边和整个这片空旷的草原-沙漠上，新月形沙丘不停地游移，把草原变成沙漠。哪里有沙子流动，哪里就没有水，哪里就什么都不生长，除

了梭梭，哪里就什么都不存活，除了蜥蜴和乌龟。现在已经不是零下五十度了，而是巴尔喀什沙地上的七十度高温。时常刮风。风卷起沙子，像雪粒似的，沙暴狂吹，沙子迷眼，随着呼吸进入肺里，灌进牙齿缝里和食物中，一嚼就咯吱咯吱响。沙堆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把一切都盖住和弄乱了。在这样的沙地上，汽车无法通行，双轮大车会陷进去。铺路工人就是在这样的沙地上，冒着如此的炎热和沙暴行进，铺设钢轨。这片沙漠上没有水。水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在这非常的酷热中，人们喝水是有定量的，一人一昼夜供应一升水。人们被沙子打坏的眼睛发痛。沙子侵蚀着伤口。在沙地上，又没有水，挖土工人的马都拒绝干活了。人们向前行进，把空闲时间用来消灭塔兰图拉毒蛛、避日虫、蝎子和毒蛇。人们走过了这些沙漠，在沙漠中建起了铁路的工业。而每逢春天，当被溪流催赶着的河水暴涨起来的时节，人们在盐碱地上下到没膝深的腐蚀皮肤的咸水中干活。出乎意外的、料想不到的水有时弄到枕木上，冲坏了路基，使业已铺成的铁路面临被毁掉的危险。人们同水作斗争，同夏天极其缺乏的水作斗争，没有劳动时刻表，昼夜不睡觉，有时甚至其他人也睡不成觉。发生这种情况时，铺路工人成星期成星期地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地平线和天空；什么都听不到，除了机器的轰隆声，风的呼啸声，鸟儿的鸣叫声和蜥蜴的吱吱声。

无票列车驶近奥伦堡郊外，沙漠立刻展现在眼前，这是一片灾难性的辽阔的、灾难性的赤贫的、黄澄澄的、无边无际的、四月份就已经被太阳晒焦的、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炎热的沙漠。从这个哈萨克的亚细亚到阿雷斯、奥利耶阿塔、阿拉木图，艾纳-布拉克的一路上到处是沙子和炎热。白天酷暑难当，夜晚严寒砭骨。被吹走的新月形沙丘，像被暴风雪吹走的雪一样的沙

漠、梭梭、艾蒿、石头、沙地、新月形沙丘、梭梭、盐湖，盐像雪一样摊在湖岸上。偶尔能见到几处帐篷。偶尔有骆驼走过。偶尔有骑马疾驰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看见火车以后，打几十公里以外就飞跑着截断火车的去路，使马和火车头赛跑。咸海的水流到了沙漠里，海就像沙漠一样了。沙漠黄澄澄的，犹如驼毛，被太阳烤焦的空地，像蒙古人的脸。列车超过了莫斯科时间三个小时：莫斯科时间落后了三个小时。咸海那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天山支脉终年积雪的山巅，天山那边，紧挨着就是中国。太阳灼人，气温高达五十度，列车从枕木和沙子上驶过，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列车从突西铁路枕木上碾过：如果把这两条蜿蜒的路轨从地平线上拆除掉，那么它的景致将又会是许多世纪以来的那个样子。骑马的哈萨克人追上来了，飞跑着追上了那两个拉着免票列车车厢的火车头。

沙漠。

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这条小溪经过了水平仪的计算，使用其每一滴水都经过精打细算，这就是古代的水利，灌溉系统，——住在主要灌溉渠那里的米拉布[①] 指挥着河水的流动。现今指挥灌溉渠的是工程师，所以在这里，在这些灌溉渠附近，在只是把无门窗的墙朝外的平顶房附近，在这里——亚热带植物，杏树、核桃树、扁桃树开花了。用水平仪测量过的田里生长着棉花、水稻，旱地里生长着麦子。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从哈萨克斯坦语准确地翻译过来就是——苹果之父。古代的水利可以改造，现代的水利可以修建。美国一些工程师来到中亚。工程师戴维斯在自己的祖国美国曾是政府水利部部长，他对免票列车上的人们说，他打算在近五年内在中亚重新

① 在古代乌兹别克斯坦由国王封的水利官员。

装备耗水量和灌溉现在的荒地（比如，饥饿草原[1]），这两项工作的数量是他在美国二十年时间里所灌溉土地的数量。工作已经开展起来，而且这些新的水正在改变着沙漠的景色。沙漠，炎热！斜坡上有的地方长着粉苞苣、茎叶肥壮的绿油油的牛蒡、含有橡胶的植物，沿巴尔喀什湖，在伊塞克湖那边，沿伊犁河的最深谷地线，生长着野生茶叶花。东方的地平线上耸立着巍峨的山脉，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金属。好一个灾难性的辽阔幅员！

为了证实突西铁路的开通，一些外国新闻记者也乘坐免票列车进入了亚洲。他们的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从艾纳-布拉克发往地球的四面八方。外国人旅游像老奶奶一样，随身带着一条猪腿、一箱酒、一箱矿泉水、一桶桶罐头、咖啡壶、茶壶，尽管餐车上供应很好。外国记者有两台放狐步舞曲的留声机、鸡尾酒手册、照相机，甚至还有摄影机。他们又吃又喝，按照美国的规矩打扑克，休息时听狐步舞曲和黑人舞曲，他们给骆驼、给自己和骆驼、给哈萨克人、给哈萨克人的帐篷拍照和摄影，拍累了便喝鸡尾酒来提精神。列车第一次从伊犁河的新桥上通过时（第一列列车第一次过桥），有些外国记者像从前老奶奶那样不敢过，于是便徒步绕过桥去。

地平线上枕木旁显现出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和三四座帐篷——这是一个小站，会让站。成排的房子还没有建成。列车向车站行驶，骑术高超的骑手们，骑马的哈萨克人在辽阔的沙漠上也向车站驰去，他们的马紧贴着地面袭步飞奔。在车站上，哈萨克人密密实实地站了一片。他们的脸是原始的。在炎热中，哈萨克人穿着羊皮长袍，羊皮裤子（但有些人赤着脚，哪怕只用大拇趾随便地扶住马蹬也好！），他们的帽子护耳也是羊皮的。马

① 饥饿草原，又称南饥饿草原，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的个头特别小，跑得特别快。哈萨克人的马鞍上驮着被子，于是马鞍被涂成了红色。哈萨克人很乐意使自己的马奋蹄疾驰，莫斯科人好像从这些筋疲力尽的马上坠落下来。哈萨克人的帐篷里摆着大箱子，地上铺着地毯，帐篷中间生着小火炉。看来，哈萨克人还不懂得需要洗脸。他们身上有一股马汗味和马奶酒味。不是在一个车站上，而是在好几个车站上，哈萨克人都这样问：

“列宁是和你们坐一趟车吗？请把他指给我们看看吧，”他们不知道列宁已经死了。

哈萨克人纷纷爬到列车上，摸摸这儿，动动那儿，得意地微笑着。这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头一次看见的第一列列车。两个哈萨克人来到餐车，——他们脸上显出惊惧的神色。他们害怕地彼此望了一眼。他们向前伸出手来。他们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他们在镜子里彼此指给对方看。他们抽搐着可怕的脸。他们哈哈大笑。他们战战兢兢地用手指和马鞭戳戳镜子。这两个哈萨克人有生以来头一回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头一回在镜子里仔仔细细地看自己，认识了自己。外国记者给哈萨克人照了相，摄了影。可以请哈萨克人吸烟。他们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可以邀请他们唱歌。这时两个哈萨克人面对面地在枕木上坐下来，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把自己带护耳的帽子推到后脑勺。这时沙漠上响起了声音，声音拖得很长，长得像沙漠，声音干巴巴的，干巴得像炎热。他们的歌很短，只有一句歌词：

“哈萨克人在草原上放牧着自己的畜群，可是草原上来了一辆大铁车。”

或者：

“沙皇把哈萨克人叫作狗，可是苏维埃政权来了，于是哈萨克人成了哈萨克人。”

或者：

"一个哈萨克人放牧着自己的畜群，可是来了一辆大铁车，于是这个哈萨克人当了工人，参加建设。"

当列车驶进艾纳-布拉克站时，已经是夜间了。于是夜间出现了那种古代的、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景象。艾纳-布拉克站位于谷地，有十平方公里的斜坡，西临沙漠，东抵群山。所有的山丘和所有的谷地都被游牧人停宿地的篝火照得发亮。列车停了，止住了隆隆的响声，这时从黑暗中，从十公里以外传来了游牧群的声音，马的嘶鸣、骆驼的吼叫和喉音很重的人们的叫喊声。有一股炊烟味、干粪味和马汗味。黎明把游牧人的宿营地暴露了出来。宿营地像在拔都[①]时期、帖木尔[②]时期的宿营地一样。所有的山丘上满都是骑马的人。他们或单独一人，或三三两两，或一帮一伙，或浩浩荡荡成群结队地骑马驰来。马扬起的尘柱直冲云天。哈萨克人从五百公里、七百公里（哈萨克斯坦可比欧洲大！）以外赶来参加庆典活动。骑在马上的除了男人还有妇女和儿童。三岁的孩童坐在马鞍-摇篮里，七十岁的老婆婆在用银子打造的马鞍上打盹。妇女们的头上裹着白缠头。载来了世界各国人们的几列免票列车停在谷地的枕木上，三个星期之前，这里除了春天的郁金香和艾蒿以外，什么都没有。列车头对头地停在那里，因为它们之间的枕木还没有铺完——总共有几米，这几米将在庆祝活动这一天，在通车庆典这一天铺完。哈萨克人来参加庆祝活动，目睹从未见过的新鲜事。在山丘上十三个地方，大型公共食堂炊烟袅袅，在沙漠上升腾飘散。突西铁路管理局请集合起来的全草原的人吃馅饼。在这些酒宴上，在用薄木板搭起来的棚子底下，在五十度的高温中，穿着

① 拔都（1208—1255），蒙古汗，成吉思汗的孙子。

② 帖木尔（1336—1405），中亚国务活动家，军事统帅。

羊皮长袍的哈萨克人盘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用手抓着吃羊肉饭，喝矿泉水，像喝伏特加似的，拔都的酒宴被摄影机摄下来了。酒宴结束后，哈萨克人冒着午后的炎热，骑着马朝山丘后边的草原驰去，数万名骑手参加了越野赛马，捉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庆祝和狂欢。在那里，在草原上，数万人围着土岗排成了方阵。雷斯库洛夫，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萨克人，骑着马，在土岗这边指挥着。哈萨克人的数万匹马围着土岗站定。勇士们，参加一对一交锋的骑手骑马来到中间，来到土岗这边的空地上。骑术高强者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两个勇士必须互相格斗，其中一个要从马上摔下来，——胜者组成委员会，并获得奖品。对手们互相进攻，互相从马鞍上拉下来，他们的马含有敌意地嘶鸣和互相撕咬。然后，骑术高强者开始了越野赛马——捉羊。急急跑来一只活山羊。每一个人都有权抓住这只羊，把它搭在马鞍上带走。谁把这只羊运到土岗那里，谁就是胜者。每一个人都有权把羊抢过来。比赛中，一个哈萨克人的手臂被弄得脱臼了。他晕了过去，他的手臂空前地弯成了弓形。立刻，马上，以哈萨克人的方法把这个手臂脱了臼的人抬到了马上，立刻使他的骨头复位了。他刚一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就投入了一对一的交锋中。当把山羊放出来时，草原上回荡起无比的、空前的嗥叫声。游牧群上空扬起铺天盖地的尘土，比伦敦的雾还浓，尖叫声和嗥叫声响成一片。骑马的游牧群朝一个方向奔跑了数十公里，然后右转，由原路飞驰而来。谁胜了，谁将在方圆很远很远的地方成为英雄。这许许多多碰过运气的人违反本能地骑在马上，在草原上飞驰，尘柱滚滚，马尾飘动，叫声喧天，原始森林一闪而过，好一派古代壮观景象！好一片库

利科沃原野[①]！……道路就这样被哈萨克人开通了——不单单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中亚、苏联的道路——而且是全球的道路。在突西铁路的一个车站上，免票列车的餐车里进来四个人：两个工人和一位带着女人的年轻工程师，那女人大概是他的妻子。天已黄昏。进来的人在旁边坐下来，点了欧洲风味的菜肴。工程师的妻子把端上来的菜分到盘子里。三个男人精神勃勃，在这里，在成吉思汗、在匈奴和哈萨克人的沙漠上。列车上不仅有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且还有欧洲的、海外各国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车厢里除了俄罗斯人，除了大陆的欧洲人以外，还有开放的美国人和保守的日本人。列车过道里散发着“古怪”的气味。

餐车里浆过的桌布发白，像人们的白衣领。列车停在梭梭和新月形沙丘滚烫的沙地中，餐车里却有冰镇矿泉水。有四个人来到餐车吃晚饭的那个车站是这样的：站长指挥着道路、道岔、处理着临时板棚中发来的电报。车站周围有六座帐篷。一条灌溉渠从站旁流过。在灌溉渠后边，帐篷后边，草原上的沙漠向南、向西和向北绵延开去，东方是冰冻的天山山巅，沿天山山脉是中国边界。在这个车站上，人们喊着“乌拉”，迎接了这列免票列车，哈萨克人骑着马，来到列车的紧窗户跟前。先卡塔雅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用英语发表了讲话。炎热渐渐退去，寒冷袭来。西边的余辉久久燃烧，变暗了。沙漠向黑暗延伸，发出艾蒿气味。列车上的人们休息了，他们被白天的炎热和在突西铁路贯通庆典日之前折腾得疲惫不堪。火车头在黑暗中慢慢地蓄水。这四个人在靠边的一张小桌后边

① 在涅普里亚德瓦亚河与顿河之间。1848—1850 年在库利科沃会战的地方建有纪念碑，纪念俄军 1380 年首次在此大败蒙古鞑靼军。

坐下来。三个男人一身行军的装束：高筒皮靴，军便服上衣。他们很快活。他们彼此开着玩笑和碰杯。他们点了独出心裁的菜肴，从容地品尝着。餐车里灯光明亮。坐在邻桌的是美国人。他们疲惫地喝着酒，坚决地说着彬彬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的真理：甚至亚洲都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火车头驶近了，把列车推走了。一个服务员警告说，列车开行了。

“没关系，”工程师说，“我们在上坡道上从车上跳下去就行了。”

列车驶入了黑暗。半小时以后，列车减速了，开始钻山洞。工程师付了账。一行四人站了起来，美国人发现连那个女人都穿着擦上油的皮靴。客人们离开餐车，来到通过台上。火车头发出嗞嗞的响声，吃力地爬坡。

“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列车员问。

“返回车站去。”工程师愉快地回答说。

头一个跳下车的是年龄大些的工人。在他之后跳下去的是那个女人。火车头发出哧哧的声音，车厢里的窗帘放下来了，长龙似的列车在上坡道上不时地吱嘎作响，从留下来的人身边驶过，转入山岩，消失在黑暗中，开走了，载着人们去庆祝突西铁路的开通典礼。这四个人走在崎岖的山丘上，没有小路，他们对草原和难以通行的山道已经习惯了。他们走着，精神勃勃，十分快乐。走了一个小时以后，在山下边很远的地方，在黑暗中，车站上亮起的一星灯火依稀可见。一路上，四个人唱着俄罗斯歌曲。又走了一个小时，渐渐看得见草原上车站周围的篝火了：这是前来迎接列车的哈萨克人，他们在这里安顿下来过夜，煮自己带来的砖茶，烤羊肉。又走了一个小时，同行者们来到了车站。他们刚一从小丘上下来，便冲着车站上的黑暗喊道：

“我们走来了！我们回来了！”

人们纷纷从窑洞里，从帐篷里走出来，聚集在一座帐篷对面的篝火旁。

“哎，请讲一讲你们有什么收获。”

水电勘查队暂住在免票列车通过的车站上，骆驼在山丘的斜坡上放牧，人们在帐篷里休息，帐篷跟前停着辕杆朝上的双轮大车，车上装着勘查工作者的钻探工具、化学实验室和简单的家具什物。这支勘查队已经在沙漠里走了两年了，寻找和检验着水，以及水的数量、月流量、水位、成分，这是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生命之水。这支勘查队由七十名工人、工程师-水文学家、地质学家、测地专家、还有三位女化学家组成。这支流动勘查大队从一个长丘走到另一个长丘，从一个土包到另一个土包，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既在地上，又在地下数百米的地方寻找着水，在这一队人的记忆中既有夏日难以忍受的炎热，又有山口处肆虐的暴风雪，每当这时候，狂风把帐篷撕成碎片，刮得到处纷纷扬扬，雪埋住了骆驼。这支流动大队夜晚在篝火旁宿营，白天在建立英雄业绩的勘查中行路，它应该给突西铁路带来水，并且把生命也同水一起带来。这支勘查队还将在沙漠里行走很久，还将拉着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仪器、帐篷、家具什物的双轮大车慢慢爬行，还将支起帐篷、使辕杆朝天扬起，还将在篝火旁休息，顶着炎热工作。勘查队里的人在一起住熟了，像兄弟一样。夜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童年的故事。在餐车里用过餐的那四个人是：来自巴库的一个矿工；一个挖土工；一个两年前刚从莫斯科矿业学院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年轻党员，科洛姆纳一个工人的儿子，第四位是他的妻子，从托姆斯克来到这里参加突西铁路建设的勘查队的化学家。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被召集起来的。世界

与这些勘查者的联系被切断了，——唯有勘查队员们随身携带的、把天线固着在帐篷上的无线电广播报道着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在免票列车通过的那一天，勘查队休息了。他们像期待喜事似的期待着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列车晚点了。人们登上山丘，想看一眼将要从这里，从三个月之前除了沙漠一无所有的地方通过的第一列列车。当时一个工人自我惊讶地说：

“啊真的，真奇怪，”他惊讶地说，“列车上有饭馆了！我已经两年没有下过馆子了！”

半小时以后，勘查队集合起来抽签，他们开着玩笑，打打闹闹，十分开心。人人都到餐车去是不可能的。凭抽签选出四个幸运者。

“哎，请讲一讲你们有什么收获，”高级工程师说。

“美美地吃了一顿！”巴库来的工人回答说，把帽子推到了后脑勺，“有餐巾，桌子上铺着桌布。”

“喝了矿泉水！”

“等一下。请按次序讲。谁先报告？”高级工程师说，“请按次序讲。你们爬上了车。坐下来。点了菜。点的什么菜呢？”

“凡是我们这里没有的，我们全都点了。我把餐巾塞到胡子下边，像美国人那样！”挖土工说。

帐篷旁边的锅里煮着羊肉。含有盐分的星星在帐篷上方的天空中，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的天空中闪烁。炎热消退以后，严寒降临到沙漠上。勘查队员们围着篝火，有的蹲着，有的躺着，他们详细询问幸运者们，并在每一次回答之后都哈哈大笑，他们什么都打听，从餐巾的质量到美国人的眼镜。夜很深了，勘查队员们才各自散开，回自己的帐篷睡觉去了。年轻工程师钻进帐幔，在帐篷里羊毛毡上躺下来，一只手放在头下边。他回忆起莫斯科，回忆起大学生时代，他在想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

的南北两条铁路明天将要贯通，西伯利亚将要与中亚连接起来，人们将要聚集起来，观看通车庆典活动，前来参加突西铁路开通庆典活动的全球的记者们将要发出电报和无线电报，这些电报和无线电报一昼夜之间将传遍全球。他在想，在政府的这列免票列车通过之后，将会有许多列车开出，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考虑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这片水决定一切的缺水的沙漠中为这条铁路的贯通提供了最主要的、决定一切的东西——水，水！在这两年里，他看见沙漠怎样在沙漠中减少，钢轨怎样铺到沙漠中，运来了一切能够运来的物品。在夏日的炎热中看得见地平线上不存在的城市幻景，但一座座城市却在现实中出现了。如今建起了阿亚古兹车站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有过五所土坯房子和四座帐篷的沙漠。曾经是一片沙漠的地方如今是阿亚古兹城，1928 年 8 月，那里，山丘上，风呼呼作响，峭壁下，博坦小溪流水淙淙。同年九月，那里出现了勘查者们的浮式排泥管，一个没有在纸上设计出来的新村。1929 年 5 月，那里出现了一座城市。那里出现了既有宽敞的俱乐部，又有明亮的食堂，还有修理厂、电报局、电话局、医院、铁路桥畔的铁匠铺——修理厂发展成了大工厂。那里正在兴建、即将建成和已经建成的有：突西铁路上巨大的机车库、压花厂、屠宰冷藏联合企业、发电站——全然一座新兴的城市，楼房林立，围着栅栏的房前小花园，街道，摆在房前的长凳，合作社小铺上的招牌，广播，摩托车和汽车的轰鸣声，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休息、繁衍生息。离阿亚古兹不远是一座军人监狱的旧城，谢尔基奥波利城，这座城建于帝王时代，是为那些必须维护君主政体的士兵而在沙漠中建造起来的。于是谢尔基奥波利城，在这座城里活着的人都逃到阿亚古兹去了。就是说，在突西铁路上，不仅有城市在诞生，而且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地方、车站、会让站和小山村

在消亡。勘查队一开始就看见了商队，骆驼队在沙漠里行走，它们来自中国，到中国去，到蒙古去，或在哈萨克斯坦，来自吉尔吉斯，到吉尔吉斯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些载着沙漠中的商品，载着棉花、大米、皮革、俄罗斯印花布和小金属制品、粮食、木材、毛织品、皮毛的沙漠中的船只用无声的脚步走过成千上万公里，于是这草原上的原料和俄罗斯联邦的工业产品从塔什干、谢米帕拉金斯克、阿拉木图到塔什干、谢米帕拉金斯克、阿拉木图转辗行程千万公里。勘查队还看见塔什干和谢米帕拉金斯克如何互相迎面走来，为了使沙漠减少，使沙漠推移开去数千公里，使中国西部靠近艾纳-布拉克，近得使其好像在这些沙漠存在的许多世纪里从来不曾有过。商队改变着自己的道路。勘查队走在哈萨克人的草原上。勘查队见过哈萨克人的帐篷、他们的马、他们的畜群、无与伦比的极度贫穷和由贫穷而造成的懒惰、宁静和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只局限于沙漠、帐篷、马奶、妻子（或几个妻子）的肥大灯笼裤、绵羊生病，以及刮风、严寒，哈萨克人躲避严寒像躲避炎热一样，裹上从来不替换的熟羊皮。勘查队见过哈萨克人生活的原始状态，那时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不能称之为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勘查队起初看见哈萨克人害怕地望着他们的浮式排泥管和施工现场。勘查队看见哈萨克人后来如何到他们这里来刨土、挖土、运土，以便给道路修建起床榻。施工结束时，勘查队发现，在突西铁路的许多车站上和小车站上，几乎在每一个车站上，当扳道工、给油工、乘务员、司磅员、看守员的都是哈萨克人，而在突西铁路枢纽站上为哈萨克人建起了学校和专修班，在这里教哈萨克人学当司机、钳工、站长、报务员、办事员、会计！……铁路使空地得到改造。铁路使人得到改造。铁路使面包和拥有面包的权利得到改造。沿着铁路兴

建了水利，这些水利将灌溉千百万公顷水稻、棉花、洋麻、茶叶花、苧麻。无论是勘查队还是哈萨克人，夜晚围坐在干粪块燃起的篝火旁，唱了多少支歌颂伟大的道路的歌曲啊！……

7月20日从莫斯科驶出的政府的免票列车来庆贺突西铁路贯通典礼。泛着瓦灰色光泽的普尔曼式列车沿着突西铁路的枕木向艾纳-布拉克站驶去。列车夜间驶抵艾纳-布拉克站，停在主道上。艾纳-布拉克站周围的群山亮着古代宿营地的灯火，因为哈萨克人从方圆数百公里的地方赶来集合在这里庆贺突西铁路的开通。艾纳-布拉克的群山和山丘上篝火旁的哈萨克人那副样子像在拔都时期一样。

无论是夏西河还是突西铁路——都已成为日常生活必需、不可或缺、理所当然的，——载入了产生新的空间、新的时代、新的人们的历史之中。

……阿尔别科夫木屋中的矢车菊、薄荷、洋甘菊、酸模、艾蒿都凋谢了，枯萎了。

帕列赫附近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可怕的羊踯躅草。猎人都害怕这种草。羊踯躅草的气味几乎闻不着，但是假如在生长着羊踯躅草的地方待上哪怕不到半个小时，人就会晕厥，感到心里发紧、耳鸣、恶心。假如朋友们不把羊踯躅草中毒者带走，假如后者不从沼泽里爬开，假如他是单独一人，那么他必将死于羊踯躅草。无论是野兽还是人都不在羊踯躅草附近生活。但羊踯躅草会和沼泽地一起消失。沼泽地却要人去消灭。

第五章

当黑麦受了粉，结了子实以后，黑麦便发出一股尘土气味和人体气味。但这些气味被白天、太阳、艾蒿、矢车菊、风铃草和洋甘菊的气味盖住了，只能稍稍闻到一点。

如若躺在黑麦田里，透过黑麦秆仰望天空，那么天一定要是晴天，一定要碧蓝碧蓝的，辽阔的天空一定要是高不可测的……而到了晚上，月亮会从高高的黑麦秆里穿行，这时便觉得天空的月亮仿佛是水晶玻璃做成的——发出清脆的丁零声……黑麦——子实，——多么巨大的人类文明啊！——巨一大一的，——从人根据果穗把黑麦从杂草中挑选出来，并将其种植，将其从杂草中保护下来的那个时候以来！……黑麦田旁边是亚麻田，亚麻蔚蓝色的风铃花刚刚开谢，结出了碧绿的蒴果，亚麻织出的布匹，做成的服装、饰物和裙子同样是巨大的人类文明。

椴树已经开花了，头茬草莓和水越桔过去了。林子里的马林浆果成熟了。7 月 14 日，在法国革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1] 的这一天，艺术家们去休假了，去割草了。帕列赫家家户户的院子里传出了打铁的当当声，——艺术家们在把大镰刀刃打直。

尊贵的客人们打算到艺术家们这里来，他们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雅科夫·斯塔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利夫希茨。功勋艺术家们在集市上物色了一只“站着的”公绵羊，凑足了钱，把它买了下来，暂时放进自家的畜群里。集市上大量出售浆果、鸡蛋、牛奶和油。有卖绵羊、牛犊和猪的，有卖鸡的。功勋卓著、智慧超群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巴卡诺夫向来买东西都亲自到集市上去，从上市到收市，他一直待在市场上，举止稳重，慢条斯理，认真仔细。

在集市上买了两只母鸡。它们是被拴在一起拿回家来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提着鸡，走在她旁边的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生平头一回看见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场面。从集市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家的一路上，所有的公鸡都跟自己的母鸡安静地卧在路边高棵杂草中的尘土中，当它们看见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手里提着被拴起来的母鸡时，便凶狠地站起来，急急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扑去，它们的样子狂怒而可怕，用嘴鹐，用爪子抓，扑打翅膀，威吓地啼叫，召唤公鸡伙伴前来帮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把拴起来的两只母鸡藏到围裙下边，躲开了那群公鸡。很自然，公鸡不会用自己的爪子拿起粗木棍（把人和兽区别开来的人类文明正是从那根

---

[1] 巴黎的一座城堡。1789 年 7 月 14 日，起义人民攻打了巴士底狱。

粗木棍开始的），不然的话，它们定会抄起粗木棍把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痛打一顿呢。在午饭前，在宰鸡之前，两只母鸡被放在屋前小花园里的长凳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八个月的儿子坐在小花园里的地毯上，他已经独立地站起来过一次了，他还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让任何人扶，主动地从地上爬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的房子的台阶上，爬了整整五级台阶！儿子坐在地毯上。他手里拿着一枝有三朵花的矢车菊。儿子身边摆着玩具。他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并且又干了一件新鲜事，也是刚刚被发现的事，那就是：他可着八个月的嗓门大声叫唤，完全像唱歌，——真的，——所以，他一开始叫唤，就应该说一句："哦，小家雀，唱吧。"两只母鸡安安静静地卧在长凳上。一只公鸡突然出现在篱笆墙头上，它喔喔地啼了几声，俨如一位统治者似的叫起来。一只母鸡对它回应了一声，抖动着被拴住的翅膀，发疯似地咕嗒咕嗒叫起来，它从长凳上跌下来，倒在地毯那边。坐在地毯上的儿子停止了唱歌，他不再作声，像只小甲虫似的躲藏起来。母鸡咕嗒咕嗒地叫着，又抖动了一下被捆住的翅膀，它离地毯更近了，儿子完全屏声静气，一动不动，缩成一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第一次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恐惧，儿子用隐藏起来的眼睛望着母鸡。母鸡又抖动了一下翅膀，靠地毯更近了。屏声静气的儿子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姿势，他跪了起来；他准备进行防卫。父亲对儿子喊了一声：

"小家雀！——怎么，小老弟，你胆怯了吗？"

儿子立刻朝父亲那边望了一眼，此前他没有看见父亲。就在这望了一眼的工夫足以使一切发生了变化。儿子的脸上露出了威胁的神色，他厉声喊道："叽呵！叽呵！"这时他以四腿甲虫的速度威严地向对手，向敌人迎面爬去。他向敌人发起进攻。

他手里拿着一枝矢车菊。他完全像作战那样举起矢车菊向母鸡打去。他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对胜利，对父亲一定会保护他充满信心。他做出威严的架势是为了吓唬敌人。他手里拿着粗木棍（把人和兽区别开来的人类文明正是从这根粗木棍开始的），这根粗木棍就是一枝矢车菊。这根粗木棍是有意识地被拿起来的。花园里，儿子和母鸡的上空，椴树开花了，太阳明媚地照耀着。儿子，一小团人肉，已经长成了人。父亲和时代应当关心使一个人成长为无阶级社会的公民，为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根除掉那个古老的粗木棍的本能，同时也是可怕的、经过了社会主义之前人类各个时期的本能。

7 月 18 日，贵客到艺术家们这里来了，他们是：乘汽车从伊万诺沃来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和妻子，乘飞机从莫斯科来的全苏公路建筑大师楚多尔特兰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西尼岑经常提到的那个人）的代理人及其妻子和女儿，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利夫希茨也飞来了。艺术家们在恭候他们到来，可是他们来得很突然，艺术家们把本来安排他们到柳列赫湖钓鱼换成了根据科图欣和马尔基切夫从高加索带来的烹制方法烧烤羊肉串。前一天在集市上买的羊放进畜群里了，可是中午没有把畜群赶回来，也没有在林子里找到畜群。所以招待贵客的不是烤羊肉串，而是传统风味的肉冻、卷心菜、腌黄瓜、小葱煎蛋，当然还有用金盘子端上来的斟在银酒杯里的酒。为了谁都不得罪，贵客们挨家走访了最著名的艺术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艺术家们前呼后拥，给他们唱歌，他们观看了艺术家们的作品，倾听了关于狩猎和割草的传说与真相，而且这一切丝毫不差，像在酒宴和游行的细密画中一样。客人们晚上离开了。艺术家们很兴奋。惊讶的人民举起摆在金盘子上的银酒杯，唱了祝酒歌——“祝大家好，祝大家好，祝大家

好！……”

晚上，畜群赶回来了，在集市上买来的“站着的”绵羊跟着畜群一起回来了，——于是艺术家们，没有客人就没有客人吧——（“真遗憾，怎么搞成这样，当然，贵客走了，只好这样了，是啊……是啊，这事闹的！”），——艺术家们前往柳列赫湖畔烤羊肉，听别连捷耶沃森林，吃高加索风味的菜肴——烤羊肉串。当森林里夜幕四合，夜间起雾时，当马尔基切夫点燃的篝火烧得只剩下余烬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唱了自己的经历：

在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
我全心爱着一个少女。
……与她在一起——
冬天如同春天，黑夜如同白昼……
我忘不了我最后一次
对她说的话，——请原谅，亲爱的！……

已是后半夜了，这时黑暗中只有德德金的几颗星星了，这时树木已移近了盖上薄薄一层灰烬的生过篝火的地方，艺术家们谈了一会儿从星期一开始的割草，说起了——1905 年的宝物。它被埋在窗户下边，埋在马尔基切夫的木屋附近的院子里第三个窗户下边。于是艺术家们决定第二天早晨把宝物挖出来。

这天是星期日。下午三点钟，艺术家们拿着铁锹来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的房子跟前。对着第三个窗户，挖了一个大约三俄尺深的坑。他们在第二个窗户下边挖了坑，在靠近第一个窗户的地方也挖了坑。他们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马尔基切夫，功勋艺术家的整个院子都挖遍了。

但是宝物没有找到，没有挖出来。

“是啊……当然，这事闹的……”

“皮斯通，你怎么会不记得你把它埋在什么地方了呢?”

“是啊，你瞧，过去三十年了……我是夜里挖的，千真万确，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不那么深……挖是挖过，——就在这个地方!”

宝物没有找到，没有像他们所打算的那样把它送到博物馆里。他们决定重新寻找宝物。原先的宝物至今还在，像红塔尔卡一样，但是在红塔尔卡的地方也是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在革命初期，在1918—1919年，当伊万诺沃人饥寒交迫时，红塔尔卡的森林被伊万诺沃的工人们伐掉当劈柴烧了。工人们曾经聚会的塔尔卡附近的田野在三十年间建成了一片工人新村。现在到塔尔卡去必经的那座桥附近，正好在护林室所在的那个转弯处，矗立着一座水泥纪念碑——在这个地方，在1905年，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被打死了，被黑色百人团的坏蛋用皮靴踩死了，他的化名叫奥捷茨，是1905年布尔什维克伊万诺沃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纪念碑后面的山上，三十年前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如今围上了栅栏。塔尔卡将永远是革命纪念的保护区，纵然它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条茂密的森林中的河流两岸展现出--派怎样的生活啊!……就算是已经没有这片森林，就算是那里兴建起一座城市，但塔尔卡依然是保护区!……

而星期一，凌晨三点钟，艺术家们都割草去了。草已经熟了。男人们肩上扛着大镰刀，排成队走在前面，——妇女们在他们后面翻草。镰刀过处，成熟了的冰草、洋甘菊、三叶草、酸模、湿三萝花纷纷倒地。艺术家们忙碌地用镰刀收割着苔草、蒿子、飞廉，镰刀过处，草纷纷倒下。田野上发生着巴卡诺夫、瓦

塔金、祖布科夫的漆画中所画的故事。艺术家们和集体农庄庄员一起割草，他们都是合作工场的成员。

7月21日，大约夜间十二点，这时灯已经熄了，开着的窗户里散发出新鲜的干草气味，整个帕列赫都充溢着这种气味，一辆汽车在阿尔别科夫的木屋跟前吼叫了一声。——有人敲门。阿尔别科夫问：

“谁呀？”

“是我，我来接您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声音。“我从昨天开始休假，今天一大早我就从莫斯科出发了。我接您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干吗在这里和那些圣像画匠待一个多月呢？想必累坏了吧，像和我们一起离开莫斯科到了苏兹达利的那个修士一样，跟他在一块可真够累人的！……我制定了一条路线——我们去参观一下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制造厂，然后到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可以视察视察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业生产，了解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顺道去巴拉赫纳看看。我在汽车里进行了改良，——汽车顶棚上安装了像美国人那样的旅行摇床，带弹簧的。小家雀在上边睡觉会像在家里睡觉一样舒坦，一点儿也不会感到颠簸。我同时还做了一只旅行用的煤油炉。我接你们全家来了。备有帐篷。我们去熟悉一下工业。我的假期从昨天起算。我们顺便去乌格利奇一趟，考察一下它是怎样被淹没的。”

“您为什么不拍电报来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回答说：

“哦，电报嘛……何必白糟踏纸呢？我直接来更方便。我把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过夜的地方啊，食物啊。我们将在森林里睡觉，用河水洗脸，——熟悉一下社会主义的工业。电报嘛——那纯粹是白浪费钱！”

最后一章

帕列赫——伊万诺沃——雅罗斯拉夫尔——伊万诺沃——高尔基——苏兹达利——弗拉基米尔——巴拉赫纳。

拉戈吉希的烟草采购——夏西河——突西铁路——帕列赫——伊万诺沃——第504期《消息报》,也门萨那,阿拉伯。——乌鲁木齐,中国西部。——悉尼,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比勒陀利亚,南非。——苏联——苏联——苏联——

窗户外面狭小的院子里,齐斯牌汽车在装运一捆捆报纸。新闻纸从车站、从夏西河、从巴拉赫纳源源运来。一捆捆报纸运往车站——每天出版的报纸需要七车皮纸张和一千五百公斤印刷油墨。《消息报》社正门的电梯在运行,犹如温度表升温一样,从一层升到六层,升到各编辑部办公室,升到报纸的中枢。电梯按照国家的温度层在运行。其中一期《消息报》上,也就是在七车皮纸张和一千五百公斤印刷油墨上,底栏刊登了阿尔别科夫关于

帕列赫的一篇短文。这是在秋天。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在森林里干活，他冻透了，他回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在集体农庄的马厩里把戈利科夫的马卸下来。他在房子的门限上把皮靴上的泥刮掉，走进木屋，浑身湿透了，累得精疲力尽。半大儿子，中等美术学校的学生，把报纸递给他，高兴地说：

“写我们的！——有一篇写我们的文章！……”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眼睛变得又惊又喜，疲顿的神色荡然无存。

帕列赫，1935 年 6 月 11 日—7 月 28 日

译 后 记

《果实的成熟》译完了。当我把稿子交给严永兴主编时，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一是因为迟延了交稿日期，二是因为我把书中没能解决的难点推给了主编，可以说交了一件半成品！这是很不像话的。这也多少说明了，这部作品绝非休闲读物，翻译起来并不轻松。不管怎样，稿子总算交了，肩头一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可是主编告诉我，由于这套丛书的体例要求，我得写一篇译后记。我心里顿然又感到了另一样沉重。译后记？记什么？我真费了一番思量，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记：翻译这部内涵深厚而凝重、思考空间宽广而深远的《果实的成熟》，我是力所不及的。可单这一句话又如何为译后记呢？其实也可以。但按照惯例却不行，也不严肃。

说实在话，我对白银时代的文学比较陌生，如果高尔基除外的话。要说有所了解，也是近年来从专家学者对白银时代的文学

的评介、文论中零零星星地知道了一点，同时也产生了对它的兴趣。所以当严永兴主编约请我翻译《果实的成熟》时，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我拿到原书一看，密密麻麻的，翻几页不见有段落，心里便有所犯愁。译了大约两万字，便有底气不足、力不从心、译不下去的感觉。于是我鼓了几次勇气，怀着难舍而又不得不舍（因为我自以为触到了这部书的脉搏，感受到了令人沉思的凝重氛围）的矛盾心理，尴尬地提出《果实的成熟》最好换人而译，以保证这套丛书的整体质量。但回答我的请求的是郑海凌先生的鼓励和严永兴先生的信任。我的心情又矛盾了一回：高兴？惭愧？由于力不胜任而最终失败以致殃及这套含有深刻思想内涵、独特艺术视角的丛书而罪不可恕？信任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尽自己所能翻下去。但越往下翻，碰到的问题越难。我觉得对于我最难的是，书中有些描写太专业，譬如：如何画圣像，如何熬漆，如何造纸浆等，可以说，我对这些浑噩无知，这是其一。其二，作者自己造的词或作者使读音发生变化的词以及行话或非常土的俚语，尽管不多。碰到这些词，我真是束手无策，字典上是找不到的。有的只好根据上下文连蒙带猜，但这样容易出错和出笑话，有的甚至连蒙带猜也终究弄不明白。所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担水的感觉。记得年轻时与工农相结合下农村劳动，那时我很瘦，担起两桶水，一半用肩膀扛着，一半用两手举着（减轻对瘦骨嶙峋的肩膀的压力），能走十多米远，但一路上总是晃晃悠悠，好像要被压倒似的，绝不敢像电影中那样潇洒地摆臂挺腰迈大步，那副由于力量不足而被压得走了形的样子其丑陋可想而知。可以说，《果实的成熟》对于我沉重得犹如两桶水。我翻译得很努力很执着，也很苦很累，但毕竟由于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能力和中文的表达能力有限，以致才有这种晃晃悠悠，似被压倒的感觉。不过我还是晃晃悠悠地把这

部作品译完了，同时也真正地喜欢上了它。

我说我喜欢上了《果实的成熟》，并不是因为我终于跋涉完了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转换，付出了辛劳，而是因为这部书本身隽永而丰富的内涵使我反复思索后而感到了一种悲壮感和浓重的历史投影，使我反复咀嚼后而品出了一股富有思辨和哲理的苦涩味。我觉得书中藏有某种东西，我似乎抓住了，而稍一走神那东西便跑掉了，在扼腕痛惜之余，我愈加想要追求它，抓住它。每当这时，我就油然生发出一种像主人公阿尔别科夫在夕阳余辉中躺在黑麦田里一任思想无拘无束地驰骋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直到此时此刻，我仍然为书中的事件和人物而不能平静。譬如：被选举出来的农民沙皇伊万在与外界隔绝的森林里可悲可笑而公正合理的执政；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悲壮的夭折；主人公阿尔别科夫在高加索遭遇大雷雨时那宇宙般的思索；圣像画工罗曼和安东之间那终生化解不开的情结与仇恨；卫生保健医生涅韦利斯基对苏维埃政权的阳奉阴违和像大雷雨般的兽医格罗扎近乎迂直的耿介和坦诚，以及修建突西铁路和巨大的造纸厂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撼的人的超自然的力量……真的，我喜欢《果实的成熟》。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似乎触到了它那跳动的强劲的脉搏，感受到了它那像十二、十四、十五、十七世纪那样久远而博大的人类文化的积淀，那样不可阻挡的历史破冰船从洪荒、远古、原始状态中向历史的新时期的迈进，那样犹如大雷雨般壮丽的人的生命，那样在非人所能忍受的炎热和严寒的漫漫沙漠中修建铁路的人的劳动和创造的神奇，以及书中人物那撞击心扉的沉抑语言，这一切的丰厚意境是那样深沉而深刻！书中的人物似乎都只会说泛着苦味的话而不会漾出笑声，包括阿尔别科夫八个月大的儿子都深沉得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安

琪儿而不敢对其小觑。我觉得，历史应该在这里沉思……这只是我个人对这部作品的一点思考，一点感想，远远谈不上理解和感悟，正如我对作者皮利尼亚克的认识和理解都极肤浅一样。

皮利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1894—1938）是白银时代颇负盛名的小说家。长篇小说《裸年》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红木》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我觉得，假如没有1938年对他的残酷，他一定还能创作出其他作品。很遗憾，其他作品随着他生命的不幸结束而没能诞生。

刘引梅